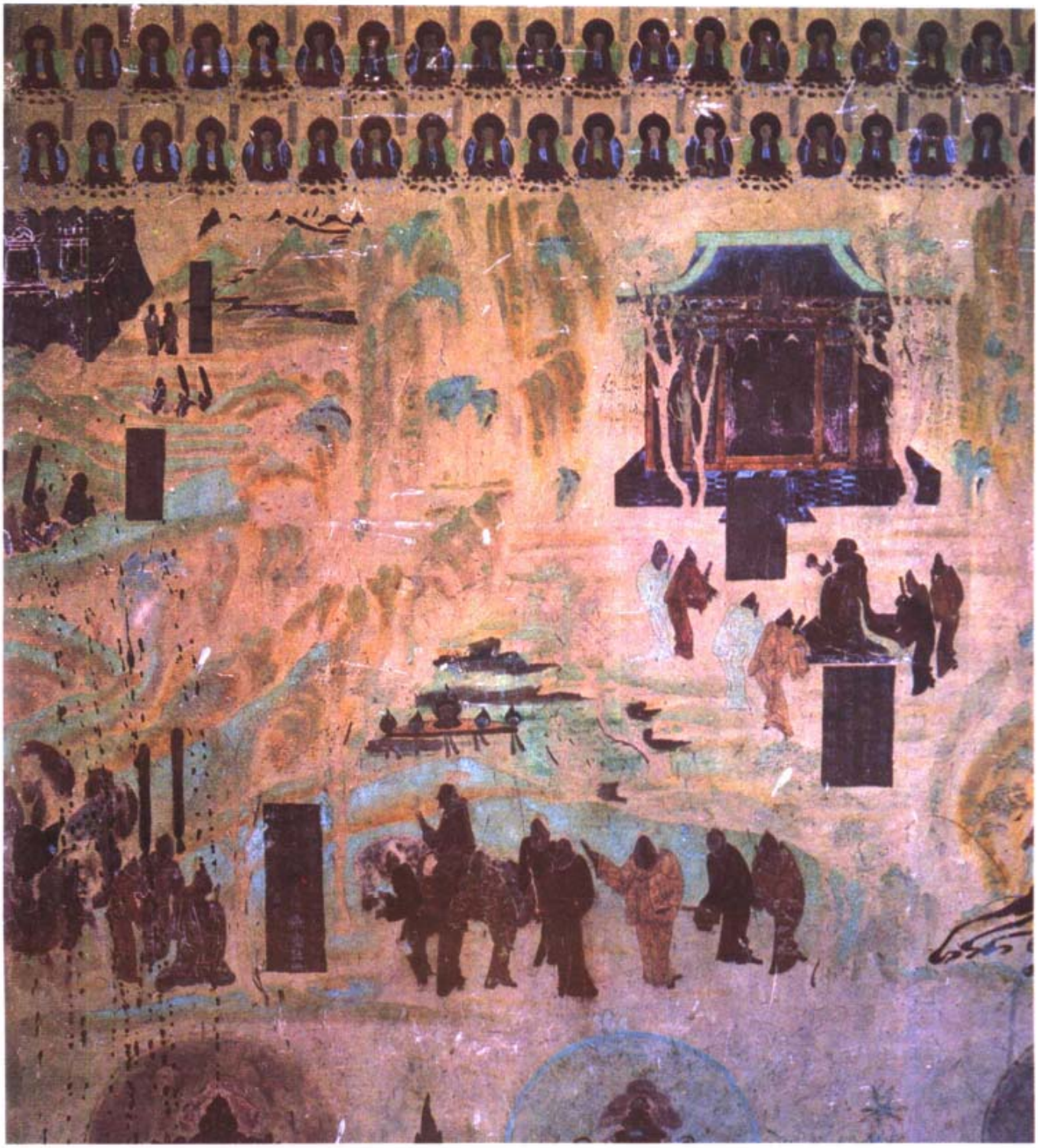


▲1.张骞出使西域(敦煌壁画,323窟,北壁中层西侧)

▲ 2.甲骨文征伐卜辞(A.《甲骨文合集》6057正　B.《殷墟文字乙编》7795)

▶3.湖南衡山县出土春秋晚期桑蚕纹尊

◀ 4.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壶人物丝服

▶ 5.公元前5世纪波斯翼狮金杯

▲6.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出土战国铜贮贝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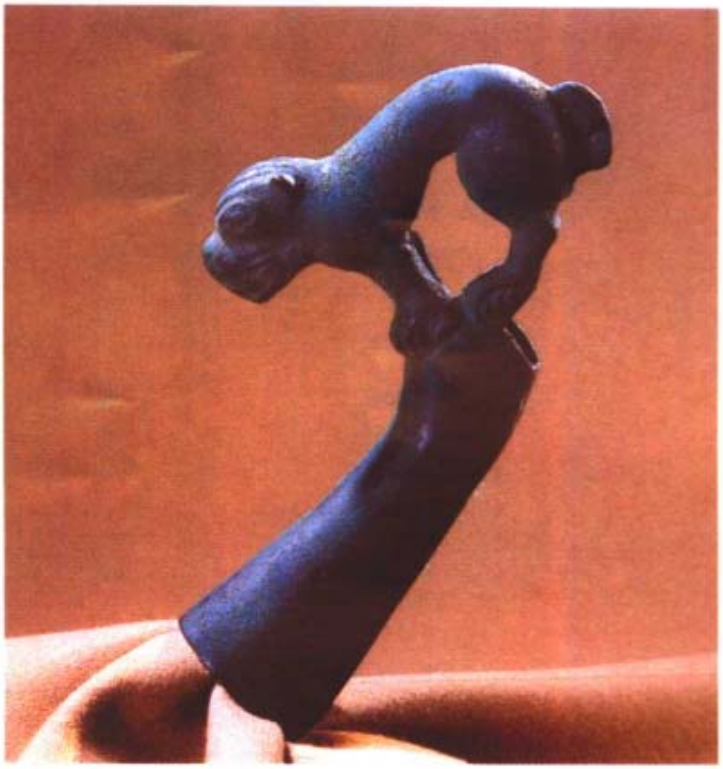
▼7.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彩绘圆雕阿育王造像

▲8.新疆阿拉沟战国墓出土狮形金牌饰

▶9.新疆阿拉沟出土战国—汉初青铜火祆教祭坛

◀10.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匈奴王金冠(战国)

◀11.公元前3世纪匈奴金属饰物



▶12.内蒙伊克昭盟出土战国中晚期狻猊形饰件

▲13.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战国玻璃珠

▲14.新疆伊犁出土战国对翼兽铜环

▲15.新疆伊犁出土战国对虎圆铜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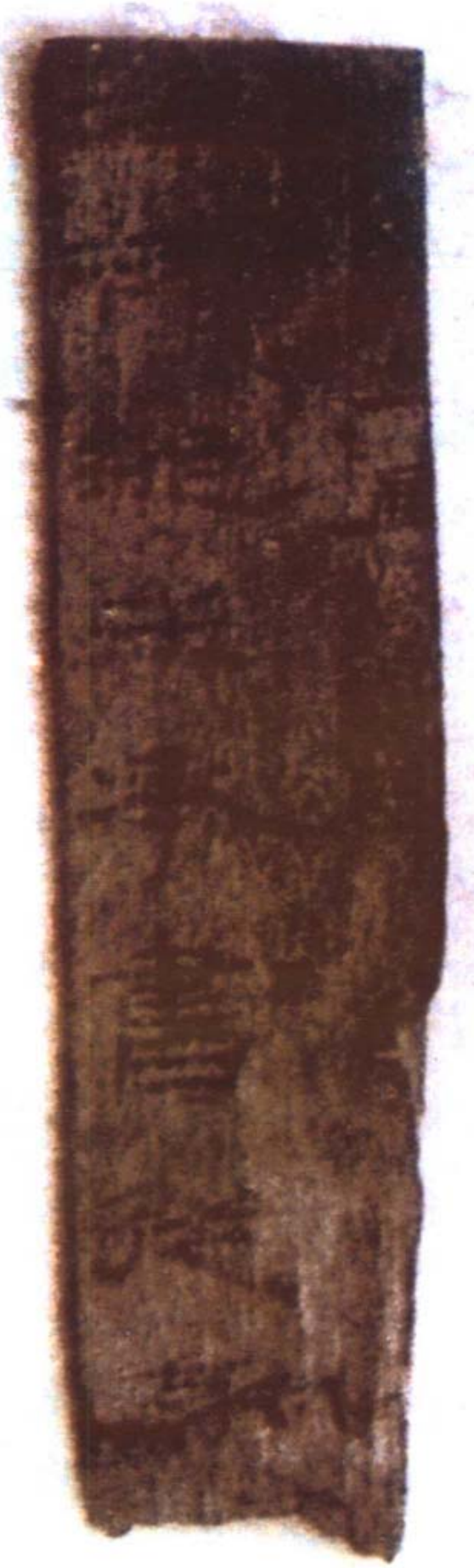
◀16.丸剑宴舞(成都扬子山2号汉墓画像砖)

▲17.沂南石刻百戏图之跳剑(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画像石)

▲18.沂南石刻百戏图之橦技(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画像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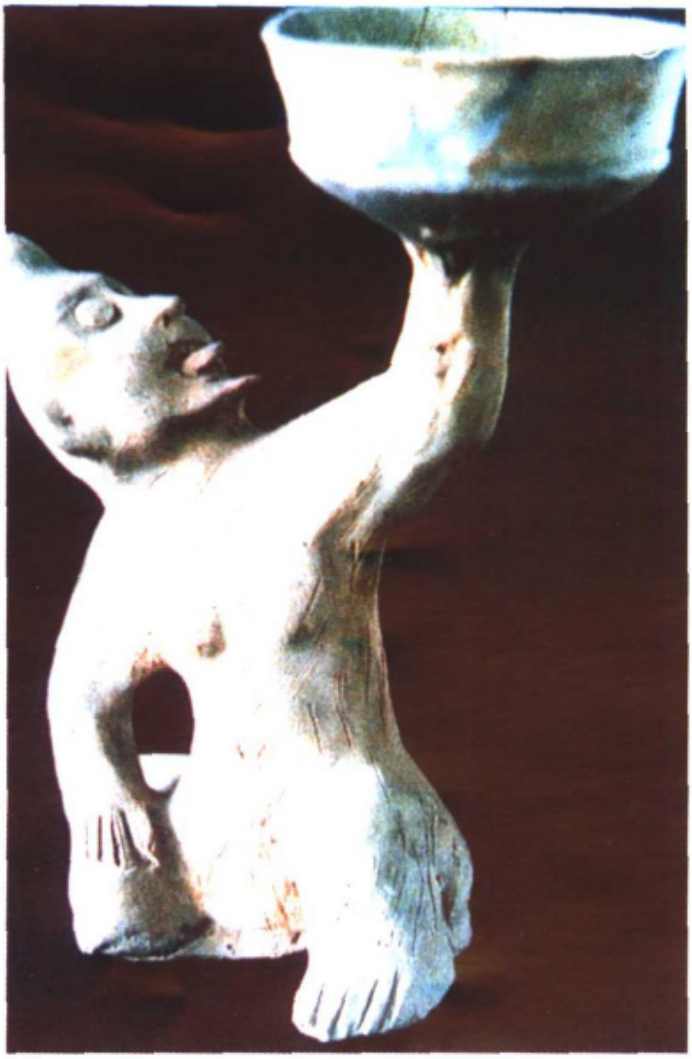
▲19.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波斯银盒

▲20.汉代玉门关小方盘城(旧说玉门关)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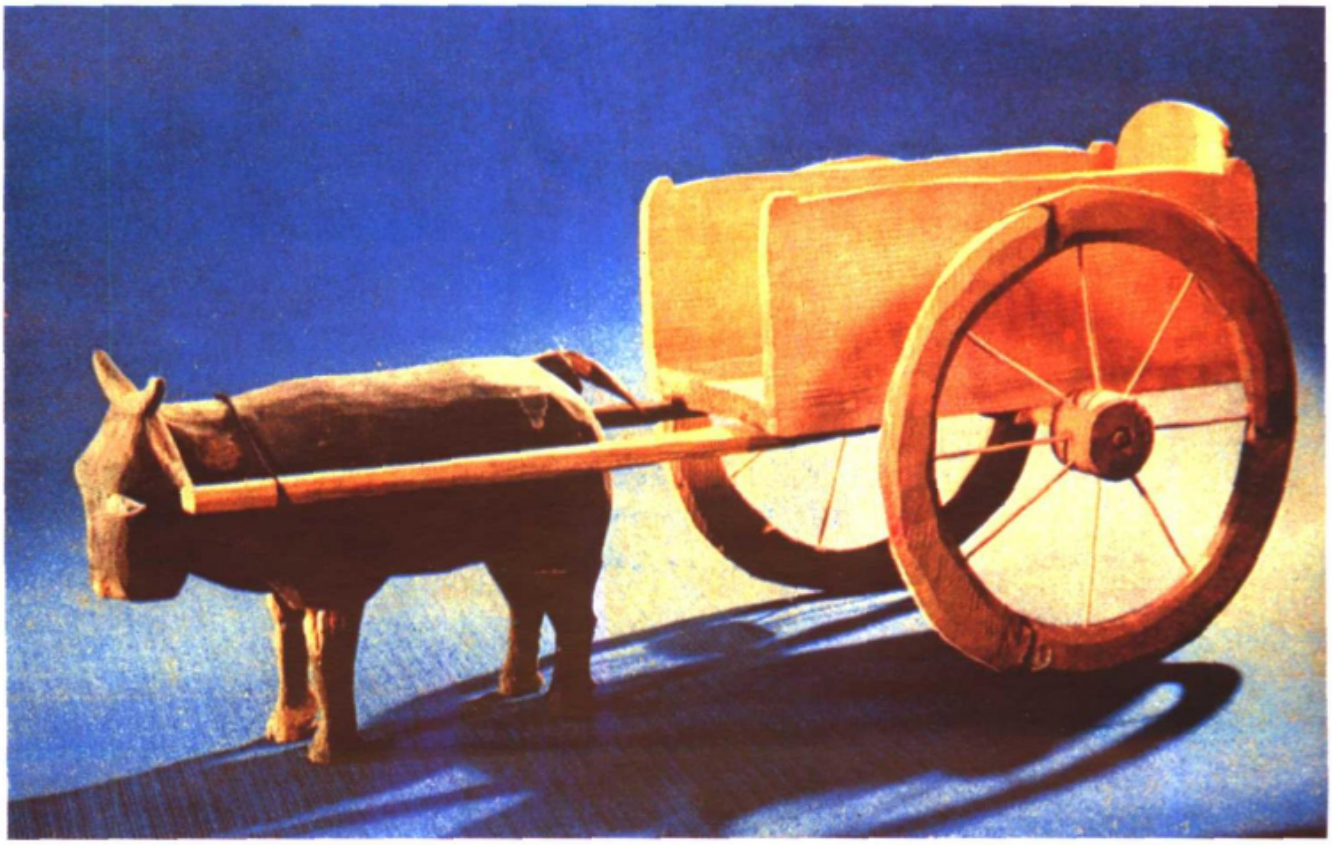


▲21.尼雅出土有“汉精绝王”字样的汉简(大英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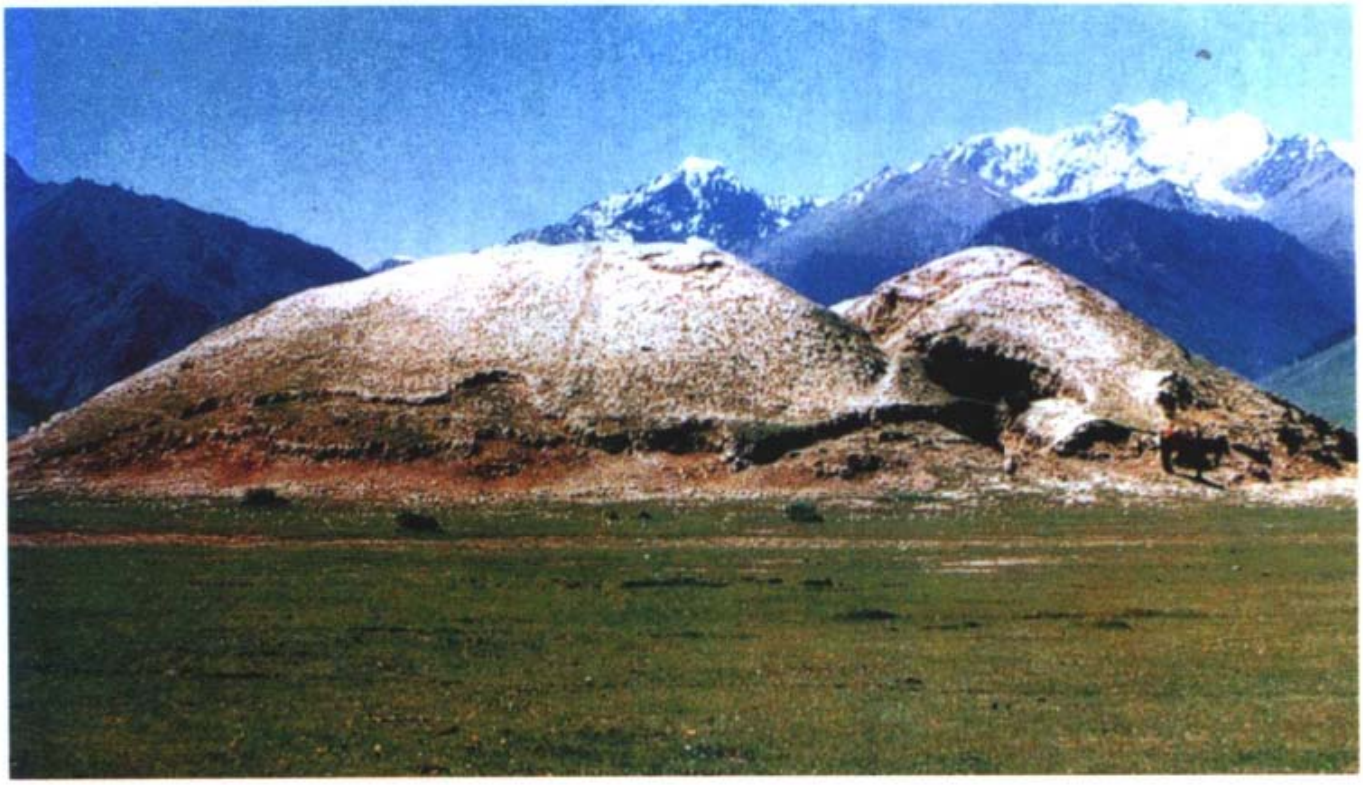
▲22.尼雅出土有关大月氏使者的汉简(大英图书馆藏)



◀23. 西汉外国人像陶俑座灯



▲24. 甘肃汉墓出土的牛车模型：丝绸古道交通工具之一



▲25.新疆昭苏县夏特乡乌孙墓葬(汉)

▲26.新疆若羌县楼兰故城

▲27.古楼兰民居遗址

◀28.贵州赫章可乐西汉墓出土干栏式陶屋模型

▲29.广西合浦汉墓群

▶30.公元前1世纪安息王像

▲31.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西汉双人舞盘鎏金铜扣饰

◀32. 陕西兴平县西汉墓出土鎏金铜马（学者认为乃“天马”造型）

▲33. 陕西咸阳渭陵附近出土西汉羽人骑天马玉雕

▲34.汉元帝渭陵寝殿出土带翼玉狮

▲35.楼兰遗址出土东汉织绵残片

▲36.陕西绥德县出土东汉鎏金铜牌饰(匈奴族艺术品)

▲37.陕西绥德县出土汉透雕铜牌饰(匈奴族艺术品)

▶38.堪培尼亚(Campania)壁画上穿着丝绸衣服的罗马妇女(公元1世纪)

◀39.东汉外国人像陶俑座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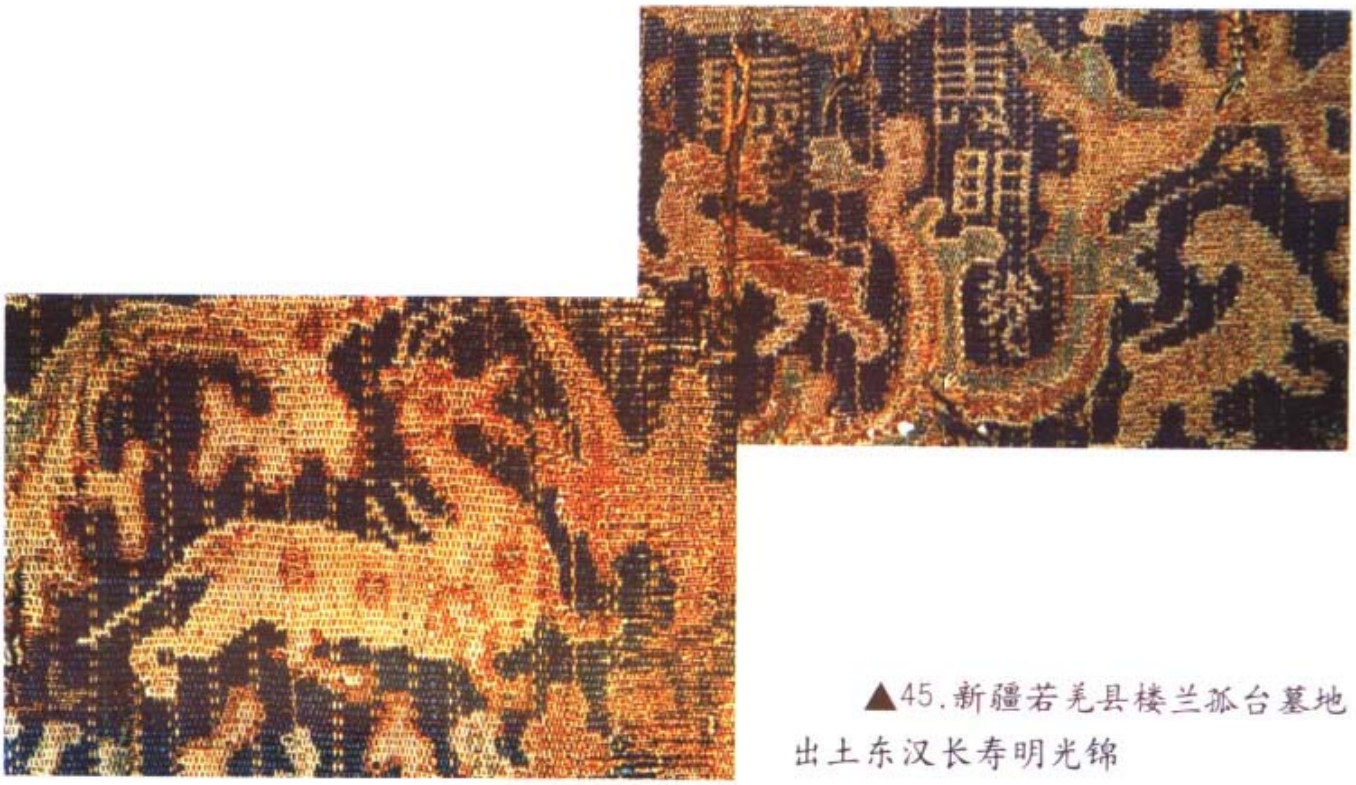
▲40. 托勒密世界地图

▲41.洛阳汉魏故城出土刻有佉卢文的东汉井阑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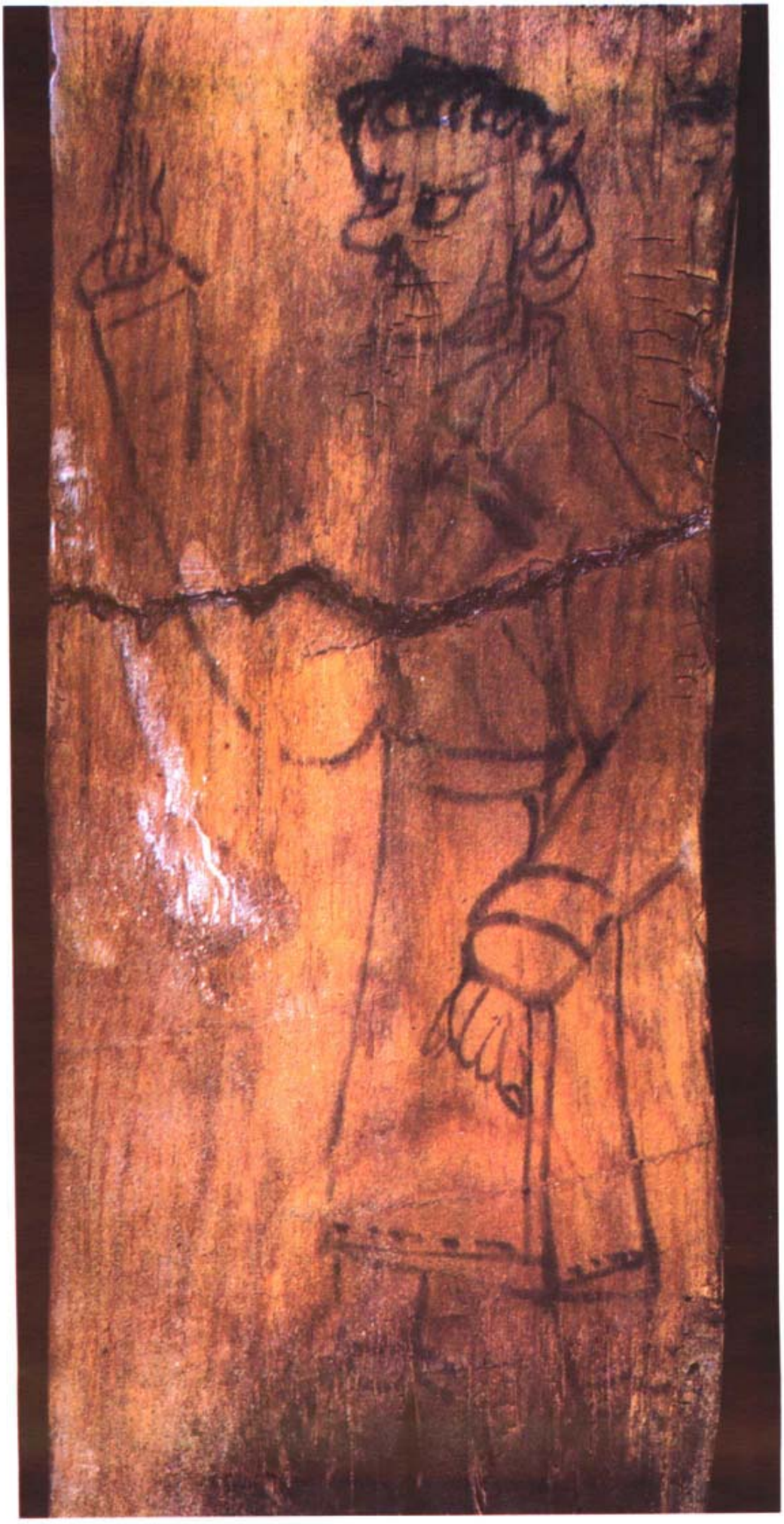
▲42.新疆若羌县采集东汉时贵霜钱币(一面为国王立像,周缘有"贵霜王闫膏珍"字样;另面为一骑骆驼神像,手持三叉枪)

◀43.新疆尉犁县营盘古墓男性干尸(墨山国贵族,身着为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纺织物,头戴黄金装饰的面具)

▲44.云南个旧市黑马井古墓群出土东汉铜跪人俑灯



▲45.新疆若羌县楼兰孤台墓地出土东汉长寿明光锦



▶46. 甘肃武威出土东汉木板画羌人图

▶47.洛阳白马寺及寺前白马

◀48.新疆尼雅东汉墓出土印染布供养菩萨像

▲49.最早来华翻译佛经的天竺高僧竺法兰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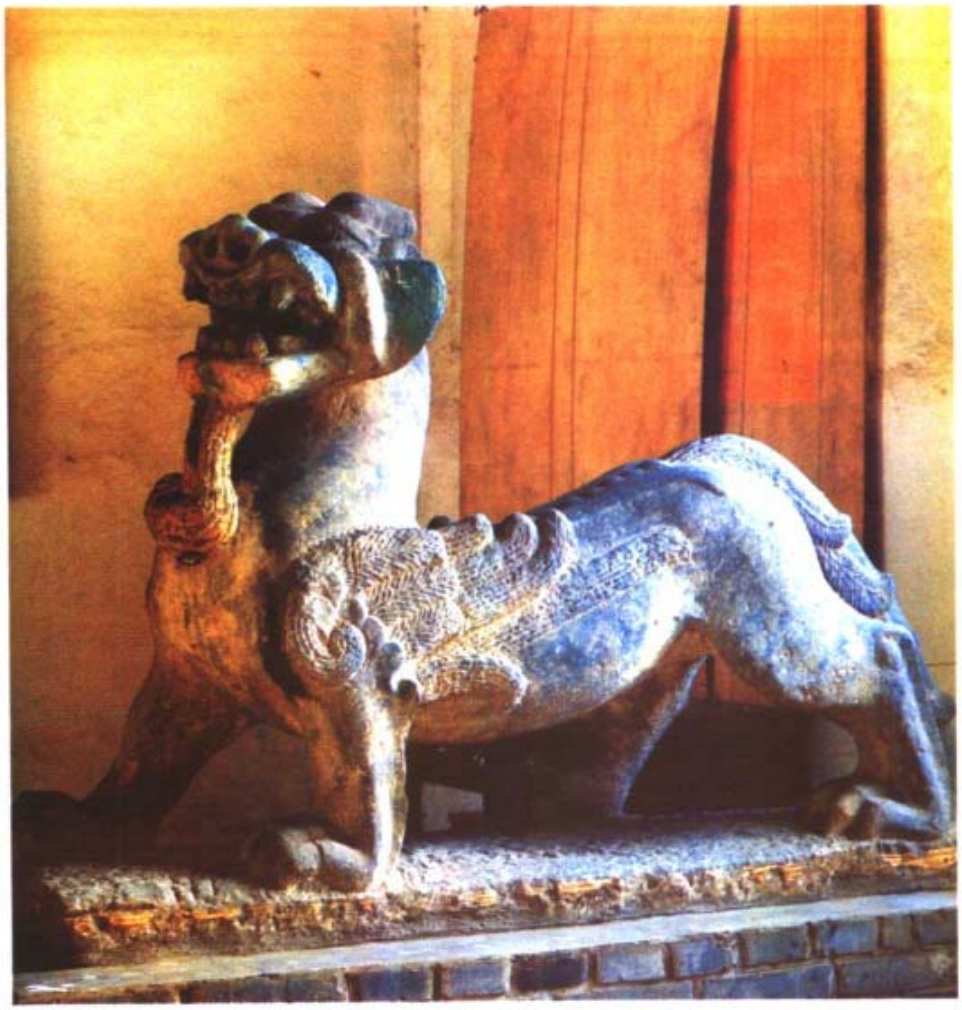
▲50.与竺法兰一同来华的高僧摄摩腾墓

▲51.四川雅安东汉末高颐墓石狮

▶52.四川芦山县出土东汉杨君墓石狮

▲53. 山东嘉祥武氏墓东汉石狮

▲54. 四川新都出土东汉骆驼载乐画像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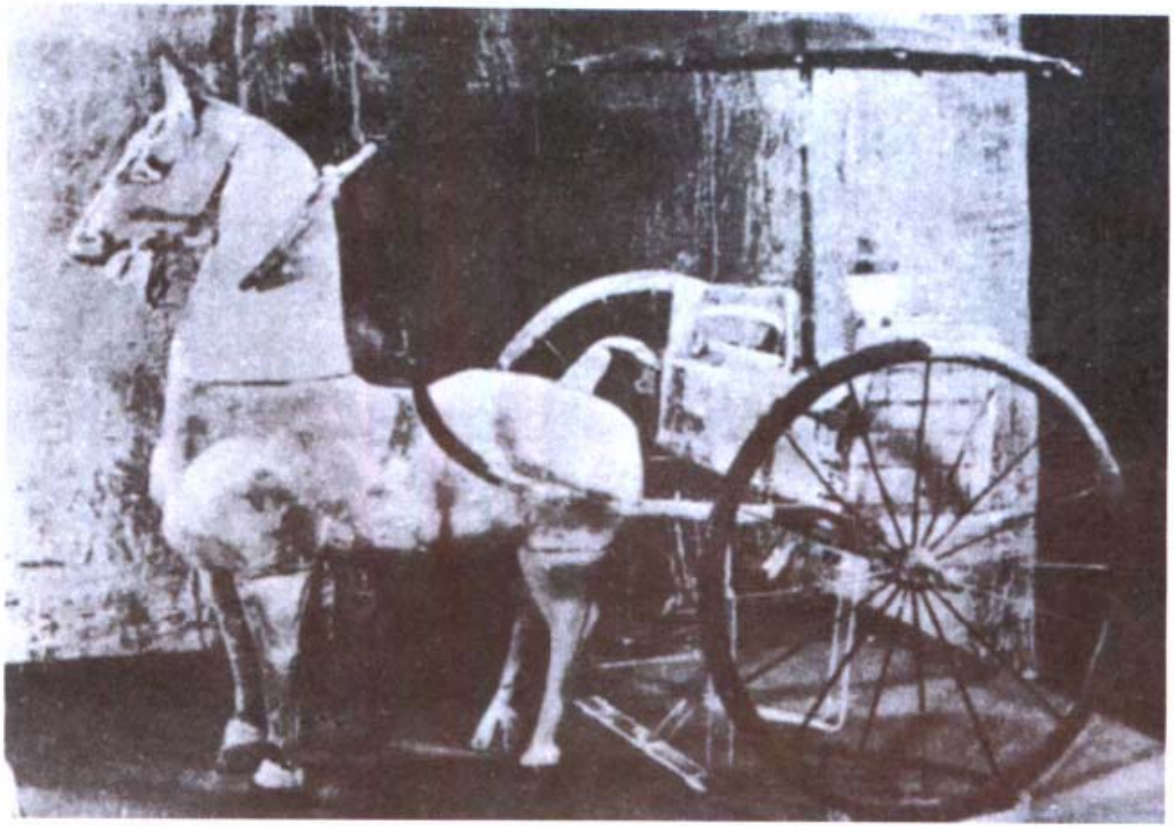
◀55.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东汉石辟邪

▶56.四川彭山县出土东汉佛像陶插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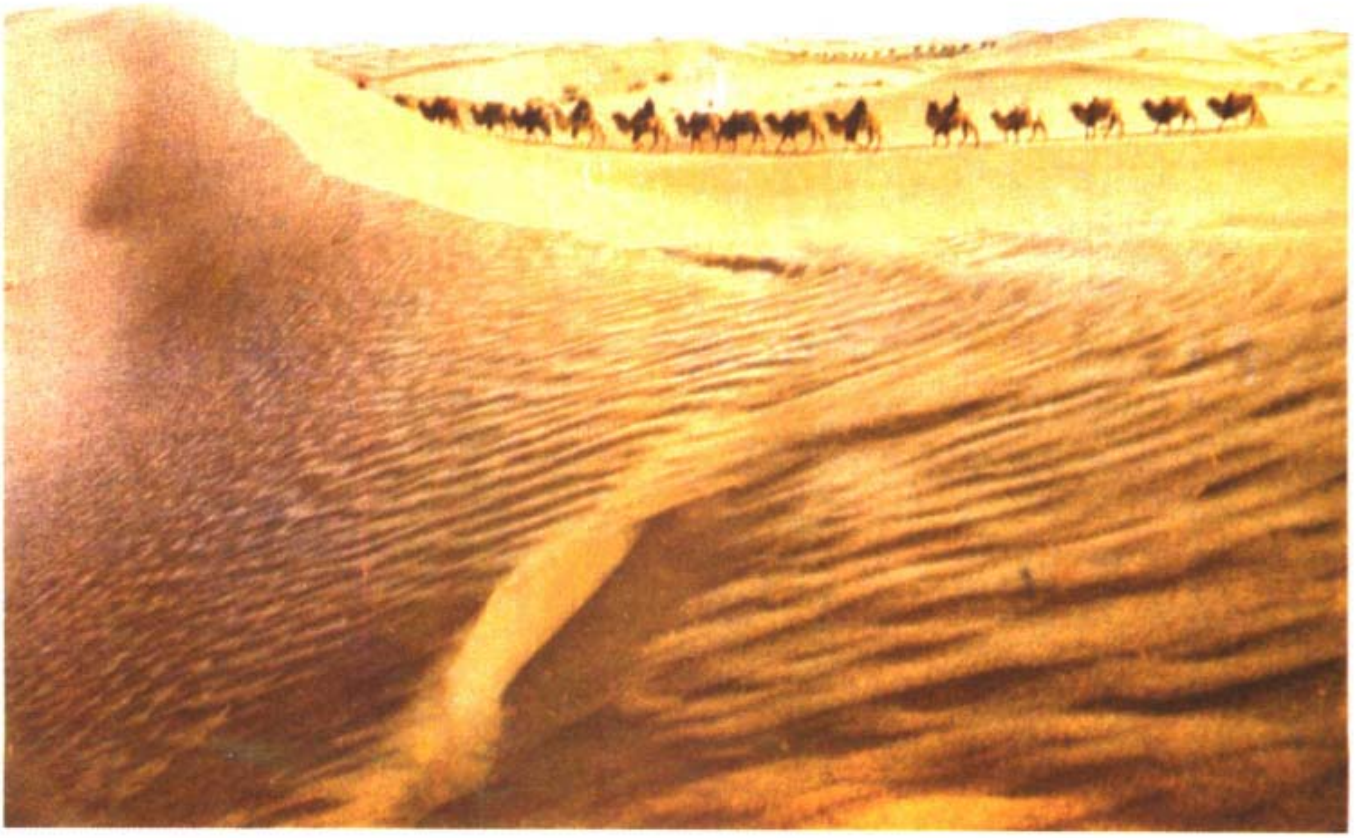
▲57.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奔马

◀58.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东汉坐佛石刻残像

▶59.河南洛阳烧沟出土东汉杂技俑



▲60.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木轺车马俑:一种传送公文的轻便车辆



▲61.沙海轻舟

本课题研究获
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资助

作者介绍

石云涛，1957 年 2 月生，河南省太康县人。1981 年 1 月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开封）中文系。1992 年 7 月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5 年 7 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史学博士学位。1996 年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至今，现任该校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2 月赴韩国任教，在诚信女子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出版有《走出玄武门——李世民的治国谋略》、《建安唐宋文学考论》、《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等专著，参编著作多种，发表古代史、古代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学术论文近 50 篇。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中西交通的创辟和发展，探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和成就。全书除前言、绪论和后记外，分上、下两编。上编研究先秦时期中西文化的早期接触，分为五章，分别研究史前、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西交通和交流的发生和发展，并对早期某些史迹表示存疑。下编研究秦汉时期中西交通的开拓，分为十二章，探讨了秦汉这一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交通的开拓和文化交流的辉煌成就，从中国和西域两方面研究了本时期丝绸之路这一中西间商道发展的历史，着重从物品、技艺、药材、音乐、礼仪制度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化的西传；从植物、动物和其他物产等方面论述了汉代来自西域的物质文明，从传播路线上考察了汉代佛教传入的途径，从音乐、乐器、杂技和其他造型艺术几个方面，论述了汉代西域艺术的传入。最后"余论"对统治者开拓西域的动机进行评价。

序

张西平

云涛博士和我都于九六年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任教。他治唐史，近年涉足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史；我研究海外汉学史，学术兴趣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从调入北外起，根据本校教学需要，他在本系开设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课，并作为选修课在全校通开。两年后又承担了学校相关的科研项目，这样我们有关的交谈和联系就更多起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是他积七年之努力的结果。

在历史学领域里，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史研究应是个比较年轻的研究方向，基础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确立的，前辈学者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直到今天，我们还要读他们的书。我自己原是学哲学的，以后对明清入华传教士感兴趣，就是通过读陈垣、方豪、张星烺、朱谦之、陈受颐、冯承均等人的书进入早期汉学研究领域的。梁启超当年曾说过，研究中国历史可以有三个角度，即从中国出发研究中国历史，从亚洲出发研究中国历史，从世界出发研究中国历史。如果从后面两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史，那就必须熟悉中外交通史。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

今天,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史的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近年来被学术界所关注的《白银资本》、《大分流》等著作虽然研究的是经济史,但都是以中外交流史为基础展开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到了十五世纪中国才开始与西方有广泛的交流,以丝绸之路的创辟和开拓为标志,中国和西方早就有了丰富的文化交流的内容。这方面前人已有大量的学术成果,云涛博士此书对公元二世纪以前中西交通和交流有更全面的阐述和精细的研究。就我所知,以三十多万字的规模,只以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和交流为研究对象,写成目前这样一部专题性的断代史研究著作,尚为首见。他的这番努力对我们认识中西交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很有价值的。

本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把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这两个专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作者研究早期中西交通的创辟和发展,而更着重探讨在此基础上中西间交流的开展和成就,这比专门研究交通路线与历史地理显得更有价值,也比专门谈文化交流更显得立论有据,因果分明。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中西交通的创辟和早期发展以及中西间文化交流的初期阶段作为研究对象,为公元二世纪以后的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出现一个热潮,但相比之下,更多的研究者投入了明清以来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也相对突出一些。而按时代先后上溯时,越向前看,研究者越少,中国的先秦时代更少人问津。这当然有各种原因,或许有人认为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有不少成果,孙猴子再难翻出如来的手心;或许有人感到先秦两汉文献不足,而艰深难解,

更有诸如古代神话传说那样的扑朔迷离无法坐实的史料；或许还有研究者个人的学术旨趣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等等，总之这种情况客观上造成了早期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研究的薄弱，国内外都有一些新的成果，包括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文献资料的利用，但宏通的研究成果却显得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出版应该说非常及时。本书还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和驾驭材料的能力。作者广泛利用了所能见到的国内外有关的古代传世文献，国内外有关的考古成果以及近代以来国外汉学家的有关著述，材料之丰富大大超过了前人的同类著述。本书讨论了与公元二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通和交流有关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前人的研究中有的已经得到论证，或已有涉及，有的则存在不同意见和分歧，本书全面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而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时，又常常调动了更加丰富的材料，从新的角度进行重新论证，时出新解。在对材料的细致分析和从容的论述中时时表现出作者的谨严和睿智。

我们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以外国语言教学为主的大学，对外语专业学生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学是学校培养复合型人才和进行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的重要内容。我们都已经认识到，过于偏重语言技能和实用性知识，不利于培养高水平和高素质外语人才。根据学校近年来新的教学规划，在我们学校各外语专业，普遍开设了必修和选修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优良传统，前辈学者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等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他们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学养与他们炉火纯青的外语素养是他们取得

卓越成就的基本条件。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有的老师和学生中也存在轻视人文教育的倾向。只满足于凭外语成绩找个月薪丰厚的工作,可能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却不可能成为杰出的外语人才。而作为一个外语大学,没有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优秀老师,没有开设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所谓培养复合型人才也只能成为空话。我个人认为,在中国一个大学没有汉语言文学系,大学的文化就没有根;没有历史系,大学的文化就会轻浮;没有哲学系,大学的文化就缺少智慧和思想。吴宓先生当年在办清华外语系时所提出的培养学生的目标之一就是:会通中西。在外语大学进行教学的老师和学子应该以此自励,特别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外语大学的人文学者。

一个读书人可做的事情就是写书和授课,本书作者近年来教学之余,在知识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可喜成绩。随着一个个字符在电脑的屏幕上清晰地跳跃,他的论著不断问世。当本书完成时,作者嘱我作序,我便以此短文,表示敬佩之情。

2003 年 4 月,北京枣林路游心书屋

目　录

序 …… 张西平(1)
前　言 …… (1)
绪　论 …… (9)

上编　先秦时期中西文化的早期接触

第一章　史前中西文化互传的信息和迹象 …… (31)
一　旧石器时代文化传播的信息 …… (31)
二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扩散 …… (33)
三　古代神话传说透露的信息 …… (39)
第二章　夏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进展 …… (49)
一　夏文化的扩散与西北部族的联系 …… (49)
二　商与西北方国部族的联系与文化交流 …… (56)
三　商代周部族与西北各族的关系 …… (67)
第三章　西周内地与西域的关系 …… (76)
一　西周与西北方国部族的联系 …… (76)
二　穆王西征与中西交通的开展 …… (82)
三　周文化的西渐与收缩 …… (88)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中西交通与交流 …… (91)

一 东周尊王攘夷运动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西迁 …(91)
二 欧亚草原民族的迁徙活动与斯基泰贸易之路
……(95)
三 中国蚕桑丝织技术的早期发展和丝绸西运 …(99)
四 北方草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输入 ……(106)
五 春秋战国时中印间交通往来 ……(112)
六 有关春秋战国时中西交通的传说 ……(115)
七 “支那”和“赛里斯”名称的由来 ……(117)
第五章 中西交通与交流早期史迹存疑 ……(122)

下编 秦汉时期中西交通的开拓

第一章 秦朝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 ……(131)
一 秦与西域的陆上交通 ……(131)
二 秦代与南海诸国的交通 ……(135)
第二章 汉匈对抗与张骞出使西域 ……(141)
一 北方游牧民族草原争霸和匈奴强盛 ……(141)
二 汉匈间的和亲和对抗 ……(146)
三 西域形势和张骞出使西域 ……(151)
四 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意义 ……(162)
五 西域都护的设置与西汉经营西域的措施 ……(169)
六 “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 ……(176)
第三章 东汉对西域丝路的经营 ……(183)
一 西域的三绝三通 ……(183)

二　班超父子在复通西域中的贡献 …… (187)
三　匈奴的破灭和西迁 …… (196)
四　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变化 …… (204)
第四章　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开辟和发展 …… (217)
一　希腊至埃及地中海航线 …… (217)
二　红海亚丁湾航线 …… (223)
三　亚丁湾至印度、斯里兰卡航线 …… (233)
四　自印度至中国南海航线 …… (247)
第五章　汉朝与西域各国关系的发展 …… (271)
第六章　汉代中印之间的交通 …… (276)
一　印度的名称与中印早期接触 …… (276)
二　罽宾和罽宾道 …… (281)
三　中印间雪山道 …… (286)
四　中印间西南缅道 …… (288)
第七章　两汉与罗马的东西辉映 …… (302)
一　汉时丝绸之路的西端罗马 …… (302)
二　罗马人所了解的中国 …… (305)
三　汉代中国人所了解的罗马 …… (324)
四　两汉与罗马之间的国家和地区 …… (335)
五　汉与罗马的直接接触 …… (358)
第八章　两汉时期中西文化西传 …… (367)
一　汉代中国物品的西传 …… (367)
二　汉代中国技艺的西传 …… (382)
三　汉代中国药材的西传 …… (389)

四 汉代中国乐器、音乐的西传 …… (397)
五 汉代中国礼仪制度的西传 …… (398)
第九章 两汉来自西域的物质文明 …… (401)
一 西域传入的植物 …… (401)
二 来自西域的动物 …… (414)
三 其他物产 …… (428)
第十章 佛教的传入 …… (461)
一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 …… (461)
二 佛教从西北陆路传入 …… (463)
三 佛教传入中国的其他路线 …… (471)
四 佛教初传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472)
第十一章 西域艺术的传入 …… (477)
一 乐器、乐曲 …… (477)
二 杂技 …… (486)
三 其他造形艺术 …… (489)
第十二章 余 论 …… (501)

主要参考书目 …… (513)
后 记 …… (527)

彩版目录

1. 张骞出使西域(敦煌壁画,323 窟,北壁中层西侧;据段文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图版 43)

2. 甲骨文征伐卜辞(A.《甲骨文合集》6057 正　B.《殷墟文字乙编》7795)

3. 湖南衡山县出土春秋晚期桑蚕纹尊(据金维诺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图版 202)

4. 公元前 5 世纪雅典陶壶人物丝服(据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5. 公元前 5 世纪波斯翼狮金杯(据[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年)

6. 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出土战国铜贮贝器(前揭金维诺主编书,图版 223)

7.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彩绘圆雕阿育王造像(据《文物》1999 年第 10 期)

8. 新疆阿拉沟战国墓出土狮形金牌饰(据马自树主编《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物集粹》,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280 页)

9. 新疆阿拉沟出土战国—汉初青铜火祆教祭坛(据《新疆

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9 年,图版 118)

10. 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匈奴王金冠(据前揭马自树主编书,144 页)

11. 公元前 3 世纪匈奴金属饰物(据[美]伊佩霞著、赵世瑜等译《剑桥插图中国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年,47 页)

12. 内蒙伊克昭盟出土战国中晚期狻猊形饰件(前揭金维诺主编书,图版 214)

13. 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战国玻璃珠(据杨伯达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0],文物出版社,1987 年,图版 203)

14. 新疆伊犁出土战国对翼兽铜环(前揭金维诺主编书,图版 218)

15. 新疆伊犁出土战国对虎圆铜环(同上书,图版 219)

16. 丸剑宴舞(成都扬子山 2 号汉墓画像砖,据傅起凤等著《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7. 沂南石刻百戏图之跳剑(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画像石,同上书)

18. 沂南石刻百戏图之橦技(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画像石,同上书)

19.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波斯银盒(据刘迎胜著《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20. 汉代玉门关小方盘城(旧说玉门关)遗址(据陈良著《丝路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年)

21. 尼雅出土有"汉精绝王"字样的汉简(大英图书馆藏,据林梅村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图版

18)

22. 尼雅出土有关大月氏使者的汉简(大英图书馆藏,同上书,图版 19)

23. 西汉外国人像陶俑座灯(据前揭刘迎胜书)

24. 甘肃汉墓出土的牛车模型:丝绸古道交通工具之一(据前揭陈良书)

25. 新疆昭苏县夏特乡乌孙墓葬(据前揭马自树主编书,287 页)

26. 新疆若羌县楼兰故城(同上书,289 页)

27. 古楼兰民居遗址(同上书,290 页)

28. 贵州赫章可乐西汉墓出土干栏式陶屋模型(同上书,400 页)

29. 广西合浦汉墓群(同上书,434 页)

30. 公元前 1 世纪安息王像(前揭布尔努瓦书)

31. 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西汉双人舞盘鎏金铜扣饰(据傅天仇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图版 79)

32. 陕西兴平县西汉墓出土鎏金铜马(学者认为乃"天马"造型,同上书,图版 71)

33. 陕西咸阳渭陵附近出土西汉羽人骑天马玉雕(同上书,图版 70)

34. 汉元帝渭陵寝殿出土带翼玉狮(据李文炳主编《陕西旅游博览》,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 年)

35. 楼兰遗址出土东汉织绵残片(据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

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年)

36. 陕西绥德县出土东汉鎏金铜牌饰(匈奴族艺术品,前揭傅天仇主编书,图版 139)

37. 陕西绥德县出土东汉透雕铜牌饰(匈奴族艺术品,同上书,图版 138)

38. 堪培尼亚(Campania)壁画上穿着丝绸衣服的罗马妇女(公元 1 世纪,据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

39. 东汉外国人像陶俑座灯(前揭刘迎胜书)

40. 托勒密世界地图(同上书)

41. 洛阳汉魏故城出土刻有佉卢文的东汉井阑残石(前揭林梅村书,图版 4)

42. 新疆若羌县采集东汉时贵霜钱币(据前揭马自树主编书,290 页)

43. 新疆尉犁县营盘古墓男性干尸(墨山国贵族,身着为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纺织物,据前揭马自树主编书,288 页;又据林梅村《古道西风》,三联书店,2000 年,图版 14,刘玉生供稿)

44. 云南个旧市黑马井古墓群出土东汉铜跪人俑灯(据前揭马自树主编书,372 页)

45. 新疆若羌县楼兰孤台墓地出土东汉长寿明光锦(同上书,290 页)

46. 甘肃武威出土东汉木板画羌人图(据前揭金维诺主编书,图版 79)

47. 洛阳白马寺及寺前白马像(据前揭陈良书)

48. 新疆尼雅东汉墓出土印染布供养菩萨像(据前揭金维诺主编书,图版85)

49. 最早来华翻译佛经的天竺高僧竺法兰墓(据前揭陈良书)

50. 与竺法兰一同来华的高僧摄摩腾墓(同上书)

51. 四川雅安东汉末高颐墓石狮(前揭傅天仇主编书,图版88)

52. 四川芦山县出土东汉杨君墓石狮(同上书,图版90)

53. 山东嘉祥武氏墓东汉石狮(同上书,图版91)

54. 四川新都出土东汉骆驼载乐画像砖(同上书,图版134)

55. 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东汉石辟邪(同上书,图版93)

56. 四川彭山县出土东汉佛像陶插座(同上书,图版127)

57.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奔马(同上书,图版148)

58. 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坐佛石刻残像(同上书,图版106)

59. 河南洛阳烧沟出土东汉杂技俑(同上书,图版110)

60. 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木轺车马俑:一种传递公文的轻便马车(据陈良前揭书)

61. 沙海轻舟(同上书,窦实摄)

前 言

本书结合中西交通的创辟和发展，探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发生和成就，因为文化交流是以交通的开辟和发展为前提的。在人类历史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曾经长期局限在欧亚非大陆之间。当人类的航海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哥伦布就不可能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产生所谓“发现新大陆”的奇迹，也就不可能造成基督教对新大陆的传播，也不可能出现后来美洲与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无线电通讯和人类的航空能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太空即便存在高级生命，即所谓外星人，地球上的人类也无法与他们接触，进行文化上的交流。同时即便交通开辟了，交通条件也限制着文化交流的发展。依靠骆驼、驴子和大车运载，就没有利用轮船、火车、飞机便捷。文化交流的水平受交通条件的制约。

这里的“交通”是狭义的和现代的概念，即双方交往交流的途径和方式，包括交通路线、交通工具和交通手段等。大家都知道，过去有学者出版过《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交通小史》等著作，他们使用的“交通”一词，是广义的，包括双方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但语言的发展已经使“交通”一词的含义缩小了，如果我们现在出版一本名为《中西交通史》的书，大概会引起不少人误会。

名曰“早期”,因为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先秦和秦汉时期中西间交通路线的创辟、早期发展和由此而引起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的交流。有人说过:“在所有的人类事务中,起源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值得研究。”还有人把史学家部落的偶像称为“起源的迷惑”,而且认为从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起源崇拜有过备受青睐的时代。不管有人赞成或不赞成这种说法,研究历史追根溯源似乎就是史学家的责任。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漫长时期的发展像一条大河,有它的源头以及上游、中游和下游,中国先秦时期和秦汉时期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和上游。在没有系统接触这方面的材料时,我谈后来的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心中总有不踏实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先前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历史的发展常常超出常人的思想之外,早期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情况存在这种现象。在许多人想像中文化交流还是空白的时期,实际上已经有了丰富的内容。当我系统地探讨了先秦和秦汉时期中西间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起源和发展以后,我获得这一认识,并产生这个强烈的感受。

这本书的写作,起始于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承担的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关系的课题研究。1996 年,我在本校开始讲授中外文化交流史课;1998 年,经学校学术委员会批准,获得学校这一课题研究的经费资助。两年后我写出了《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史略》的初稿,经我校程裕祯、马大品两位教授评审,通过了此一课题的结项,两位先生都给予了过奖之誉。此后我又用了三年时间,集中精力进行先秦和秦汉时期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并对初稿中相应部分进行了反复补充和修改。本书完

成后，又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李鸿宾教授和本院海外汉学中心张西平教授审阅，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现在奉献给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这些年努力的结果。

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是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之所以没有全面研究中外交通和交流，首先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和条理的清晰。当我们想在一本书中“四面出击”，试图全面探讨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通、交往和交流时，就显得头绪纷繁，不仅作者不好安排全书的线索和结构，读者也常有“杂乱无章”之感。更重要的是中西间的交通和交流与中国跟其他地区如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交通和交流存在着性质很不相同的内容。这一点过去的学者已经意识到，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一书中说：“自汉以后，历朝对于经营西域，皆有所贡献，惟其地之华化，不如朝鲜、越南等地之深者，实因对于西域经营，向不彻底，而原住西域之西方系统人种，其文明程度，颇为发达，尤以在宗教及美术方面，中国反受其影响。”他说得并不全面，但很有道理。中国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北非和欧洲都是古代文明发达最早的地区，中国文化中吸收世界上这些地区的文明成果不少，同是强势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交流和互相吸收曾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而相比之下，中国跟以东地区的接触中则主要地是输出。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都在通常所谓“汉文化圈”。同样是汉文化圈之内的交流自然不同于跟“圈”之外文化间的交流，在很多情况下，彼此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西间的交通和交流进行专门的研究，而不必跟其他地区间的交通和交流放到一起。

本书作者希望在早期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此做了如下努力：首先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前人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注意了解、吸纳前人过去的和新的成果，以充实自己的论述。本书行文中将引用文献的出处作了注明，书后附有参考书目，以表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为读者提供一个书目索引。其次全面检阅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捕捉和搜集早期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信息和资料。中国历史文献的系统性、丰富性和可靠性是公认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都难与比肩。不仅中国历史，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要靠中国文献来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中国史、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史，文献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研究中泰关系史的泰国华裔学者黎道纲先生说，在研究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中国古籍记载是经得起推敲的，不能轻易否定。"上世纪二三十代，张星烺先生编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问世，辑录传世的有关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史料，包括中国的和域外的内容，可谓煌煌巨著，成为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好的史料合集，沾溉学林，厥功甚伟。周一良先生说："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先生创始于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文化交流之内容"（《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序）。此后，在有关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古代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方面，少有像张

先生那样下功夫的学者。有的研究者不肯像老一辈学者那样先作一番资料工作,只凭藉现成的材料去做,所以研究领域和资料方面不能有所突破。当我系统接触先秦和秦汉文献时,感到张先生大作之外,有关中西交通史料仍有遗珍;限于张先生的那个时代,张先生不少论断还值得再推敲;事过这么多年,新的资料发现和研究成果问世,不断地纠正和补充了张先生的研究。第三,尽可能地利用新发现的史料补正过去研究的不足,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较已经出版的同类著作,读者会发现本书有不少新的内容,这与自己结合交通研究文化交流的思路和新的材料的利用有关。从张星烺先生《汇编》大作出版以来,新的研究史料不断被发掘和被发现。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指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大批新的文献材料,如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新发现了许多石刻类史料,同时,上世纪初出土的大批迁居中国的胡人留下的胡语文献,如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梵文、叙利亚文文书和典籍,也主要是由西方学者翻译成现代西方文字。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文物资料在不断出土,不断刊布。这些材料更加分散,研究的难度也更大。"(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古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在研究过程中,我努力接触新的史料,但由于自己见闻不广,这方面可能有不少薄弱的地方,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和提高。荣新江先生已经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把张星烺先生《汇编》出版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汇为一编,把零散的史料系统全面地展现出来。此一计划若果实现,肯定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极大方便,我们企盼这一宏愿早日实现。

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是世界性课题，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学者。但是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人能“包打天下”，或“独占鳌头”，它需要的是协助攻关，共同进步。好像攻占一个山头，每一支军队可以有自己的路线和方向，在研究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中，每个学者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切入点和研究方式。我们不能忽略西方学者的成果，随着近代西学东渐，文化交流还产生了汉学西传的另一方向，西方各国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汉学家，我们可以列入长长的名单，其中便有以研究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见长的专家学者。谈到外国学人的成就，我想借美籍华裔学者朱学渊先生的话表达我的看法。在其《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序言中，他说：“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治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首先在于目标的差异。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标；结果往往是学罐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设，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反倒在他们手中”。朱先生认识到中国文献的重要价值，同时看到中国学者的不足。他说，在北方诸族的研究领域里，“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有登堂的荣誉。面对西人的大胆宏论，国人往往只有小心求证的本份。如果说西方学术有海洋民族勇敢的精神，中国传统学术则表现为农业民族的勤奋和执着”。应该说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各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我们不应该厚此薄彼，固步自封；也不应该妄自菲薄，盲目崇拜。朱先生曾经身历两种学术文化环境，是通过切身体验和认

真比较后作出的判断，极有见地。

在我接触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时候，也有与朱先生同样的体会，我只想举两个小小的例子。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特别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彼此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较多涉及诸如世界各大宗教的传播等曾经席卷各大洲的大规模文化运动，从宏观历史的文化交流的角度眺望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其立论和方法都给人很多启示，代表了西方一定时期研究世界各地文明交流历史的水平。但当我们注意其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观点和论述时，常常令人遗憾地发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也是一部西方名著，本书中文本译者耿昇先生称誉此书："这是法国出版的第一本真正科学的、具有严格限定意义的丝路专著。书中既使用了丰富的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汉文－藏文及印度古代资料，又使用了近现代各国学者的论著，特别是对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重点研究的是丝路的历史概况和丝绸贸易史。此书在问世后的30多年间，其法文本先后修订三次重版，又陆续被译成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日文等文本出版。此书从上古传说一直讲到近代，从丝绸故乡一直讲到丝绸最后聚散地里昂，从人文和自然科学一直讲到王朝盛衰的沧桑变迁。全书文笔优美，通俗易懂，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国际畅销书。"但我们通过耿先生精湛的翻译，仍然注意到作者对中国文献掌握的不足，论述中也常常出现朱学渊先生所说的"疏于求证"的失误。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读国外汉学著作常常产生的感觉。这两本书都是我

受益匪浅的著作，作者思维的敏锐、分析的独到和表达的生动以及文风的活泼都很具魅力，与中国学者的专著庄重严肃不同。我们不必去追求一定要超越西方学者，而应该思考如何发挥中国学术之长，在应该由中国学者作出判断的课题中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以达到短长互补。我自知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比较前辈学者和西方学者存在不少弱势和劣势，但自信在中国文献的系统掌握方面确是下了前人没有下过的功夫，在吸收近年来新的考古成果方面也有超过前人之处，因为这些成果是前人尚未接触到的，我们是新成果的受惠者。

在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研究方面，我的学识和知识积累都很不够。在我之前出现过许多大师级的学者，他们筚路蓝缕，成就辉煌，功不可没；如今在这一领域里，还有无数的优秀的学者在辛勤耕耘，他们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以更加宏阔的眼光，更科学的方法，更有利的条件进行着更卓越有效的研究，新的资料不断被发掘，新的成果不断涌现。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研究呈现日新月异的局面，这方面的著作有不断充实和更新内容的必要，这也是我之所以称自己的书为“史稿”的原因。这不是谦虚，而是尊重学术研究的现状。

绪　论

美国传播学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人,信息和媒介:人类传播概览》一书中说:"人是会传播的动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传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用传播作材料。"文化具有扩散功能,文化的扩散就是文化传播,互相传播就是交流。文化传播是一个运动过程,文化交流则是双向传播的运动。我们认为,根据文化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应该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1)传播内容(文化源);(2)传播者(是谁承担了文化交流的任务);(3)传播对象(文化传播的接受者);(4)传播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斗争等)和途径(路线、方式和媒介);(5)效果与影响(异质文化间的碰撞、冲突、排斥以及互相吸收、接受、同化、变形等)。

一　广义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通"纹",就是纵横交错的纹理。《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说文解字》释"文"曰:"错画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形如网络,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就是"文"。在中国古代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规范

就是礼乐制度和法令条文。有了礼和法，人与人的关系才有条理。上尊下卑，上下有序，君臣和谐，这就合乎“礼乐”。孔子赞扬西周社会曰：“郁郁乎文哉！”文即指礼乐制度。春秋时礼坏乐崩，孔子感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用礼乐教化人民，就是“文化”，因此“文化”是与“武功”相对而言的。《国语·周语》云：“有不享则修文”。三国吴人韦昭注曰：“文，典法也。”同书又云：“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韦昭又注曰：“文，礼法也。”汉代刘向《说苑·指武》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即以文化之。

现代意义的“文化”概念是从西方引进而从日文中转译过来的。“文化”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新兴的人文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常用的术语。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采用汉语的现成词汇“文明（ぶんめい）”、“文化（ぶんか）”来翻译西文中的“Civilization”和“Culture”两个单词，我国又从日语中引入这两个概念。最先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的是英国学者泰勒（1832—1917），他被人们称为“人类学之父”。他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任何人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此后，中外不少学者给文化下定义，由于文化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概念具有岐义性和非确定性，迄目前为止，文化的定义已经数以百计。现在一般对文化作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文化，即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它的精神产品、宗教艺术

以及它对自身制度的意识和解释等等。泰勒的定义就是一个狭义的解释。广义的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和需要，通过体力或脑力劳动改造自然界，改造人类社会，也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改造人自身，从而取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和成就。正如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在《哲学小辞典》中解释的那样："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比较狭隘的意义来讲，文化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

我们所讲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广义的文化。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的基本构成成分可以分为三个子系统，针对自然界，创造了物质文化；针对人自身，创造了精神文化（人对自然，对自身，对社会的认识及其物化形态）；针对社会，创造了制度文化。而三大子系统下面还有更小的小系统，各自包含着诸多复杂的要素及其功能。具体说来，物质文化子系统包括：一、人们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二、人们运用生产力改造自然，进行创造发明的物质生产过程；三、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产物、产品。制度文化子系统包括：一、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二、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各种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三、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种种社会规范和准则。精神文化子系统包括：一、人们的各种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如教育、科学、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医疗、卫生、体育和文学、艺术

等;二、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满足生活的方式,如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娱乐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方式等。三、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等。

文化的三大子系统构成了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从而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在这个整体系统中,各子系统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物质子系统是文化系统的基础,它是制度文化子系统和精神文化子系统的前提条件。制度文化子系统是文化系统的关键,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文化,才能保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精神文化子系统是文化系统的主导,它保证和决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二 "中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中西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方面。所谓中国文化指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或称华夏文化、中华文化、汉文化。但"汉文化"这一概念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汉文化只能指汉族文化,不应包括其它民族创造的文化。有人则认为汉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诸兄弟民族的文化成果而形成的多民族、多地域、多因素、多层次的复合体。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文化也是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称为汉文化圈。看来,"汉文化"这一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兄弟民族在文化创造和建设中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在论及中国各民族文化时,它是与各

少数民族文化对应的一种文化，即汉族文化；但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文化对应时，它又常常代表了中国文化，包括各兄弟民族创造的文化。在与世界上其他思想文化对应时，相对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等，它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那么，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属于这一文化区，这就是汉文化圈。这是从内涵上来说的。

中国文化从外延上说，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其地域性。中国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就是所谓东亚大陆，这是一个自西向东呈倾斜的大三角形地区。它以帕米尔高原为顶，以向东北和西南延伸的两组山脉带为两边，向东北伸展的一组包括阿尔泰山、天山、外兴安岭山脉，一直到鄂霍次海；向西南伸展的一组包括喀喇昆仑山、喜玛拉雅山、横断山脉，一直到南海岸。它的底边是沿太平洋漫长的海岸线及其内弧形岛屿。这个地区北有大漠，西有高原、高山，东南面临大海，从而天然形成的一片相对独立的辽阔大地，960 万平方公里。当然所谓独立并不是封闭，独立只是相对而言的，也主要是针对古代交通不发达而说的。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都注意到这一地理特征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由于地域的辽阔，中国文化既有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农业文化，又有以西北地区为主的游牧文化，也有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的海洋文化。

其次是民族性。这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 50 多个民族参与创造的文化，同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了世界各国文化形成的多元文化。中国文化是丰富多彩的，除了汉族拥有无比丰富的传统文化之外，还体现在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而富于

特色的文化，许多民族如回族、藏族、蒙古、维吾尔族等都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和宝贵遗产。这些都是祖国灿烂辉煌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又是一个具有很大的兼容性的文化，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上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异质文化，它吸纳了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文化，并加以改造、同化，为我所用，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是持久性。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从有人类诞生起直到现在，我国人民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创造的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世代延续，未曾间断的文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过去人们说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后来又有人称世界上有六大文化区（希腊罗马、印度、埃及、巴比伦、中国、阿拉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人类六千年文明史划分为二十六个文明，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丛书序》中把世界文化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和四大文化圈。两大文化体系指西方文化体系即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东方文化体系，即以闪族（伊斯兰文明）、印度、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四大文化圈则指古希腊、罗马文化圈、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其中中国文化是唯一的不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呢？有人说，在中国境内，元谋人是至今发现最早的人类，距今 170 多万年。中国文化应该从那时算起。元谋人的年代是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跟北京猿人的年代差不多，都是四、五十万年。即便如此，我们仍有材料说明早在 100 多万年前，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人类生存，如山西芮城

县西侯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至少180万年。安徽繁昌人的发现，则说明至少200万年前，中国大地上已有人类生存。

另外还有“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文明和文化有时是同义词，但文明有时又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社会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如文字的使用和发明，阶级社会出现，金属器的发明和使用，农业的起源，真正的艺术出现等。它与原始、野蛮相对而言。中国这样的社会，或者说中国文明史是从黄帝时算起的，从那时到现在大约5000多年。因此，应该说文化史比文明史有更为悠久的历史。

西方文化这一概念，也需要作一说明。“西方”一词的含义在历史上有过演变。这里所谓“西方”包括了古时所谓“西洋”和“西域。”西洋，古代指南海以西沿海各国，包括南洋群岛、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地。大家都知道的郑和下西洋，所谓西洋，就指这一带。明末清初以后，所谓西洋则通常指大西洋两岸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西域”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汉代文献，班固《汉书》中有《西域传》，汉时指玉门关以西的地区。但人们使用这一概念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班固说：“西则限以葱岭”。这一地区基本上在现在我国的新疆境内。广义的西域则包括从玉门关以西，越过葱岭，一直向西，直达欧洲的广大地区。唐代玄奘著《大唐西域记》一书，他所谓西域包括了他经历过的中亚、南亚等地区。后来又指在地理上位于西半球的各国，并特

指西欧各国和美国。我们要讲的历史上的西方文化从地域上就包括了西洋和西域这样两大块。

从发展的角度看，文化交流总是从邻近地区开始的，后来逐渐扩大，中国和欧美各国起初是完全隔绝的，后来产生了间接的交流，最后才产生了直接的交流，因此，我们要从最早、最近处讲起，应该而且必须按广义来讲。在中国以西是文化发达较早的地区，在西亚有巴比伦文化，南亚有印度文化，在欧洲有希腊文化，在非洲有埃及文化，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这是通过文化交流实现的。在历史上，各文明古国和几个大文化之间并不是互相隔绝和独立发展的，而一直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彼此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应该说明的是，中华民族及其多元统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无庸讳言，现在同处于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的各个民族，有的在历史上曾经是属于对立的政权和不同的政治实体，它们是经过了长期的斗争逐步融合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之间历史上也存在文化的互相传播和交流，中华文化就是在这个传播和交流过程中融合而成为多元统一的文化体系的。因此，我们称中华民族内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为交融。古代中原政权和它西部地区现在中国境内不同民族间不仅存在文化交流，而且这些地区和民族还常常成为中原文化和更远的域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在这本书中，我们所谈的交通和交流包含着我们所说的中国与中国以西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西部地区或民族的文化的交融。

三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

中西文化交流何时发生？有人认为开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历史上称为“凿空”之举。《史记》记载了张骞通西域后，说：“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谓西域险扼，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大陆型”的，是“封闭型”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才以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还有人认为，元代以前中西交往“大都还停留在器物交流的水平上。”这些都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中西文化的互相接触、传播和融合，包括精神文化的互相传播，要比人们想象的早得多，即便从中国和西欧的文化交流来说也是如此。考古学提供的信息，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已经有与境外文化接触和传播的迹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明国家中国和希腊之间已经有了间接的交往，那时中西文化的交流已经揭开了序幕。这不仅有文献上的记载，也有考古资料能够加以说明。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所记的欧亚草原民族，人们可以知道，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即中国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欧亚草原之路实际上已经走通。

因此，讲中西文化交流史，就不能只从鸦片战争开始，也不能只从汉代讲起，而应从先秦更早的时代开始。从那时起，中国与世界其它各国，与西方各国的文化交流就不曾中断，中国文化是在博采外域文化中走向雄浑壮大的。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不

仅是中国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广泛吸收和融合了世界各国文化的结果。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什么大陆型的，封闭型的，只能说明是对历史的无知。事实上，华夏文化，汉文化长期坚持开放传统，中国文化正是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从两汉到清代中叶以前，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历来都是积极开放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从主流上说也是积极主动的，中外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至于明代实行海禁，清代后期的闭关锁国，虽然也有文化抵制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有特定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而且事实上统治者的海禁和闭关政策并不能阻断文化方面的交流。

应该说中西交通创辟和文化交流起源很早，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发展的过程。先秦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轫期，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我们已经看到现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不同人类群体间文化传播的信息。公元前六世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贵族的奢侈品。秦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期，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迎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魏晋南北朝是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由于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对峙，中西文化交流缺乏汉代那么大的规模和成就，但有新的内容和发展。中西交通的发展表现为绿洲之路的发展、青海道的兴盛和海道的进一步利用。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而又迅速地盛极而衰，海上丝路开始兴盛。中国文化空前开放，中西文化交流又一次形成高潮，可以称为第二次高潮时期。一方面唐代文化作为世界上的先进文化为世界各国所仰慕所效仿，一方面唐代统治者又

非常大度地吸收和借鉴域外文化。五代辽金宋时期曾长期存在着多个政权对峙的政治状态，战争不断，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很复杂的状况。但总的说中西文化交流在多方面、多层次、不断地、或明或暗地进行着。

元蒙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可以说是第三次高潮时期。元蒙统治者曾在亚洲和欧洲的广大地区进行长期的征战，元朝建立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经过三次西征，元蒙统治者在从葱岭以西直到欧洲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三个汗国，从而大面积地打通了欧亚交通。中西之间陆海交通空前发展，元蒙统治者又具有世界本位观念和开放心态，促进了文化交流的高涨。明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转折时期。西北陆路交通断绝，欧洲人环球航行成功，中国郑和七下西洋，标志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上交通进入新时代。这种转折一方面表现为西学东渐，过去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一向以老大自居，以一种优胜的心理对待异域文化。现在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兴起，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相对停滞，西方文化逐渐处于一种后来居上优胜东渐的趋势。二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是物质文化的交流，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东汉以来传入的佛教就是一种精神文化。现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方面也越来越多的受到西方的影响。这种转折的重要标志便是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方传教士不仅带来了“上帝的福音”，而且带来了西方的声光化电；不仅将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宗教文化带来中国，而且也向西方世界宣传了中国，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欧美传教士的来华活动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新的一

页。

清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态度由主动开放到被动输入，又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显示了一种传统文化面对一种先进文化的挑战所表现出来的被动、局促不安和手足无措。中外文化交流向深层次发展。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反思，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认识和借鉴。

四 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

有人把文化交流分为古代的、近代的和现代的三种方式。现代文化交流的时空跨度已经大大增加，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的产生，文化交流的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简捷迅速。空间上的距离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交流障碍，现在已有可能建立一个把地球上任何地点都互相联系起来的全球交流系统。所以人们常说："地球越来越小"。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不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无时无刻不再进行交流。我们要说的是古代的交流途径，那要比现在的情况困难很多。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概括为如下几种主要方式，即官方使节、宗教、贸易和战争等。

（一）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乐舞团体等，赠送各种礼品（包括手工艺品和动植物等）及书籍。这是一条通常的渠道。汉代运丝的商队通常由政府官办，称为使节，实际上是官方贸易队伍。唐代日本、新罗等国都有不少人来华留学，有的参加中国

的科举考试，留唐做官，有的学习了中国文化后又回到本国。东汉时禅国献乐及幻人。隋代吐蕃人吞米桑布札留学印度，返回后创制了吐蕃文。公主和亲也起到了文化交流的作用。唐代中国和尼泊尔两位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把佛教带入现在的西藏地区。

（二）宗教。宗教本身就是文化，宗教的传播就是文化交流，同时宗教又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和媒介。宗教是古代最容易突破民族、国界和政治隔阂进行文化交流的媒介和载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宗教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虽然当时传播宗教的那些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比如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富有思辩性的哲学、逻辑学、天文、历法以及文学、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等都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来，大大丰富和充实了魏晋到隋唐七百年间的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文化生活。如果要我们举出古代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贡献的人物，那么，宗教徒占了很大的比例。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唐朝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技术和医药之学，作为重要的文化使节，至今为日本人民所怀念。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同时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算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工艺技术。如果这些学问的传播不受阻碍，发扬光大，中国的面貌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法显玄奘义净樊守义等宗教信徒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贡献。尤其有趣而无独有偶的是，明末的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和清末、民国初年基督教牧师德国人卫礼贤，他们都抱着用自己的宗教感化异端的目的来到中国，最后都倾倒于中国数千年传统的思想文化，没有有效地传

播天主教和基督教，反而变成了中国文化的积极宣传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促进了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三）贸易。贸易有两种形式，一是朝贡形式之下的贸易，二是商人经营的个体贸易，其共同特点都是互通有无。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丝绸之路上奔波着无数的商人和商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孟子》）。商人跋山涉水，甘冒风波之险，长途贩运，从事交换，为的是牟利。“利”趋使着历代无数的商人或商队在古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商品交换，同时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以中国输出而言，物质文化方面较高级物品如丝绸、瓷器等固无论，铁器在明清时代也输出到菲律宾、缅甸、泰国，木制家俱也曾输出到菲律宾。这不仅是一种物质的交换，在物质交换的背后隐藏着文化的意义，一件木制家俱传到了菲律宾，同时它的技艺样式和审美趣味也被对方所接受。不仅物质文化产品，精神文明的产品同样是历代商人贩卖的对象。唐代白居易的诗和张鹭的文章都为日本和朝鲜人所重，当时就有人将他们的作品拿到这两个国家去卖钱，张鹭的《游仙窟》在国内已失传，后来又有热心人从日本抄回来。这反映了文学作品在中外文化交流市场上的需要。明清时赴泰国的商人对《三国演义》的爱好和谈论，引起了泰国人对这部小说的兴趣，产生了好几种泰文译本。清代中国商人到日本经商，贩运货物之外，书籍也是大宗商品。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就是清代商人舶载进口的。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的大庭修教授的《江户时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之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之一，就是清商历次贩运进口的

大批书籍的目录和这些书籍售出后的下落，这些说明商人贸易与文化交流也是密切相关的。

（四）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战争可以造成交战国之间交往、贸易、交流的暂时中断，同时也造成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的机会。战争双方都有必要研究对方的状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要改进自己的盾，就要研究对方的矛。这种研究必然造成对对方的了解、学习和借鉴。战争还造成俘虏和掠夺，也是获取对方文化成果的机会。公元前64年，罗马侵占叙利亚等地，从这里取得了久已流行于此地区的中国丝绸。唐代高仙芝率军与大食交战，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江布尔城）一役，被俘的唐代工匠把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进而又远播西方。北宋“靖康之难”，金人不仅掳走了徽、钦二帝，还带去大量书籍和印版。蒙古统治者向西扩张，战争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最典型的例子是“火药”的西传。我国最迟在唐代已经发明了火药，唐末已经应用于军事，南宋时有人发明了管形火器。蒙古人在对宋、金的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药、火器。元朝时随着元军的远征，火药和火器开始西传。先是阿拉伯人在与元军交战中学会了制造火药火器。十三世纪后期，欧洲人从阿拉伯人的书籍里了解到火药的知识，十四世纪前期，又从对回教的战争中学到了制造和使用火药火器的方法。从此在世界兵器史和军事史上引起一连串的变革。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还有一种容易为人们忽略的途径和方式，就是民间的交往和交流。这是一种持久不断而一直存

在的交流，而常常又是无迹可寻不为古代史书所记载的途径和方式，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途径和方式的重要性。统治者为了获取生活的奢侈品，不惜代价遣使远出，厚待贡使，用中国的丝绸和黄金去换取异域珍禽奇兽、佳果名卉或珠宝，他们的活动被记入史册。与此同时，人民却在进行着最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交流活动，一个明显地事实：棉花、粮食作物及其种植技术的传播，这些在封建社会中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常常看不到统治者的有意提倡，也看不到史书上的认真记载。这是人民的自发的活动，它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一位伟人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真理。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是很复杂的，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在《丝绸之路》一书中还作过这样有趣的描述："矿物、植物、动物在20个世纪之前是怎样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呢？某些植物是通过近邻关系而几近于自动传播的。另一些产品是通过使节之手而从一个地区逐渐地传到另一个地区的，如作为'贡物'或'礼物'，或者是通过商贾们的媒介作用。这些传播有时具有军事的原因，或者是与经济实力的迫切需要有关，通过权力和暴力、劫持或绑架、抢劫而完成，还有某些传播是通过阴谋诡计而走私完成的；最后，某些传播又是通过王室通婚而完成的。"古人从事这种传播和交流活动时遇到的困难有时我们无法想像。唐代去南亚拜佛求经，史书上记载，"西去者盈半百，留者仅几人。"1980年11月23日，阿曼苏丹国的一艘双桅三帆船苏哈尔号从首都马斯喀特启程，东来中国广州。这是一次模拟实验，苏哈尔号是一艘全木质帆船，它的结构完全模仿阿拉伯

中世纪海船，船上不装近现代动力设备全凭季侯风鼓帆行驶；它也不配备科学仪器，而是借助罗盘针、牵星术等中世纪方法来判断方向和航路。苏哈尔号战胜了浩渺鲸波，驶过了中世纪阿拉伯文献所说的七海，于1981年7月1日到达广州，历时七个月，行程9800公里，从而验证了八世纪以来阿位伯人航海术的实际过程。

五 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因此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人类交通、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条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都是文化交流的受惠者。我想起李白的《蜀道难》诗："蚕丛及鱼鳬，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人类社会彼此间的交往和交流进入现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和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但是回顾以往的历史，仍有其重要价值，那就是它能为我们提供某些经验和教训，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某些有益的知识和某种精神力量。

我们应该借鉴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更好的从事和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与外界交流，从各方面吸取营养，以充实自己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辉煌发展，历史上气象恢宏的汉唐盛世就是如此。今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当然也要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

文化成果。但是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接受异质文化时，都不是也不可能兼收并取。那么吸收什么，扬弃什么，应该有所判断，有所抉择，有所去取，择善而从，得到健康的需要的东西，有利于民族进步的东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态度，例如鸦片是外国文化，引进后曾经毒害过无数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文化的糟粕。但鸦片也不是一无所用，因为它有医药价值。所以问题是复杂的，什么有用，什么无用，怎样做有积极意义，怎么做会产生不良影响，取决于态度和方法。在这方面，我们既要研究新问题，也要向历史学习，从历史上找到借鉴。

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习，丰富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知识，为今后从事文化交流工作做知识方面的准备。缺乏必要的知识，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发展和延续，今天的世界是古代世界的发展和延续，只有了解古代中国和世界，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了解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交往和交流，才能更好把文化交流事业不断推向新的水平。

我们还要了解历史上那些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而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物及其事迹，学习他们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寻求真理，为了促进各国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不畏艰险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培养自己建功立业的热情，树立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远大理想。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俘虏，羁留 11 年，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伺机逃脱后，仍杖节西行，历尽艰险。回国后当国家需要时，又毅然出使。朱士行西行万里，在于阗 20 年，译经 20 卷，80 岁死在于阗，葬身异域。玄

奘西行取经的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郑和历尽艰辛，七次下西洋。他们的事迹都很感人。外国人中也有不少这样杰出的人物，马可波罗、利玛窦等都留名后世，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人们所敬仰。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限于本书的篇幅，我们可能只是大致地浏览一下人类文化早期交流的奇妙路程，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史是一个颇具魅力的研究领域，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志于这门学科的人们如果不想满足本书所研究的深度，自可继续深入探讨。天道酬勤，只要用心钻研，必能获得厚报，取得成果。

原书空白

上编　先秦时期中西文化的早期接触

原书空白

第一章　史前中西文化互传的信息和迹象

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历史经历了中国人类起源和发展、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时期和夏、商、周奴隶制社会时代以及封建社会早期的战国时代。文化一产生便会有传播，只是人类早期的交往和文化传播范围、速度有限罢了。本章叙述中国先秦时期中西之间文化的早期接触和交流。

一　旧石器时代文化传播的信息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就是中国与它以西许多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这种交流是从无到有由近及远逐步展开不断扩大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传播早于文字记载。在普遍使用文字之前，尽管有无数天然的艰难险阻，比如说大海和大山；但是人民间还是有往来的。"[1]因此追溯中西文化交流的源头，难以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做出准确的论断，考古资料和古代传说往往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中国人类和文化起源的历史已经追溯到极其遥远的过去。世界人类不是起源于一地，而是在具备一定条件下，在多处地方发生的。考古成果充

分说明,中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人类起源于一种古猿,人和猿同属高等动物灵长类。迄今为止,人类所知的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是曙猿,人类是由曙猿经后来的古猿、类人猿、猿人、古人、新人进化而来的。在中国山西垣曲发现的曙猿化石距今4500万年,比北非同类化石还早500万年。1998年,考古学家在安徽省繁昌县孙村镇发现了大量早更新世早期高等灵长类化石、少量石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原黄狒是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早更新世早期的高等灵长类。在上半年调查、试掘的基础上,下半年的正式发掘又获重大成果,出土了大量的200万年前的骨制品和石制品,说明早在200万年前,这里已有人类生活。科学家在对繁昌县人字洞旧石器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在该遗址西北约200米处的山顶发现了一处距今1000万年的中新世裂隙堆积,其中埋藏有大量的古猿牙齿化石。大家已经熟知的,西侯度人生活在180万年前,元谋人生活在170万年前,蓝田人生活在约80万年前,北京人生活在69万年前。考古证明,中国各地都有原始人生活的遗迹,直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建立,中国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并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劳动创造了人,人则通过劳动创造了文化。文化具有扩散的功能,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居住极其分散的旧石器时代,虽然人群间接触的机会、文化传播的范围和速度极其有限,彼此间文化交流的现象似乎已经存在。考古学上发现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2]。这种文化上的类似意味着当时人群集团之间的交往。

从后来的文献记载来看，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很早就存在着交往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蜀地所产邛竹杖、蜀布，问之当地人，大夏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张骞因此推断，"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3]因此意识到由蜀到印度当有路可通。汉武帝接受了张骞的建议，派遣使者往四川、云南，试图探索一条经印度至大夏的道路。据《史记·大宛列传》，这一计划由于氐、笮、雋、昆明等所谓西南夷的阻拦而落空，但汉朝确实打听到在云南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在今何处，颇有不同看法。有一种说法，此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地方的迦摩缕波国（Kamarupa）[4]。如果把张骞在大夏所见蜀货和此所谓"蜀贾"联系起来，则可以肯定当时在中国西南与印度北部之间确有一条商路存在。此道之走通又必然是建立在久已存在的两地人群和居民间的长期往来的基础上。看来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带已成为人群较为密集彼此间互相往来的地区，两地间的崎岖山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根本无法通行。那时当然没有现代意义的国界划分，那是生活在这个区域之间人群和部落之间的活动。

二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扩散

旧石器时代各地间文化交流的信息毕竟十分微弱。到了新

石器时代,情况便大不相同了。随着人群的增多,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不同地区的人群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增多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人类文化创造的丰富成果为彼此间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虽然当时的交流活动并没有文字记载可凭,但不同地域间人群的交往交流活动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些蛛丝马迹,使我们感受到文化扩散交流的强烈信息。

(一)细石器文化传播

细石器是考古学名词,指细小的打制石器,原料有石髓、玛瑙和燧石等。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石钻、石镞和石核、小石叶等。长方形小石叶常是嵌在骨刀上使用的。以细小的打制石器为特征的各种文化称为细石器文化。中国的细石器传统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最早起源于华北地区,如山西省朔县峙峪遗址。到新石器时代,则以此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分布于东北、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广大地区。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进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时期后,细石器传统很快退居次要地位,甚至消失,而在上述各地区却成为主要的文化因素。细石器的传播说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很早就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在它诞生以后,就呈现出向周围扩散的趋势。

考古学成果也透露出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传至中国境外的信息。当然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国界的明确划分,我们是从今天的疆域观念观察问题的。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产生于我国中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与北亚、东北亚、南西

伯利亚等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属于同一系统。这是中国细石器文化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应该说明，世界上细石器文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几何形细石器，分布于南亚地区，而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为非几何形细石器。在两种类型细石器文化区连接处的印度东北部，如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格普尔高原和西孟加拉邦一带，也发现类似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学者认为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联系可能是通过我国西藏的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而产生的。在这两个地区都有细石器的考古发现，印度东北部细石器文化应该经由这一通道，受到我国中原地区细石器文化的影响。

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西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唐古拉山脉以南到喜玛拉雅山以北地区。其中藏南定日县的苏热旧石器类型及加工技术与华北旧石器中晚期相近，出土于藏北申扎县的多格则和阿里日土县的扎布两处的石器则起源于华北的“船底形石核”，申扎县珠洛勒石器则与宁夏水洞沟的类同。这些都说明旧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现在的西藏地区存在密切联系。到了新石器时代，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居民在世界上两个文明古国之间从事了早期的交流活动。

中印之间滇缅通道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信息更加丰富。印度东北地区如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和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出土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石锛，八字形式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都是中国云南常见的器形。在阿萨姆曾发现一种刃部磨在两窄边的圭

形石凿，在中国四川西南部则甚常见。特别应该注意的是，阿萨姆地区制作石器的原料中有翡翠，在萨地亚边区，翡翠甚至是制作石器的主要原料之一。印度本土不出产翡翠，距其最近的产地在缅甸。而缅甸最有名的翡翠产地在其北部的密支那勐拱地区的度冒和缅冒等地，离现在中国的云南边境仅 150 公里。《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在今天云南境内的永昌郡产翡翠，可见古时永昌一带是翡翠产地。阿萨姆一带新石器时代的房屋是中国南方常见的干栏式建筑，除了两地之间直接的文化交流之外，很难有其他的解释。据莫维士的研究，在缅甸吻外（今称马圭）县德马多河发现的石斧、石楔、石凿，在东彬发现的小圆石器，与北京周口店的石器很相似。在缅甸上下墩县和瑞波县境内出土的环石，也同中国仰韶文化新石器相近[5]。由此可以推知，中国西南地区、缅甸和印度东北部之间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多方面的交换往来活动。印度学者巴普贾里（H. K. Barpujari）说："阿萨姆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的发展是与东亚紧密相联的。"[6]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应该是通过今天的缅甸和西藏两条通道进行的。

（二）彩陶文化的传播与扩散

中国大地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很早就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和互相交流。彩陶文化的产生和扩散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传播现象。中国彩陶文化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代表。1921 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细泥红陶表面红色，表里磨光，器表常有

几何形纹、绳纹或动物形花纹等各种彩绘，故称彩陶。据碳－14法测定，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后来仰韶文化遗址在中国东北的辽宁、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续有发现。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的故乡。甘肃仰韶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前2050年，齐家文化为公元前2000年。都是继承仰韶文化而向西发展的。在新疆各地如哈密、巴里坤、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轮台、库车等地，后来也发现不少彩陶。而其年代都未超过公元前2000年，时间更晚于甘、青一带。新疆西部的和阗、皮山、沙雅、伊犁河流域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原彩陶文化西传的终端。彩陶文化的传播在西北方向上应该说没有走出国门，而在西南方向上却有传至印度东北部的迹向。印度阿萨姆北加贾尔山出土了素面红陶和绳纹陶，有学者推测都是受了中国西南文化的影响。在印度中央邦的纳夫达托里和南部邦格纳伯莱邦的帕特帕德等地所发现的彩陶带流钵，器形同于云南宾川白羊村出土之陶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在它诞生以后，呈现出向周围扩散的趋势，在西部地区，表现出由东向西的传播方向。"[7]

彩陶文化非中国所独有，在今吐库曼斯坦的安诺，有彩陶的考古发现。安诺文化属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东欧的特里波列文化也有彩陶的考古发现，特里波列文化主要分布于罗马尼亚东喀尔巴阡山至乌克兰第聂伯河中游。特里波列村在基辅城附近，其遗址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至

前3000年。但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说明，中亚、东欧的彩陶文化与中国彩陶文化虽然都曾向周围扩散，却没有发生接触和联系。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间中亚地区制造彩陶的部落，在向四周散布并传播其文化时，到卡拉库姆沙漠（在今吐库曼斯坦境内）南部边缘便停顿下来。两种彩陶文化来自不同的艺术母题，某些相似之处只能看作是自然形成的巧合性质。有人曾经认为中国彩陶文化受到特里波列文化和安诺文化的影响，缺乏科学的论据。

（三）域外文化自西东来的迹象

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也有域外文化自西东来的痕迹。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有中国最早的卐（万）形纹饰，此种纹饰在青海乐都县柳湾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壶上大量出现。中国出土的带有此种纹饰的陶器最早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多年。同样的纹饰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欧洲等地也大量发现，而最早的卐纹饰则见于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的塞浦路斯和卡里亚陶器残片上。在巴基斯坦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莫享朱达罗（Mohenjo Daro）遗址中出土的印章上也见有此种纹饰，其卐形符号笔画有左折的，也有右折的。从年代早晚和地域上看，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卐形符号极有可能是从西域传入的。根据研究，卐形符号代表着某种抽象的意义。据说有的表示太阳的光芒四射，有的则是女性的标志，有的代表雷电或其他自然现象，其中都表达着先民们某种心理和观念。卐形符号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说明当时各地之间人们心灵的某种勾通。在西藏

昌都所发现的卡诺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采用“勒瓦娄哇”技术制作的器形。这一技术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广泛流行于北欧、北非和西亚地区，在中亚、南亚地区也被广泛使用。卡诺文化可能接受了来自域外的影响。在卡诺文化遗址中，还发现如同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区甘吉·达维新石器早期遗址中的骨片[8]。

包括中国在内，广大欧亚地区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陶塑裸体女像，使人们感受到各地女神文化的某种联系。1982 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陶塑裸体女像残块 20 多件，大多为人的肢体部分，未见头部。其中有两件可以辨认的小型女性形体，身体肥硕圆润，有明显的阴部符号，左臂曲于胸前，下肢弯曲，小腹圆鼓，臀部肥大凸起，分明是一位孕妇的塑像。这种史前裸体女像，在西到比利牛斯山，东至贝加尔湖的广大欧亚地区有不少发现，人们通常称之为“早期维纳斯像”。最早的“早期维纳斯像”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像”大多是以木、牙、骨、石等材料雕刻而成，新石器时代的女体裸像则以泥塑为主，各地女神像造型式样不同。西欧地区的不少裸像强调胸部、臀部和腹部，呈现肥大状。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裸像相应的部位皆呈自然隆起状。从早期维纳斯神像的发现可以看出，女性裸体陶塑的造形艺术和所表示的生殖崇拜的文化观念曾在远古时期广大地区互相传播和交流[9]。

三　古代神话传说透露的信息

文化交流是由人的活动实现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的

史前历史中，人类的活动除了凭考古资料进行科学说明之外，就是凭先民口耳相传而由后人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和零散的文字追忆。神话传说经过数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不断被加工和改造，不能作为信史来凭依，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人类早年历史的某些遗痕，或者说明古人乃至原始人对人类历史的某些看法，对认识史前期人类的历史活动有重要的认识和参考价值。

如上所述，旧石器时代文化传播的热点地区之一是中国西南、缅甸和印度东北部。从缅甸各民族的起源来看，根据出土文物、古代文献和各民族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中外学者都认为，现在定居的缅甸境内各民族，并不是本地的土著民族。他们大都在史前就从我国青藏和云贵高原先后迁入缅甸境内。从其语族上可归为三大类，即孟—高棉语族、藏缅语族和侗泰语族。其中孟—高棉语族主要为孟族（缅甸称楞族）、崩龙族（中国境内称得昂族）等族，他们在史前就自中国云贵高原迁入缅甸，是最先移居缅甸的民族。缅甸民间流传着《三个龙蛋》的民族起源故事。说在远古时期，有一龙公主与太阳神相爱，生下三只龙蛋。一个破裂后变成了一块宝石；一个孵成了女孩，由许多神仙把她送到中国，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另一个孵成了男孩，后来成为缅甸有名的国王骠苴低。缅甸人自古以来就称中国皇帝为“乌底巴”，意思是同为蛋生、同母所生。直到现在缅甸人见到中国人还用缅甸语称之为“胞波”，意思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有时称“瑞苗”，意思是亲戚[10]。

如前所述，新石器时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甘肃、青

海、新疆等地保持着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并与亚洲其它地区、非洲、欧洲等存在着某种文化交流的信息。考古发现，今青海地区早就有人类的活动，湟水流域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据此推测，古羌族早就活动在青海东部和新疆若羌之间的交通线上。《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欲从羌中归"，学者们推断此羌中可能就在柴达木盆地两沿。说明当时已存在自中亚至新疆，再由新疆经青海向东进入关中地区的道路。这条路线就是古羌人活动的地域，它的起源应该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丝绸之路河南道考察小分队在白龙江上游流域的迭部、阴平、南坪等地相继发现大量属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湟水流域和隆务河流域同样发现大量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迹。这些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两千年以前，由湟水流域经隆务河流域而往白龙江上游，原有一条新石器晚期居民南北相互从事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这种交往活动在许多滇黔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起源传说和民族迁移传说中有所反映。如羌彝等族的口头传说中就有一则故事说他们的先民是从北方迁来的[11]。从上述彩陶文化的扩散看来，古羌族和青海地区都曾在这种传播中发挥了作用。

中国古代传说也有关于西域和中原民族交通的内容。中国古代载籍中有黄帝西游昆仑的行踪，《山海经》卷二《西山经》云："（西王母之）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又云："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同书卷十一《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庄子·天地篇》云："黄帝游乎赤水之

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同书《至乐篇》云：“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墟，黄帝之所休。”据《穆天子传》卷二，周穆王西征，“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陆贾《新语》云：“黄帝巡游四海，登昆仑山，起宫望于其上。”贾谊《新书·修政语》云：“黄帝济东海，入江内，取录图而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

后世文献上还有黄帝使伶伦西之昆仑的传说。《吕氏春秋》卷六《古乐》云：“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汉书·律历志》、《说苑·修文篇》、《风俗通义·声音篇》、《〈左传·成公九年〉正义》皆记载此事，“阮隃”皆作昆仑，《世说新语·德行篇》引《吕氏春秋》，亦作昆仑。过去不少人以为此大夏为中亚西域古国，伶伦律管来自巴比伦，理解有误。实际上伶伦到过的大夏是在中国境内今甘肃东南部一带。因此伶伦西行的尽头仍是昆仑，而非中亚古国大夏。

昆仑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郑玄注谓昆仑、析支、渠搜为三山名。古籍中之“昆仑”，有的作民族名，有的作古国名，有的作西北山名。民族名、国名当皆从山名而来，而古之昆仑之山在何处？学者历来有二说，一说在今甘肃酒泉之南、祁连山主峰一带。《山海经》卷二《西山经》“昆仑”条毕沅注云：“在今甘肃肃州南八十里。”一说在于阗国，《史记·大宛传》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

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传说中之昆仑当从前说。

古代文献还有黄帝西行至崆峒山的传说。《庄子·在宥篇》又记载黄帝曾往“空同之山”，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平天下，“西至于空桐，登鸡头”。葛洪《抱朴子·内篇》也记载黄帝登崆峒山的传说，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空桐，《史记集解》引应劭语：“山名。”又引韦昭曰：“在陇西”。鸡头，《史记索引》云：“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

文献中还有远古时其他中原人西行的传说。《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之孙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括地志》云：“流沙在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太平御览》卷七九七引《元中记》记载：“扶伏民者，黄帝轩辕之臣曰茄丰，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后是为扶伏民。去玉门关二万五千里。”

古代传说中也有西域人来华的记载。《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记载：“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一曰长脚。”张星烺说：“长股在黑水之西阿，亦中央亚细亚民族也。”《拾遗记》卷一记载，颛顼时，“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国，人皆衣羽毛，无翼而飞，日中无影；寿千岁；食以黑河水藻，饮以阴山桂脂；凭风而翔，乘波而至。中国气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为饰。献黑玉之环，色如淳漆；贡玄驹千匹，帝以驾铁轮，骋芳殊乡绝域。其

人乘风泛黑河以旋其国也。”同书同卷还记载，帝喾时，“有丹丘之国，献玛瑙瓮，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以露充于厨也”。“丹丘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马脑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轻丽。中国人有用者，则魑魅不能逢之”。

尧时有关中国与西域交通的传说很多。《竹书纪年》卷二记载：帝尧陶唐氏“十六年，渠搜氏来宾。”《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云：“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云：“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钹汗。元魏时曰破洛那。”张星烺说：“钹汗即今俄领中央亚细亚之费尔加拿省(Ferghana)也。《凉土异物志》谓渠搜在大宛北。汉代大宛，亦为今费尔加拿省也。宋膺《异物志》云：‘大头痛(山)、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唯冬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杜佑《通典》卷一九三《竭槃陀记》谓‘头痛山在国西南，向阙宾历大头痛、小头痛山，赤土身热之阪’。据《通典》及《异物志》渠搜亦在今葱岭之西也。”《竹书纪年》同卷又记载：“二十九年春，僬侥氏来朝，贡没羽。”僬侥氏在西方，所以后来庾信《哀江南赋》云：“西尽浮玉南琛没羽”。

《述异记》卷上记载：“陶唐之世，越常国献千岁神龟，方三尺余；背上有文，科斗书，记开辟以来。帝命录之，谓之龟历，伏滔述帝功德，铭曰‘胡书龟历之文’。”越常国即越裳国，后世认为在今越南，《后汉书·南蛮传》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但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详考诸书记载，认为越裳国当即鲍梯所谓亚述利亚：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南蛮传》谓:"交趾之南,有越裳国。"《梁书》卷五十四,《海南诸国传》谓"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之界也"。中国学者自昔皆依《后汉书》,谓今安南南境,为古越裳国。考越裳国于周成王时亦尝来献。《前汉书》《后汉书》及唐马编《中华古今注》皆有记载。《中华古今注》谓"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扶南为今柬埔寨(Cambodia),又名真腊。林邑为占婆(Champa),又名占城。今皆隶安南,为法国领土。欲往越裳国,须缘扶南林邑海际,行期年方至,其不在今安南之南境,已昭昭然明矣。法国鲍梯氏(Pauthier)谓近世发现之古代亚述利亚(Assyria)石碑,见其所刻,人皆服长衣,下垂及地,与汉文越裳二字之义相合。《述异记》此节谓龟背上有文,科斗书,或即亚述利亚之楔形文字也。迦尔底(Chaldaea)为世界最古之国,其国有书,记天地创造。龟历亦记开辟以来。鲍梯谓此节之越裳国使节,或为迦尔底之使者也。鲍氏之说,虽无确实证据,然亦有若干理由。(见 H. des Relation politiques de la Chine ,etc. pp. 5 - 7)越裳国不在今安南南境,固可断然无疑也。中国史书序海外各国位置,多不清楚。越裳国使由海道南来,而抵交趾,因而谓在交趾之南,亦未可知也。

古代传说中,尧时与西域有密切联系。《庄子·在宥篇》记载:尧"投三苗于三危"。三危,山名,地处西北,张星烺同上书云:

"三危山在今甘肃敦煌县境。"汉焦延寿《易林》卷一记载："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嘉子。"又云："戴尧扶禹，松乔彭祖，西遇王母，道路夷易，无敢难者"。《墨子·节用篇》云："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淮南子·修务训》云，尧曾"西教沃民"，"窜三苗于三危"。贾谊《新书》卷九《修政语》上云："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国与人身鸟面及焦侥。"张星烺说："沃民何在不可考，有谓即今波斯者，然亦难信也。……大夏、渠叟并称，可见其壤地相接。大夏在今阿母河南，则渠叟在今费尔加拿省，益可信矣。"

舜时也有不少有关中西间交通的传说。《竹书纪年》卷二云：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徐干《中论·爵禄篇》云："故舜为匹夫，犹民也。及其受终于文祖，传称曰予一人，则西王母来献白环。"《宋书·符瑞志》亦记西王母献白环玉玦事。《风俗通义》卷六《声音》云："舜之时，西王母来献其白玉琯。"白玉琯为乐器，古以玉为之，后改为竹制。《大戴礼记》卷十一《少间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来献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晋书·律历志》、《尚书大传》、《宋书·乐志》等书皆记西王母献白玉琯事。刘向《新序》卷一《杂事》云："及(舜)立为天子，天下化之，蛮夷率服。北发渠搜，南抚交趾，莫不慕义。"王嘉《拾遗记》卷一记载："冀州之西二万里，有孝养

之国，其俗人年三百岁，而织茅为衣，即《尚书》'岛夷卉服'之类也。……昔黄帝伐蚩尤，除诸凶害，独表此处为孝养之乡。万国莫不钦仰，故舜封为孝让之国。舜受尧禅，其国执玉帛来朝，特加宾礼，异于余戎狄也。"刘向《说苑》卷十九《修文篇》记载舜时"南抚交阯、大（当为'北'）发，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

注　释

〔1〕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140 页。

〔2〕莫维士（Movius，H. L.），"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Paper of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vol. 19. Cambridge，1944. 童恩正支持莫氏之说，见《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 年第 4 期。

〔3〕《史记·大宛列传》。

〔4〕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2 辑。

〔5〕前揭莫维士（Movius，H. L.）文。

〔6〕巴普贾里（Barpujari，H. K.），"The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Assam"，vol. 1，Ancient Period，32，Guwahati：Publication Board Assam，1990. 前揭童恩正文。

〔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7 页。

〔8〕参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51－71 页；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25 页。

〔9〕参安志敏等《藏北申札、双湖的旧石器和新细石器》，载《考古》1979 年第 6 期；郭大顺等《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 年第 11 期。前揭陈尚胜书，24 页。

〔10〕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见前揭周一良主编书，2－3 页。

〔11〕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36 页。

第二章　夏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进展

一　夏文化的扩散及夏与西北部族的联系

中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共历四五百年的时间，在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前十七世纪之间。公元前十七世纪，成汤在众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下灭掉夏朝，建立了商朝。我国的上古文明自夏朝起有了相当迅猛的发展。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堪称文明古国可以与夏商匹敌的为数很少，仅有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印度河流域和克里特岛的一些城邦国家。

夏朝是一个历时长久的王朝，据《尚书·禹贡》记载，夏之声教所被，达于四海，其西至雍州：

>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为黄壤，厥田为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

厥成功。

其中昆仑、析支、渠搜既是山名，又是族称和古国名。张星烺说："黑水既今额济纳河。弱水何在，则纷纷聚讼，莫衷一是。《地志》云，在张掖郡删丹县（今山丹县）。三危即舜窜三苗之地，在今甘肃敦煌县。积石山在今甘肃导河县。昆仑即古书所称河源，析支在唐河关西千余里，渠搜在今俄领费尔加拿省。……流沙即今敦煌西之沙漠也。"顾炎武曾对此所谓"四海"的概念进行了考证，《日知录》卷二十二"四海"条云：

> 《禹贡》之言海有二："东渐于海"，实言之海也；"声教讫于四海"，概言之海也。宋洪迈谓海一而已。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曰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之称四海，盖引类而言之。至于《庄子》所谓"穷发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谓"指西海以为期"，皆寓言尔。程大昌谓条支之西有海，先汉使固尝见之，而载诸史。（原注：《史记·大宛传》："于填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汉书·西域传》："条支国临西海。"）后汉班超又遣甘英辈亲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与海商皆常往来。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实临瀚海。苏武、郭吉皆为匈奴所幽，置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干国，在海北岸。然则

《诗》、《书》所称四海，实环华裔而四之，非寓言也。

夏文化曾向四方扩散。《尚书·大禹谟》云："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说明夏朝与周围的夷人部落保持有密切联系。夏朝与今天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交往和交流，《大戴礼记》卷十一《少间》记载："舜有禹代兴，禹卒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最早称为"狄历"的民族夏时居住在北海（贝加尔湖），据何秋涛《王会篇笺释》引《禹四海贡物》，夏代曾"会于中国"，是"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之一。在北方与夏族为邻的还有荤粥。《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叙述西羌之始末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皆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

后来称雄北方草原的匈奴族乃夏之苗裔，《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裴骃《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淳维，"匈奴始祖名"。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张晏云："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司马贞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

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

《荀子》卷十九《大略》记载:"禹学于西王国。"西王国,唐杨倞注云:"西王国,未详所说。或曰,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新序》卷五《杂事》也记载此事。《淮南鸿烈》卷六《览冥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中国古代北方早就形成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圈,文化圈是特定文化比较稳定的存在区域,其内部具有相对统一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形态。大体说来,中国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农耕文化在夏朝即具雏形,《论语·宪问》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汉书·食货志》云:"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人贡棐"。后经商周的继续发展,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周以农耕强盛,灭商,并将农耕文化的影响扩大到长江中游,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波及吴楚的农耕文化圈。北方游牧文化圈的出现年代,现在没有确切的资料加以说明。但在直至中国新疆地区的辽阔的欧亚草原上,早就有草原民族游牧其间。人类学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游牧的印欧人分布已达中国新疆东部的罗布泊和哈密盆地。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甘肃、宁夏、内蒙长期成为中原农耕与西北游牧两大文化圈之间交叉地带,而后来的长城一线被视为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圈的分界线。夏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传播表现为农耕文化与游牧两大文化间的交流。

夏朝已经进入青铜文化时代。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是双轮马车,《周礼·考工记》云:"攻木之工,轮、舆、弓、匠、车、

梓，……故一器而工聚者，车为多。”意思是说，造车技术集中体现了各种古代制作，特别是机械制造的工艺水平。传说中中国造车始于夏代，《世本·作篇》将车的发明归功于夏朝车正奚仲。《管子·形势解》云：“奚仲之为车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而且奚仲造车不久，车就被夏启用于战争。《夏书·甘誓》记载启与有扈氏作战就是一场车战，其中提到车左的兵士、车右的兵士和驾车的兵士。《竹书纪年》将这场战事系于夏启二年。中国夏代已有战车，也有考古学方面的资料加以说明。一般都认为，以二里头遗址第一至四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早期青铜器文化和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夏代铜器中不仅有古代文献所说的车战五兵“矛、戟、钺、盾、弓矢”，而且有整套造车工具，如空首铜斧、铜斤、铜刨、铜凿、铜锥等。考古未见夏朝的任何车迹，但这些兵器和造车工具足以说明夏代已有车和战车。现在所见最早的车迹是殷墟的车马坑，之所以没有更早的车迹，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始以木为车”，《山海经·海内经》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殷代以前的战车不带任何青铜饰物，而木车遗迹难以保存到今；二是车马殉葬是造车手工业发达阶段的产物。据《夏书·舜典》记载，车马是夏天子赏赐功臣的名贵之物，所以殷代以前中原可能不用车马殉葬。

林梅村根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新疆和内蒙等地的考古发现指出，先秦文献所言造车工具的完整组合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800年左右已在中国北方草原初步形成，这套工具很快传入夏王朝统治中心地区。战车用马牵引，中亚草原是现代驯

化马的故乡之一。公元前2500年至前2100年,中亚草原的阿凡纳羡人最早用家马殉葬,说明他们是中亚最早驯化马的民族之一。塔里木盆地分布有阿凡纳羡文化类型的陶器和石器。阿凡纳羡文化不仅到达天山东部山脉,而且越过天山,向南一直分布到塔里木盆地的叶尔羌河下游地区。中亚草原的驯化马可能在公元前2500至前2100年就随阿凡羡文化的传入而出现在天山南北了。中国西北草原也是驯化马的故乡之一,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河西走廊在古代居民也已经驯出家马。

古代岩画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表明,中国北方草原的古代居民使用马车的历史相当悠久。1978年,在嘉峪关市西北20公里黑山山谷崖壁上发现一批古代岩画,在岩画分布中心地区四道鼓心沟发现一幅单辕双轮车图画。据研究,黑山岩画的年代很早。岩画上描绘的这种整木轮单辕双轮车即文献中说的"椎车",这是中国最古老的车种之一。汉桓宽《盐铁论·非鞅》中说:"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世本·作篇》也提到"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商开国之君成汤的第十一代祖先,乃夏代人物。他所造椎车以马牵引,说明中原地区使用马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黑山岩画上那辆椎车后面所拖一物就像是一匹马。上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阴山巴音乌拉山谷古代岩画上也发现了马拉椎车。据介绍,这辆马车为双轮,车轮无辐条,但是有对轴的刻画。两轮之间有一车厢,车厢前为单辕双马,右边还有一小马随行。鄂尔多斯草原是中国最早流行造车工具的地区之一,阴山椎车岩画和甘肃黑山岩画应当属于同一时期。新疆哈密市五堡墓地出土青铜时代的椎车车轮实物,据

《哈密文物志》一书中的介绍，车轮“直径79厘米，轮宽12厘米左右。用胡杨木相叠并以榫卯连接而成。中有轴孔，孔径9.4—10.2厘米，孔内残留有轴。单轮表面有明显使用痕迹，并有沙粒嵌入其中”。有学者指出，哈密五堡墓地出土椎车车轮，应属焉不拉克早期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300年之间。这些都说明，中国战车发源地要在西北草原追寻。

据文献记载，“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或曰“子车”。还有一种名叫“钩车”的战车。《司马法·天子之义》记载：“戎车：夏后氏曰钩车。”《礼记·明堂位》云：“钩车，夏后氏之路也。”据郑玄注，“钩，有曲舆者也”。孔颖达疏曰：“曲舆，谓曲前栏也。”就是说夏代的钩车是一种车箱前栏呈弯曲状的战车。中国北方和蒙古草原的古代岩画上屡次发现车箱前栏呈弯曲状的钩车。60年代初，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在戈壁阿尔泰省查干河沿岸阿尔泰山一个狭窄的山谷中发现一组表现钩车的古代岩画，三辆车的车厢前栏均呈弯曲状。林梅村认为，这就是夏代流行的钩车，其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东方古战车如何从整木轮椎车向多轮辐钩车演变的具体过程，第一辆钩车使用整木车轮，也即钩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第二和第三辆6—8轮辐钩车则生动反映了钩车从整木轮向多轮辐的历史演变。80年代初，新疆阿勒泰市乌吐不拉克和多兰特山谷发现4幅古代椎车岩画，椎车两轮之间车厢前栏皆呈弯曲形。从年代看，阿勒泰钩车岩画可能比蒙古查干河谷钩车岩画还要早。总之，蒙古和中国新疆、甘肃、内蒙等地古代岩画都可以和《司马法·天子之义》等有关夏代战车的记载相印证，说明中国使用战车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夏

代。

《世本·作篇》等先秦文献都把车的发明归功于夏车正奚仲。据林梅村考证，奚仲出身奚族，本非中原人士，奚仲的故乡奚族部落在宁夏泾源鸡山。殷墟出土的《小臣墙刻辞》中提到奚部落，刻辞中"奚"字偏旁从阜，可推知殷代奚部落得名于奚山，而奚山就是《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黄帝鸡山"。据宁夏史地研究者近年调查资料，黄帝鸡山系宁夏泾源县六盘山一支脉，奚仲的故乡可能就在鸡山附近奚族部落。《山海经·海内经》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吉光之吉，即古代谱牒之"姞"字，是中国最古老的十二姓氏之一，《诗·小雅·都人士》郑玄笺曰："吉读为姞，尹氏姞氏，周室之旧婚姻之旧姓也。"既然姞姓和姬周互为婚娅，那么奚族部落应该距周人的原始故乡古豳国不远。古豳国可能在今陕西长武县，县之西就是六盘山地区，所以奚部落就在六盘山支脉古鸡山附近。1972 年，在距离泾源古鸡山不远的甘肃灵台白草坡发现西周初年奚部落酋长奚伯墓，灵台一带本来就是姞姓密须国所在地。

甘肃灵台和宁夏泾源都在中国最早流行造车工具的考古文化齐家文化分布区，既然中原造车手工业最初兴起于和齐家文化密切相关的姞姓奚族部落，而夏车正奚仲很可能出自这个部落。则夏代中原战车和造车技术应当来自西北草原游牧文化[1]。

二 商与西北方国部族的联系与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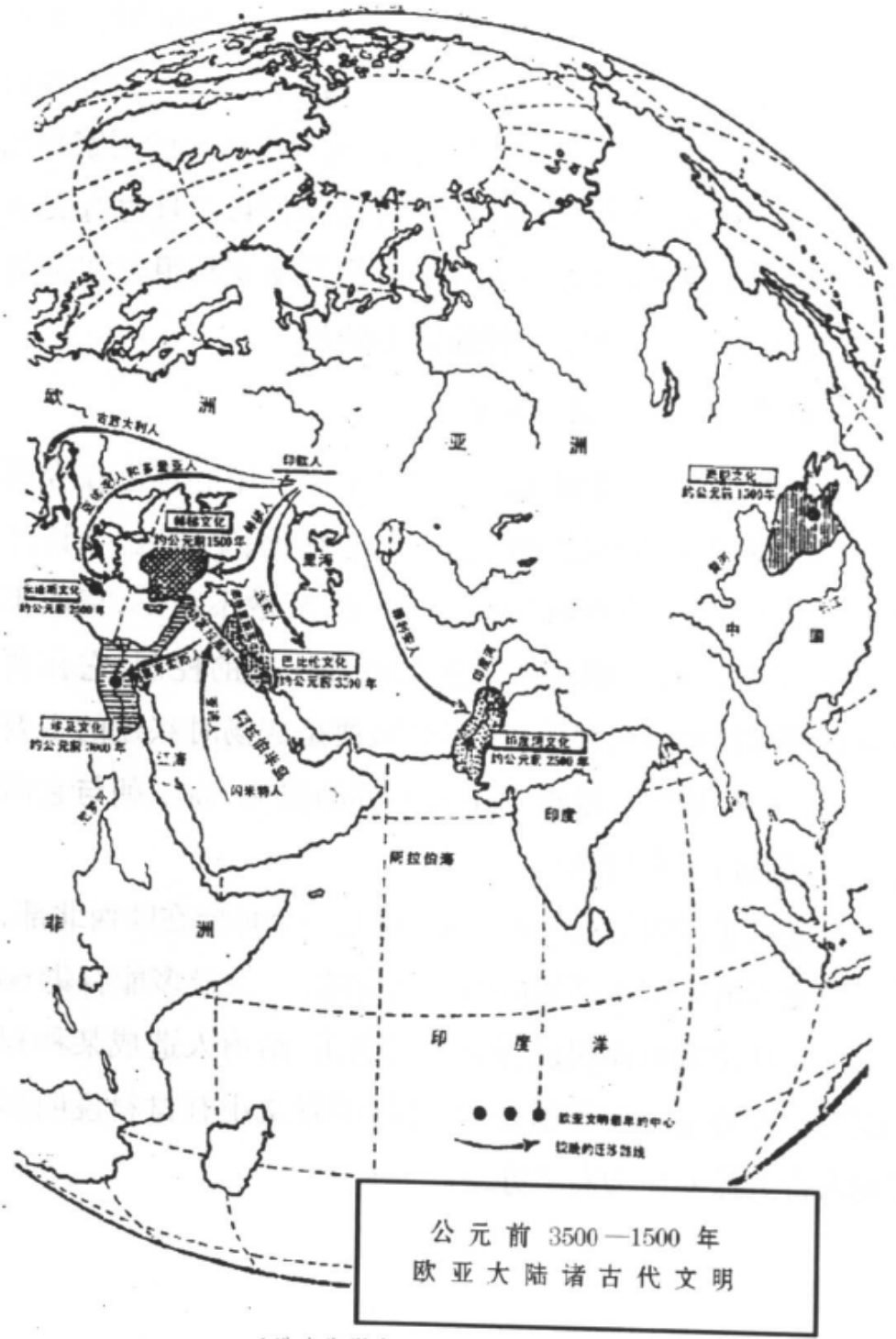
据《史记》记载，商朝共传 17 世，31 王，"用岁四百九十六

年”。它的覆灭是公元前十一世纪的事情。商朝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以前称为早商时期，盘庚迁殷之后至商朝灭亡称为晚商时期。商朝与它西部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则不仅有地下考古的资料，而且也有文字方面的记载来作说明，因为由于商代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字的发现，商朝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时期。

（一）商与西北方国部族的联系

成汤灭夏以后，商朝正式建立。早商的中心都邑在今郑州商城，而其西土在开国之初已达河西走廊氐、羌地区。《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莫敢不来享，曰商是常。”商王朝注意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它在西部设立有别都以加强其影响，偃师商城便是成汤时兴建的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之城邑。根据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商王朝与它西北的各方国保持着密切联系。

吾方位于商朝遥远的西北部，这是一个可能在陕西北部，或者更偏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的牧人部落，一次最多能召集6000名战士。它常常对商朝进行突然的袭击，给商人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失。双方也有友好相处的时候，甲骨文中有材料说明商王曾要求吾方派差使为商王办事。



（选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商之西北还有一个鬼方，《世本》记载，鬼方隗姓，又称鬼戎。《竹书纪年》作西落鬼戎。鬼方是羌族，后世称先零羌，世居河西走廊，《山海经·西次三经》云在三危山之西、大山之东有騩山，是鬼方发祥地。古代的騩山在今玉门西南的巴颜达山，商代时天山以东都是鬼方游牧之地。殷王武丁时商曾与鬼方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最长的一次长达三年，才打败鬼方。《周易·既济》九三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事为近年考古证实。殷墟妇好墓出土玉戈上刻文有卢方进贡"戈五"的记载。日本甲骨学家岛邦男考证，殷墟卜辞中之卢方在殷之西土。《国语·周语》中记戎狄民族曰："卢由荆妫。"韦昭注："卢，妫姓之国。"可知卢方与鬼方同族，妫姓。向高宗妃子妇好纳贡的卢方就是高宗所伐鬼方。商代后期，鬼方东侵，越过黄河，成为商代西患。鬼方在商的西北地区青铜文化传播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荤粥当在鬼方东北，后来北移，可能与鬼方东侵有关。荤粥的北移造成商文化向外贝加尔湖地区扩散。

羌方也是位于商朝西方的国家，它的位置可能在陕西北部，北与吾方相邻。羌与商保持着长期的联系，羌的名字在甲骨卜辞第一、三、四和五期中都有出现。商人与羌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商征伐羌有时一次征发了13000名士兵。商人祭祀祖先时把羌作为牺牲使用，后来羌还参加了武王灭商的战争。

召方也位于商的西部，与羌为邻，可能在今陕西中部。商王武乙时商对召方的军事活动规模也比较大，商王亲自指挥，王族成员都充当战士。

商朝西部的周方和周从太王时起就活动在岐山附近的渭水

中下游地区，后来成为商的敌手和征服者。

商与西部这些方国之间既有军事冲突，也有友好交往。《商书·伊尹朝献》记载，成汤时四方民族都来朝献，带来各自和远方交换所得的异物。当时，西方、北方有十几个民族，其中也有鬼亲（即鬼方）。这种冲突和交往都会导致彼此文化上的接触和交流，商文化又通过它们与更远的西部、北部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进行间接的接触和交流。

（二）商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尤其是手工业内部分工的扩大，商代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得到迅速的发展。商代手工业各部门彼此间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诸如冶铸、制陶、玉石雕刻和镶嵌工艺，以及纺织、皮革、建筑等行业，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

在早商墓葬中已发现用贝随葬的现象，殷墟晚期墓葬以贝随葬的现象更为普遍，有的墓中随葬海贝竟达6000枚以上。甲骨文、金文中也有以“贝”作为对臣下赏赐的材料，并以朋为单位。甲骨文“贮”、“宝”、“买”、“得”等皆为从“贝”之字。晚商墓葬中甚至还发现了不少铜贝。因此有人认为这种贝和铜贝已具有货币的机能，已经起着货币的作用，已经是真正的货币。

甲骨文中有“舟”、“车”等字，舟在商代虽然没有实物发现，而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像人手执竹竿立于舟上。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一个饕餮纹青铜鼎，腹内铭纹为人荷贝立于舟中，学者们推测是商人去远方贸易之象征。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车马坑则多次被发现。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发现不规则的长方形车

坑，南北约3公尺，东西长约6公尺，底深2.5公尺。车木已朽，而有马络头饰和车饰数百件。此后的发掘又发现车马坑多处。《管子·轻重篇》记载："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古时一车驾四马，中间二匹叫服。根据甲骨文、金文和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以及古籍记载，可以知道，商代的确有了车马、舟等交通工具并用于商业运输。

此外，殷墟遗址出土不少来自远方的物品，如南方的象，海中的鲸，来自新疆和阗玉制造的玉器等，有的龟甲经鉴定来自东南亚，还有的甲骨上粘有土卢布（棉布），可能来自域外。这些都说明殷都已经和我国边远地区以及域外存在相当规模的交通和交往。

（三）青铜文化的传播

在与西北方国接触交往和商业交通发展的基础上，商与西北民族、地区和国家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交通和交流。我们首先注意到青铜文化的传播。冶铸青铜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商代出土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等。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各自发展了自己的青铜文化，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发明了冶铜技术。公元前2500年，印度人已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使用铜和青铜工具。巴比伦进入青铜时代也比商代要早。和殷商青铜文化同时，北亚也有两个青铜文化中心。一个是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发展起来的阿凡纳西沃文化，继起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另一个是以南土尔克曼为中心的纳马兹加文化。

然而研究表明，中国殷商青铜文化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

化，商代的青铜器采用的是分件浇铸法，和近东、西亚和西伯利亚的失蜡法工艺不同，在青铜铸造的技术发展上自成体系。它与埃及、印度和巴比伦青铜文化似乎并没有发生接触和交流，但与北亚青铜文化却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存在着接触和交流的迹象。考古学研究说明，河南二里头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商初，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中，人们曾发现北方系特色的环首柄刀、器身类似北方系战斧而以扁平的"内"代替管銎方的奇特武器。这种北方系兵器最早起源于伊朗，而在中国北方，蒙古国境内，俄罗斯联邦的外贝加尔湖地区、土瓦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阿尔泰地区，更西的吉尔吉斯草原、鄂毕河中游地区，直到黑海沿岸一带，都有发现。说明出土这种青铜兵器的中国北方地区当时与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都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青铜文化联系，商人引进了北方系青铜器的某些因素来改进自己的工具和兵器。

我们也看到殷商青铜文化西传和北传的迹象。卡拉苏克文化是分布于南西伯利亚、鄂毕河上游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卡拉苏克文化晚期墓葬中发现的短剑、折背刀和弓形器等青铜器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某些器物具有相似性，因此有人认为卡拉苏克文化主要受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青铜文化的影响。从发现的这些青铜文物多为兵器这一点来看，其传播的动因和媒介不能不说与商代与西北各方国间频繁的战争有关。战争必然造成双方的互相了解和借鉴，要改进自己的盾，就要研究对方的矛；要改进自己的矛，就要研究对方的盾。要补自己的武器之短，就要取对方武器之长。这就必然造成兵器形制

性能的互相传播和借鉴。

（四）玉石文化的传播

商与西北各方国之间密切的联系促进了中西之间玉石文化的传播。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出土玉石雕刻品750余件。经鉴定，这些玉石均属软玉，产地为新疆和田。这些玉石应该是通过西北地区游牧民族转贩和西北各方国朝献而来。

殷商玉石文化又通过北方草原传播到西伯利亚地区。在作为贝加尔湖沿岸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格拉兹科沃文化的墓葬中，曾出土有白玉环，其形制与纹饰与中国商代的玉器完全相同。玉器上的几圈同心圆刻线和外大里小的“马蹄眼”穿孔也显示了商代的艺术工艺。在俄罗斯联邦下诺言夫哥罗德市附近的塞伊玛墓地，也发现这种白玉环。塞伊玛文化出现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300年之间。前苏联考古学家C. B. 吉列谢夫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中说：“商代的白玉西传完全证实，在塞伊玛时期，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沿岸、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和中国北方之间曾有联系。塞伊玛、图尔宾诺、贝加尔湖沿岸和绥远等地相似铜戈的形制，很可能是沿玉器之路传播的。经由此路传播的还有塞伊玛出土的其他器物：镞和菱形铤的矛。”[2]

在中国境内，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一种龙首刀，而在新疆哈密盆地也曾发现与之形制完全相同的刀。同样的龙首刀在山西保德晚商墓葬也有出土，说明从新疆哈密经山西保德至殷都大邑商有一条古老的通道。玉石和龙首刀之类有的就是通过这条道路传播的。

(五)西域胡舞初传中原及宫廷

《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荒淫奢侈,"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林梅村认为,这里描写的可能是殷臣师涓为纣王编排的舞蹈"北里之舞",果若是,则北里之舞实际是一种裸体舞蹈。据殷墟卜辞,此类裸体舞蹈可能由男女奴隶来表演。如:"贞:今庚辰夕用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帚。九月"(《甲骨文合集》629);"癸酉卜,贞:多妣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帚"(同上630)。小臣指男仆,小妾指女奴。中国传统观念是男女授受不亲,殷王这项活动同时使用男仆和女奴各30人,疑与《史记》中所说"男女裸,相逐其间"的北里之舞有关[3]。

有学者指出,乐舞奴隶必需按照奴隶主的要求去进行创作和表演,与"靡靡之音"并提的"北里之舞",可能是在某地的民间情舞基础上加工的[4]。但林梅村认为,纣王年间出现于宫廷的男女相逐的裸体舞蹈似非中原固有文化。北周时传入中原的乞寒胡戏是西域胡人的一种裸体宗教舞蹈,而据韩儒林《泼寒胡戏与泼水节的起源》一文研究,这种裸体舞蹈的起源地在波斯。法国伊朗学家华尔(C. Huart)在《古代波斯及伊朗文明》一书中,曾详考这种裸体宗教舞蹈的来龙去脉。他说:"俾路斯在位25年,他的统治是很不幸的。为了战胜长期干旱之后的饥馑,下令向外国购买粮食,减轻赋税,强迫富户分其储粮给予贫民。所谓泼水节即为纪念甘雨解除了灾难性的干旱而创立的。""他在位时大旱无雨,波斯遭受干旱的苦难。国王免除国

人多年赋税，打开国家粮仓，卖掉祆神庙的财产筹措银钱。最后亲到法尔斯的阿达尔忽拉山顶，祈祷神祇结束这场灾难。他的祈祷被神接受了。他刚刚到达这个地区的旷野，天际升起乌云，倾盆大雨下起来了。为了感谢神恩，俾路斯在这个地方建起一个村庄，名其村曰 Kām Pērōz，意即'俾路斯的祈祷'。由于狂喜，人们用水互相泼洒。这个高兴的轻率活动成了泼水节节日具有特征的仪式。"林梅村认为，殷末帝宫突然流行的裸体舞蹈和波斯祆教舞蹈不会有什么联系，但有可能与古代印欧人用于祈雨的原始宗教舞蹈有关。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深山一处崖壁上发现表现裸体舞蹈的大幅古代岩画，其中一幅有祭祀双马神的图案，双马神是雅利安人崇祀的重要神祇，类似的双马神还见于商代铜器铭文。这种裸体舞蹈的内容可能与古代印欧人祈雨的宗教活动有关，商代印欧人包含有裸体舞蹈内容的宗教活动随东迁的雅利安人传入了新疆地区。

《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云："舞以大夏。"何休注曰："东夷之舞曰株离。"《白虎通·礼乐》曰："东夷之舞曰朝离。"《周礼·春官》郑玄注云："西方之舞曰株离。"《新唐书·西域传》"挹怛"条云："大夏即吐火罗也。"林梅村认为，株离之舞应如郑玄所说乃西域胡舞，"朝那"一词可能来自吐火罗语，其所在地即今宁夏固原及其附近地区，曾是先秦时期吐火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株离之舞是先秦时期即已流行于中原的西域胡舞[5]。

（六）古史和传说中商与西北方国部族以及西域的交通

古代传说中也有不少商与西域交通的材料。《竹书纪年》

卷上记载:“汤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还,诸侯八译而来者千八百国。奇肱氏以车至,乃同尊天乙履为天子。”据《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奇肱国在一臂国之北。汤时曾乘西风至,《述异记》卷下云:“奇肱国,其国人机巧,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吹奇肱人乘车东至豫州界。后十年,而风后至,使遣归国,去玉门四万里。”《大戴礼记》卷十一《少间》记载,商汤时“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竹书纪年》卷五记载,成汤十九年,“氐羌来贡”。“(太戊)二十六年,西戎来宾,王使王孟聘西戎。”七十五年,“太戊遇祥桑,侧身修行。三年之后,远方慕明德,重译而至者七十六国。”传说中还有彭祖流离西域的故事,《神仙传》卷一云:“彭祖者,姓籛讳铿,帝颛顼之元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吾遭服而生,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抱朴子》卷二《释滞篇》云:“彭祖为大夫八百年,然后西适流沙。”

商与西北方国的军事冲突也见于古史和传说中的记载。《竹书纪年》卷五记载:“阳甲三年,西征丹山戎。”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商对西北方国部族的战争,造成西北方国部族对商的臣服,加强了内地与西北地区的联系。《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叙述西羌之始末云:“后桀之乱,畎夷人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

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卷六记载，祖甲“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十三年，西戎来宾。”

商汤时曾令伊尹作“四方献令”，规定前来朝贡诸国进贡方物。《汲冢周书》卷七《王会解》记载：“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支之鞞、□鯈之酱、鲛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闟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奸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汤曰：‘善。’”

三　商代周部族与西北各族的关系

代商而起的是周朝，周人的祖先后稷是尧、舜和夏禹的同时人物。姬姓的周人本来就与西北游牧部落有密切关系。周人的历史从姜嫄生后稷开始，周人以姜嫄为女性始祖，将姬、姜二姓联结为人类学上的两合氏族。姜、羌为一词二形，从姬姓周人的起源上看，周人便与羌人有密切关系。古代羌人活动的地域在陕西西北、陇右、山西南部。据《史记》记载，在夏后氏政治衰微

时，周族的祖先奔于戎狄之间，他们放弃了原有的农业，采取戎狄的生活方式。后来在部落首领公刘的率领下，迁徙到豳（邠），“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公刘以后九传至古公亶父，此时周人仍居于与戎狄相接的区域。《孟子》卷二云：“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周人大约在商王武丁时臣服于商，进入商人的文化圈和势力范围，周人也有奉商人之命与戎狄交战的活动。据《竹书纪年》卷上，商王武乙“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千里，玉十穀，马十匹。”“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人为戎狄所攻，古公亶父又率众从豳（同邠）迁至岐山下的周原。此后周族迅速发展，据《竹书纪年》卷上，帝辛“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周与周围方国部族保持着密切关系。随着周部族势力的逐渐强大，西北各方国部族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其联盟或附庸。

作为殷商之附庸，周人则向商纳贡，有时进献征伐西北各方国部族所得。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由于文王积善累德，赢得诸侯的拥护，纣王恐不利于己，“乃囚西伯于羑里”。为了换取文王的获释，周人进行了多方努力，“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

莘氏美女，驷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据殷墟甲骨刻辞《小臣墙刻辞》，周人为了获得纣王好感，释放文王，向西北芮国、奚国和辛国发动了进攻，将战利品进献纣王，其中有辛国美人24名，芮国人570名，奚国女子160名，车2辆，甲衣83副，箭囊50个，箭头60枚[6]。帝辛"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诸侯入贡。"后来周伐密，取耆及邘，伐崇，力量越来越强大，"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周又伐昆夷、伐黎。在翦除了商之羽翼之后，武王率诸侯伐商，一些戎狄部落参加了他东征的行动。

周朝建立之前，周人活动的地域自古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和北方草原文化接壤的边缘地区。因此先周文化既受到商人青铜文化具有优势文明的冲击，同时由于与戎狄的接触的频繁，草原文化的因素也不能排除。

据文献分析，西北游牧部落的马文化东渐首先见于商朝的周部落。《诗经·大雅》中有一篇《绵》，其中有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在世时周族是附属于商朝的一个诸侯国。关于诗中反映的周人对马的使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骑"条云："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习尚有相同者。然则骑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程大昌《雍录》云："古皆驾车，今曰走马。恐此时或已变乘为骑。盖避翟之遽，不暇驾车。"周部族开始单骑用马，是与西北游牧部落接触中向戎翟学习而来的，也是与戎翟的冲突中逃避敌人追赶的快

捷方式。据顾炎武考证，中原地区骑马的普遍风气是战国时形成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正义》注云："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顾炎武说："至六国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不过骑马术早在商代周部族那里已经向西北游牧民族学会了。

《诗经·大雅》中还有一篇《皇矣》写到周人有"禔马"之俗，所谓"是禖是祃"。关于这种宗教活动，有人引《周礼·夏官》"庾人"条云："乃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有学者指出，这种身高近两米的大马应该来自西域，祭祀八尺以上中亚马的宗教活动当即胡人的龙神崇拜，周人的"禔马"活动是胡俗。有学者则以为是刑马祭天的宗教活动，周国地近戎狄，故周人有刑马歃血之胡俗。《汉书·匈奴传》记载："（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歃血为盟。"这种歃血为盟的习俗，在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的斯基泰人那里也可以看到：

> 斯基泰人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同别人举行誓约的。他们把酒倾倒在一个陶制的大碗里面，然后用锥子或小刀在缔结誓约的人们的身上刺一下或是割一下，把流出的血混到里面，然后他们把刀、箭、斧、枪浸到里面。在这样做了之后，缔结誓约的人们自身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当中最受尊重的人们便在一些庄严的乞求之后饮这里面的酒。[7]

匈奴和斯基泰人举行这种仪式时都用佩剑(径路刀),因此匈奴"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的习俗可能来自斯基泰人[8]。

考古学家考察先周文化,均以鬲的形制为线索。先周文化的鬲有联裆与分裆两类,一般以联裆鬲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分裆鬲中高领有双耳而有细绳纹的一型,老家在甘肃洮河、大夏河一带,是先周文化分裆鬲的祖先。周人克商之后,这种形制的鬲渐趋消失。在陕西绥德、清涧一带,出土的铜器除了有与中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的之外,同出的马头铜刀和蛇形铜匕,则具有浓重的草原文物特色。先周文化斗鸡台的贺肩罐与辛店文化的双耳花边罐形制基本相似。

在武器方面,周人的武器有戈、矛、剑、戟及弓矢。比之殷商,周人新添的武器是剑。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详细考证了商末周初时出现的青铜短剑和中原佩剑之风的起源,认为中国考古新发现以及中亚古代语言研究的最新进展,为探讨商周青铜短剑渊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大量证据表明,商末周初突然出现于中原的青铜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剑是游牧人发明的,对于游牧人来说,剑既用于防身,更重要的是作为吃饭时割取肉食的餐具。有人认为,中国北方系青铜短剑和周初流行的柳叶形青铜剑,可能受到西亚杰姆代特·奈斯文化以及后来苏美尔—阿卡德时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并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青铜短剑在杰姆代特·奈斯文化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至2900年,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短兵器。根据林梅村的研究,尽管柳叶剑最早产生于近

东杰姆代特—奈斯文化，但它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却和古代印欧人文化密切相关。丝绸之路上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字无一例外地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人，他们曾在欧亚草原放牧，附带从事一些农耕生产。古代印欧人很早就有迁徙至中国西部的，天山以南的龟兹人、焉耆人、高昌人、楼兰人和天山东麓的月氏人属古代印欧人。印欧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便东迁至新疆东部的罗布泊和哈密盆地，学术界称之为"吐火罗人"。草原游牧民族的剑可能就是通过吐火罗人最早传入中国西部的，汉语"剑"字很可能来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剑主要流行于商代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一带，如陕西绥德县，山西保德、石楼、柳林三县，河北青龙县、张家口市和北京市等地的商代遗存中，发现不少早商至周初的青铜剑。山西保德出土的铃首剑，年代相当于商代后期。保德地处晋北，出土文物血缘近于先周。出土铜器中有好几件铜铃和带铜丸的镂空装置，还有两件赤金弓形饰，都反映出草原文化的特色。《逸周书》卷四"克殷解"记载，武王"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轻吕，注谓剑名，《史记》便作"轻剑"。有学者研究认为，与匈奴语中的"径路"可能都是源于吐火罗语，是对"剑"的称谓。铜剑在西周早期已普遍出现，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河北北平琉璃河各处西周早期墓中都发现一种柳叶状无首无腊的铜剑。草原文化中剑的历史很久，可能因为骑马作战时，剑可刺可削，比斧钺、手戈更为便利。步卒用剑接敌，也为利器。周

人用剑代替了商人的短兵，是受了草原文化的影响。

在西亚和中亚的青铜兵器中，柳叶剑是和管銎战斧配合使用的短兵器。中国境内甘肃灵台百草坡、陕西宝鸡渔国墓地和北京昌平白浮等周初墓葬中的柳叶剑也和管銎战斧共存。早在1961年，前苏联考古学家契列诺娃已经指出，商周青铜兵器中的管銎战斧和管銎戈源于近东[9]。此类兵器西北地区有不少新发现。中国考古学家通过对西北地区出土的商周青兵器进行检验，认为它们确实和近东青铜兵器有联系。乌恩在《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一文中说："据目前的发现，公元前第3千年至第2千年前半叶在近东已有管銎斧。年代早于我国北方管銎斧。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近东管銎斧的形制与我国北方的标本非常相像，如石楼曹家垣斧和伊朗尼哈温德斧，均有很长的管銎。这种长管銎斧在安阳殷墟和岐山王家嘴各出过一件。"他还说："管銎戈和斧一样，最早出现于近东，后为我国北方的青铜文化所借鉴，并同短剑、管銎斧一样，经蒙古和外贝加尔传入米奴辛斯克盆地。"[10]中国学者根据上述甘肃、陕西地区周初墓中既随葬青铜礼器，又随葬富于西域文化特征的异形兵器，推测当是华化戎人墓葬。据《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时曾有西土八国军队参加。《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丰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可知周初西土戎人入居中原者甚众。上述含有柳叶剑和管銎战斧的周初墓葬正是这些入居泾、洛之间的戎人墓葬。柳叶剑和管銎战斧最初当以这些入居中原华化戎人为媒介而传入中原的。

先周文化也有西渐的迹象。上引《孟子》便云，古公亶父为了缓和狄人的进攻，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周人亦有西行至西域定居者。《穆天子传》卷二记载："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丌璧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春山，丁谦、顾实、张星烺都认为即葱岭。赤乌氏国，在春山西三百里，丁谦、张星烺认为即《唐书》中之护蜜，又作护蜜多。张星烺还认为大王亶父以元女妻季绰，即古代波剌斯国王娶妇汉土事。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揭盘陀国"条记载："建国以来，多历年所。其自称云是至那提婆瞿怛罗（唐言'汉日天种'）。此国之先，葱岭中荒川也。昔波利斯国王娶妇汉土，迎归至此，时属兵乱，东西路绝，遂以王女，置于孤峰。"而日轮中来之"一丈夫"与其女相通，致其女怀孕，波利斯国迎婚使臣不能奉女归国，于是"立女为主，建宫垂宪，至期产男。容貌妍丽，母摄政事，子称尊号。"揭盘陀国人"以其先祖之世，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然其王族，貌同中国，首饰方冠，身衣胡服"。玄奘还记载："无忧王命世，即其宫中建卒堵波。"张星烺认为波利斯即波剌斯，因此他说："无忧王与秦始皇同时，中国公主下嫁波剌斯，为周初之事可无疑也。"[11]《大戴礼记》卷十一《少间》云："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用，行三明。亲亲尚贤，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

注 释

〔1〕参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见氏著《古

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 年。

〔2〕转引自张广达等《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 年,10 页。

〔3〕林梅村《帝辛甲骨所见殷宫秘史》,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

〔4〕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28 页。

〔5〕同〔3〕。

〔6〕同〔3〕。

〔7〕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 年,292 页。

〔8〕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前揭《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39 - 58 页。

〔9〕契列诺娃(N. L. Chlenova)《塔加尔文化部落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莫斯科,1967 年。

〔10〕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载《考古学报》1985 年第 2 期。

〔1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上古时代中外交通",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影印辅仁大学丛书 1930 年版,84 - 85 页。

第三章 西周内地与西域的联系

一 西周与西北方国部族的联系

西周建立之后，其西北居住着鬼侯、禺氏（月氏）。鬼侯即鬼方羌族，甘肃祁连山南北是其游牧地区。禺氏则在祁连山北。周之北方有猃狁，亦即荤粥或狄族。周与这些羌、狄之国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他们与葱岭以西民族有所交往。《尚书·周书·旅獒》记载："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意思说，武王克商以后，开辟了通往四周各个民族国家的道路，西方旅国来献大犬。于是太保召公奭便写了《旅獒》来开导、劝谏武王。太保劝告武王："明王慎德，四夷来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即把四夷贡物分赐给同姓和异姓诸侯，而不独自享用。所谓西旅，即西方蛮夷国。

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王朝建立后，那些处于边远荒服的戎狄也"以其职来王"，即携带其方物朝见周王，其中包括中亚地区的渠搜、康民等游牧部落。《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武

王伐纣而营洛邑，复居于邦郊，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周成王时平定殷代奴隶主的叛乱，四邻民族都来朝贺，《汲冢周书》卷七《王会解》记周成王时朝见诸侯及四方蛮夷之礼，提到西方的有禺氏献騊駼，大夏献兹白牛，犬戎献文马，渠叟献鼰犬，匈戎献狡犬，康民献桴苡。

据先秦文献记载，周代的乐舞中已经融入四方少数民族的节目。《周礼·春官》云：“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宴）亦如之。”除四夷之乐外，四方的民间乐舞即所谓“散乐”，也有名为旄人的专职人员采集和施教。传说中也有域外乐舞传入。任昉《述异记》卷上云：“周成王元年，贝多国人献雀舞。周公命返之。南海中有轩辕丘，鸾自歌，凤自舞，古云天帝乐也。崆峒山中有尧碑禹碣，皆籀文焉。”据《拾遗记》卷二的记载，伴随有歌舞表演的域外杂技幻术也有输入。“（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中；缀金玉毛羽为衣裳，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群犀、象、师子、龙、蛇、火鸟之状；或变为虎兕，口中生人，备百戏之乐，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飚忽，炫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亡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猴伎，则扶娄之音，讹替至今。”此条说明西域之杂技幻术周时已传入中国。

古代传说中有不少周初西域之国进献方物的记载。《拾遗记》卷二记载：“成王即政三年，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霆之声在下；或入潜穴，又闻波澜之声在上。视日月以知方国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考国之正朔，则

序历与中国相符,王接以外宾礼也。"法国鲍梯氏(Pauthier)以为,泥离国即埃及泥罗河之转音;久良(Stan. Julien)认为泥离为印度拿拉镇(Nala)之转音,张星烺认为皆不能成立。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以为泥离为缅甸伊洛瓦底江(Irawadi)西岸之奴莱(Norai),古国名[1]。同书同卷又记载:"(成王)四年,旅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至于京师,育于灵禽之苑,饮以琼浆,饲以云实。"凤至被视为成王时天下太平的象征。"五年,有因祇之国,去王都九万里,献女工一人,体貌轻洁,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摇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纳于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来献,有云昆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杂珠锦,文似贯珠佩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列灯烛也。幅皆广三尺,其国丈夫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地。又贡嘉禾,一茎盈车,故时俗四言诗曰:'力勤十顷,能致嘉颖。'""六年,燃邱之国献比翼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豢头尖鼻,衣云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经历百有余国,方至京师,其中路山川,不可记。……经途十五余年,乃至洛邑。"张星烺云:"豢头尖鼻,或者即欧洲之白人也。"昭王"二十四年,涂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张星烺说:"涂修音与途思相近。途思名见《元史·地理志》,其城甚古。据云,为波斯国神话时代国王哲姆锡特(Djamshid)所建筑。"[2]

尧时即曾来朝的越裳国,周初又来朝贡。《竹书纪年》卷上云:周成王十年,"越裳氏来朝"。《韩诗外传》卷五云:"成王之

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大几满车，长几充箱。成王问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据说，周公曾为越裳国使者而造指南车。崔豹《古今注》卷上云：“大驾指南车，……旧说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赐以文锦二匹，軿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使大夫宴将送至国而还，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期年而还至。”

周与西北民族也时而发生战争。周初名器有大盂鼎、小盂鼎两件。考古学家根据其形制、内容加以考订，确定是康王时器物。大盂鼎铭文记载了盂受赐车服，并受命视察疆土，并“敏谏罚讼”。根据小盂鼎铭文内容，可知乃是一项康王二十五年献礼的记载，大致内容是盂征伐鬼方两次战役归来，献俘于王，告捷于宗庙，王廷的大小官员都参加这一隆重的仪式。盂所献第一战役的战果中有俘虏13081人，另有车、马、牛、羊各若干。说明康王时周曾与西北的鬼方羌人发生很大的战事。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几位农民在村子附近的砖厂挖坑取土，意外打开一个古窖，窖中出土鼎、壶、盘、鬲等青铜器27件。这些青铜器都制作于距今2700多年的西周时代。尤为珍贵的是这些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多达4000余字，其中记录了西周12位王的名号和一些重要史实。青铜器中的12件鼎有两件铸造于周宣王42年，有10件铸造于周宣王43年。鼎上的铭文主

要是纪念周宣王对一位叫作“速”的多次赏赐。42 年鼎的铭文记载“速”因为征伐戎族打了胜仗，并缴获了很多车马，俘虏了很多敌兵，宣王赏赐给他美酒和土地，而“速”则对宣王的赏赐表示感激。43 年的 10 件鼎记录的内容大致相同，其中讲到宣王为了赏赐“速”，给他换了一个官职，从过去主管山林变成负责祭祀和法律行政。还记载宣王赏赐他车马、马具、礼服和头盔之事[3]。鼎铭记录的这些内容反映了周与西北戎族的战争的频繁。

西周与西北民族的战争促进了青铜兵器的传播。欧洲哈尔希塔特时代丹麦出土的双环兽角把头青铜双刃剑，俄罗斯出土的环状把头青铜剑都和中国出土的同类青铜柳叶剑相似。哈尔希塔特文化约产生于公元前十世纪，延续至前五世纪。如前所述，剑带有北方草原文化色彩，中国出土的此类青铜柳叶剑出于鄂尔多斯和临近地区，房山琉璃河 53 号墓出土的一件属西周早期，剑身和柄间有向两侧凸起的护手，护手有长方、椭圆、半月、兽首、鸟首和两端翘起等形制。柄首有环形、双环形、椭圆形、长方形或兽面形。茎上有沟槽和透孔，有的饰动物纹。哈尔希塔特文化的此类青铜剑有环形或双环柄首、半月形或椭圆形护手，形制与中国近似，而与当地传统产品不同，明显地受到中国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流行剑式的影响。

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辽宁宁城南山根石椁墓中出土兽形柄首青铜剑，早于塔加尔文化第一期（前八世纪至前四世纪）出土的形制相似的短剑；河北怀来北辛堡、内蒙和林格尔范家窑子等出土的柳叶剑早于塔加尔文化第二期（前四世纪至前二世

纪）中形制相近的T字形柄顶短剑。塔加尔文化属西伯利亚早期铁器文化，最初发现于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塔加尔岛，分布于叶尼塞河上中游。说明塔加尔文化是中国文化西传的一个媒介。

西周的青铜剑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中国古代有西胡或西域献刀或剑的传说，相传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记载："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于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满于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实灵人之器。"又说："剑之所出，必从流洲来，并是西海中所有也。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东岸十九万里，上多山川积石，名为昆吾。冶其石成铁，作剑，光明洞照如水精状，割玉物如割泥。"西晋张华《博物志》引《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葛。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

考古资料也说明剑通过战争从西北方民族传入。1981年陕西扶风下务子村西周晚期窖穴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条与剑有关的铭文。其中的师同鼎铭文中明确提到"剑"字，被专家们认为是目前所知古文字中最早的"剑"字，为研究周代青铜剑提供了重要的古文字学依据。鼎铭大意是：戎敌首领出现，师氏同就跟踪追击。一部分敌人被斩首，另一部分被俘虏。缴获战车5辆；牛车20辆，羊肉100捆，在黾地献给周王，作为御膳。还缴获戎人的铜头盔30个，戎人的铜鼎20个，铜腹50个，青铜短剑20把，用来铸造此尊鼎，让子子孙孙永久地珍惜留用[4]。此篇铭文明确说明剑是周初戎人的重要军事装备，但这些铜剑被师同销毁铸造青铜礼器，并不被作为武器使用。

周代也发展了自己的铸剑业，中原造剑始于周初，有的剑铸有铭文，如西周东都附近（今洛阳东郊）出土的丰伯剑。丰伯是周初分封的姬姓丰国国君，此剑必为周人所自铸。林梅村指出，自60年代中科院考古所在西安张家坡发掘出周初柳叶剑以来，中原和周边地区墓葬中已出土富有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剑10余把，如果加上传世品和近年盗掘品，至少积累了近30个标本。经西周工匠改造过的柳叶剑，其鲜明的周文化特征是：剑身装饰周人青铜礼器上特有的夔龙纹，并装配工艺极其精美的铜剑鞘。戎人以剑为餐具，周人佩剑作为兵器，或表明上大夫身份，所以周人逐渐将剑身加长。西周中期中原出现的脊柱剑和后来吴越流行的青铜剑都显示出这一特点。

由中国传入南俄罗斯和欧洲的还有剑鞘带所附形状对称和图案花纹繁富的铜制或玉制饰品、祭祀用的青铜斧钺和器身细长的带扣项圈。由欧洲或西北草原游牧民族传入中国的器物有兽形壶把、兽形金饰物、金银高脚杯，还有某种形式的青铜矛头、鞍饰扣。还有一种仅见于南俄、哈尔希塔特和中国的三棱箭簇。三棱箭簇可能产于中亚的纳马兹加文化[5]。

二 穆王西征与中西交通的开展

在公元前十世纪以前，中原和西北地区的联系始终被戎狄部落所牵制，阻碍着周和西北方国部落之间的来往。西周中期，周穆王（公元前1001至前947）西征犬戎，史载“益国二十”，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草原之路。穆王西征故事，《竹书纪年》、《穆

天子传》、《史记》中之《秦本纪》、《赵世家》皆有记载，说穆王向西巡狩，直到西王母居住的地方。

周穆王，名满，昭王之子。穆王西征的原因，据说与西极之国化人入周有关。所谓化人即幻人，据《列子》卷三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一作石）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由于化人的诱导，穆王越来越奢侈贪玩，"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于是才有西行至西王母国之举。这个故事说明西域之杂技魔术周时传入中国，但不能正确解释穆王西征的原因。

根据诸书记载，穆王西征起源于犬戎的扩张，阻断了周与西北各游牧部落的联系。因此穆王西征的目的一方面是征服犬戎，另一方面是加强与西北各族的联系和交往。现代学者的著作皆以穆王即位后第十二年西征犬戎与西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当做同一事件，疏于考证。实际上汲冢古书《穆天子传》由于"多毁落残缺"，第一次西征犬戎失载。而据《竹书纪年》、《史记》记载，穆王西征有前后两次。第一次是穆王于即位的第十二年，由于犬戎不肯臣服，决心西征犬戎。祭公谋父谏阻，他的理由是"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意思就是犬戎从来不失职贡之礼，出师无名。但穆王说："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竹书纪年》卷八记载：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

次于阳纡。秋七月，西戎来宾。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据《列子·汤问篇》："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酷然疑乎雪。"《史记》卷四《周本纪》记载，此次西征，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却造成了"自是荒服者不至"的后果，周朝失去了远方国家和民族的支持。第二次西征却是一次有征无战的行动，大概是穆王接受了上次的教训，采取的是修好态度，目的是恢复和发展与西北各族的友好关系。据《竹书纪年》"周穆王"条："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事在他即位的第十七年，即公元前993年。

《穆天子传》记载的就是穆王第二次西征的过程。穆王以伯夭为向导，乘造父驾的八骏马车，从王都宗周出发，率六师西行。这次他带有大量金银朱帛，作为馈赠之礼。他先入河南向北至滹沱之阳（今山西北部），又一次来到犬戎地区。"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说明穆王受到犬戎的热情接待。此后穆王继续西行，到达"焉居、禺知之平"。又西行至鄝人居地，首领柏絮派人迎接，先送上豹皮、良马。穆王于此逗留数日后西行，至阳纡之山，河宗伯夭迎穆王于燕然之山，穆王以"束帛加璧"劳之，伯夭使人先送上白□为礼。伯夭亲乘渠黄马作穆王向导，以极西土。于是西济黄河，经河西走廊登昆仑，"以观黄帝之宫，而丌隆之葬"。而后过珠泽，上春山，穆王"升

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云：“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先王所谓悬圃”。穆王继续西行，到了昆仑山北麓的赤乌人居地，赤乌人献酒千斛，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赤乌人居地即今新疆和田、叶城和莎车一带，盛产美玉。所以穆王说：“赤乌氏，美人之地也，宝玉之所在也。”穆王由此北行，至曹奴人部落，曹奴人献食马牛羊穄米。穆王赐以黄金之鹿、银□贝带四十、朱四百裹。由此北征东还，至黑水，遇雨。又前行至群玉之山。穆王于此“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当地之人献良马牛羊，穆王以其邦攻玉，辞而不受。又西行至剖阆氏部落，祭铁山西行。至鹑韩氏部落，鹑韩人献良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彷牛二百、野马三百、牛羊三千、穄麦三百车。穆王则赐之以黄金银器四七、贝带五十、朱三百裹。从鹑韩人居地继续西行，过玄池，树竹；至苦山，休猎。最后到西王母之邦。穆王赠以丝绸，并与西王母会宴于瑶池之上。宴会上西王母举声高歌：“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王亦以歌相和。穆王从西王母处东归，绝大漠，返宗周。一路上仍与沿途各国各族互赠礼品，建立了极其友好的关系。

穆王西巡归途中，还得到西域“献工人”偃师进献的类似木偶戏表演的“能倡者”，即人造歌舞演员。据《列子·汤问篇》记载：“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一作下）至奄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注：中道有国献此工考之人也），名偃师。穆王荐（注：荐当作进）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与俱来，（注：日谓别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

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注:倡,俳优也)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领(注:犹摇头也)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胃、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

周穆王西征是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是中西之间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远距离的交往和交流活动。穆王足迹所至,极西至昆仑丘和西王母之邦。现代不少学者认为先秦文献中的昆仑丘,或昆仑山,即现在的阿尔泰山。西王母之邦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部落,所谓西王母瑶池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穆王往返经行各地和道里途程,《穆天子传》有专门统计:

> 自宗周、鄘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千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乌氏,春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

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一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

穆王两次西征，打通了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和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的通道，与沿途各国各族建立了友好关系，促进了彼此间的互相了解。从有关黄帝的传说中，我们知道，中原地区很早便与西域有密切的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一度由于犬戎的强盛受到阻碍，穆王西征反映了公元前十世纪以后，黄河流域和西北新疆地区重新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由关中向西北的道路，一经祁连山北的河西走廊，一经祁连山南的柴达木盆地，都和新疆建立了联系。在新疆境内，天山北路的草原路和天山南路的绿洲路，成了中西交通的大道。再往西去，越过葱岭，便是塞人（西王母即塞人部落）、月氏人、羌人和中亚细亚各民族。他们本来和我国西北地区各民族就有较密切的联系，通过穆王的西征，不仅加强了内地和新疆地区的联系，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内地、西北地区和中亚细亚各民族的联系。

特别是穆王第二次西征，穆王与沿途各地各族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质文化交流，《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每到一处，就以丝绸、铜器、贝币和朱砂馈赠各部落酋长，各部落酋长也向他赠送大量马、牛、羊、酒和稷麦，穆王还运回大量玉石。除了彼此间进行各种礼品的互赠之外，也是中国丝绸进入西域的最早记载，这对古代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西域的马、玉石东运和内地丝绸、铜器的西传，成了此后中

西交流的重要内容。穆王以后，周朝重视引进西域的马，《竹书纪年》卷八记载，孝王“五年，西戎来献马”；“八年，初牧马于汧渭”，开始置牧场养马。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中原货物西运的终端远远越过了葱岭，一直伸向乌拉尔地区（在今俄罗斯西部）和伊朗高原。对于穆王西征，传统的认识多批评其“肆行游乐，辙迹遍于天下”。其实穆王西行是相当艰苦的行程，在大沙漠，缺水，属下刺马血供穆王饮用。看来对穆王西行的意义应该做重新评价。张星烺说：“西周初年，兵威之盛，交通之繁，不亚于后世汉、唐二代也。东封箕子于朝鲜，肃慎来贡楛矢；西封季绰于春山（即葱岭），渠搜献其猎犬。汉唐盛时，东西最远所达之国，亦不过若是。越裳氏航海期年而至，唐宋二代，海道通商之业，周初已启之矣。周穆王以天子之尊，乘兴为万里壮游，尤为秦汉以后二千年所未有也。”[6]强调虽不免过分，对西周中西间交通的开展，确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三 周文化的西渐与收缩

考古学材料证明，西周穆王以前，周文化圈明显向西北扩大。在今日甘肃境内，与西周同时代的土著文化有湟水、洮河的辛店文化及洮河、陇山一带的寺洼—安国文化。两者都有长远的新石器文化传统，其主人当是羌氏。西周文化渐入陇右的考古学证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陇西的西周居住遗址、灵台与平凉两县的数十座西周墓葬。灵台遗址有不少西周青铜礼器出

土。车马坑似为燎祭，然后埋入车马。出土的兵器，构造奇特，不见于别处。青铜短剑有形状奇特的剑鞘、镂孔、饰牛、蛇和缠藤。铸虎纹的戈也为西周时代所少见。灵台墓葬的时代是西周早期和中期，即康王至穆王时期。灵台居泾水流域，应是周人可以到达的地区。

西周遗址的礼器均为常见之物，而虎纹、燎祭和纹饰奇特的剑鞘则都带有异文化的色彩。墓中出土的玉石人形，一件裸身站立，发髻如盘蛇，饰虎头。另一件发上有带歧角的高冠，二者都不是周人发式和头饰。这些异族色彩的存在，说明灵台是周文化的边陲，是周人与异族的接触点。虎是羌人文化的重要内容，灵台器物多虎饰，可能就是接触最多的是羌人之故。西南夷的古剑也与灵台出土的铜剑有不少相似处，剑身有动物或几何纹饰，鞘作三角形，一边是带漆木板。说明西南夷的铜剑在发展过程中也接受了羌文化的影响。

西周从懿王开始，外患日益严重，尤其西北方面与戎狄之间，连年交战。《汉书·匈奴传》云："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竹书纪年》卷八记载：周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周孝王"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五年，西戎来献马"。周厉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周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虽然史书上也见到周人北伐取得了一些胜利，如懿王时虢公帅师北伐，犬戎败遁；夷王七年虢公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但终于不能摆脱西北戎狄的侵扰。宣王时号称中兴，西北方面也只是互有胜负。

据《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和《后汉书·西羌传》诸

书记载，秦人的祖先秦仲，曾受命伐西戎，西戎为之少却。又先后伐太原戎及条戎、奔戎，王师都以败绩闻。晋人伐北戎于汾水流域，戎人则灭了周厉姜侯之邑。宣王曾征申戎，取得胜利。千亩之役，姜戎又败周师。宣王时周与西北两方面的戎狄战事非常频繁。《诗经·小雅》中的《六月》、《出车》等诗，咏叹尹吉甫和南仲的功劳。猃狁入侵，经过镐及方，直侵畿辅附近的泾阳。尹吉甫"薄伐猃狁，至于太原"，筑城朔方。南仲也讨伐了西戎。

至幽王之世，外患日益严重。周朝为了安定边境，其戍边的诸侯或将领如申侯、秦等都与戎狄互通婚姻。但这挽救不了西周亡于夷狄的命运。幽王曾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而伯士战死。同时戎围犬丘，俘获了戍守西陲的秦世父。幽王自己最后在"保西垂"的申侯与西夷犬戎联合进攻之下，死于骊山之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宣告了西周的灭亡。

注 释

〔1〕前揭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上古时代中外交通"，59页。

〔2〕同上书，66页。

〔3〕赵婷、范涛《眉县国宝青铜器在京首展》，载《北京日报》2005年3月10日。

〔4〕李零《"车马"与"大车"——跋〈师同鼎〉》，载《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古文字杂识》，载《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67－274页。

〔5〕参前揭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

〔6〕同〔1〕，74页。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中西交通与交流

一　东周尊王攘夷运动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西迁

周幽王死后，平王即位。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平王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夏、商和西周时期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有很大影响，向西向北侵润扩展。到了东周时期，这种影响业已减弱。值得注意的是西部的秦国和北方的晋国由于地处与戎狄接壤之地，与西北各族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在文化上互受影响，中原文化因与西北草原游牧文化的接触而与更远的西域发生联系。

春秋时，面对四方夷狄强盛，周王室衰弱的局面，中原各诸侯国掀起了“尊王攘夷”运动，先后崛起的齐、晋、秦等大国担当起号召和组织中原各国共同抵御周边各族侵扰的任务，有效地制止了游牧族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商周时中原文化的优势进取态势。《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燕国屡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齐桓公曾伐戎救燕。《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的霸业：“中救晋公，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东胡之先也），而骑寇始服（北狄以骑为寇）；北伐山戎，制冷支，斩孤竹，而九夷始

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谓龙门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浮济河,至于石沈(地名),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按:山名)之貉,拘秦(一作泰)夏,西服流沙西虞(国名),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记载:"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

晋国所在地汾水流域原来是戎狄游牧地区,西周初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为唐侯,在唐国内"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即按照戎狄惯例,分配牧地,而不是像中原地区诸侯国那样采用周法分配耕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由于与戎狄杂处,晋所代表的周文化在那一带只成点状的分布。春秋时晋献公执政,积极开疆拓土,先后灭霍、耿、魏、虞、虢等国,征服骊戎,击败北狄,领土发展到黄河西岸和南岸。至晋文公重耳即位,尊王攘夷,取威定霸,晋国成为春秋时最强盛的国家。在晋一步步走向强盛时,境内戎狄国先后被消灭,扩大了华夏文化的灌溉面。

嬴秦在西周后期仅是一个"西陲大夫",平王东迁,秦襄公以兵护送平王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并许以若秦攻取戎之地,则为秦有。以后秦与戎不断战斗,扩大了地盘,成为西部强国。《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穆公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至黄河边上。又用谋臣由余,灭戎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向西部的扩张,又一次打通了秦与

河西走廊的交通。秦国接受了中原地区强势文化的浸润，也受到西部戎狄文化的某种影响。公元前753年，秦文公开始设史官记事。前746年，采用西戎野蛮法律，实行“灭三族法”。前678年，秦武公死，用人殉葬。前677年，秦德公建都雍，用三百牢祭天求福。西周故地，戎狄杂居。商亡后西周曾将其遗民迁至此地，西周灭亡，商人后裔建立亳国，自称亳王。西周文化为戎狄风习和商文化所摧毁，秦采用不少落后制度与文化，虽然成为大国，却被华夏诸侯看作戎狄国，秦不得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

秦不仅受到戎狄文化的影响，也对落后的西北戎狄文化发生了推进作用。秦与戎狄保持有密切的外交往来，秦地女乐通过这种往来输入戎地。《韩诗外传》卷九记载：“昔戎将由余使秦，秦缪公问以得失之要，对曰：‘古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也，失国者未尝不以骄奢也。’由余因论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缪公然之，于是告内史王缪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由余圣人也，将奈之何？’王缪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尝见中国之声色也。君其遗之女乐，以淫其志，乱其政，其臣下必疏，因为由余请缓期，使其君臣有间，然后可图。’缪公曰：‘善。’乃使王缪以女乐二列遗戎王，为由余请期。戎王大悦，许之。于是张酒听乐，日夜不休，终岁淫纵，卒马多死。由余归，数谏不听，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国十二，辟地千里。”

秦厉公时，西戎的一族羌人爰剑被俘为奴隶，在秦学得农业知识，后又逃回羌地，教人耕种、牧畜，诸羌敬服，推为大酋。原

来以射猎为生的羌族，从此逐渐发展为西方强族。《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记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

随着秦对西北羌狄的用兵，迫使羌人西迁。同书同传记载，爰剑时羌人崛起，"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原戎。忍季父迎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隽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9种。舞生17子，为17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92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羌人的流散西迁，必然把农耕文化带至新的居地。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初有诸侯国140多个。经过长期的兼并，至战国时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割据。地处北方和西北的燕、赵、秦诸国与戎狄接壤，他们有效地抵抗了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掠。当然，在彼此间存在着争夺和战争的同时，也存在着文化上的互相影响。那时北方草原一度出现

"东胡强而月支盛"的局面，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学习草原游牧文化而进行的改革。后来秦逐一吞灭关东六国，统一了中国。在秦国逐渐崛起并最后建立秦朝的过程中，秦一边东向发展，一边征服了西北诸戎，促进了西北民族与华夏文化的融合。秦的强盛和西进不仅打通了与河西走廊的交通，而且迫使原来居住在它西部的戎狄各族西迁，从而与当时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活动联系起来，因而推动了中西之间文化的交流。

二　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活动与斯基泰贸易之路

从世界范围看，从商周以来，欧亚大草原上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许倬云指出，据草原文化考古学研究，欧亚大陆间游牧的草原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有扩散的现象。其原因一是由于以畜牧为生的牧群人口增加，二是牧人们知道了骑马，三是草原上气候干燥，生活环境恶劣。同时牧人们知道了饮乳和制作乳制品，比单纯食肉增加了新的生存条件。中亚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个阶段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第三个阶段始于公元前700年左右。商周时期中国北部和西北部都承受了来自草原游牧民族扩散的压力，那时在北部和西北部与戎狄的长期战事就是这种压力的表现。中亚游牧民族扩散的第三次浪潮应当与草原气候有关系，据竺可桢的研究，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地区曾有一段寒冷时期，至春秋时逐渐变暖，严寒迫使游牧民迁移，温暖的气候适宜草原民族的生活和繁衍，草原人口畜群的增

加必然造成对水草的争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向周之领地的侵扰[1]。当周王朝衰落不能有效抵制其进犯时，西北地区不免受其蚕食，幽王之死与平王东迁皆与此相关。

春秋时兴起的强大的“尊王攘夷”运动，特别是齐、晋、秦等国向北和西北两方面的进攻，阻止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迫使居住在河西地区的戎人和部分大夏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与楚河流域。齐桓公称霸中原时，曾“逾太行拘泰夏”，所谓“泰夏”，一般认为即大夏。秦穆公时征服了西戎八国，向西北开疆拓土，迫使活动在河西走廊的允姓之戎和部分大夏人西迁。有人考证，河西地区西迁的允姓之戎即塞人。当时在中国北方草原还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即月氏。当月氏扩张时，也驱迫允姓之戎和大夏人向西迁徙，史载：“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由于他们的西迁，造成欧亚草原民族迁徙的连锁反应。居住在伊犁河流域与楚河流域的斯基泰人被迫离此西迁，斯基泰人向西挺进，又迫使黑海之滨的西米里安人西迁。斯基泰人至黑海北岸，又南下入侵西亚，促使西亚的亚述帝国迅速衰亡。在公元前2000年以来欧亚草原民族迁徙的背景下，随着斯基泰人西迁，一条沟通欧亚大陆之间的草原之路形成了。

关于欧亚大陆间草原游牧民族活动的情况，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希腊诗人阿里斯提士在他的长诗《阿里麻斯比》中有所记载。阿里斯提士曾旅行至中亚地区，他所谓“阿里麻斯比”意谓“独目人”，是居住在里海与中亚草原间的游牧的塞人部落。据他的记载，阿里麻斯比以东还居住着希帕波里亚人。曾有人以为希帕波里亚人是黄河流域的汉人，其实是月氏人。记述更为

丰富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425)的名著《历史》。希罗多德的生活年代正是中国的春秋时期，有“欧洲史学之父”之称。约在公元前450年至前440年间游历了黑海北岸的奥勒比亚(今克尔赤)，访问了当地的斯基泰人和希腊人。根据他的《历史》卷四的描述，公元前7世纪时，从黑海东北岸顿河口向东，南俄罗斯分布着西梅里安人(Cimerian)，其东有斯基泰人(Scythae)，向东北有萨尔马提人(Sauromathae)，布提尼人(Budini)、蒂萨杰人(Tyssagetae)。转向里海东北，分布在吉尔吉斯草原锡尔河下游之间有奄蔡人(Iurkai)、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和安杰帕人(Argrippaei)，安杰帕人意谓“秃头人”。再向东到达天山北麓，这里是伊赛顿人(Issedon)的地方。有人认为伊塞顿人就是允姓之戎，有人则以为伊塞顿人就是塞人。自此向东便是阿里斯提士诗中说到的阿里麻斯比人(Arimaspea)、希帕波里亚人(Hyperboreans)，希帕波里亚人居地直至大海[2]。

这些游牧的民族便是活跃在欧亚草原之路上的主人，被希腊人统称为斯基泰人，现代学者则称为广义斯基泰人。广义的斯基泰人活跃在公元前七至前三世纪。他们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们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他们的迁徙和游牧造成了欧亚大陆间的交通和交流。当时斯基泰人习惯于使用马和车，或驾车，或单骑，凭借这种交通工具进行商品交换。在公元前六至前三世纪，中国和希腊两个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就是靠中国农耕文化首先与西北游牧文化进行接触和交流，然后又通过草原游牧民族继续向西传递而实现的。斯基泰人充当了中国丝绸最大的中介商和贩运者。因此也有学者称这条由游牧

民族的活动形成的欧亚草原之路为“斯基泰贸易之路”。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即通常所谓塞人。德国语言学家吕德斯认为,塞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这支讲塞语的雅利安游牧民后来分化,入居塔里木盆地的塞人逐渐走向定居,并产生出若干支系。中国文献中只把天山北麓保持游牧传统的雅利安人称为塞人。

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有关西北草原民族“秃头人”、“独目人”和塞人的记载。《山海经》卷八《海外北经》记载“自西北隅至东北隅”之国,有“一目国”,在钟山东,其国人“一目中其面而居”。《庄子·逍遥游》提到遥远的北方有一个“穷发”国。穷发意即秃头。塞人就是西王母之邦。在中国文献中,则称天山北麓的伊塞顿人为塞人、塞族(《汉书·西域传》),即中国传说中西王母的部族。这个民族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本分布在今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一带。前二世纪前期,由于中国北部的匈奴强盛,势力向西扩展,原来居住在敦煌一带的大月氏人西迁,侵入其地,导致了塞族的分散。一部分南下征服罽宾等地,一部分留居故地。后来由于匈奴的逼迫,乌孙人西迁,又侵入这一地区,大月氏人则继续西迁。留下的这一部分塞人则与新侵入的乌孙人混合。我国史籍中所称的塞人,大约与西方和印度记载中所称塞西安人、萨尔马西安人、释迦人同族。周穆王西征,见西王母,并赠之以丝绸。那时中国中原地区生产的丝绸已经传至欧亚草原上活动的斯基泰人中,这种质地精美而又轻便易于长途转运的丝绸便自然地向更为遥远的地方传送。

三　中国蚕桑丝织技术的早期发展和丝绸西运

自夏商西周以来，中国中原文化与西北各族文化就发生接触、交流和影响，并通过这些民族与中亚、北亚、西亚甚至更加遥远的地区发生间接地接触和交流。有学者指出："周人是背靠大西北的，而西北的民族又与域外诸方国部族有所交通。当时亚欧大陆如何构成联系的链环，中外学者曾做过不少探索，还有待今后更多的考古研究来证明。"我们注意到在夏商西周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随着欧亚草原之路的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中西之间文化交流有了更进一步的开展。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的精美的丝绸至迟在这一时期已经传至遥远的另一个文明古国希腊。

以中国和西欧为中西两端的文化交流何时发生？史学界有不少争论。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而最早交流的内容则是中国丝绸的西传。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都说明，那时希腊和中国两个文明国家之间在文化上已经有了间接的接触和交流。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人物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推测那时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这方面有几个典型的事例。

(1)雅可波利斯的科莱(Kore)女神大理石像，胸部披有薄绢，是公元前530年至前510年的作品。雅典卫城巴特侬神庙的"命运女神"像(公元前438至前431年)，希腊雕刻家埃里契

西翁的加里亚狄(Karyatid)像等公元前五世纪的雕刻杰作,人物都穿着透明的长袍(Chiton),衣褶雅丽,质料柔软,都是丝织衣料。(里希特《希腊的丝绸》,见《美国考古学报》,1929 年,27 - 33 页)

(2)希腊绘画中也有类似的丝质衣料。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成批生产的红花陶壶上有彩绘的人像,穿着非常细薄的衣料(日本《世界美术全集》战后版,卷五,色版 11)。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陶壶狄奥希索斯(Diohysos)和彭贝(Pompe),更是显著的例子。(里希特《希腊艺术指南》,伦敦,1959 年,图 460)

(3)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Kul Oba)出土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制作的象牙版,上有绘画"波利斯的裁判",将希腊女神身上穿着的纤细衣料表现得十分逼真,透明的丝质罗纱将女神的乳房和脐眼完全显露出来。[3]

(4)在克里米亚半岛克特齐附近,古希腊人殖民地遗迹中,曾有丝发现。据美国《全国地理》杂志 1983 年 3 月号报导,德国考古学家在斯图加特市西北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了一座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凯尔特人墓葬,发现有用中国蚕丝绣制的绣品,可见中国丝那时已远销此地。

可以断定,上述那种蚕丝、衣料在当时只有中国才能制造。这必须是用人工饲养的家蚕结的茧织成的丝绢,野蚕丝织成的产品达不到这种细薄透明的程度。希腊没有饲养家蚕的技术,在那时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这种细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在中国很早的时候,种桑养蚕就在广大地区开展起来,据《尚书·禹贡》记载,天下九

州中之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等六州皆为产丝之地，说明蚕桑丝织业分布地区之广。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是唯一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通鉴外纪》卷一记载古代传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之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实际上养蚕治丝技术不是某一位圣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掌握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仰韶遗存，曾发现有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过去认为蚕桑丝织技术最早产生于黄河流域，后来考古发现似乎南方更早。1958 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已发现由家蚕丝织成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绢片长 2.4 厘米，宽 1 厘米，丝线为平纹组织。经鉴定，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有 40 根[4]。遗址年代距今 4700 多年，约在公元前 2800 年左右。说明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先了解到从野蚕茧中抽取丝线进行纺织的知识，这要拿蚕茧放进热水浸泡，才能抽出一根完整的丝来，这一道工序就叫缫丝。进而又知道选取野蚕的良种进行培育，得出家蚕结的茧，织出优良的丝帛。

据说，最早的家蚕是由鳞翅目野蚕驯化而来的，古代中原人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可以抽取丝用作纺织原料，便开始驯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关于蚕桑丝织方面的技术，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在所著《丝绸之路》一书中曾作了细致的讲述。她认为真正的养蚕业只有在具备两种条件的时候，才能兴旺发达起来：一方面人们必须学会扼制蚕蛹孵化；另一方面必须摸索出一种最有利于蚕虫生长的喂养饲料。为了实现制造高质量的丝绸之理想，肯定要经过数世纪之久的摸索改进过程。中国的

先民是如何逐步摸索出养蚕规律和技术的，现在缺乏考古学方面提供的最远古的样品来说明，但在漫长的时期内，这种技术肯定没有多大变化。中国十三世纪的一部文献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种技术，如今还没有发现关于蚕桑丝织技术的更古老的论著，这可能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如战争或火灾之类使之失传了，而更有可能是因为另一种原因，即中国古代的养蚕术和蚕茧处理技术都是严格保密的，甚至禁止把蚕卵和蚕茧带到中国之外的地方。她所谓中国十三世纪的文献，可能指元代《农桑辑要》，这本书为元朝司农寺撰作，其中讲到栽桑养蚕技术。

商代蚕桑丝织技术大有进步，成为一种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手工业。商代非常重视养蚕业，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到，武丁时命人省察蚕事，占卜至少有9次之多；商代更有所谓蚕神，即“蚕示”，祭蚕示有时用三牛，有时用三羊，有时用羌（俘虏），典礼非常隆重。商代丝织品的织法也有了进步，商代已出现了简单的提花机替代了原始的踞地织和挑织方法。商人已经能够在平纹织地上斜纹起花，从而产生了花纹绢或文绮。商代青铜器上有平纹素织和挑织菱形花纹的文绮的印迹。据胡厚宣研究，甲骨文中有蚕、桑、丝、帛等字。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与丝帛有关的字，如“断”、“束”等。说明商代养蚕业和丝纺织业已极为发达。丝织业的发展为贵族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商纣王“绵绣被堂”，[5]“发美女士以充倾室之宫，妇人衣绫纨者三百余人”[6]。衣丝织品被看作生活奢侈的表现。

西周丝织业继续发展。《周礼·天官冢宰》中记有“典丝”一职，很可能是掌管丝绸出入的官职。提花机斜纹起花技术和

手工刺绣技术都表现出丝织技术的新的进步。宝鸡西周早期墓葬中更有地纹和花纹全是斜纹组织的绫、绮残迹。西周丝织品种类更多,《诗经》中有不少歌唱采桑劳动的诗篇。《豳风·七月》、《魏风·十亩之间》中奴隶生活的描写就有采桑的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丝织业更有了长足的进展,各国都重视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公元前518年,楚国的边邑卑梁氏女子和吴国边邑之女争桑,结果引起两国发生战争,"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吴占领了楚国的居巢和钟离两座边城。这件事说明蚕桑丝织业在各国经济生活中据有重要地位。丝织业遍及黄河流域和江淮地区,官府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丝织品品种繁多。在当时的文献中,如"丝、绸、绢、帛、绵、绮、纱、縠、纨、缯、锦、绣、罗、绫、组、纯等,这些字都已经出现。除了使用平放的或斜卧式的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和绫罗之外,更有了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彩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施以彩绣,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锦衣锦绣。

恩格斯说:"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7]随着丝织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丝绸贸易便产生了。由于丝绸绢帛轻便,容易携带,又因为价格昂贵,能够牟取暴利,产品精美,受到欢迎,因此成为商人们乐于进行长途贩运的货物。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吸引了包括西北游

牧民族的其它许多民族，成为重要的商品等价物，在各族人民中间起着货币的作用，那时用绵帛可以和各种商品进行交换。通过西北游牧民族流向欧亚草原各地，辗转传至遥远的希腊。

据记载，商代以来丝织物已经成批地向外推销。相传是春秋时齐相管仲著《管子》卷二十四《轻重》篇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帛牢"是牲口棚，专门用来养驾车贩运绢帛的牲口的牛棚马厩。古代一车驾四马，中间二匹叫"服"，这里引申为动词，驾御的意思。这条记载说明了丝绸贸易在商代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尚书》中有《酒诰》一篇，记载周王派人告诫殷民："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劝其从事远途商贩，赚钱以养父母。当时丝绸成为抢手货，畅销品，流通非常快。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内地丝绸的流通方向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进人新疆地区，通过西域各族人民流入葱岭以西的中亚和更远的地区。

中西交通的这条道路称为欧亚草原之路。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长久的定居处，欧亚大陆间草原又是非常宽阔的地带，因而古代通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行的中西之间的交通，其路线难可详考，文献资料也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现代学者根据希罗多德笔下草原居民住地的分析，做出如下大致推测：西从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是宽广的草原道，中间需要越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或乌拉尔山。再往东，与蒙古高原相通的大道有三道。第一道在东及巴尔喀什河西缘时，从东南折向楚河谷地，而后进人伊犁河流域。从这里沿着天山北麓一直向东，直到东端的博格达山以北。从博格达山北麓

向北，还可以走向蒙古高原的西部。第二道，从伊犁河流域偏向东北，进至准噶尔盆地，直抵阿尔泰山西南山麓；或者从东钦察草原东进至额尔济斯河中游，沿着其支流的河谷和宰桑湖南缘进至阿尔泰山。在绵亘的阿尔泰山脉上，有不止一处可以越过的通道。著名的达坂（突厥语意为“山口”，维吾尔语意为“高山峡道”）有三个，即乌尔莫盖提、乌兰和达比斯。第三道从东钦察草原东缘向东，渡过额尔济斯河抵达鄂毕河，然后沿着鄂毕河上游卡通河谷地进至蒙古草原。这条道路上有阿尔泰山和唐努乌梁山之间的崎岖山地，相当艰险。相对而言，第一道最易通行[8]。

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中国丝绸、铜器大量地运往中亚，传去的还有中国的天文、历法。丝绸更通过那些游牧民族间接地传到更加遥远的地方，甚至西欧。所以我们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三世纪的希腊文物中，才能见到那种细薄透明的衣料。从 1928 年至 1949 年，在今俄罗斯的戈尔诺阿尔泰地区的乌拉干河畔，卡通河和比亚河上游，发掘了一批时间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墓，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织物，其中巴泽雷克 3 号墓和 5 号墓出土的绢、绸，其图案有形态优美的凤凰，在一幅绣帷上绣着非本地所有的飞鹤，这些可能是中国最早传入的丝织工艺品。1977 年在新疆的阿拉沟东口，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和漆器，出土的菱形链式罗是当时内地刚刚才有的丝织珍品。由于外销，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天山山麓。在新疆乌鲁木齐鱼儿沟也发现过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丝织品。

四 北方草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输入

不仅有输出的，也有由北方草原和西域输入的。兵器、马具和动物纹饰是草原文化的三大特色。兵器方面中原地区与欧亚草原民族互有影响。在与西北和中亚游牧民族的接触中，中原地区引入了马文化，马具是其重要内容。春秋时秦国最先组织了骑兵，《韩非子》记载："秦穆公送重耳，畴骑二千。"地处西部和北部的秦国和晋国为了对付游牧民族的侵扰，公元前七世纪已经使用单骑作战。北方的赵国在赵武灵王时大力推广胡服骑射，伊朗式的铁铠和铠环代替了笨重的犀兕皮甲。胡服衣冠与黄金饰比的外族带钩也随着进入中原地区。

中国的动物纹饰起源很早，自新石器时代就形成其特有的主题和艺术风格，如饕餮纹起源于龙山文化。动物纹饰是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艺术，在我国北方、蒙古、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直至黑海沿岸都很盛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饰起源极早，可以上溯到商代晚期。商代时期的兽头刀和短剑，春秋战国时期的群兽纹饰牌，卷曲成环的虎形饰牌，以及两汉时期流行的长方形饰带等都起源于中国，在中国境内都可以找到其祖型。在蒙古、外贝加尔、米努辛斯克盆地都有发现。春秋战国以来丰富多彩的圆雕动物造型及其他多种题材的动物纹，都有中国北方民族所特有的基本题材和艺术风格。至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动物纹造型艺术吸收了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和阿尔泰艺术的某些因素，在某些题材上表现出对后者的重复和模仿，如屈足

鹿、鹰头兽、躯体扭转兽和双兽格斗纹。螺旋形野兽纹(兽背作连续的旋纹)是斯基泰动物纹中最优秀的制作,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晚期墓中的螺旋纹鹰头狮身兽完全仿照斯基泰样式,这种半鹰半狮状幻想动物纹源出于西亚两河流域。陕西神木县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又利用鹿身巨角雕成八个鹰头,卷曲的尾巴也雕成另一鹰喙,周身刻有商周艺术常见的云纹,体现了两种艺术的融合。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螺旋纹屈足鹿,角贴背作四个连续的环形,四足屈伸,和公元前六世纪克里米亚出土的屈足鹿形制相似,差别只是斯基泰艺术中四支鹿角仅有末支成环状,其余三支在顶端成弧形。1983 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境巩乃斯河南岸出土战国时期对翼兽铜环和对虎圆铜环各一枚,都是塞人神话传说中的形象,表现出鲜明的塞人文化特征。战国时匈奴联盟崛起以后,北方草原民族对斯基泰艺术的借鉴有所加强。杰特曼指出:"从南俄草原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已开始表现为以动物为主题的相似的艺术风格,它既显示出艺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适应,又反映出欧亚草原地区各民族间的早先接触以及各民族间草原流动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广泛的文化交流。"[9]

考古材料证明,起源于西亚的祆教先秦时有传入中国的迹象。祆是火祆教所奉之神在古代中国的名称。火祆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由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一译苏鲁阿士德,前 628—前 551 年)在波斯帝国东部创立,因此又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波斯教。火祆教奉《阿维斯塔》为经典,基本教义是善恶二元论。它

信奉的最高神马资达(一译胡腊玛达,希腊文作奥尔穆兹德,意即光明神),故又称马资达教(Mazdaism)。祆教认为,世界有两种对立的本原在斗争,一种是善,化身为光明神马资达;另一种本原是恶,化身为黑暗神安赫腊曼纽(希腊文作阿利曼)。火是善和光明的象征,因而崇拜火,以礼拜圣火为主要仪式,故又称火教、火祆教、拜火教,拜占庭人称其信徒为拜火者。

据说,琐罗亚斯德为传播祆教浪迹天涯,后来在大夏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在大夏王维斯塔的倡导下,大夏臣民信奉火祆教,使这一宗教是到推广。公元前六世纪末,大流士统治时期,曾被定为波期帝国的国教。祆教后来传入中亚粟特地区,据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部粟特语祆教残经(Or. 8212/84),早在公元前五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中亚时,粟特人就已经信奉祆教。火祆教传入粟特的同时,还向北传入中亚七河流域的塞人部落。根据林梅村的研究,火祆教最初很可能是由塞人传入中国西部地区[10]。1976 至 1978 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天山东部阿拉沟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木椁墓。墓中出土物中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漆器和丝织品。根据漆器的图案可知,这批古墓的年代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发掘者推测阿拉沟这批墓葬的主人和塞人关系密切,因为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高足承兽方盘,王炳华指出:"同类文物在苏联中亚地区曾出土多件,细部特征有差异,但基本风格是一致的,被认为是拜火教的宗教祭祀台,是塞克文化中典型文物。"[11]新疆地区出土的表现为火祆教祭坛的青铜非此一件。1983 年,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其中一件与上述阿拉沟塞人古墓所出拜火教祭坛形制完全

相同，显然塞人曾将火祆教带入中国新疆地区。

根据德国语言学家吕德斯研究，塞人是雅利安的一支，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这支讲塞语的雅利安游牧民后来分化，入居塔里木盆地的塞人逐渐走向定居并产生出若干支系。中国史籍只把天山北麓保持游牧传统的雅利安人称为“塞人”，而把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定居、讲塞语的雅利安人按其分布地域分别称为于阗人、莎车人、扜弥人、疏勒人、汉盘陀人等。于阗人是信仰火祆教的塞人的后裔，其习俗中保留有祆教文化的传统。《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于阗国“其俗信巫”，据英国伊朗学家贝利和丹麦语言学家施海夫的研究，于阗人信仰佛教之前崇祀的巫教就是火祆教。于阗塞语文书中表示太阳的词 urmaysde 即祆教主神 ahura mazdā（阿胡拉·马兹达）；于阗佛经中表示印度女神 s'rī（吉祥天女）和梵语佛经的 mahādevī（天女）的词 s's'andrāmatā 源于《阿维斯塔》神祇 spanta ārmaitis。于阗人还用《阿维斯塔》中的世界最高峰 harō 或 haraiti 翻译梵语佛典中的须弥山（sumeru）。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疏勒国……俗事祠祆神，有胡书文字”。但疏勒人信奉火祆教并不始于唐代。挪威语言学家柯诺注意到，塞语表示“神”的词 gyasta（于阗语）和 jezda（疏勒语）词源相同，皆来自波斯祆教古经《阿维斯塔》的 yazata（天神）[12]。

考古资料还说明，起源于西亚、后来流行于中国内地的箜篌在战国时期已经传入新疆地区。1996 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且末县托格拉克勒克乡扎滚鲁克墓地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两件箜篌，除了琴弦和共鸣音箱上的蒙皮已腐朽缺失外，其余部分保存

完好。均木质，由音箱、琴颈和琴杆三部分组成，通长 87.6 厘米；音箱呈半葫芦状，长 41.6 厘米，宽 6.8－13.2 厘米，高 4－6.8 厘米。音箱外壁打磨光滑，口部还留有蒙皮的残迹，宽 1.2－1.6 厘米。音箱深 2.8－5.2 厘米，腔内可见凿痕，音孔开在音箱的底部。音孔造形特别，略成长方形，四边作弧曲内凹长 2 厘米，最小宽 0.4 厘米。颈部侧视呈长方形，约长 46 厘米，宽 8 厘米。尾部与音箱相连，偏上部位有一横穿的小圆木棍，长 3.6 厘米，径 0.35 厘米。琴颈下部延伸到音箱底部，稍稍呈脊状突起。颈首稍厚，上面刻有椭圆形的卯眼以固定琴杆。琴杆略带弧形，截面为圆形，长 31.2 厘米。杆首稍细，直径约 2 厘米。有三道明显的系弦痕迹。杆尾镶嵌在颈首的卯眼内，用木楔固定。露出部分琴杆截面为椭圆形，长径 2.8 厘米，短径 1.6 厘米。出土这两件乐器的墓中，至少葬有 19 具尸骨。出土时，两件乐器分别置于一个小孩和一位中年女性尸骨的胸部。同时出土有木梳、木腰牌饰、木纺转、毛纺织品和陶器、铁器、砺石等。考古工作者根据墓葬中其他出土文物的文化类型、历史背景等综合分析，初步确定该墓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三至四世纪，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所见最早的箜篌实物，过去人们对箜篌的了解，主要是根据古代佛教壁画或乐舞俑、砖雕石刻图像等资料，现在见到了箜篌实物。这在研究箜篌的早期流传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音乐专家的研究，且末箜篌的形制应为弓形箜篌，但与新疆地区发现的其他弓形箜篌有所异同，其他弓形箜篌的音箱形似一个皮囊，皮囊内应有硬质腔体支撑。且末箜

篌为木质腔体，两者在外观上有一定的差异。如果仔细考察，发现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几种弓形箜篌，音箱结构则与且末箜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箜篌约产生公元前二十世纪前后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弓形架、直角架和拟直角架均具备，而且演奏方法也一样。关于且末箜篌演奏的方式，专家们认为，最为合理的姿势是右胁夹持音箱，左手扶持颈端，右手拨弹，像新疆克孜尔第77窟壁画中所表现的样子。且末箜篌全长86.7厘米，其颈首被磨削成圆角，共鸣箱的中腰开始内敛，正适合一臂夹持音箱，一手扶握颈端的演奏方式[13]。

新疆和田地区的玉石仍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地区。战国时代，赵国随秦攻齐，苏厉代齐王写信给赵惠文王，替赵国分析利害，说秦灭韩后攻赵，“秦以三郡攻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14]。昆山之玉即新疆和田玉，这说明从和田至赵经羊肠、句注二山有路可通，苏厉意谓一旦秦国切断这条路线，赵国就断了昆山之玉的来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洛阳古墓中，曾发现玻璃制品目珠，经鉴定，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产品。在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地区突亚赫塔的一处古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玻璃目珠。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战国玻璃珠，有的呈六面圆形，有的呈六面长条形，周身饰有椭圆形白圈，圈内有深蓝圆点，均有一圆形穿孔。据说此类玻璃珠在中国、东南亚、西亚、地中海东部沿岸多有发现，形制色彩也很接近。这些文物的发现，反映了这一时期玻璃制品的发展和交流，为我们认识欧亚草原之路树立了坐标。这条路

线可以说是最早的“丝绸之路”。后来有人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说法,起初不是指这条路线,但随着人们对古代中西之间交通不断加深认识,后来人们都把它看作最早的丝绸之路。所以我们把西周和春秋战国这一时期称为丝绸之路的创辟期。古代游牧于欧亚大陆草原之间的众多民族为中西之间的交通和交往做出了贡献。

五 春秋战国时中印间交通往来

前文已经指出,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甸、印度间已有文化交流的迹象。春秋战国时期,中印间的交通往来已见于文献上的记载。公元前五世纪,波斯阿赫曼尼德朝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曾多次向葱岭以东地区派出商队,其中就有印度商人[15]。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王朝与中国新疆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佛祖统记》卷三十五记载,迦叶摩腾向汉明帝讲述佛教传播的历史,说:“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

在于阗建国的传说中,阿育王时代印度人已经有人来到于阗定居。传说中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于阗尚为无人之地。东国万人在王子瞿萨旦那率领下到达于阗河下游,此东国人当为塞人。不久,阿育王宰相耶舍率7000人越大雪山至此,双方相遇后发生过冲突,后来联合建国。瞿萨旦那成为于阗国王,耶舍为相。两部移民起初分居两处,后逐渐融合,并建立城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记载于阗国历史和风情云:

从此(斫句迦国)东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此言地乳,即其俗雅言也。俗谓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谿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沙碛大半,宜谷丰乐。出氍毹、细毡,叠工绩绌紬。又土多白玉、莹玉。气序和调,俗知礼义,尚学好音,风仪详整,异胡诸俗。文字远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蓝百所,僧五千余人,多学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爱有德,自云毗沙门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无忧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罗国,后被谴出雪山北,养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无子,因祷毗沙门天庙,庙神额上剖出一男,复于庙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向养子,遂至成长。王崩,后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诸国,今王即其后也。先祖本因地乳资成,故于阗正音称地乳国焉。

于阗建国的历史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于阗之地已有印度移民在此定居。于阗文字、习俗多遵印度。先秦时代,经过塔什库尔干的克什米尔－于阗一道,成为中印交通的重要通道。

考古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西藏地区与南亚之间保持着文化上的往来。199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文管会在拉萨曲贡村发掘了一批石室墓。该墓地的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 758 至前 401 年。其中出土的一枚铁柄铜镜既是西藏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同时也是时代最早的铁器。然而据研究这枚铜镜不是西藏本土产品,而是南亚或中亚地区的输入品[16]。

经由中国西南、缅甸而至印度的道路在秦汉以前也早已走

通。春秋、战国时期这条道路有更多的利用。云南古代传说中有阿育王派人至云南传播佛教的故事。《纪古滇说》记载，阿育王生三子，率领部众追王神骏至金马山和碧鸡山之间，其地大致在今云南大理、楚雄一带。此后王子回国，被哀牢夷所阻，留居在滇。传说滇王庄跻（约公元前328—前263年）晚年崇信佛法，迁居白崖（今弥渡红崖），后裔成为白国的祖先[17]。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乃春秋晚期墓葬，其中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是仅见于公元前四世纪以前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文化遗存的早期产品。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以加工过的白色圆圈纹为特点，琢成椭圆形，是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运至云南的珠饰。

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云南使用贝币可能也受印度影响。1996年，考古工作者对云南晋宁县石寨山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出土文物中有两件贮贝器极为别致。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还出土有战国贮贝器。贮贝器以其用途而定名，在贮贝器出土时，大部分都盛满货贝海币。李家川遗址出土海贝达300多斤，属环形货贝，来自深海区，充作货币[18]。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描写班度和俱卢两族争夺王位的斗争，反映印度奴隶社会的生活。其主要故事形成于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五六世纪开始加工，公元最初几世纪趋于定形。其中有数处提到“支那”，甚至讲到支那军队参加了和普拉约蒂萨（阿萨密）的军事冲突，反映出由于中印间的交通和交往彼此间信息的互相传递。中国的丝绸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已经传至印度，印度学专家雅各比考证，公元前320年至315年，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大臣高底里雅在所撰《政事论》（Arthasastra）一书中不仅提

到“支那”，而且还提到 cinapatta 一词，意为“支那地产成捆的丝绸”，说明公元前四世纪时，丝已贩运到印度。

六　有关春秋战国时中西交通的传说

王嘉《拾遗记》卷三“周灵王”条记载：“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献玉驼高五丈，虎魄凤凰高六尺，火齐镜广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语，则镜中影应声而答。韩房身一丈，垂发至膝；以丹砂画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势，可照百余步。周人见之，如神明矣。灵王末年，亦不知所在。”火齐，有人解释为琉璃，有人解释为宝石。

同书同条记载：“浮提之国，献神通善书二人，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出肘间金壶四寸，上有五龙之检，封以青泥。壶中有黑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斗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经》，垂十万言。……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经成工毕，二人亦不知所在。”张星烺以为“浮提国必即浮屠国之转音，浮图即佛陀也。”

同书卷四“燕昭王”条记载：“七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善炫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特绝。人皆长五六分，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喷水为氛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氛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

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怀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术炫惑，神怪无穷。”

汤用彤指出：“王子年《拾遗记》文原多亡佚，经梁萧绮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其所记燕昭王事，不悉是晋代原文，抑梁时改窜。但其所记，《晋书》已称其事多诡怪。所谓沐胥之国，印度无此名称。燕昭王时佛化未出天竺。所谓‘尸罗荷锡持瓶指出浮屠’，影射佛徒已来中国，诚属荒唐不经。按《史记·世家》谓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封禅书》则谓其信方士，《水经注》亦谓昭王礼宾，广延方士。此均由招贤事附会而来，因是而起种种诡怪不实之故事也。”[19]《拾遗记》中所记燕昭王时佛徒已入中国事虽不经，然而此段所记印度善炫人表演的魔术杂技，有声有色，则应有一定根据。

《拾遗记》同卷同条又记载，燕昭王“八年，卢扶国来朝，渡河万国方至。云其国中山川无恶禽兽，水不扬波，风不折木，人皆寿三百岁。结草为衣，是谓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让。寿登百岁以上，相敬如至亲之礼。死葬于野外，以香木灵草瘗掩其尸。闾里助送，号泣之音，动于林谷，河源为之流止，春木为之改色。居丧，水浆不入于口，至死者骨为尘埃，然后乃食。昔大禹随山导川，乃旌其地为无老纯孝之国”。“九年，昭王思诸神异。有谷将子，学道之人也，言于王曰：‘西王母将来游，必语虚无之术。’不逾一年，王母果至，与昭王游于燧林之下，说炎帝钻火之

术”。

七　“支那”和“赛里斯”名称的由来

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支那”、“脂那”，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文献，在费尔瓦丁神的颂辞中写作 Cini，或 Sāini，古代波斯文中有的写作 Cin，或 Cinistan、Cinastan，与粟特文中的 Cyn 相近。这个名称可能是通过东伊朗语传去的。公元前 550 年，波斯人居鲁士攻灭米底国，建立波斯帝国。后来居鲁士东征，将帝国东界推进到阿姆河两岸的巴克特里亚（汉代中国人称为大夏）。居鲁士之子即位后，一再对东方塞人部落进行征战，把波斯帝国的东北疆域扩大到中亚的锡尔河流域，与葱岭以西塞人游牧地区接壤。这促进了波斯人对中国的了解。

古代印度人最早也称中国为“支那”，梵文中写作 Cīna，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提到这个远在北方的支那。两大史诗起源很早，成书过程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二世纪间，所以不能确定其具体年代。而旃陀罗笈多王（前 320—315 年在位）侍臣高底里雅的《政事论》有年代可考，书中提到 Cīnapattā，意即“出于支那的成捆的丝”。可见至迟公元前四世纪，印度人已经了解到代表中国的这一名称。

希腊、罗马文献中最初称“Thin”，见于公元 80 至 89 年佚名作者完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此词拉丁文写作“Sina”，复数为“Sinae”。“Sin”是词根，发音接近中文的“星”。加

上词尾“a”，发音为“希那”，加上“ae”，发音为“希内”。后来英文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a”，梵文作“Cīna”，其源皆出拉丁文。梵文这个词后来在佛教经籍中被译为“支那”、“脂那”或“至那”。支那的本义是什么？有各种解释，如秦、日南、滇、羌、荆(楚)、蚕、丝、绮、窖义的美称等等。

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是“秦”和“丝”、“绮”，春秋时代秦国处于西北，后来秦朝统一全国，开展了对外交通，秦之威名通过西域民族和商贩而传入中亚、南亚和西亚，北方和西方的邻族和邻国就称中国为秦，直至汉代匈奴人仍称中国人为“秦人”。先秦时秦国与西域的交通，史料上缺乏详细的记载。张星烺说：“秦穆公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勋业烂然，史无详文。仅于《左传》中一二处，略见其范围之远近而已。其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九十二国之名，竟无一国传于后世，至可惜也。九十二国所占区域，究若何之广，亦无从知。鄙意秦始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惜汉初执政者，皆丰沛子弟，悉非秦人。秦国之掌故，鲜能道者，以致秦与西域之交通事迹，史无详文也。”[20]

西方传教士卫匡国于明朝永历九年(1655 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其《中国新图》，首先提出“支那”即“秦”这一说法，伯希和也认为一定为“秦”之译音。有人认为“支那”就是丝绸。如前所述，高底里雅书中已经讲到产于“支那”的丝，那时秦朝尚未建立，故“支那”一词不可能从秦朝演变而来。称支那为“秦”之译音的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伯希和指出，秦朝建立虽然晚于高底里雅之书，然而秦之建国始于周平王时代，在公元前 700 多

年，高底里雅之书晚于秦穆公约350年，那时“秦”之威名早已远扬于印度了。据《大唐西域记》卷五记载，玄奘答戒日王问“大唐国”时，也说：“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说明所谓“至那”和大唐一样都是国号。“支那”这一名称直至汉晋时还为西域各国所沿用。公元150年前后，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eus）在他的地理学著作中同时用“支那”（Sinae）和“赛里斯”（Seres）两个名称。

通过中西交通的开展和从遥远的东方传来的丝绸，欧亚大陆上其他地区和文明国家很早都了解到中国的信息。在古代希腊文献中称中国为“赛里斯”，最早记述“赛里斯”的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作家克泰夏斯（Ctesias），他说：“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21]肘尺乃法国古代长度单位，指从肘部到中指长，约等于半米。“赛里斯”，西文写作“Serice”或“Seres”，这个词的原意是“丝国”、“丝国人”，显然希腊人也是用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产品丝绸来称呼中国和中国人。有人认为，克泰夏斯这一段文字的真实性令人生疑。不过书即便为后人伪作，书中记述的内容却有真实的成分，克泰夏斯的描述有些荒唐，这种荒唐正是古代希腊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早期的模糊认识造成的。他提到“赛里斯”这一名称很有意义，说明希腊人很早已有了对中国的了解。公元一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也记载了赛里斯的地理位置，但他的记载并不准确，大致是指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一个地方。到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罗马作家笔下，“赛里斯”已经是对中国的很普遍的称呼

了。

注 释

〔1〕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5 年,68 页。

〔2〕黄时鉴《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见氏著《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1 – 14 页。

〔3〕明斯(E. H. 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剑桥,1913 年,204 页,图 10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22 – 23 页。

〔4〕《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见《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

〔5〕刘向《说苑·反质》,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年,462 页。

〔6〕《后汉书·桓帝纪》注引《帝王纪》。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163 – 164 页。

〔8〕前揭黄时鉴文。

〔9〕杰特曼(K. Jettman)《草原艺术》(The Art in Prairie),纽约,1967 年。

〔10〕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载《西域研究》1996 年第 4 期;收入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102 – 110 页。

〔11〕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 年第 1 期。

〔12〕前揭林梅村文。

〔13〕王子初《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载《文物》1999 年第 7 期。

〔14〕《史记·赵世家》。

〔15〕古奇(M. M. Ghosh)《梵文"支那"名称的源流》(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Sanskrit word cina as the name of cnina),《巴达伽东方研究所年刊》(ABORI),普那,1963年,42卷,214页。前揭沈福伟书,46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文管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第10期;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载《考古》1994年第7期;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99年第5期。

〔17〕前揭沈福伟书,48页。

〔18〕佟伟华《云南石寨山文化贮贝器研究》,载《文物》1999年第9期。

〔1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页。

〔20〕前揭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上古时代中外交通",8页。

〔21〕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2001年,1页。

第五章 中西交通与交流早期史迹存疑

追溯中西文化交流的早期发展，其源头处有一些可疑的史迹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做出更加明确的论断。事实上远古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历史，有的内容可能永远都是谜了。

印度河流域发掘出来的古城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达鲁（Mohenjodaro）中出土的古陶，与中国甘肃出土的史前的彩陶有一些相似之处。季羡林先生认为，二者之间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那么是否存在互相传播和影响？如果存在，这种传播和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古代埃及、波斯、阿拉伯、中国、印度天文学中都有“二十八宿”之说，中国和印度的二十八宿之说最为古老，其他地方显然是从印度传去的。印度和中国两国之二十八宿每一个都有具体的名字，据研究是同源的。那么二十八宿最早起源于何处？有人以为起源于印度，有人以为起源于中国，也有的以为起源于巴比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中国学者竺可桢发表《二十八宿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一文，认为印度的二十八宿是从中国传去，又加以改进而形成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中也持这一观点。中国古代有十二岁之说，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十二岁的名称很奇怪，如太岁在子称为“困敦”，在汉语中语义难解，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从梵文音译成汉文的，也就是说十二岁的概念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传入的

时间不会晚于战国末年。印度和中国古代传说中都有月宫中有玉兔的说法，据季羡林先生研究，印度的月兔故事早于中国，至迟在屈原时代就已传入中国。至于时间上限则无法确说[1]。

中国古代的寓言和传说有与印度相似者，中外不少学者以为受印度影响。孔好古《中国所受印度的影响》(Indischer Einfluss in China)以为《战国策》所载若干动物寓言，完全源于印度，只是动物名称不同罢了。此外《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韩非子·说林》中的"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战国策》卷十七《楚》四记载"郑袖谗楚王美人"，《左传》卷四十四记载"师旷讽晋侯"，《列子·汤问》中巨鳌负山的传说，《山海经》中"巴蛇吞象"，《庄子》中关于大鹏的寓言，邹衍所谓大九洲说等，据学者们研究，都与印度的传说故事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正像季羡林先生指出的那样，关于这些"我们没有十分确凿可靠的证据，学者们的论断有很大的假设性，但也含有很大的可能性"[2]。

中国古历以十九年之章及七十六年之部为骨干，而这种周期亦见于西域，其始用时间亦与中国战国时代相当。巴比伦于公元前383年始用十九年章法；雅典在公元前432年。此为由中国西传，亦或自西域传入，还是不谋而合者？难以给出肯定的解释。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为一年之说，是中国人之发明，抑或由西域传入？立木于地，以悬垂线确定其正直位置，其应用则有用上下午等长日影测定南北线或东西线，用正午日晷最短之日以定冬至，为一切历法之基础，周礼已测表高八尺，夏至影一尺五寸，冬至影一丈三尺[3]。水星每

十二年一周期之运行，及由此发现而发展为占星术之周期观念；战国时楚人甘公、魏人石申著《星经》中之许多恒星位置及其名称；火星、金星之运行；以春分为首之新历法；以闰月订正与际历不合之差误；四季中分配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天分九分野或十二分野，与地上分野相等，人事反映天象，天上分野支配地上相应分野等，有学者以为皆由西方传入，但似乎并未为大家所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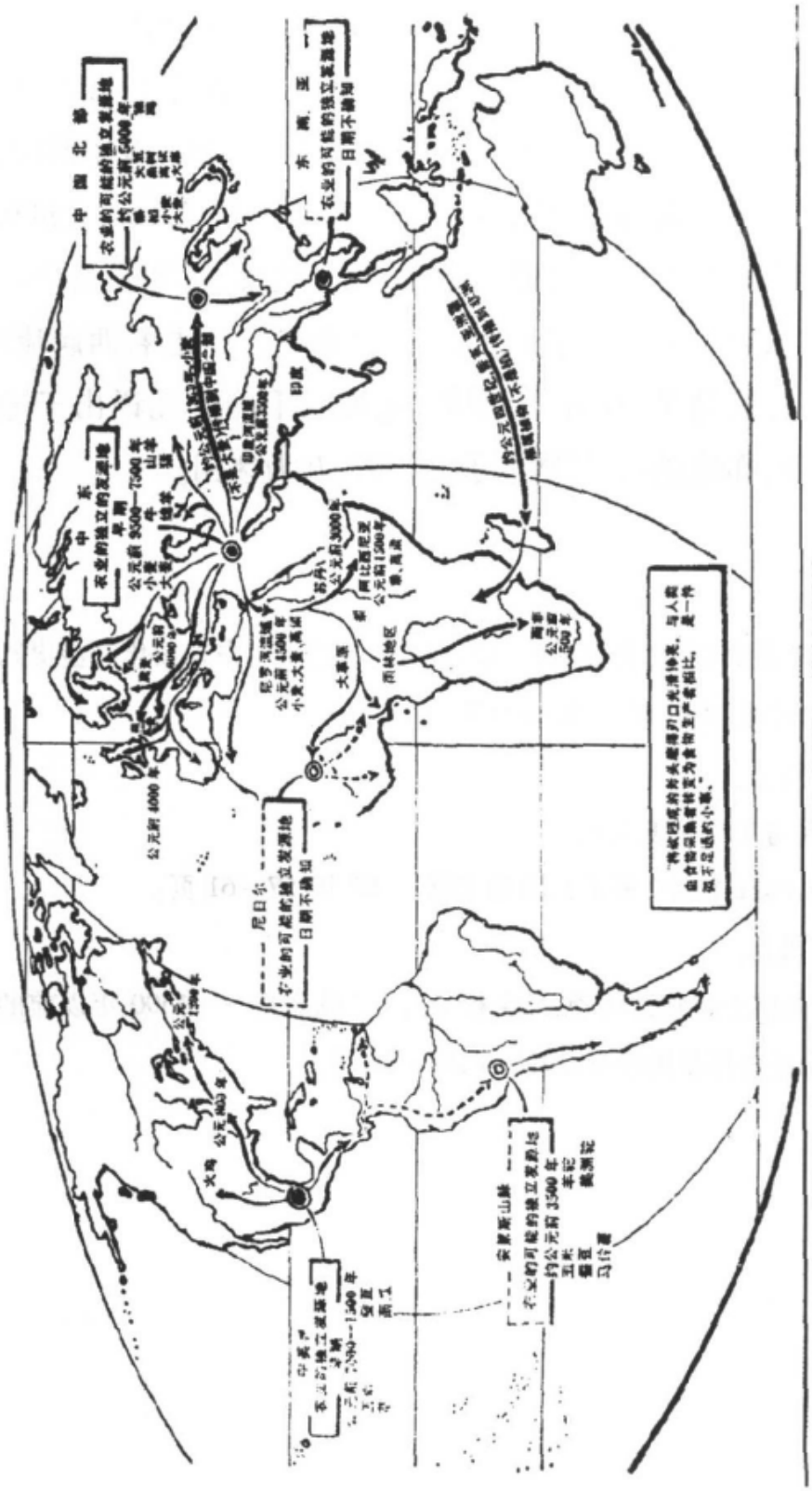
日晷制造法，也有人认为传自西方。据高鲁《日晷通考》："创用日晷，为历史记载中可考知者，惟有鲁达国王，在西历纪元前七百四十年。希腊最古之日晷，建在雅典，建设者曰默冬，时为纪元前四百三十三年。意大利之最古日晷，建在罗马，建设者曰古梭，时为纪元前三百零六年。古有天文家曰埃罗多，谓希腊人以一日之长分为十二时，用巴比伦之旧法，创为有极之日晷，自是而制度定。……亚里斯多德，希腊之哲学名家也，生于纪元前276年，制一日晷，有特殊点，不用平面，采用球体而空其内部，设置圭表于球之中心，投其景于球之内面，并于此凹面之上刻有圆周，分划度数，可以直接测定光线与圆周所成之角度。"（《观象丛报》五卷二册）鲁达国王，可能是犹太分裂时之犹太王，因《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提及日晷与日影下降度数，时为公元前700年左右。但未述及构造方法。加提天文学家佩劳苏斯（Berosus）于公元前340年发明半球形而中空之日晷，为后人所沿用，阿拉伯人至第十世纪犹在仿制。在中国古书中则不见有日晷。中国古代有日影测验，但目的在于定方向与节气，而非定时刻。《诗经·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传云："度日出

日人以知东西，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又《公刘》诗云：“既景乃冈”，笺曰：“既以日景定其疆界于山之脊。”《周礼》中之《大司徒》、《大宗伯·典瑞》，《考工记》中之《玉人》、《匠人》所记“玉圭”、“臬”，《周髀算经》、《淮南子·天文训》、《后汉志·律历志》所记“表”或“仪表”，《史记·天官书》所记“土炭”法，皆无测验时刻之作用。据刘复《西汉时代的日晷》记载，他所知当时所存中国古代之测时日晷有三，但皆为西汉物，远在西方之后。因此他认为中国之测时日晷必传自西方。至于传入时间，方豪以其制作之精，“推其传入中国必已久，或在西汉之前，几经改良而后成也”。[4]

中国西汉之前测验时刻之工具为水漏，有人认为漏刻制造法亦传自西方。方豪《中西交通史》云：“汉简中所见‘夜漏上水’等字句，足证汉简时代，即西汉下半期，塞上用漏定时，则漏壶之制，当亦从中亚经西域传入。盖日晷与滴漏同为巴比伦人所发明也。”埃及的玻璃器何时传入中国？早在公元前1600年，埃及的工匠们就掌握了制作玻璃的初步技术。公元前十二世纪就发明了制造玻璃的办法。河南省出土了一个公元前二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头像。那么这种玻璃器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玻璃珠，经测定属于钾玻璃，是舶来品，还是本土所产？尚有争议，有人推测钾玻璃可能来自东南亚地区。中国上古纪功，多用铜器，至秦乃有石刻。而埃及则公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既已流行石刻；波斯、巴比伦亦早于中国。还有秦以白马祭天。这些方豪也认为“似皆受有西方之影响”[5]。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研究文明之前的人类农业的传播，他认为，中东、中美洲和中国北部都是农业文明的中心。现代的小麦、燕麦、稞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猪均起源于中东。由于适宜的植物生长环境，中美洲能成功地栽培植物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苋、蚕豆和南瓜之类。在中国北部的黄土平原上，早在公元前 5000 年时，黍、高粱、稻、大豆、大麻和桑树已作为旱地作物得到种植。他认为中国的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 1300 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由于中国北部旱地种植作物，所以在中国的作物中最后出现的小麦和大麦也被当作旱地作物进行栽培，而不象在它们的发源地中东，种植在水田里。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稻早就传播域外，而小麦和大麦又是从域外传入的，其具体的传播时间、途径和方式却是疑案。斯塔夫里阿诺斯说，那时农业在诸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在了解得还很不够，只有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情况知道得最清楚。由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其他方面的情形只能凭推测了[6]。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桩悬案，即春秋时思想家老子是否去了西域。《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伊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后来道教徒编造《老子化胡经》，固属不经，然而老子究往何处？司马迁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史记索隐》引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显然以为所谓"关"乃函谷关。又引崔浩语以尹喜为散关



农业的传播（选自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

令。葛洪《抱朴子》云:“老子西游,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列仙传》云:“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酉阳杂俎》卷二云:“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弋、身毒,为浮屠,化被三千国。”此说出于道教神仙之说,亦难凭信,然则老子之归宿,乃为迷团。

注 释

〔1〕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138 - 140 页。

〔2〕同上。

〔3〕《考工记·玉人》。

〔4〕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 年,57 - 61 页。

〔5〕同上。

〔6〕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85 - 88 页。

下编　秦汉时期中西交通的开拓

原书空白

第一章　秦朝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

秦始皇击灭六国，建立秦朝，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东亚大陆出现了第一个封建制中央集权大国，为中西交通更大规模的开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汉朝在秦朝大一统局面的基础上，将中西交通推向一个新阶段，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本章先论述秦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开展。

一　秦与西域的陆上交通

秦朝统治仅十五年时间，统治者又忙于稳定东方局势，无暇顾及向西部的开拓。因此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秦时中国与西域各国各族间的交往和交流都很少材料能够说明，历来中西交通史著作都不加论述，或者一笔带过。实际上秦朝在中西交通和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大一统的局面为汉朝中西交通形成高潮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秦朝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征服南方的百越，无论在西北陆路，还是在南方海路的交通上，都具有奠基和开拓的作用。

秦朝是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发展而来的。如前所述，秦于周平王东迁时始建国，地处西陲，自建国之初便与西北戎狄接壤。秦国与戎狄间有过战争，但长期以来秦国统治者主要精力

在于与中原各诸侯国的争霸斗争，对于西北戎狄主要处于守势，相互进攻的不多，为彼此间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环境。秦朝建立，“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秦与西域交通的咽喉地带，即后世所谓“河西走廊”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汉初河西居住着羌人、匈奴人、月氏和小月氏人、单桓部人、敦煌（薁）人等，而且各有不同的部落[2]，秦与诸族的关系基本上和平相处。

史书上虽不见有关秦与西域官方的往来，但有史料说明，彼此之间有人进行着贸易活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据《史记集解》引韦昭曰：“乌氏，县名，属安定。倮，名也。”《史记正义》则云乌氏县“古城在泾州安定县东四十里”。泾州安定县秦时属边境地区。倮是人名，所以《史记》同传说他“鄙人牧长”。《史记》中所谓西戎，是西北戎族的总称，分布在黄河上游和甘肃西北部。这段记载是说乌氏人倮从事畜牧，贩卖马牛，换取中原之丝织品，又将丝织品献于戎王，戎王则偿之以十倍的牛羊。乌氏倮因此成为巨富，秦始皇以封君视之，请参与朝事。这件事说明秦代的丝织品通过私人贩运传至西北戎人部落。

秦代器物也有向更远的西域地区传播的迹象。据苏联考古学家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的文章介绍，在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3号墓发现有花纹的丝织品，制作精美。

在6号墓出土一面中国铜镜，白色金属制成，镜体已经损坏，乃秦式镜的变形之一。阿尔泰山西麓的一个墓室中曾出土过形制相似的镜子[3]。有学者认为此铜镜的年代最晚可能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古阿尔泰部落居于中亚地区，在这里发现的中国丝织品和铜镜，反映了秦时中亚与中国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前期，考古工作者对秦咸阳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第3号宫殿基址发现大面积壁画，其中有葡萄内容。秦与西域邻近，葡萄是西域特产，传入秦国和秦朝都是有可能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三云："葡萄，《汉书》作蒲桃。……《汉书》言张骞使西域还，始得此种。而《神农本草》已有葡萄，则汉前陇西旧有，但未入关耳。"汉以前陇西已有葡萄，陇西地近秦国都，葡萄传入秦国或秦朝首都咸阳当无疑义。李斯上秦王《谏逐客书》中有云："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又云："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昆山之玉、夜光之璧来自西域。此书虽上于秦朝建立之前，而秦时也应源源不断地输入。相传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记载："秦始皇时，西胡献切玉刀。"并且以为切玉刀乃"西海中所有"，从流洲来。"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东岸十九万里，上多山川，积石名为昆吾。冶其石成铁，作剑，光明洞照如水精状，割玉物如割泥。"

西域刻玉画工有人秦迹象。《拾遗记》卷四记载：

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

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像。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名其臆，前记以日月。工人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奔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得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山泽之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目，相随而行，毛色相似，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各无一目。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灭，宝剑神物，随时散乱也。

如果剔除此段记载中一些夸张的成分，其中所反映的西域进献工艺匠人善于雕刻玉器和绘画，有一定的真实性。新疆于阗是产玉之地，其地当有善于雕刻玉器的工匠艺人，秦国和秦朝都城咸阳地近西域，西域刻玉画工人秦，应该是有可能的。同书同卷又记载：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之语及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曰："臣少时，蹑虚却行，日游万里。及其老朽也，坐见天地之外事。臣国在咸池日没之所九万里。以万岁为一日。俗多阴雾，遇见晴日，则天豁然云裂，耿若江汉。则有玄龙黑凤，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继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

皆自光澈，扣之则碎，状如粟。一粒辉映一堂。昔炎帝始变生食，用此火也。国人今献此石，或有投石于溪涧中，则沸沫流于数十里。名其水为焦渊。臣国去轩辕之丘十万里。少典之子，采首山之铜，铸为大鼎。臣先望其国，其金火气动，奔而往视之，三鼎已成。又见冀州有异气，应有圣人生，果有庆都生尧。又见赤云入于丰镐，走而往视，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弥信仙术焉。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树，酆水燃沙，贲都朱泥，云冈素竹；东得葱峦锦柏，漂遂龙松，寒河星柘，元云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渊羽垦，涤蟑霞桑，沉塘员箬；北得宴阜干漆，阴坂文梓，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珍异是集。二人腾虚缘木，挥斧斤于空中。子时起工，午时已毕。秦人谓之子午台。亦言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疑也。

此段凭虚之说，难可信据。

《广弘明集》卷十一载唐法琳上书驳傅奕，引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曰："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意谓秦时已有西域僧人来中国传教，此事有的学者以为可信，有的学者以为太远于事实，姑且存疑[4]。

二　秦代与南海诸国的交通

秦降服闽、浙一带的越族后，又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征服了南方的百越(今广东、广西以及越南中部和北部地区),在南方沿海建立了南海、桂林、象等郡,政治势力达到了南方滨海地区。今越南北部和中部进入秦朝势力范围,中国文化随之出现了南被的趋向。周秦之际,中国金属工具通过长江流域传入交趾。《交州外域传》云:"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秦汉之际,交趾地区的文化由于汉文化的南传更有长足的进步。秦时慈廉州人李翁仲入咸阳学习经书,佐秦始皇修筑长城,任职校尉。将兵至临洮,威震匈奴。同时,越地的特产也进入中原地区。据《淮南子·人间训》,秦始皇之所以发卒 50 万,与越人战,原因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秦征服百越后,这些异物自然成为当地对中原政权的贡品。随着秦的势力进入南方沿海地区,秦时中国通过海路与沿海国家的交通有了新的发展。《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朝"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有人指出,秦始皇发配大批商贾到南海和象郡,为后来丝绸之路交趾道以及海路丝绸贸易提供了大批善于经商的人材。中原农耕文化与东南海洋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

中国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征服海洋的活动,这种活动最初是沿海地区与近海岛屿之间的短距离漂流。随着航海能力的提高,则有了更远的航行。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发现六支木桨,还出土了一只"夹碳黑陶舟",模拟陶舟呈半月形梭状,两头尖,与后世出土的独木舟形状相似,分明是当时先民所造独木舟形状的反映。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有段石锛,考古学家认为,这是新石器时代专门用来制造独木舟的的造船工具,即所谓"刳

木为舟”。这种有段石锛曾向海外扩散，在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浙江沿海、近海的舟山群岛、台湾和更为遥远的菲律宾、北婆罗洲、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和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人们认为这是河姆渡文化通过赤道逆流的漂航向海外扩散的物证。山东大汶口和西夏侯两组遗址出土的人骨测量，浙江河姆渡遗址的人骨鉴定，证明这些地区的远古居民具有波利尼西亚人的因素，说明波利尼西亚人的远祖来自中国东南地区，他们在向外迁移的过程中，把有段石锛这种石器传播到各地。波利尼西亚人与马来人有某种亲缘关系，是太平洋上著名的航海民族。他们向太平洋诸岛迁移和有段石锛传播路线大约是，从中国东南地区沿海航行，或越海漂流，首先传至台湾、菲律宾、北婆罗洲和苏拉威西，然后由波利尼西亚人传播到波利尼西亚群岛和新西兰等处。这说明早在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已经开始了原始的航海活动。

上古浮海工具除了独木舟，还有桴，即筏。《易经·物原》云：“伏羲氏始乘桴。”此属传说，但说明其产生之早。后来人们“观落叶因以为舟”，独木舟发展为尖底木板船，由筏则发展为平底木板船。有了船，人们又逐渐发明了帆、橹和舵。我国最早古书之一《竹书纪年》卷三记载，夏朝帝芒“十三年冬狩于海，获大鱼”。《诗经·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是商汤的第十一世祖，这句是说夏统治下的商部落势力已经扩展到海外。春秋时，我国造船水平有了更大提高，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此说应该有其一定的生活基础。《越绝书》记载吴王阖闾与伍子胥谈到吴国水师中的各种兵船和大小，其中有“大

翼”、“小翼”、“突冒”、“楼舡”、“桥舡”等。还写到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国有戈船和楼船,越灭吴国,迁都琅琊,戈船300艘,载8000士卒,战船浩浩荡荡。

古代中国人把东南亚至印度洋中诸岛国划分为“东洋”与“西洋”,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出发,渡东海至台湾或吕宋,顺菲律宾列岛南航,至婆罗洲。这条沿西太平洋诸岛的航线所经诸地被称为“东洋”;从中国南海港口出发,沿大陆海岸南行,过印度支那半岛,所经诸地被称为“西洋”。秦代以前,中国人的海上交通似乎顺东洋航路发展较早,而向西洋航路发展较迟。秦平百越,水军取道海上直趋今顺化沿海地区,置象郡,为古代中越海上交通辟一新的途径。考古资料说明秦于南方沿海置郡之后,秦朝也积极发展南海海上交通。1974年,广州发现一处秦末汉初的造船工场遗址,距今约2190年。从该造船场遗址的发掘和考察来看,工场规模巨大,估计当时中国已能造宽6至8公尺、长30公尺、载重50至60吨的木船,中国船舶已经具备在南海进行近海远航的能力[5]。

虽然秦时南海航行的具体情况没有材料能够说明,秦时中国通过海路与南海诸国进行交通和交流却有迹可寻。李斯《谏逐客书》说秦始皇:“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所谓夜光璧和犀象之器即犀牛角、象牙制品等皆非中国所产,显然秦有从域外获此等物品之渠道,这些物品又当从南海海道而来。从民族学角度看,菲律宾民族主要有两大人群,即尼格里多人(Negritos)和马来人(Malays),这些人群的祖先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或者说与华南民

族有血缘关系。研究菲律宾民族学的刘芝田认为，中菲民族相同的文化特质多达63种，如以鼻箫取悦情人、独柄风箱的使用、服役婚的通行、少女房试婚制、干栏建筑、铜鼓和铜锣、文身、猎首与食人肉、梯田文化、瓮葬风俗、染齿、刀耕火种等。他的结论是"菲岛民族的渊源所自，其先世十之八、九是来自中国大陆，可能是没有多大疑问的"[6]。许多学者指出，菲律宾伊戈律族（Igorots）与中国南部的古代民族革佬族（或称仡佬、葛佬、仡僚）和台湾高山族同属一个民族系统，伊戈律族大约是在秦、汉时代开始直接从中国大陆或经由台湾岛移居菲律宾的。考古学家在马来西亚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代文物中，有许多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7]。这种情况说明秦时中国海船可能已经将自己的航线扩展到马来半岛的南端。当然这种传播也可能是通过东南亚诸岛屿上居民的航海活动完成的。

秦时地处北非的托勒密王朝已经了解到中国的信息。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东征，占领了埃及，并于公元前332年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城。后来其部将托勒密割据埃及和周边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直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为罗马人所灭。在这一时期，埃及成为古代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地区。托勒密二世（前285－246）修复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从此亚里山大里亚的船只便可以直接进入红海。据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地理书》的记述，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亚历山大里亚迅速成为地中海地区商业、文化中心，"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唯一海上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

来,聚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建立和繁荣,为东西方海上贸易和增进东西方的了解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亚里山大里亚建立后约一个世纪,在东方秦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秦朝中国威名远播,秦之国名经海路传至亚历山大里亚。公元一世纪,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位操希腊语的船长亦或商人撰写了《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第一次记载了遥远东方的秦国,并说大洋就止于秦,还记载秦之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指咸阳或长安),秦尼所产的丝织成的绸缎由经陆路过大夏而达印度。当然他不知道当他作此书时,中国秦朝已为汉朝所取代。

注 释

〔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39 页。

〔2〕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仑出版社,2001 年,155 页。

〔3〕《考古学报》1957 年第 2 期。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7 页。

〔5〕广州文管处、中山大学《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载《文物》1977 年第 4 期;高玮《秦汉造船业的考古发现》,见《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479 - 481 页。

〔6〕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香港,1970 年,30 - 57 页。

〔7〕简斋《汉唐的陶瓷器》,见《南洋文摘》,1960 年第 12 期。

第二章　汉匈对抗与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汉代丝路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原与西域以及中国与葱岭以西各古代国家间的交通和贸易，以此为转折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局面，影响深远。

一　北方游牧民族草原争霸和匈奴强盛

自古以来我国北方活跃着不少游牧民族，他们时常侵扰中原北部边境。春秋时中原各诸侯国兴起强大的尊王攘夷运动，战国时北方各国如燕、赵、秦皆与北方各族发生过长期的战争。三国都修筑长城，出兵反击其侵扰活动，有效地制止了北方草原民族的南下。同时在辽阔的北方草原各游牧族也互相争夺水草，征战不息。秦朝建立，大修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治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长城以北，则形成匈奴、东胡和月氏争霸的局面。起初，"东胡强而月氏盛"，东胡在今蒙古和内蒙古东部，匈奴在今内蒙中部，月氏在今宁夏、甘肃一带和新疆东部，其中匈奴最弱。匈奴头曼单于

因不胜秦而北徙，秦末中原战乱，匈奴“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月氏，先秦著作《逸周书·王会篇》有“禺氏”之名，《管子》中亦三见。汉代以前的文献中还有“禺知”、“和氏”、“月支”等写法，可能都是“月氏”的同音字或一音之转。有关月氏人的族属问题众说不一，有藏族、萃利族、突厥族、印欧族、伊朗族、东夷族等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月氏人为印欧人，他们通过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三个方面取得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印欧人在东方的分布已达新疆孔雀河流域至哈密盆地一线。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印欧人就是后来定居塔里木盆地的月氏人的祖先。《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句话出于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张骞向汉武帝所作报告。据学者们研究，那时汉朝还没有设置敦煌郡，张骞所谓敦煌指《山海经·北海经》中的“敦薨山”，也就是《汉书·西域传》提到的天山山北六国中的单桓，在今新疆昌吉博格达山。张骞所谓祁连山实际是唐代祁罗漫山，在今新疆巴里坤山。两山都位于东部天山北麓[1]。秦汉之际，月氏相当强大，其游牧分地东达鄂尔多斯草原。月氏鼎盛时，曾迫使东面的匈奴献送质子，头曼单于以太子冒顿质于月氏。

冒顿后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是时东胡强盛，强迫匈奴进贡千里马；甚至阏氏，冒顿皆委屈从之。东胡又求匈奴割地与之，冒顿大怒，发兵击之，破灭东胡。然后回兵击月氏，月氏西遁，其时大约在公元前174至161年之间。西迁的月氏人，有一小部分越过祁连山，退处南山，与那里的氐、羌杂居，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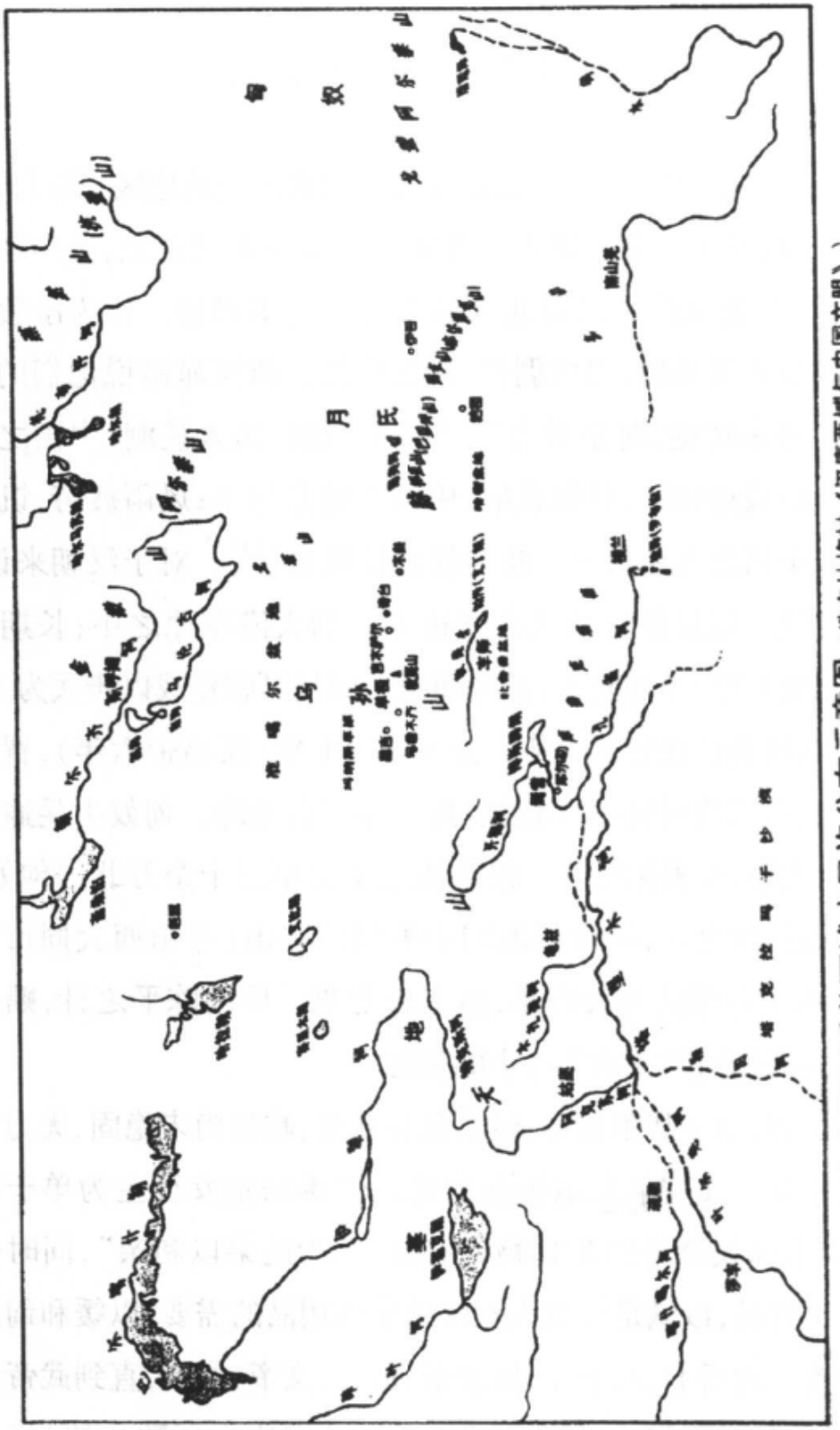
小月氏，在历史上没有大的影响。大部分月氏人向西迁徙，击破乌孙，活动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一带，称大月氏。匈奴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全部收复秦将蒙恬所夺匈奴之地。“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匈奴的强盛还造成了乌孙人的西迁。乌孙人最初亦在哈密一带游牧，处月氏之西，与月氏人有仇。《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王昆莫之父为月氏人所杀，昆莫自小为匈奴单于所养，故长大为匈奴所用，“将兵数有功”。单于“以其父之民予之”，臣属于匈奴。乌孙势力得到发展后，“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迁到了伊犁河和伊克塞湖一带。匈奴击之，不胜，保持了一种“羁属”关系。

汉文帝时，大月氏人又败于匈奴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迫使原来居住此地的塞人西迁。塞族在公元前二世纪前期分布于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附近一带，大月氏西迁侵入此地，塞人离散。塞王南越县度（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西南），进入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征服其地，以后其属部逐渐扩展至中亚及印度。留居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河流域绿州故地的塞人后来与新侵入的乌孙人混合。西迁的大月氏人再遇乌孙人，这时乌孙已经“控弦数万”。约在汉文帝时（前 161 – 160 年），乌孙首领昆莫为报杀父之仇，击破大月氏，占有伊犁河流域，迫使大月氏向西南迁徙。大月氏经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到了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此为大夏之地。“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即今阿姆河（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吐库曼斯坦以此为界），王庭或即在此河北岸的铁门（Ter-

mid)。大月氏从伊犁河上游迁至阿姆河流域的时间在公元前133年至前129年之间[2]。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形成强大势力的民族,其名始见于战国文献。战国时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其起源不明,或以为即夏时薰粥、商时鬼方、周时猃狁之后裔。其族属和语言,有蒙古、突厥、芬兰-乌尔戈、斯拉夫和伊朗诸说,今突厥说渐占优势。考古资料显示,匈奴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又融入来自西方的游牧民族斯基泰(Scythai)及古波斯、希腊、罗马诸文化的因素。匈奴文化甚至被称为"欧亚文化"。秦汉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匈奴族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至冒顿单于最强盛。冒顿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父头曼自立后,建立军政制度,强化内部组织。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逐月氏,夺取楼兰、乌孙、呼揭等及其旁二十六国地;后又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服楼烦(古族名,春秋末活动于今山西宁武岢岚等地,后活动于今陕北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先被匈奴征服,后为汉将军卫青所破)、白羊河南王(约在今蒙古南部),占领河套地区(秦之河南地)。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其统治区域东自今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南伸入帕米尔山脉东西的西域许多地方,南到今晋北、陕北一带。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十分强大。

如前所述,在匈奴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过程中,曾造成一系列民族的迁徙活动。大月氏、乌孙、塞人等西迁至中亚地区,对中西间交通和交流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大月氏西迁前西域古民族分布示意图（选自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二 汉匈间的和亲和对抗

汉朝建立以后，匈奴经常侵扰汉朝北部边境地区，其侵扰的特点是秋季的掠夺。唐人的诗句："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就反映了汉时北部和西北的边境形势。作为游牧民族，匈奴人善骑射，勇敢剽悍，来去倏忽。西汉晁错说他们的活动是"往来转徙，时至时去"。"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3]。对于汉朝来说，大军出征，匈奴很快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大漠草原之中；长期戍守，空费粮草；不加防备，随时而至。而且汉朝作战以步兵为主，步兵对铁骑往往处于劣势。公元前 201 年（汉高帝六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引兵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城下。汉高祖亲率大军三十余万北击匈奴，中匈奴诱敌之计，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西南），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达七天七夜。后用陈平之计，贿赂单于阏氏（亦作"焉提"），才得脱险。

汉初，由于战争破坏，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稳固，无力对匈奴作战。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同时开放关市贸易，以满足匈奴人对汉地生活用品的需要，以缓和匈奴的进攻。此后七、八十年，历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初年，汉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此即唐人所歌咏的"行人

习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4]。但是“和亲”并不能阻挡匈奴贵族的侵扰和掠夺，匈奴不断发兵南下，劫掠汉地人口和财产。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14万从朝那（今甘肃平凉县北）、萧关（今甘肃萧关）攻入，杀北地郡（今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今陕西凤翔）和甘泉（今陕西淳化县），火烧回中宫，汉政府急调10万大军保卫长安，发车骑抵御匈奴。过了八年（文帝二十二年），匈奴又从云中、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鱼河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匈奴骑兵不断入侵，汉与匈奴互有胜负，但汉朝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文、景时期一边采取“和亲”政策缓和局势，一边为抵御匈奴做了些防备工作，随着经济的恢复开始作反击的准备。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增强了边防力量。文帝还大力提倡养马，训练骑兵，在西北及北部边境地区设立了30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景帝时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始造苑马以广其用”[5]，训练众多而精强的军马以扩大骑兵。作为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在与游牧民族长期的军事对抗过程中，骑兵的发展往往决定了双方的强弱变化。春秋时，中原各诸侯国盛行车战，北边的戎狄步战，未构成对中原的真正威胁。“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战国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北方出现了习于骑战的胡人，对秦、赵、燕形成极大威胁，各国修长城以作防御。赵武灵王则搞“胡服骑射”，聘请匈奴军官训练骑兵。凭借这支军队，赵国灭掉中山国，攻打楼烦、林胡，扩大了领土，“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6]。汉朝文帝和景帝发展养马事业，为后来武帝

反击匈奴做了必要的准备。

在汉初和亲政策之下，汉匈之间虽然时战时和，彼此之间的交流一直存在着。匈奴寇边，常抄掠汉之“人民畜产”。双方聘使不断，互有书信来往。除了有时作为礼品赠送匈奴贵族之外，汉朝的丝绸、衣物、酒米、粮食每年大批定量供应匈奴。匈奴之骆驼、骑马和车驾也作为礼物进献汉朝统治者。例如文帝时，冒顿单于遗汉文帝书，其中有云：“使郎中係零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汉遗匈奴单于书则云：“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中原地区先进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老上单于初立，文帝使宦者中行说伴送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中行说至匈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中行说常与汉使辩论汉与匈奴文化优长，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汉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武帝即位之初，仍然保持边境互市贸易，“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通汉，往来长城下。”这种互市贸易，直到武帝时汉与匈奴和亲关系破裂，双方进行军事对抗时仍然进行，“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原因是这种边境互市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汉与匈奴的互市必然大大促进双方的交通和交流。

汉武帝即位后，改革政治体制，结束了诸侯跋扈的局面，中央集权大为加强；汉朝建立已经六十余年，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综合国力空前雄厚；社会安定，已无内顾之忧，反击匈奴的条

件成熟了。从武帝元光三年(前133年)起,汉朝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这一年匈奴以骑兵10万侵扰代郡、雁门一带,汉武帝采取大行王恢的意见,欲诱敌深入,乘机歼灭。汉朝使人佯卖马邑于单于,而在马邑附近则以大军设伏。但有人告密给单于,单于退兵,以此绝和亲,汉匈间和亲关系宣告破裂。从此揭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的序幕。

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元光三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的15年间,将军李广曾说他身经大小70余战。其中大的战役有十几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战役有3次。第一次战役收复河套地区。汉匈关系破裂后,匈奴"数入盗边",侵渔阳(今北京密云县),杀辽西太守;入侵雁门,"杀略千余人"。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旗),沿黄河北岸西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到陇西,对河套以南的匈奴军进行大包围,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这一战役使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汉朝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今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今内蒙五原),又下诏募民屯边,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基地。

第二次战役进占河西地区。这次战役发生在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贵族凭借着河西要地控制西域,这一年派骑兵万余人攻入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汉朝派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越过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东南)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越居延泽(今内蒙居延海),攻至祁连山,大破匈奴,俘虏3万余人,

俘虏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都尉等70余人。河西匈奴军损失惨重。匈奴西部地区在一年之内连遭两次沉重打击，在西部的统治无法维持。汉的军事打击引起了匈奴内部的分化，匈奴单于怪罪浑邪王、休屠王无能，“欲召诛之”，浑邪王率4万人降汉。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此后，汉朝又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7]。河西走廊为汉朝所控制，通向西域的道路打开了。

第三次战役收复漠南。这次战役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虽然连遭失败，仍不断南下搔扰。元狩三年（前200年）入右北平（今河北平泉一带）、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二郡，杀掠千余人。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朝决心深入漠北反击匈奴。漠北即蒙古大沙漠以北的地区，自汉代以来即有此称，文献上有时亦作“幕北”。第二年，汉朝发十万骑，分东西两路，分别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向漠北进军。这是汉朝反击匈奴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卫青率西路军从定襄越大漠，北进千余里，击灭了匈奴伊稚斜单于的军队，单于仅率数百名骑兵突围逃走。汉军直追至赵信城（在今蒙古杭爱山）。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里，跨过大沙漠，同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败匈奴，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此次战役后，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史记·匈奴列传》云：“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

匈奴以北。”

经过十几年的战争，汉朝对匈奴的反击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解除了北方匈奴的威胁，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使北部边境地区得以安定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汉武帝时对匈奴的反击，构成了张骞出使西域的背景。

三　西域形势和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据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七《西域土地内属略》研究，唐、虞、三代（夏商周）中原地区便与西域有所交通。《山海经·大荒西经》、《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和风土物产有不少记载。《山海经》18 篇是古代地理著作，近代学者大都认为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 14 篇是战国时作品，《海内经》4 篇则为西汉时作品，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如前所述，西周时，犬戎兴盛，阻断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周穆王两次西征，远至昆仑丘，打开了通向大西北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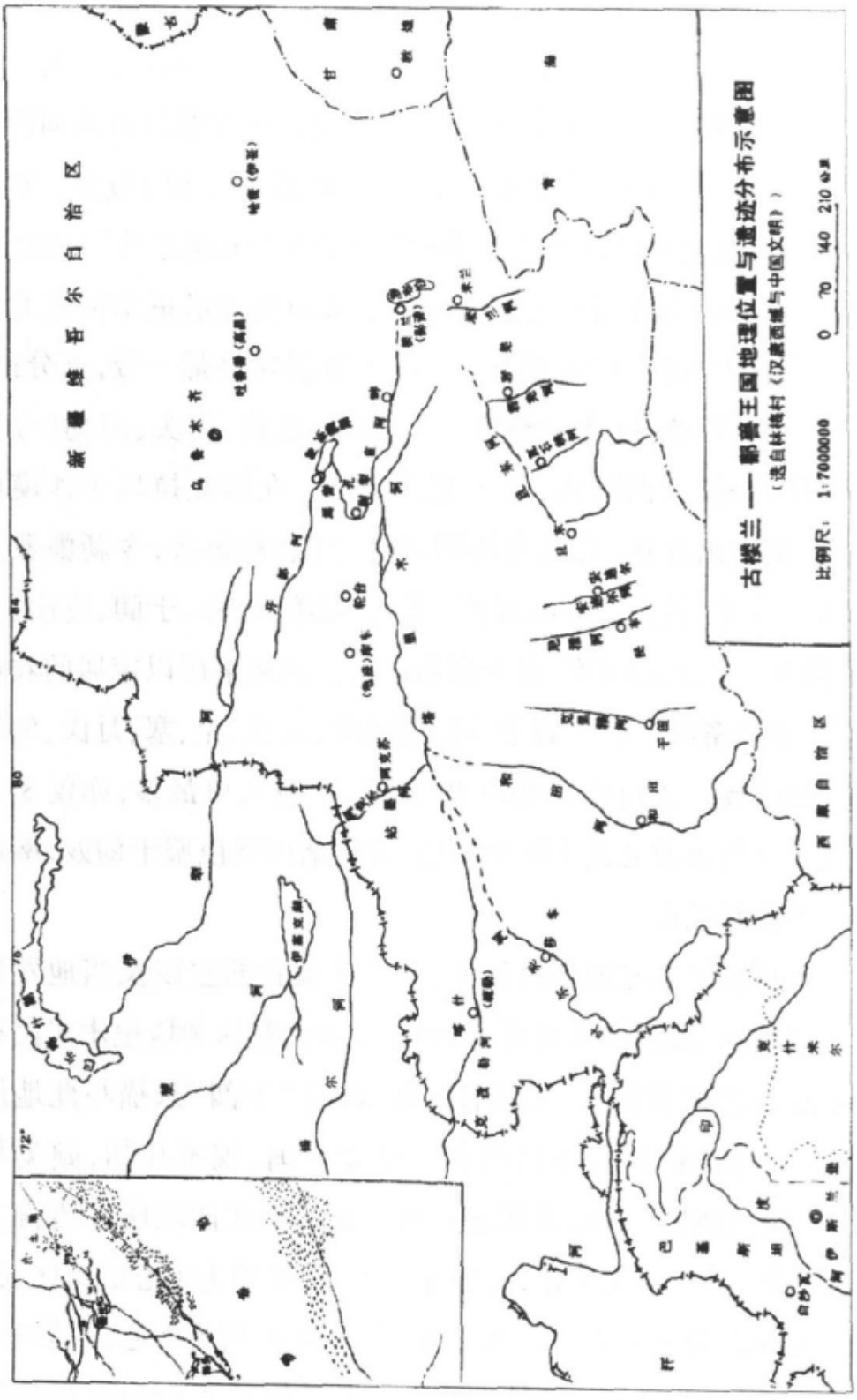
公元前二世纪初，即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在这里设置僮仆都尉，对西域进行管辖。僮仆都尉治所在焉耆、危须、尉犁之间，这些地方均在今新疆焉耆一带。匈奴僮仆都尉隶属于日逐王，负有监领被征服的西域诸国之责，并向他们掠夺人口、索取贡税，作为匈奴的重要财源，匈奴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因此当时西域成为匈奴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

僮仆都尉的设置，是匈奴势力控制西域的标志。由于匈奴势力的强盛，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

狭义的西域大致指今新疆一带。“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所指十分明确：

> 西域以孝武帝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三十六国”乃西汉武帝时数，后经兼并离合，至班固生活的东汉初为“五十余”。见于记录的有53国，葱岭以东者48国。后来范晔《后汉书》又增7国。“南北有大山”指北有阿尔泰山和天山，南有昆仑山。“西则限于葱岭”，则其间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有塔克拉玛干（维语意为“进去出不来”）沙漠，一称塔里木沙漠，东西九百公里左右，南北300多公里。盆地东头有罗布泊（在今罗布泊之北），史书称为“盐泽”、“坳泽”，又名“蒲昌海”、“牢兰海”，或音译蒙古音为“罗布诺尔”、“罗布淖尔”，诺尔或淖尔意为海。沙漠上有狭小绿洲，有发源于昆仑雪山上的河流灌注其间，可以居人，从而形成若干城邦小国，为中西交通必经之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详实记载了诸国山川风习、道里远近和王侯、户数人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古楼兰——鄯善王国地理位置与遗迹分布示意图
（选自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比例尺 1:7000000
0 70 140 210 公里

据同书同传记载，西汉时西域36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这些国家大的有几万人，小的只有几千人。其分布情况，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准噶尔盆地自东向西有蒲类、且弥、乌孙等，这里水草丰美，人们多半从事游牧业。在天山以南和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维语意为“无缰之马”）盆地区域，又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在天山南麓塔里木河之北自东向西有伊吾（今哈密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又分前、后部）、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温宿、尉头、疏勒（今新疆喀什）等较大的国家，是为北道诸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沿、昆仑山北麓，自东向西则有楼兰（后称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且末、若羌、小宛、戎卢、渠列、精绝、扜弥、于阗、皮山、乌秅、莎车等较大的国家，是为南道诸国。西域诸国以定居的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有氐、羌、塞、月氏、匈奴和少数汉族。人口合计大约30余万，龟兹人口最多，亦仅8万多人。大约在公元前176年以后，北道诸国皆臣服于匈奴，南道诸国亦受其控制。

根据塔里木盆地居民语言、人体头盖骨测量以及当地发掘出土之绘画、雕刻作品的研究，中外学者大都认为塔里木居民有操印欧语之雅利安人。《魏书·西域传》“于阗”条描写此地居民云：“自高昌以西，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深目高鼻”正是雅利安人的特征。汉代西域居民语言主要有三种，其一吐火罗语，流行于以龟兹、焉耆为中心的地区，又分龟兹和焉耆两种方言。其二于阗语，以于阗为中心。其三为粟特语，属伊朗语系。粟特即今中亚撒马尔干之古地名，粟特语

流行地区最广。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之西方系统，粟特语、于阗语则属印欧语系之东方系统，而于阗语为东方系统更为明显，几乎与伊朗波斯语完全相同。

雅利安人是欧洲十九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人的总称，从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的比较研究中推知，远古时在中亚一带曾有一个自称"雅利阿"（Arya）的部落集团，主要从事畜牧，善长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崇拜多神。公元前2000年至1000年，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流域，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还有一支迁入小亚细亚。自十八世纪欧洲语言学界发现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共同点后，即根据雅利阿这个名词造出雅利安语一词来概括这些有关的语言，现通称印欧语系语言。印欧语系雅利安人何时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尚难断言，但据近年考古可知，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已达新疆孔雀河流域至哈密盆地一线。

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中亚、西亚、南亚以及、高加索、黑海之北一带。据《汉书·西域传》记载：

>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大月氏迁徙居地已如上述。大宛，为亚里山大东征后所建，为中亚希腊化国家之一，西域人称希腊为Vavan，大宛意为大希

腊。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王治贵山城(今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卡散赛),属邑大小70余城。居民从事农牧业,盛产葡萄、苜蓿,以汗血马著名。商业也较发达。大夏(Bactria),音译巴克特里亚,也叫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中亚细亚希腊化古国。古希腊人称其居民为吐火罗,中国文献中则称其为大夏。大夏人原来居今甘肃河西地区,后西迁。地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今阿富汗北部)。本波斯帝国一行省,后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王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独立,狄奥多德(Diodotus)建国;都巴克特拉(Bactra),司马迁《史记》作蓝市城。公元前三世纪末至二世纪初国势强盛;领有北起阿姆河上游,南达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大宛和大夏都是远离匈奴不受其控制的西部国家。大宛势力较强,而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大夏本无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所以大月氏人迁居此地,很容易就征服了大夏。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在大宛的西北,东界乌孙,西达奄蔡,南接大月氏,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都在卑阗城。北部是游牧区,南部是农业区。南部城市较多,有五小王分治。安息在康居南,西与条支接,"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条支在今叙利亚,塞琉古王国国都安条克位于叙利亚境内,所以又称叙利亚王国,我国史书则以其国都而称之为条支。

从地理位置和交通上看,西域诸国又分当道和不当孔道两类,所谓当道即在出河西走廊之后西行主干道上必经之国,这是张骞通西域后根据汉使西行经行之路线所得的经验。这种概念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汉

书·西域传》则详记南北两道诸国，并明确区分不当孔道和当道之国。《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二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按照本传记载，其南道诸国，当道之国有鄯善、且末、精绝国、扜弥、渠勒（今新疆策勒南）、于阗、莎车、皮山、乌秅等国。而若羌"僻在西南，不当孔道"；小宛国（在今且末以南，已沦为沙漠）"东与若羌接，辟南不当道"；戎卢国（今新疆民丰县以南）"东与小宛、南与若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北道诸国皆为当道之国，有疏勒、尉头、乌孙、姑墨、乌垒、温宿、龟兹、渠犁、尉犁、危须、焉耆、乌贪訾离（今呼图壁南）、蒲类（今巴尔坤）、单桓（今乌鲁木齐以北）、车师前后部、捐毒等国。

从诸国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则又分为"土著"和"行国"两类，《史记》中已经使用了这两个概念。所谓土著即农耕民族，行国即游牧民族。按照《史记》的划分，大宛、大夏、条支、身毒为"土著"国家，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则是"行国"。汉朝欲拉拢大月氏和乌孙，共击匈奴，也是从他们皆为"行国"而考虑的，因为游牧民族可以随时迁徙。张骞向汉武帝建议，就说："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但汉人对西域形势的判断并不十分准确，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显然已与过去"随畜移徙"的生活不同，因此"自以远汉，殊无报

胡之心”。离开现在的居地，改变生活方式，从事“报胡”的战争，对于趋于定居的大月氏来说是太困难了。从政治关系上说，又分属都护国和不属都护国，这是汉于西域置都护以后的概念。属都护国即进入汉朝政治势力范围之国；不属都护国则被视为异域，皆在葱岭以西，《汉书·西域传》中皆指明之，如罽宾“不属都护”；而难兜国“与诸国同属罽宾”，诸国指罽宾附近之无雷、依耐、蒲犁、西夜等国。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等皆“不属都护”。

在汉朝即将开始对匈奴进行反攻时，从审问匈奴降人的口供中获悉，在敦煌、祁连山（当为敦薨、祁罗漫山）一带原来居住过一个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击而西迁，对匈奴恨之入骨，时刻想回来报仇。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匈奴破月氏王，（老上单于）以其头为饮器”。但月氏势单力薄，这个愿望不能实现。汉武帝为反击匈奴，乃募人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这件事发生在建元三年（前 138 年），在元光二年反击匈奴揭开序幕之前 4、5 年。当时月氏人在西域的情况如何，汉朝人是不清楚的，所以这次外交活动带有一定的探险性质。汉中人张骞应募远道出使。关于张骞出使西域，《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汉书·张骞传》有详细记载，是研究中亚史和古代中西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张骞（前 167？ －114 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东）人，他一生曾两次出使西域，是我国历史上开拓中西交通的伟大人物，是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旅行家。

第一次在建元三年（前 138 年）。张骞在汉武帝建元初年

为郎官。郎官是皇帝侍从官的通称，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始置，秦汉沿袭，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当武帝想派使者去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时，张骞以郎官应募任使者。建元三年，张骞一行100多人出陇西赴大月氏，经过匈奴控制的河西地区时被匈奴所获。单于不允许汉使过境，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张骞十余岁。张骞虽在匈奴娶妻生子，但始终未忘自己的使命，"持汉节不失"[8]。后与其属伺机脱逃，数十日至大宛。见其王，张骞以利相诱，得到了大宛国王的帮助，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康居本土在大宛西北，大月氏在大宛东南，往大月氏不经康居，张骞所经应为康居属土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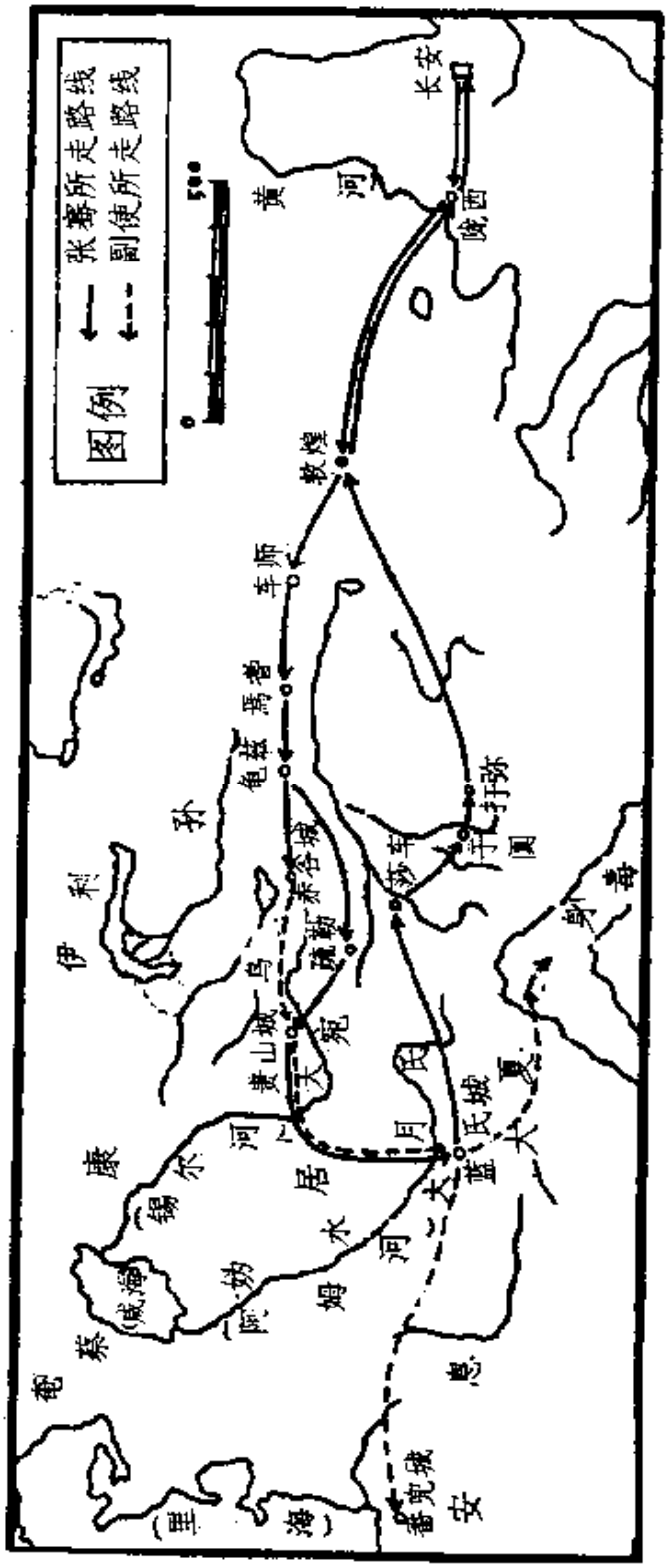
张骞向大月氏王陈述来意，表示愿意与之报杀父之仇。这时的大月氏已在妫水北岸定居，其社会生产已由游牧转为农耕，"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9]。张骞因而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张骞在臣属于月氏的大夏停留一年多后返回。他沿着南山（昆仑山）北麓前进，想经过羌人地区回国，却又被匈奴所俘，再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与胡妻及堂邑父一起回到长安。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汇报了西域的情况，被授以太中大夫，堂邑父被授予奉使君。

此次出使，从去至回13年，去时的100多人仅剩他和堂邑父两人。堂邑父是西域人，善骑射，困难时他射猎以为二人生计。张骞告诉武帝，他在大夏见到邛竹杖、蜀布等，大夏人言是

通过身毒贩来。由此可以推测从中国西南经身毒有可达大夏的道路。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南，寻找身毒国，由于当地部族的阻拦而未成功。

元朔六年（前 129 年），张骞任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熟悉地理环境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封为博望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在元狩四年（前 123 年）。元狩二年张骞为卫尉，与李广分道合击匈奴。张骞因为迟误军期，被夺爵免为庶人。元狩四年，卫青和霍去病两路进军漠北。匈奴在屡遭重创后向西北退却，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物力和汉朝对抗。武帝此时有意经营西域，数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国情况。张骞失侯，欲立功异域，于是建议联络乌孙，招引其返河西故地，既可“断匈奴右臂”，又能招徕大夏等国为外臣。武帝采纳了张骞的意见，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 300 人，马各 2 匹，“多持节副使”，携数万牛羊及价值数千万的金帛，出使乌孙。

由于匈奴浑邪王降汉，这时汉朝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因此张骞很顺利的到达了乌孙。乌孙国本已服属匈奴，其大臣都畏惧匈奴，又离汉太远，不知汉之大小虚实，不愿远徙。“王不能专制”。接着又遇到乌孙国发生内乱，乌孙王“不敢专约于骞”。于是张骞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扜弥、身毒及诸旁国，自己则离开乌孙返汉复命。乌孙派向导、通译送张骞，又遣数十人、马数十匹随张骞使汉，“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元鼎二年（前 115 年），张骞到长安，被授以大行，列于九卿，翌年卒。不久，他遣往各国的副使都陆续返汉，而且还大都有各国的使者随同前来。


图例
张骞所走路线
副使所走路线
长安
黄河
陇西
敦煌
车师
焉耆
龟兹
疏勒
乌孙
伊犁
大宛
康居
奄蔡
(咸海)
阿姆河
大月氏
大夏
安息
(里海)
于阗
罽宾
身毒

张骞通西域示意图

四 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意义

张骞出使西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原定的任务都没有完成，但对后来中西交通的开拓发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1)打破了由于匈奴强盛所造成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隔绝状态。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北游牧民族和绿州居民已经在开辟绿州之间的交通。由匈奴强盛而引发的大月氏、乌孙和塞人的西迁，其主要路线正是在绿州之路上。但是由于匈奴对西域的控制，阻塞了汉朝与西域的交往，隔绝了中原与西北各民族的联系。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北国始通于汉”，从而沟通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重新打开了由于匈奴的兴起而造成的中原与西域的隔绝状态，故《史记·大宛传》有“凿空”之说。裴骃《史记集解》引苏林云：“凿空，开通也”，“西域险远，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此后汉与西域各国的来往越来越频繁，除了文献上的大量记载之外，考古材料也有丰富内容加以说明。1990 年 10 月至 1992 年 12 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获得大量简牍和文物。所谓“置”，应劭《风俗通义》云：“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今吏邮督掾、府督掾掌此。”说明置乃为邮驿之所。据说简牍多达 23000 余枚，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就有 1900 枚，最早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最晚的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简文中有不少有关中西交通的史料。张德芳《悬泉汉简

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一文对这些简文进行了考释，他在全部悬泉汉简中检索出有关西域方面的资料360多条，皆为邮驿文书。当时汉与西域诸国使节往还，皆有遣使送客之通例，如《汉书·西域传》"罽宾"条引杜钦所说："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这些邮驿文书记述了主客方使团行经沿途诸处食宿供应各方面的情况，这种内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葱岭东西诸国的交往活动的认识。据张德芳的研究，这些简文涉及到的西域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24国，还有乌弋山离、罽宾等，几乎一些重要国家与汉王朝的来往，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诸如祭越、钧耆、折垣等过去未曾知晓的国家。大部分是有关汉使与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于阗、疏勒、精绝、扜弥诸国使者往还的内容。[10]据简文反映，彼此送往迎来，交往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西域间外交往来的盛况。

(2)促进了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虽然没有达到拉拢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但获得不少有关西域各国的知识，了解到西域各国都"利汉财物"，这为此后发展贸易关系打下了基础。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虽然主要是为了拉拢乌孙，"断匈奴右臂"，但其目的已经不如此单纯。他随行带那么多副使，而且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等国，不存在夹击匈奴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他第二次出使西域，除了谋求与乌孙建立反匈联盟的动机之

外,招西域诸国以为外臣,发展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和经贸关系也是其重要目的。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了解到西域各国对中国产品,特别是丝绸的喜爱和渴求,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所需要的西域各国的一些物产,汉与西域的贸易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据《史记·大宛传》记载,"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汉朝往西去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汉武帝的使者曾到达奄蔡(在黑海之北)、条支(今叙利亚)、犁靬(有人以为乃条支的一个港口)。这些汉使有时并非政治性使节,大多数则为商使或商队。

(3)张骞及其副使交通西域诸国,将沟通欧亚大陆、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商道连接起来,为发展此后的国际贸易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汉通西域,丝路西部的开拓要早于东部。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王大流士为了便于统治他的庞大帝国,便于调遣军队、传达政令和收取各地信息,大力修筑驿道。除了利用赫梯、亚述原有的驿道外,又增修许多新的驿道,以帝国四个首都为中心,形成通向四面八方的驿道网。大流士修筑的驿道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从苏撒直达小亚以弗所城的"御道";另一条自巴比伦而东至帝国边陲。后者横贯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而达大夏和印度。驿道沿途设驿站商馆,并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专备快马,信差传送急件逢站换骑,日夜兼程,可达古代最快的送信速度。从苏撒至以弗所城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公文日夜相传七日可到。为了保证驿道的畅通和安全,沿途各地险关要隘、大河渡口与沙漠边缘,皆修筑防御

工事，并派兵驻守。各行省总督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法律和秩序，收取税赋和向中央财政缴纳贡赋，执行国王的命令，维持皇家大道的安全。大流士修驿道主要为军政需要服务，但也便利了国际和国内商旅的流通，更使帝国境内各个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联接紧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希腊马其顿王死后在中亚、西亚立国的塞琉古王国曾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繁荣的大国，城镇林立，商业发达。塞琉古修筑和发展了波斯原有的驿道系统，使之成为重要的国际商道。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地中海岸边的海港塞琉西亚经首都安条克而达巴比伦附近的塞琉西亚，以此为商货的最大集散地而北通里海和高加索，南连波斯湾、阿拉伯，西则经巴勒斯坦而入埃及。另一条则是向东经伊朗、安息、大夏而达远东的商道，从大夏向南可折向印度，往北可越过帕米尔而到达中国。公元前三世纪后半期，大夏的希腊总督据地自立，安息也建立了本民族的王国，塞琉古的疆域局限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一带，但它开辟的连贯东西的商道却并不因此而中断。关于这条商道，法国汉学家莫尼克·玛雅尔说："在西方一侧，我们发现了奥古斯都（Auguste）时代的舆地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的描述，或者是生活在公元二世纪时的一位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托勒密（Ptolémée）在其《舆地书》（按：一译《地理志》）中的论述。从西方延伸而来的道路经过伊朗之后，又要经过木鹿城（Merv）和大夏都巴特拉（Bactre），通过经由犍陀罗（Gan dhāra）那自印度出发的道路而汇合在一起。接着便是颇难翻越的帕米尔高原，越过此高原之后便是当地的重要喀什噶尔站，来自古康居（索格

狄亚那,Sogdiane)和古大宛(费尔干纳,Ferghāna)的道路都要通达此城,也就是说位于萨马尔罕(Samarkand)和柘枝城(塔什干,Tachkent)等城市周围的富庶地区。"[11]与中亚、西亚早就存在的驿道系统相呼应,至秦汉时,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也发展起了自己的交通网络。秦始皇为了巡行各地,大修驰道,蒙恬所修自九原至甘泉的驰道长 1800 里。所谓驰道,《史记集解》引应劭云:"天子道也。"汉初贾山在所著《至言》中讲到秦朝的交通,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12]代秦而起的西汉继续发展了交通事业,《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中讲到武帝初的情形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贡献,羌棘贡献,东瓯入朝。"汉代的交通是以几个大都市如长安、洛阳、临淄、邯郸、蓟城、寿春、南阳、番禺等为中心,组成很繁密的交通网,全国各地四通八达。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东北与辽东、朝鲜及塞外诸民族交通贸易也很繁盛。而且汉时自京师至郡国,沿着主要的交通大道,都设有驿传、邮亭,以保证交通的高效、通畅和安全。当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汉使足迹到达中亚和西亚,特别是到达大夏和安息,这条贯通东西的丝路主干道便东西连接起来,《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乌孙,"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其副使所至之国为"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说明诸国皆"道可使使",即有路可通。当

汉使到达上述诸国，中国境内的交通网络通过自长安出发西行的路线与贯通中亚、西亚的古驿道系统便联接起来。这条路线被称为绿州之路，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商路。这条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新疆地区，越葱岭进入中亚地区，经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从而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进行交通。同时在丝路东端的长安和西端的罗马又向其周围扩散和辐射，从而将欧亚非三大洲各文明中心和商贸中心联接起来。

(4)张骞及其他汉使在出使途中向西域各国传播了汉朝的信息，返汉后则向朝廷介绍了西域各国的政治状况和风物民俗，从而加深了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认识。《史记·大宛传》云："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汉武帝因此了解到西域各国政治形势风俗物产，还了解到自西南至身毒、大夏当有路可通。张骞的报告被司马迁收入《史记·大宛列传》，此传反映了张骞归来和李广利伐大宛后汉朝对西域的认识水平。张骞及其副使带来各国使节，使西域各国具体了解到汉朝大国的情况。由于汉朝扩大了对西域的认识，因此不久就产生了有关西域地理山川的舆图。《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记载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条奏轮台屯田事，有"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之语。屯田有图，则军事上必更有图。《三国志·乌桓东夷传》注引《魏略》云："又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所谓旧图，当指汉代之西域图。此种图至鱼豢时

尚能得见。而且据“出琦石”三字，又可知图上并注明各国各地物产，说明此种图乃有便利出使西域的汉使进行贸易的导行性质。《汉书·李陵传》记载：“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同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语：“百闻不如一见，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据此学者推测，张骞及其副使，还有后来的班超、甘英等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历绘成西亚、中亚的地图。

(5)扩大了反匈联盟，为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新的条件。乌孙使者归国，通告了汉朝的情况，乌孙终于与汉通好。武帝两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乌孙王，与乌孙建立了“和亲”关系，共击匈奴。后来宣帝立汉外孙元贵弥为乌孙大昆靡(王号)，乌孙成为汉朝的盟友。张骞出使乌孙，“当时虽未达目的，而至宣帝时，则大收效果也”[13]。诚如有的学者指出，乌孙的向背，对于西汉最终战胜匈奴至关紧要。张骞使乌孙虽不得要领，却收效于日后，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没。

(6)张骞及其他汉使向沿途各国赠送了金帛，回来时又带回了西域各国赠送汉朝的礼品，带回了苜蓿、葡萄等种子在汉地种植。这些友好交往在汉朝和西域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史记·大宛列传》云：“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说明张骞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西域人民，赢得了西域人民的好感。当汉武帝遣使至安息时，“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大)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后来为

了取信西域各国人民，汉使皆以“博望侯”之号出使，“其后使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而且“人所赍操大仿博望侯”，也就是说像张骞一样携带赠送的礼品和交换的商品。张骞及其副使与西域各国人民建立的这种友好关系影响深远，直到东汉时，西域各国不堪忍受匈奴、莎车等国的欺压和奴役，都纷纷要求遣质子入汉，他们关心汉朝的动静，向往于臣属于汉。这与汉朝的友好政策和张骞等西汉以来的汉使给他们留下的良好印象有关。

(7)张骞坚忍不拔的精神、热爱祖国的民族气节和勇于开拓的气魄鼓舞了后世的人们。东汉时为开拓西域、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做出巨大贡献的班超，早年投笔慨叹：“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张骞、傅介子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14]所仰慕、所追求的就是张骞等人所建立的功业。

五　西域都护的设置与西汉经营西域的措施

经过汉武帝时对匈奴的反击，匈奴贵族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匈奴人民和其它被奴役的民族纷起反对匈奴贵族的统治，许多被奴役的少数民族脱离了匈奴贵族的统治，匈奴贵族集团内部也发生内讧。但是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仍很强大，这里仍然为匈奴僮仆都尉监领。自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使者相望于道”。但有些西域国家慑于匈奴的压力，故意刁难汉使，“非出金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几个位于交通要冲的国家，还常常“攻劫汉使”[15]，以兵阻道。

随着对匈奴反击的逐步深入，汉朝越来越认识到控制西域的重要性，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命赵破奴发兵击破车师，降服楼兰（其遗址在今新疆若羌一带，罗布泊西北）。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远征大宛取得胜利，西域震惧，多遣使者贡献。汉遂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亦名蒲昌海）设立亭障，又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渠犁（今新疆库尔勒）等处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保障汉与西域的交通要道，供应往来汉使。此后汉与匈奴对西域进行了长期争夺。

自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起至西汉末，匈奴贵族集团统治不断削弱，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也不断削弱，同时汉对西域的统治则越来越得到巩固。昭帝时匈奴统治集团矛盾加剧，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等往渠犁屯田，与匈奴争夺车师。郑吉攻占车师，以功升卫司马，使护鄯善（即楼兰）以西的西域南道诸国。鄯善即楼兰。昭帝时，楼兰曾联合匈奴，杀汉使官员，傅介子奉命以赏赐为名，携黄金锦绣赴楼兰，在宴席上刺杀楼兰王，立其弟尉屠耆（为质子在汉），改其国名为鄯善。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贵族分裂为南北两部，日逐王降汉，郑吉发兵迎之。汉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并护车师以西的西域北道诸国。因总领西域南北两道，故称西域都护。“都”即总领的意思。西域南北两道皆通，匈奴在西域的统治至此瓦解。汉之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僮仆都尉在西域的统治。至王莽篡汉，汉朝失去对西域的统治，连续80余年间，先后任都护者18人。应劭《汉官仪》下云：“西域都护，武皇帝始开通西域三十六

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国，置使者校尉以领护之。宣帝神爵三年，改曰都护，秩二千石。平帝时省都护，令戊己都护领之。”同书又云：“戊己，中央镇抚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16]西域都护府设于乌垒城（在今新疆轮台县东），职位略低于内地郡太守，秩比二千石。其职责是护卫汉朝与西域诸国往来的通道，为汉与西域诸国使节和商贾的相互往来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安全保障。西域都护代表汉朝，对西域各国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绶，调遣军队，征发粮草。从汉朝设置西域都护起，西域，包括北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正式归入汉朝版图，帕米尔以西以北的大宛、乌孙都在西域都护的管辖之下。西域都护的设立，显示了西汉对西域的牢固统治。

从汉元帝时，汉朝屯田车师，又在西域设戊己校尉，掌屯田事务。颜师古注《汉书》解释此职名含义云：“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作为西域镇抚机构，戊己校尉一方面接受西域都护指挥，一方面单独开府行事，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车师在今吐鲁番、鄯善一带，处丝路要冲，而且土地肥美，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于车师屯田，并置戊己校尉，加强对屯田的管理，对镇抚西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于西域置都护府、戊己校尉府等镇抚机构和长期经营西域，是其“事征四夷”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是“断匈奴右臂”和“通西域”。为了实现这种目的，汉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首先,和亲和联姻是孤立匈奴和拉拢反匈势力的一个手段。乌孙是西域大国,汉通乌孙以后,汉使西行多取道乌孙南境而前往大宛和大月氏等中亚各国,并远至安息、奄蔡、条支、身毒。为了巩固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汉妻以公主。武帝元封年间,乌孙王娶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汉与乌孙结下和亲关系,乌孙在汉朝最终击败匈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龟兹王绛宾妻乌孙公主女,并与公主女朝汉,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亦号公主,汉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绮珍凡数千万。汉与龟兹的联姻大大改善了彼此的关系。龟兹王和夫人在汉朝待了一年后回国,汉厚赠送之。此后数来朝贺。龟兹王在本国推行汉朝制度,"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羸也'。"[17]绛宾死,其子承德继立,自谓汉外孙,在汉成帝和哀帝时与汉来往频繁,汉遇之亦甚亲密。楼兰改名鄯善,汉朝立其质子尉屠耆为王,并以宫女妻之。汉与乌孙、龟兹、楼兰之间的联姻进一步密切了彼此间的关系。昭君出塞,对汉朝与匈奴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武力威胁和军事打击是巩固汉与西域各国政治关系的有力保证。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针对匈奴,征服匈奴是经营西域保证丝路通畅的前提,因此从武帝起,对匈奴进行了长期用兵。西汉时对西域用兵不多,但当西域一些国家杀害汉朝使者,直接妨碍西域交通时,汉朝则施以征伐,以扬国威,成为推进和维持丝路畅通必不可少的手段。武帝时伐楼兰、姑师、大宛,宣帝时伐龟兹、莎车,平帝时杀卑爰噮等,都对西域反汉势力和反

汉倾向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西汉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屯田驻军，也起到了镇抚作用。经营西域，必须遣使驻军，而道途险远，供应困难，屯田积粟便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采取的措施。西汉时自武帝起在西域开始驻军屯田，此后诸帝皆有开屯田之举。屯田之处多在当道要冲，如伊循、车师前后国、轮台、渠犁等地，起到了镇守与积粟的双重作用。汉朝在西域屯田，还起到扶植亲汉势力的作用。元凤四年(77 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更名其国为鄯善，立其弟尉屠耆为王，《汉书·西域传》记载，尉屠耆请求汉朝屯田伊循城，云："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朝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伊循以镇抚之。

第三，设郡筑城，驻军移民。汉武帝为了经营西域，保证丝路通畅，并隔绝匈奴与南羌的联系，先置金城郡(今兰州)为向西发展之基地。匈奴浑邪王降汉，又于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并派兵驻守。约十年后又增设张掖、敦煌二郡。敦煌为河西四郡最西一郡，成为汉代通向西域的门户。四郡之外，又修建长城。1904 年，斯坦因在河西考古，发现汉长城遗址，在敦煌西北。与长城、郡城相关的则是亭障烽燧、阳关和玉门关的修建。《史记·大宛传》记载，王恢、赵破奴破楼兰后，"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李广利伐大宛后，"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汉武帝时修玉门关，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在今敦煌西北小方盘城。阳关亦西汉时置，故址在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因在玉门关南，故称阳关，可知阳关的修建在玉门关之后。"两关"

同为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门户，出玉门关的为北道，出阳关的为南道。这些设施共同组成防御系统，保证经河西走廊进入西域道路的通畅。在汉朝企图联络大月氏、乌孙，以“断匈奴右臂”的同时，匈奴也谋求拉拢汉朝西部的羌族共同对付汉朝。《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以先零羌事对云：“（武帝）征和五年（88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武师将军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由引可知，匈奴拉拢羌人夹击汉朝的用意也很明显。汉朝在河西走廊及西域筑城屯田，也有破坏匈、羌联盟、孤立匈奴的打算。东汉时陈忠《议救西域疏》便说武帝“规敦煌、酒泉四郡，以隔绝南羌。”

第四，赂遗施惠。西域各国皆“利汉财物”，汉朝则利用其此种心理和需要，以汉之财物特别是丝绸相赠送以结好其统治者，从而达到联络的目的。张骞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张骞则告诉大宛王：“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为发导译。张骞出使乌孙，携金币绢帛价值“数千巨万”，目的便是“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大宛贵人蝉封立为王，汉则“赂赐以镇抚”。汉武帝巡狩海上，有外国客使相从，“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又如常惠赐乌孙贵人，张遵赐狂士，冯燎赐城郭诸国。细君嫁时，“赠送甚盛”。尉屠耆归国，绛宾来朝，皆有厚赐。此种赂遗赏赐，《汉书·西域传》有不少记载。

第五，纳质。对于愿意内属汉朝的西域各国，汉朝则希望和

要求他们遣子为质或入侍。对于汉朝来说，质子和侍子能够起到人质的作用，也是培养亲汉势力的机会。莎车王延元帝时曾入汉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返国为莎车王，立国参用汉之“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汉朝还曾以兵护送龟兹国侍子回国为王，以取代亲匈奴势力的旧王。

第六，以夷治夷。当西域有战事时，汉西域都护则调发诸国兵力进行征伐，如天汉二年，征和四年，地节二年击车师，冯奉世击莎车和常惠击龟兹等几次军事行动，皆曾调发诸国兵。一方面显示了汉朝对西域的牢固控制，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又节省军旅之费。汉朝还以授予诸国王侯以汉室印绶官号的方法，通过他们控制西域。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以后，宣帝甘露二年（前 51 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所杀。呼韩邪单于在汉朝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元帝竟宁元年（前 33 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与匈奴之间的军事冲突，恢复了旧日的和亲关系。此后半个多世纪，北方和西域呈现出和平景象，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记载，北部“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建国后在包头附近发现的汉末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字样的瓦当。瓦当即筒瓦之头，其上多有纹饰和文字，作为装饰之用，这种文字则有纪念意义。汉匈和好，汉对西域的控制，保证了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畅通。由于西汉王朝的多年经营，汉与西域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这种联系从此便未曾中断，只是不同时期形式

不同罢了。即便在王莽时代，西域各国开始发生叛离，而东汉也没有完全丧失控制权。天凤三年（16年）李崇等出使西域，西域诸国仍郊迎送兵、谷。

六 “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

古代中国通向西方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路，因传递大量的中国丝绸，而被称为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此说最早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的。1860年，李希霍芬曾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他曾七次到中国考察。在他自1877年起直到1912年陆续出版的五卷本巨著《中国》（China）第一卷中，在提到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他首次称之为“丝绸之路”（die Seidentrasse）。此说提出后得到一些欧洲汉学家的支持和阐发。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以及日本的“探险家”和“旅行者”如斯坦因（英）、斯文赫定（瑞典）、伯希和（法）、大谷光瑞、橘瑞超（日）、亨廷顿（美）等，陆续到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进行考察，找到古代中国与亚、非、欧各国交往的许多遗址和遗物，纷纷著书立说，证实和说明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存在和发展。此后，丝绸之路一名就为人们普遍认可，“丝绸之路”一名便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开来。至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mann）著《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China und Syrien）又将丝路的含义延伸到从中国通向更远的西方，此说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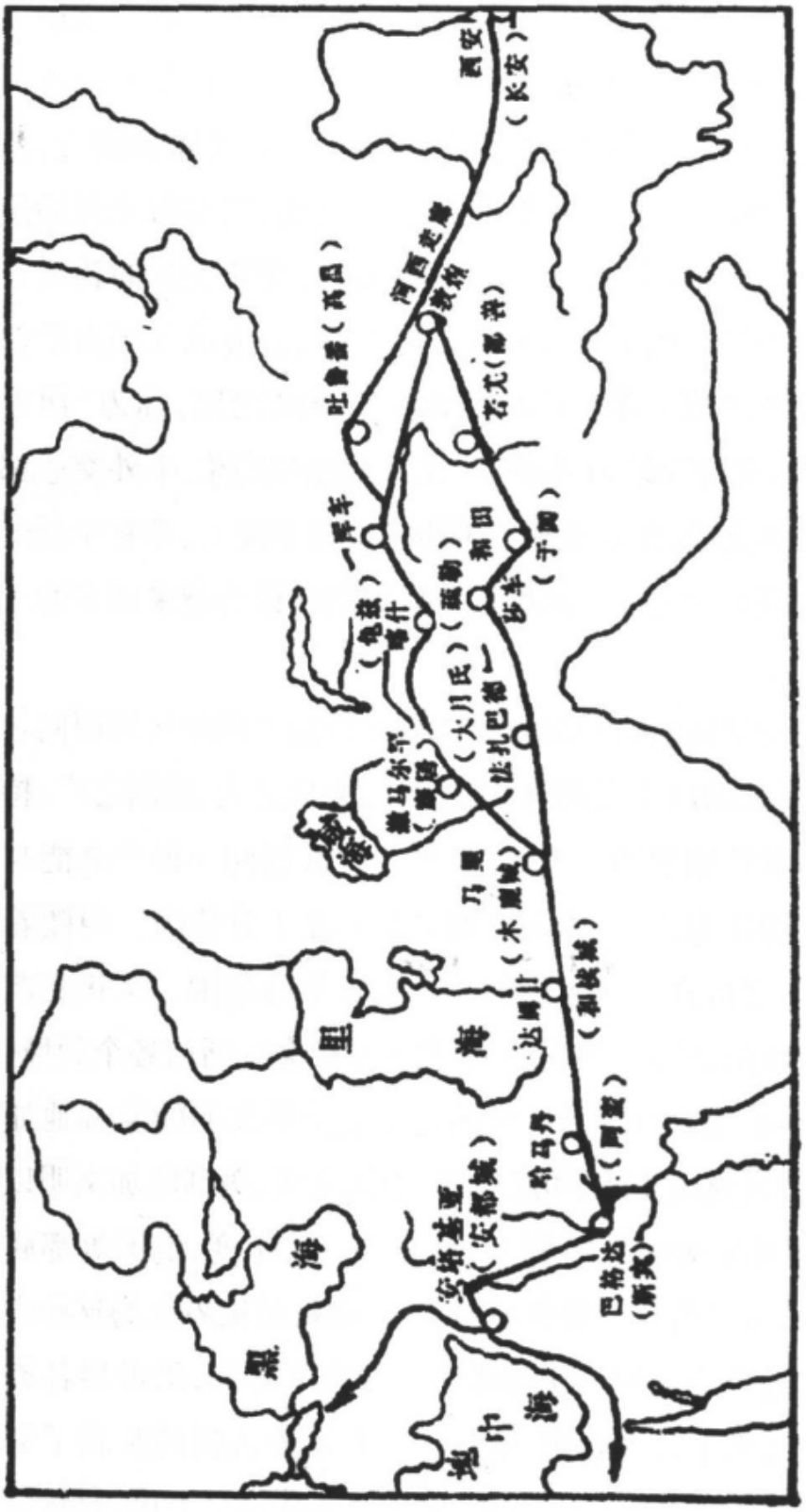
这条贯通欧亚大陆的古代交通道路，东起渭水流域，具体地说就是古都长安，并且向中国内地延伸。有时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都城的迁移，其东端也改变为其他地方，比如东汉时洛阳便成为丝路东端的起点和终点。从渭水流域向西，出陇西高原，经过河西走廊，分两路进入新疆地区。汉朝设立河西四郡，敦煌为西域门户，自敦煌西行，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北道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沿天山南麓西行，自玉门关西出，过白龙堆（罗布硷滩）至楼兰，经车师前王庭、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市），在此通过捐毒（今乌恰西北）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今撒马尔罕附近）南部西行，至奄蔡。南道经今新疆境内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通道，经楼兰（后改名鄯善）、且末（今且末南）、于阗、皮山（今皮山南），在莎车（今莎车县）以西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越葱岭，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喷赤河上游西至大月氏，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西行，至安息。两条路线会于木鹿城（今吐库曼斯坦马里），再向西经和椟城（今里海东南，伊朗达姆甘附近）、阿蛮（今伊朗哈马丹）、斯宾（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今叙利亚地中海东岸。

南北两道在葱岭东西都有不少支线互相交通，如于阗虽为南道当道之国，而“南与若羌接，北与姑墨接”，姑墨为北道之国。皮山“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南与天笃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大宛“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而自康居西北通奄蔡，

向南可至大月氏，西南则通安息。除了上述南北两道之外，在新疆境内还有两条经常为人所利用的交通干线，一条出玉门关后向西南行至伊循，南行至若羌、小宛、戎卢、渠勒至疏勒。另一条则从敦煌向北到伊吾，北越天山，至蒲类，由此西向沿博格多山北麓到车师后王国（今吉木萨尔），经卑陆（今阜康县东）、单桓、乌贪訾离，西出特克斯河至乌孙。从新疆往葱岭以西的中亚以及更远地区的国际通道，南道又有一线从皮山西南经乌秅、悬度（特鲁以东）、至罽宾（查萨达），出开伯尔隘口后经过喀布尔，西南到达乌弋山离（亚历山大·普洛夫达西亚）。据《汉书·西域传上》，“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继续前行则经伊朗南道可以转北而东到安息国都。北道亦有一线，由温宿西北越过别迭里隘口（勃达岭）到赤谷城，经都赖水（塔拉斯河）通康居，由康居所在的河中地区（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地带）南下，又可至大月氏和安息。这些国际通道通过中亚延伸至西亚、地中海东部利凡特工商城市和欧洲，甚至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也发生贸易联系。

通常所说丝绸之路指的就是这条从古代长安通向地中海东岸的经由沙漠和绿州的道路。这条道路绵亘数千里，两千多年间是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它不仅是贸易路，也是古代世界文化交流的道路，对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对古代中西间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把丝绸之路的名称沿用到东西交通的欧亚草原之路和经由中国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而至欧洲的海道。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年）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提出：“丝路有



丝绸之路示意图（选自陈良著《丝绸史话》）

海陆两道”。其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与香港学者饶宗颐对海上丝绸之路又进行研究。三杉隆敏著有《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多年从事海上丝路的研究，出版有《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论文集，则将海上丝路进一步扩大，凡经过海上交通与海外各国进行交往交流的路线皆可称为海上丝路。近年来又有人把从四川、云南出发经由缅甸至印度和经由西藏至印度的道路也称为丝绸之路，称为“西南丝路”、“中印藏道”或“吐蕃路”。无论海路和陆路，中外交通都有一些主线和支线，在这些形成网络的交通干线上，都有中国丝绸外运的记载和遗迹。因此称之为丝路的认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中西交通的陆路和海路是以向外传播中国的丝绸而闻名于世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经销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和影响之深远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能与中国的丝绸相比肩，因而称为丝绸之路确是十分恰当。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丝绸贸易的范围。文化交流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丝绸之路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美洲印加文明以及各世界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中国等都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沟通世界各地的交通网络，使世界上的这些古老文明通过这个交通网络互相传播而放出了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世界各地人民的互相了解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丝绸之路从狭义上讲，是物质与

文化交流之路；而从广义上讲，则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18]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则为古代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注　释

〔1〕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载《西域研究》1997 年第 1 期。

〔2〕大月氏西迁时间及路线，国内外学者多有考证和论述。参桑原实造《东西方交流论文集》，1933 年；藤田丰桥《月氏的原住地及其西迁的日期》，载《东洋学报》第 6 卷，1916 年 10 月；安间矢一郎《论月氏西迁》，载《史学杂志》第 43 卷，1932 年 5 月，第 657－669 页；G. 哈楼恩《关于月氏的问题》，载《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第 91 卷；J. E. 范·洛惠泽恩－德·黎乌著、许建英等译《斯基泰时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24－25 页，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70－86 页。

〔3〕晁错《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上书言兵事》，《全汉文》卷十八。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 年。

〔4〕李颀《古从军行》，《全唐诗》卷一三三。

〔5〕《汉书·食货志》。

〔6〕《史记·赵世家》。

〔7〕《汉书·张骞传》。

〔8〕《史记·大宛传》。

〔9〕《史记·大宛传》。

〔10〕《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汇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2002 年,未刊。

〔11〕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 年,23 页。

〔12〕《汉书·贾山传》。

〔13〕前揭张星烺《中西交通史》(第五册),13 页。

〔14〕《后汉书·班超传》。

〔15〕《史记·大宛传》。

〔16〕《全后汉文》卷三十五,前揭严可均书。

〔17〕《汉书·西域传》。

〔18〕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见《中外美术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第三章　东汉对西域丝路的经营

东汉建立，汉与匈奴的斗争没有结束，东汉王朝与匈奴间围绕丝路控制权进行了长期的争夺。为了解除匈奴对西北边境地区的进扰，保证汉与西域以及葱岭以西诸国的交往和贸易正常进行，东汉对西域进行了苦心经营。由于西域和东汉王朝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这种经营出现过许多反复，但这种斗争对促进丝路贸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　西域的三绝三通

从王莽时起，北匈奴与汉在西域进行了长期较量。在这一过程中，西域丝路曾三绝三通。《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云："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建武是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延光是安帝的年号。东汉时西域的绝通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斗争，东汉经营西域的目的主要是制匈奴，保全河西和保证西域丝路的通畅。

西汉末年，王莽辅政，对周边各民族采取歧视和压迫政策。他命令匈奴囊知牙斯单于改名为"知"，以表示景慕他辅政后的"太平圣制"。称帝后，他派专使收回汉朝颁发给单于的"玺"，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又派人到边境招降呼韩邪单于诸

子，各封为单于，对匈奴实施分化，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这些引起匈奴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汉匈关系的破裂。始建国三年(11年)，王莽一边下令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这种带侮辱性和轻蔑性的称号，一边又大发北方各郡国及乌桓、鲜卑等十二部兵，由十二将率领，分路进攻匈奴，结果遭到匈奴的坚决反击而惨败。王莽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德，特派五威将军王奇等向边疆少数民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印绶，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尽改为候，引起了各族的普遍不满，西域各国纷起反抗。这样西汉以来中央政权和西北各民族之间形成的臣属关系陷于瓦解，汉之西域都护被驱逐，西域丝路遂绝。

西域各国受匈奴控制，匈奴向西域各国勒索苛重的赋税，进行极其暴虐的统治。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阻断了中西交通的大道，给西域和汉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东汉建立，西域各国遣送质子，请求东汉王朝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但光武帝感到无力经营西域，送回质子，于是西域陷于混乱，互相攻伐，强弱兼并。《后汉书·西域传》云：“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呰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又一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服于汉，逐渐内迁汉境，北匈奴退居漠北。

由于南匈奴的降汉，原来依附于匈奴的乌桓、鲜卑等也随之归附东汉。这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北匈奴与汉朝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其最必须的粮食、布匹、食盐等日常生活品的获得十分困难，因此北匈奴不断寇扰东汉缘边郡县。明帝永平年间，匈

奴胁迫诸国共寇河西，致使“郡县城门昼闭”[1]。于是，东汉王朝开始对北匈奴进行反击。永平十五年(72 年)，东汉应西域各国之请，命窦固、耿秉出屯武威，北伐匈奴，取伊吾卢地，于此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第二年，东汉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恢复了西域各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此为第一次复通。

永平十八年(75 年)，汉明帝死，匈奴乘机反攻西域。几个亲匈奴国家如焉耆、龟兹等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匈奴、车师出兵围汉戊己校尉，东汉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东汉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建初二年(77 年)，又罢伊吾屯田，匈奴则进兵屯伊吾。此时班超尚留于阗，绥集诸国。至和帝永元元年(89 年)，东汉再次经营西域，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第二年窦宪又派副校尉阎槃率骑兵二千余进击伊吾，破匈奴，收复伊吾。永元三年，班超定西域，朝廷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屯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侯屯车师后部。永元五年，班超又击破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更远的西域国家条支、安息等，直至地中海沿岸诸国，皆重译贡献。永元九年，班超遣其掾甘英西使大秦，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甘英所至，“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2]，中西交通形成了一次空前的盛况。此为西域第二次复通。甘英所至西海，历来说法不一，有云地中海，有云黑海，有云波斯湾。据《史记·大宛传》记载，西汉时汉使已到地中海和黑海东岸，此云“前世所不至，山经所

未详”，而且又为安息人所阻，则知甘英所去之方向为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所临之西海乃波斯湾。汉代史籍已称印度以西之波斯湾、红海和阿拉伯海海面为西海。

和帝死，接替班超为西域都护的任尚失和于西域各国，诸国背叛，攻围任尚等。朝廷以西域险远，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此后十余年间，北匈奴乘机收复诸国为属国，共同寇扰汉之边境地区。安帝元初六年（119 年），为了防御北匈奴和西域诸国的侵扰，敦煌太守曹宗派行长史索班率千余人屯伊吾，招抚西域诸国，车师前王和鄯善王前来降附。但几个月后，北匈奴又率车师后部共攻伊吾，击没索班等，赶走车师前王，进逼鄯善。鄯善求救于曹宗，曹宗欲报索班之耻，并进取西域，请出兵击匈奴，但朝廷不许，仅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部营兵 300 人羁縻之。其后北匈奴与车师连兵，入寇河西，朝廷无奈，有人甚至建议关闭玉门关和阳关，放弃西域。延光二年（123 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引起朝廷关于经营西域的争议。安帝采纳了尚书陈忠的意见，决心于敦煌置校尉，并增河西四郡屯兵，震怖匈奴，重新招抚西域诸国。乃以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统兵西屯柳中，破平车师，实现了西域的第三次复通。顺帝永建二年（127 年），班勇又击降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西域 17 国皆附从汉朝。但乌孙、葱岭以西仍不得通。永建六年，顺帝又令于伊吾屯田，并置伊吾司马一人。

顺帝阳嘉以后，东汉朝廷在西域日益丧失威信，西域诸国对汉朝则日益骄慢，相互攻伐。桓帝元嘉二年（152 年），西域长史王敬被于阗攻杀。永兴元年（153 年），车师后王反攻东汉屯营，

自此日以疏慢。随着中原战乱，东汉终于丧失对西域的控制权。

东汉经营西域在方法和策略上与西汉大同小异，东汉没有重复联姻和亲的形式，但在屯田、武力威胁、纳质、施惠赂遗和以夷治夷等方面则和西汉相同。东汉通过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的设置对西域进行控制，但与西汉不同的是，自安帝永初以后，不再置都护，而以西域长史代行其事。后来更以西域长史秉命于敦煌太守，乃至凉州刺史。

二　班超父子在复通西域中的贡献

永平十六年(73 年)，明帝令窦固为奉车都尉，屯兵武威，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班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使西域，开始他长达 31 年为经营西域而英勇奋斗的事业。

班超(32－102 年)字仲升，东汉扶风平陵人，班彪少子。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 年)，班彪人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幕府任从事，班超就是在河西出生的。建武十二年(36 年)班彪随窦融入朝奏事，班超也随父东归。父卒后，明帝永平五年(62 年)，班超兄班固被召入朝任校书郎，班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为官府抄书以养母，曾投笔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他旁边一起抄书的人都笑他。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来，明帝因班固的原因，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但不久又因事免官。

奉车都尉窦固屯兵武威，班超参加了窦固的军队，被任命为假司马。窦固命他"将兵别击伊吾"，他率兵与匈奴战于蒲类

海,攻占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多斩首虏而还"。于是窦固在这里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戍守,同时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窦固发现班超有才能,就派他和从事郭恂出使西域。班超肩负着招抚诸国恢复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的使命,率领36人出使。班超使团先是联络南道诸国,即塔里木盆地南边通葱岭的沿路诸国。他们首先到了鄯善(在今新疆罗布泊东南),这是受匈奴控制的小国。使团初至,鄯善王广十分礼敬,后来突然疏懈下来。班超判断匈奴有使者来,通过诈唬"侍胡"得知,果然北匈奴使团100多人来到,鄯善王莫知所从。班超与随行36人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因夜火攻,一举袭杀北匈奴使者,鄯善为之震服,"纳子为质"。窦固将其功表奏朝廷,班固受到明帝的称许。

明帝任命班超为军司马,命再使西域。班超仍将本所领30余人从南道西行,至于阗。于阗乃西域大国,"新攻破莎车","雄张南道"。莎车是一个亲汉的国家,国王延在汉元帝时为侍子,在长安长大,因此仰慕汉朝文化。当汉匈关系破裂,许多西域国家依附于匈奴时,延却联合了南道一些小国与北匈奴对抗,并保护了汉西域都护及吏士家属千余人。东汉王朝刚刚建立,莎车王康就遣使至河西,问中原动静,表示思慕汉家。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五十五国。后来,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先后遣使朝贡,或选派侍子,请求东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光武帝送还质子,西域遂陷入混乱状态,各种势力互相兼并攻杀。莎车与于阗都是南道大国,两强相争,莎车先胜后败。此时于阗势力正盛,但为匈

奴所败，故服属匈奴。匈奴遣使监护其国。班超等至，于阗王广德"礼意甚疏"。其俗信巫，巫师传达天神的旨意，说与汉通好，天神发怒。天神知道汉使有騧马（黑嘴黄马），要"急求取以祠我"。班超识破诡计，却一口答应，要巫师亲自来取。巫师一到，班超就把他杀了。然后提着巫师的头去见广德，责备广德的敌视行为，广德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击灭匈奴使团的事，对班超心存畏惧，于是杀掉了匈奴的监护使者，与汉通好。班超重赐于阗王以下，因镇抚之。由于于阗降汉，绿洲路南道重新沟通。

此时北道诸国尚在匈奴势力控制之下。永平十七年（74年）春，班超率众北上，至疏勒（今新疆喀什）。疏勒此时为龟兹征服，龟兹王建乃匈奴所立，依恃匈奴的势力称雄北道。他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班超至疏勒，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先派属员田虑去劝降，班超向田虑交代："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田虑来到槃橐城，兜题见田虑人少势弱，殊无降意。田虑趁他不加防备，上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田虑派人快马通报班超，班超立即赶来，把疏勒将吏全部召来，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之子忠为王，疏勒人大为喜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班超不听，欲示以威信，放走了他。疏勒因此与龟兹结怨，班超驻守疏勒。这一年，窦固等在天山东麓向匈奴大举反攻，击破匈奴，平定车师前后部，北道遂通，西域局势稳定下来，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这标志着汉对西域的控制重新确立。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崩，北匈奴乘机反攻西域。焉

耆、龟兹等亲匈奴诸国攻杀汉西域都护陈睦，西域交通又绝。汉援兵不至，班超在疏勒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多次发兵攻疏勒，班超守槃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章帝即位，以陈睦新没，班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班超返朝，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西域。建初元年(76 年)，朝廷诏令撤消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令班超还朝。班超启程出发，疏勒举国忧恐，怕又被龟兹灭掉，其都尉黎弇自刭。当他们到于阗时，于阗王侯皆号泣挽留，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他们抱住班超坐骑的马脚，班超不得行，又“欲遂本志”，就又返回疏勒。疏勒已降龟兹，并与尉头国连兵。班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 600 余人，疏勒复安。

建初三年(78 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诸国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 700 余人。班超想乘胜平定西域，上疏请兵，曰：

> 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

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葱岭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由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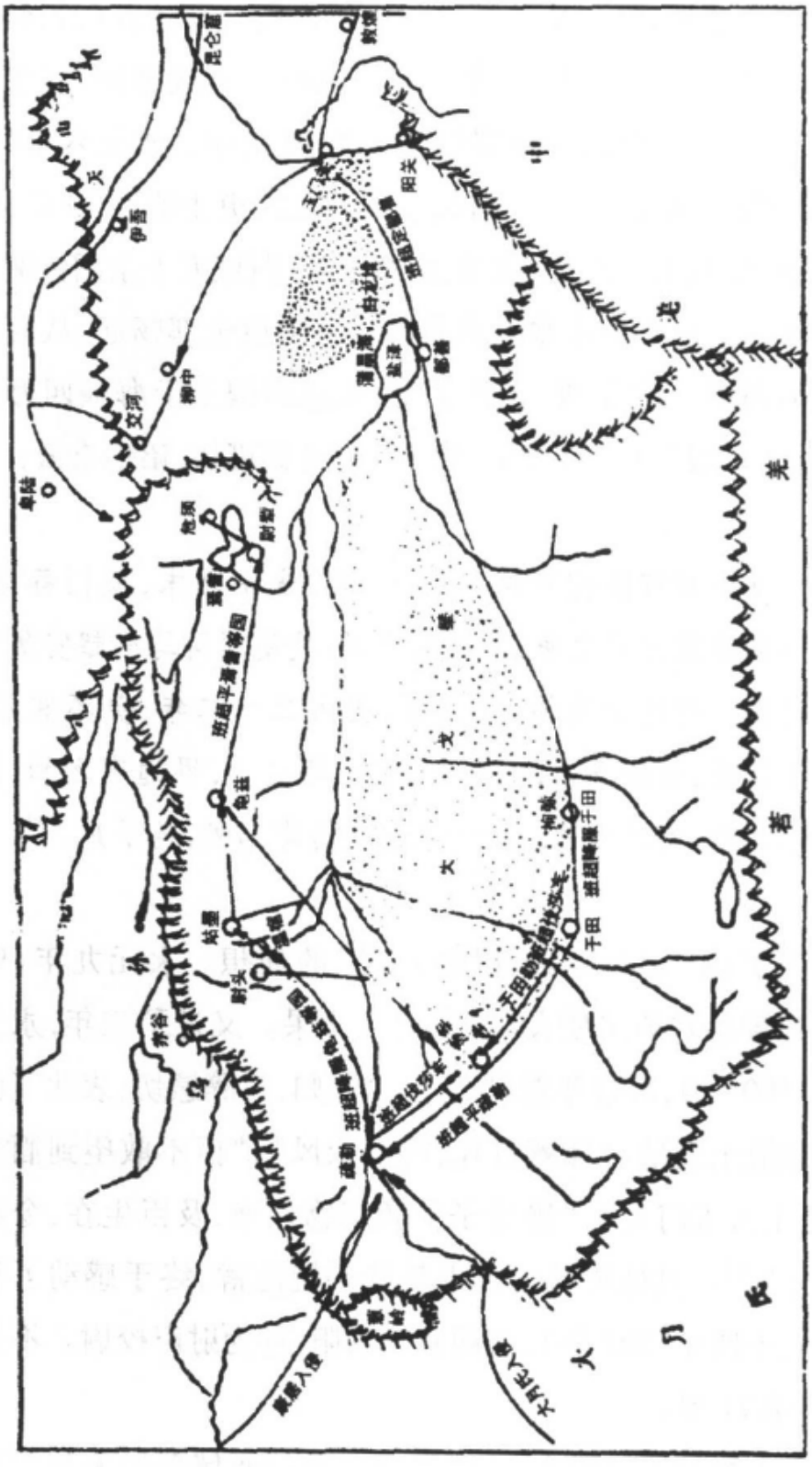
此疏详细分析了西域形势，陈述了经营西域的战略和策略，并表达了个人献身复通西域事业的愿望和决心。朝廷知道班超有把握取得胜利，建初五年，遣假司马徐干领兵千人增援班超。莎车以为汉朝不会出兵，降于龟兹，疏勒也发生了都尉番辰的反叛。徐干领兵至，与班超会合，大破番辰，斩千余人。班超欲借助乌孙的兵力以平龟兹，上疏朝廷请遣使招慰。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遣使结好乌孙。建初八年(83 年)，班超被任命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干为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李邑向朝廷谗毁班超，受到章帝的斥责。《后汉书·班超传》记载：

李邑始到于阗，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

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

班超遣李邑护送乌孙侍子回朝,第二年,朝廷派和恭等率兵八百增援,班超调发疏勒、于阗兵击莎车。莎车以重利诱疏勒王忠反叛,忠据乌即城,班超则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发疏勒国不反者攻忠,半年不能下,康居又遣兵救疏勒。当时康居刚与月氏通婚,班超派人出使月氏,赠月氏王大量锦帛,月氏王劝康居王罢兵,班超则捉忠回疏勒国都。三年后,忠又向康居借兵,出居损中城,暗中与龟兹结谋,向班超诈降,班超将计就计,擒杀忠,击破其众。章和元年(87年),班超发于阗等国兵二万五千人击莎车。龟兹则遣将发温宿、尉头、姑墨等国兵五万人救之。班超采取骄兵之计,引龟兹王、温宿王各领兵出莎车,班超等奇兵突袭,击降莎车,各国援兵奔散。"自是威震西域","南道于是遂通"。

永元二年(90年),发生葱岭以西大月氏东侵。这时西迁的大月氏建立起强大的贵霜王朝。大月氏贵霜王曾助汉攻车师,这一年贵霜王"贡奉珍宝、符拔(羚羊一类的珍奇动物)、师子(即狮子)",效乌孙国求娶汉公主[4],遭到了班超的拒绝,因而引起了大月氏王的怨恨。大月氏王遣副王谢(Kshatrap)率兵七万,越过葱岭进攻班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班超坚壁清野,又派兵邀击其向龟兹求援的使团,尽杀之,遮断其与龟兹的联络。谢粮尽援绝,遣使请罪撤兵。大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5]。和帝永元三年(91年),大将军窦宪连破北匈奴,北匈



班超通西域示意图（据陈良著《丝路史话》，略有改动）

奴主力向西迁徙,西域基本解除了匈奴的威胁。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龟兹、姑墨、温宿皆降。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居于龟兹,改立龟兹王。至此西域都护已中断70余年。永元六年(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及汉吏士贾客1400人,大破焉耆,斩其王。焉耆、危须、尉犁皆降,西域五十余国皆遣质子内属于汉。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的丝路主道全部畅通,从而实现了西域的第二次复通。"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6]。第二年,和帝下诏褒奖班超,诏书有云:

> 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重元元之命,悼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以西。超遂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缓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7]

班超实现了他"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理想。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未果。又过了三年,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年老思乡,上书迄归,言辞恳切,表达了强烈的眷恋故土之情:"狐死首丘,代马依风";"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8]。其妹班昭也上书替他委婉陈辞,终于感动了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不久病卒,终年71岁。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继班超之后的西域都护失和于西

域诸国。与班超交代者是戊己校尉任尚，他赴任前曾去拜访班超，请教治理西域的经验。班超指出其“性严急”的缺点，教以“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的原则，任尚不以为然。结果，“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诫”。汉安帝以班超的少子班勇为军司马，出敦煌迎回都护及屯田士兵。汉“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9]。北匈奴余部与车师后部的势力及于天山东部，且屡次侵扰河西。

安帝延光二年（123 年）夏，东汉朝廷就西域的经营抑或弃置进行过反复辩论，终于采纳班勇的建议，重新经营西域。朝廷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 500 人，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第二年正月，班勇到楼兰，奖励归附于汉的鄯善王，并以恩信开导龟兹、姑墨、温宿等国，使之降附。随后班勇又发诸国兵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北匈奴伊蠡王，收复车师前部。延光四年（125 年）秋，班勇率军大破车师后部，杀其王军就，报索班之耻。顺帝永建元年（126 年），立车师后部王之子特奴为王，又击斩东且弥王，更立其种人为王，车师前后部由此得到安定。这年冬天，班勇发诸国兵出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远遁，其众二万余人投降。经过班勇多次军事上的打击，匈奴单于逃至枯梧河边，此后“车师无复虏迹”。永建二年，班勇率军与敦煌太守张朗分道合击焉耆，约期会师。张朗急于邀功，先期赶到焉耆，焉耆降。实现了西域的第三次复通。然而班勇却因晚至而获罪，征还下狱，免刑，后卒于家。

班勇熟谙西域道里、风情和政治状况，曾在安帝末年著有《西域记》一书，记载西域事甚详，此书已佚。范晔撰《后汉书·

西域传》主要依据其材料，所以他说："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

东汉时，西域丝道三绝三通，班超、班勇父子在复通西域的过程中，建有卓越功绩。由于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稳定了西域的局势，进一步加强了中原和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通向中亚、西亚以至远达欧洲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从而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继续发展。东汉时由于建都于洛阳，因而丝绸之路的东端延伸至此，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十分繁盛，葱岭以西诸国与汉交往频繁，各交通要道商贾车牛，动辄以千计。《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元和二年(85 年)二月丙子诏书云："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勋。……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岭以西，冒耏之类，跋涉悬度，陵践阻绝，骏奔郊畤，咸来助祭。"《字书》曰："耏，多须貌，音而。"注云："言须鬓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冒而(须)长，故举以为言也。"诸胡助祭反映的是当时中外交往的扩大和汉朝国际地位的提高。

三　匈奴的破灭和西迁

匈奴西迁，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不仅仅是东汉一个朝代的事，而是前后延续三百多年的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这件事是从东汉开始的，而且与东汉与匈奴的斗争和对西域的经营直接有关。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 年)，东汉王朝开始对北匈奴大举

反击。这一年，朝廷遣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获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向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至汉章帝时，北匈奴日见穷蹙，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北匈奴内部离叛，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和帝永元元年（89 年），东汉大将军窦宪、耿秉等会合南匈奴进攻北匈奴，大战于稽落山，连战皆捷。追击到私渠北鞮海，降者 20 余万人，北单于逃向乌孙，汉军勒铭燕然山而还。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它标志着匈奴被汉朝彻底击溃，汉匈对抗达数百年之久，以匈奴的最终失败而告终。从永元三年（91 年）起，匈奴有一部分便开始向西迁徙，匈奴余部大部分并属于鲜卑，一部分留在漠北西北隅，到五世纪时为柔然吞并；另一部分留在天山以北，又持续活动了 60 多年。

根据对汉文文献记载的研究，西迁的匈奴先抵达伊犁河上游、特克斯河和纳伦河流域，又进至费尔干纳盆地，又到康居的居地，大致在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以后的情况，汉文文献失载。北匈奴的行踪，中国史书记至东汉末年（151 年），以后未再有纪年史事。另据西文文献记载，在四世纪下半叶，亦即中国东晋十六国时期，匈人（Huns）出现在里海以北，也就是说，在时间上和汉文文献记载匈奴人的最后活动相距 200 年左右，在空间上从咸海到里海以北这个区域匈奴人的活动，历史上是一个空白，其间匈奴人的踪迹要靠后来的考古资料加以说明。这期间这部分匈奴人在失去了原来活动的地区后继续西迁，他们不能沿当年月氏人西迁的路线活动，因为他们无力与中亚的贵霜王

朝和西亚的安息王朝对抗，他们大概只能顺着过去斯基泰人流动的辽阔草原逐水草而居。据西文文献记载，西迁的匈奴人于371年（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向西击败居住在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阿兰人（即奄蔡人，魏晋时称阿兰人），迫使阿兰人西迁，从而引起草原民族的大迁移。阿兰人向西进攻东哥特人，其中一支则与汪达尔人一道西迁，于409年进入西班牙，建立汪达尔—阿兰王国。374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匈奴人越过顿河，征服了东哥特人；进而渡过德聂斯特河，击败西哥特人，迫使部分西哥特人迁往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他们受到罗马统治者的压迫而被迫起义，加剧了罗马帝国的动荡局势。

五世纪初，匈奴人占领以班诺尼亚（Pannonia）为中心的中欧一带，后由其首领阿提拉（434－453年）建立匈人帝国。阿提拉时是匈人最强盛的时期，疆域东起里海，西至莱茵河，北达波罗的海，南及多瑙河。匈人曾进攻东罗马帝国，迫其纳贡；又进攻西罗马帝国，促其衰亡。451年，沙隆之战失败；453年，阿提拉死，诸子内讧。454年（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日耳曼人重创匈军，匈人帝国瓦解。匈人的主体返回里海北部，一部分留在班诺尼亚，与后来的马扎尔（Maggars）人相融合，形成匈牙利民族。

匈人在欧洲的活动，前后有80余年，不仅震慑了整个欧洲，而且引起一系列民族迁徙，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刘应（C. Visdelou）、宋君荣（A. Gaubil）最早提出匈奴、匈人同族说，但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论据。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二十—

至二十六年，1756—1758），法国学者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著《匈奴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全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des Mongols）详细论述了由匈奴人而产生了匈人（Huni）的观点，从此“匈人是否匈奴人”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探讨的世界性课题，历时已两个多世纪。德经的说法得到许多人赞成，而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十九世纪，德国学者夏德信从德经的观点，在他所著的《伏尔加河匈人与匈奴》一文中，根据中国史料，进一步论证了德经的观点。此后，不少人又根据欧洲史料进行论证，后来又有人利用中亚史料即所谓粟特文书进行研究。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学者们运用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多种资料和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说明在匈人和匈奴人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和不等号。比较稳妥地结论是：匈人的出现与北匈奴的西迁有明显的关系，西迁的北匈奴人是匈人的主要族源之一。以为罗马帝国之亡是由于匈奴人西侵造成的，是以部分代全体，因为罗马帝国之亡，原因很多。但认为罗马的灭亡，曾受到匈奴西侵的某些影响，还是有根据的。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与有关匈奴人活跃的年代和迁徙路线的遗址文物的考察，可以认为，匈奴人最初之文化乃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后来受秦、汉文化影响越来越深，汉化程度很深。

吕思勉研究古代文献记载，认为匈奴政教风俗，与中土相类者极多。匈奴自古以来与汉族杂居黄河流域，其渐染汉族文化之深，固无足怪。汉族敬天而尊祖，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风俗云：“岁正月，诸少长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

祭其先、天地、鬼神。"《后汉书》称其俗有三龙祠，尝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匈奴围汉高祖于平城，其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騋，北方尽骊，南方尽骍。月尚戊己，祭天神以戊日。这正是中国五行干支之说。其俗又信巫，单于听巫之言，诛贰师以祠；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汉军。单于遗汉朝皇帝衣裘，常使巫祸祝之，此皆汉之古俗。匈奴称其君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意即"天"，"孤涂"意即"子"；老上单于自称"天之所生"，狐鹿姑遗汉书，云："胡者，天之骄子。"则汉人称皇帝为"天子"，感天而生之说，亦为匈奴所习闻。永光元年，汉使韩昌、张猛与匈奴盟约，俨然古代束牲载书之辞。匈奴之俗虽与秦汉习俗多所不同，而与夏商之世则极相类，如"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数百人。"[10]

从匈奴人使用的文字来看，也可知匈奴汉化之深。匈奴征服西域在汉文帝三、四年之前，在此之前，匈奴人早与中原书疏相往还。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牍，及封印，皆令广长大，说明他们的书写工具与汉族相同。匈奴与汉朝书疏往还之文字，并没有说出于译人之润饰，说明匈奴使用的文字亦与汉人相同。据《一切经音义》，"匈奴谓引弓曰控弦"，可知匈奴之语与汉族相同。王国维《观堂集林》有《匈奴相邦印跋》，指出："匈奴相邦玉印藏皖中黄氏，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当是战国秦汉之物。考六国执政，均称相邦。秦有相邦吕不韦，见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见剑文。今观此印，知匈奴亦然。史作相国，盖避汉高帝讳改。《史记·大将军骠骑列传》，屡言获匈奴相国都尉。而《匈奴列传》记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贤王以下二

十四长，而不举其目。又言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十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相封即相邦。易邦为封，亦避高帝讳耳。”这都可作为匈奴与汉族同文之证。

汉朝对匈奴有意施行汉化政策，汉初娄敬说刘邦与匈奴和亲便有此意，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11]随着汉朝与匈奴的和亲和通市，匈奴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匈奴人非常喜欢汉朝的东西，“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来自汉地的酒为其珍重如此。汉朝遗之以缯絮、秫糵，岁有数，所以中之也。自关市之通，匈奴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几堕马邑之权。而犹乐关市，不能绝，可知匈奴陷溺于汉文化之深。文帝时贾谊便提出“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的设想。他还提出“三表五饵”之建议，实际上就是如何逐步同化匈奴，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12]。对于匈奴的汉化倾向，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最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劝告匈奴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其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曰：“言汉物什之二入匈奴，匈奴则动心归汉矣。”因此中行说极力贬低汉物，以改变匈奴人亲汉心态，“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

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13]。中行说还强辞夺理与汉使相辩论,盛夸匈奴文化之优越,目的则是阻挡匈奴汉化倾向的发展。然而游牧民族对农耕文化的依附性和汉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强大渗透力,终于造成汉文化对匈奴的影响不可阻挡之势。

在发掘唐努乌梁海匈奴人墓葬中发现的毡、陶器等,考其形制,可知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1924 年,苏联科兹洛夫所率蒙藏探险队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北 70 公里,位于库伦和恰克图大道东七公里处发掘三组古墓,共 221 座。其中发现的织品和花绢,与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时代相同。墓中还出土汉代五铢钱、汉镜及汉通行隶书,其时漠北正在匈奴人统治之下,显然是汉代时匈奴人墓。墓葬中出土有来自汉朝的刺绣、漆器、青铜器,还有来自中亚的毛织品,而其绣品质地及所见图案花形则有中国式、波斯式和希腊式。二十世纪 40 年代,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叶尼塞河上游的哈卡斯州首府阿巴干市以南八公里处,发现中国式建筑。考古工作者认为是投降匈奴的汉朝大将李陵的住所,因而称之为"李陵宫"。屋顶用板瓦及筒瓦覆盖,房檐有圆形瓦当,上有反印的隶书八分体汉字"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汉代匈奴墓葬在我国境内北部和西北部多有发现,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县补洞沟、宁夏同心县倒墩子、青海大通上孙寨等处的匈奴墓地或墓葬的发掘,都有重要的发现。其时代从西汉初期至东汉后期,以西汉中晚期的匈奴墓发现数量最多。这些匈奴墓既保留有草原民族的文化特色,又包含了大量汉文化因素。在不少东汉晚期的匈奴

墓中，汉文化特征占据主导地位，说明入居内地的匈奴人已逐渐与汉族融合[14]。

有史料表明，匈奴人早就与西域民族有所交往和交流，美国学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著《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曾插入一件匈奴金属带扣的图片，大约为公元前三世纪的制品，作者指出这枚饰件能够证明匈奴人与亚洲更西部的游牧民如斯基泰人有所接触，后者也喜欢有动物图案的挂饰和带扣。匈奴文化也接受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库伦北70公里古墓第12号墓出土的一幅丝织品，用红黄棕等色丝线绣着三座小山和三朵白云，当中小山上有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树，两旁小山上各有一只飞鸟。有人认为这幅图画带有明显的希腊风格。第24号墓中出土的垫毡上的刺绣图案是斗兽头像，与黑海北岸出土的斯基泰人金、银、陶器上刻划的图像相同。阿巴干市南8公里处中国式建筑，铺首上却铸着高鼻梁的欧罗巴人种的形象。据《汉书·陈汤传》记载，陈汤率汉军进攻匈奴郅支单于，当汉军逼近郅支单于城时，见“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颜师古注云：“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德效骞《中国和罗马的军事接触》认为这是按照罗马军团操练叠锁盾的龟甲形阵。郅支单于城的结构，与一般的中亚城市不同。是在“土城外有重木城”，用多重木栅作为土城的外围，这也和罗马城防工事一样。因此推测这是由罗马传人的军事技术，甚至郅支单于部下有罗马军团参与了郅支城的保卫战。公元前54年，罗马将军克拉苏斯的部队被安息人击溃，他们的余部可能加入了匈奴的军队。当然还有其他可能，比如在郅支手下有接受了罗马军事训练的

安息士兵,或者有罗马的军事顾问等。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江上波夫和水野清一曾在内蒙古长城一带从事考古活动,1935 年,撰《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第二篇"绥远青铜器"认为绥远之青铜器含有中国式和西徐亚(塞族)式,所以称之为"北方欧亚文化"。

匈奴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生过重要影响,还担当了中间媒介作用。蒙古考古工作者发掘漠北匈奴人墓葬,出土大量来自汉朝的器物,有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五铢钱、板瓦、筒瓦、瓦当、马具、黄金、服饰和丝织品,反映了匈奴与汉朝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和匈奴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当匈奴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之时,曾迫使月氏西迁,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民族迁徙,如乌孙的北迁和塞人的南徙,改变了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民族分布,推动了中西之间文化的交流。匈奴西逐月氏,其势力进入中亚地区。后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降汉,完全汉化;北匈奴西迁后,又同化于希腊、罗马文化。从北匈奴开始西迁,至匈人称雄于欧洲,时间长达 300 多年,行程数万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不同的部落、民族之间不仅在文化上,甚至在血缘上相互影响极为复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匈奴西迁的过程又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匈奴人所到之处,带去了中国中原文化,同时不断吸收各地文化,最后为希腊、罗马文化同化。

四 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变化

如前所述,史书上通常记载,丝路分南北两道,出玉门关为

北道，出阳关为南道。但有人经过实地考察并研究文献认为，“玉门、阳关相距不远，自此西行，原只一路，出玉门关者由之，出阳关者由之；至沙西井后，再分南北两路进行”[15]。《三国志·魏书》卷三十注引三国初鱼豢《魏略·西戎传》云：“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那么，从沙西井转西北，过故楼兰，则进入北道；若从沙西井转西南，经鄯善，则进入南道。东汉时楼兰南迁，鄯善成强国，出南道必经鄯善。因此南道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更形重要。于是东汉时经营西域的政策一变而为北攻伊吾，南服鄯善。

史书上还有“新道”之说，乃由玉门关入北道的一条支线。从玉门关即今大方盘城起，便折向西北行，经横坑，避开三陇沙及龙河或曰龙堆，出五船北而达车师（今吐鲁番阿斯塔拉）。当《汉书·西域传》之北道有时被称为中道时，这条路又称北道。从此道出车师前王国，转车师后王国，沿伊犁河西行至乌孙北境，然后到康居、奄蔡。这条路线要取道罗布泊涸址东北，直达鲁克沁南之得格尔。“中道”之说，见于《魏略》记载，自玉门关到故楼兰后，从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此“中道”实即《汉书·西域传》中西汉初之北道。此道开于汉武帝以后，是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府以后的情况，此道西过榆树泉，经巴什托克拉克，穿越白龙堆（后来称之为罗布碛滩）北头，由罗布淖尔北经楼兰，沿孔雀河北岸西抵库尔勒，和北道相接，西行至龟兹、疏勒，过大宛至康居。这条路线经过楼兰古国，又称楼兰故道。这条路线汉时曾一度封断，至魏晋又恢复，所以鱼

豢书中才有记载。至四世纪中叶,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改道,楼兰废弃,交通最终断绝。

张骞出使西域,已走此道。相对南道和其北的新道以及天山以北的北道,称之为中道。此道又称"径道",意为捷径。因为北道行于噶顺戈壁之东边转西,行于库鲁克山之北麓,须绕库木什山,取道焉耆,才到尉犁。不如中道至尉犁近便。据赫尔曼《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中道七星期行程,1700 公里;南道八星期行程,1900 公里;北道九星期行程,2100 公里。但此道虽距离较近,因为须经过白龙堆(罗布硷滩),缺乏水草,旅途较为艰难。李广利远征大宛,大宛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硷滩)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汉初楼兰当道,又近汉,常主导发,负水担粮,送迎汉使。东汉明帝时,匈奴势力被驱赶到天山以北,车师前王国土地肥美,物产丰饶,于是重开新道,以新道为北道,行旅循硷滩北缘,宁肯绕远北行,中道遂废。

东汉建立,以洛阳为首都,西北丝路东端随之由西汉时的长安东移至洛阳。

古代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彼此间贡使活动则是主要的贸易活动。而贡使贸易的目的地则是对象国之首都,诸国接待外来使节的机构和活动当然也主要在首都。西汉时,长安涉外机构主要有鸿胪寺和主客曹。鸿胪寺主持外交事务,其长官为大鸿胪,属诸卿系统。关于其职名沿改,《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

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主客曹也是掌管外交与民族事务的专职机构。长官为主客尚书，属尚书系统，其职责“主外国四夷事”[16]。由于事务繁杂，其下设置郎官以协助处理具体事务。汉初还承秦制，置典属国之职，其职责“掌蛮夷降者”、“周边之属国”和“四方夷狄朝贡侍子”[17]。而据《汉书·成帝纪》，至河平元年（前28年）六月，“罢典属国，并大鸿胪”。禁中少府属官黄门令也负责部分海外事务，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他们的任务可能是负责为皇室搜罗天下宝物和奇禽异兽。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接待海外来宾的馆舍，称“蛮夷邸”，据《三辅黄图》卷六，“蛮夷邸，在长安城内藁街”。这些机构和设置东汉时皆置于洛阳。东汉时又改王莽时典乐为大鸿胪，从此成为固定的名称。主客曹在光武帝时又分为南主客曹和北主客曹。而据《后汉书·西域传》“焉耆”条，洛阳亦有“蛮夷邸”，据同书《南匈奴传》，洛阳又有“胡桃宫”，皆为外商在洛阳的活动所提供的场所。尚书中宫官，为皇帝的近密和喉舌；大鸿胪是外官，属外朝，他们都负责外交事务，相互配合。皇帝关于外交方面的指令，通过尚书撰写为诏令，下达大鸿胪具体执行和运作。这些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在首都，因此首都也是中外交往的中心，都城的东迁必然牵动中西交通路线的向东延伸。于是汉使出行自洛阳出发，西域各国使节东行亦至洛阳。

西汉时西域诸国人入华多沿丝路至长安。长安胡人首先是

西域使者和商贾，张骞通西域后，大批西域使团和商贾涌入长安。《三辅黄图》卷四“池沼”条记载：“武帝穿池得黑土，帝问东方朔，东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问胡人，胡人曰：‘劫烧之余灰也’。”说明武帝身边常有胡人在。《东观汉记》卷十六记载：光武帝死，长安城“西域贾胡供起帷帐设祭，（京兆）尹车过帐，贾牵牛令拜。”说明直到东汉初，长安商胡还为数不少。西汉时长安经常有西域质子居住，西域诸国为了表示臣服和取信于汉，送王子到长安充当人质。最早送质子者是楼兰王，见于记载的除了地处今新疆地区葱岭以东诸国质子外，还有葱岭以西中亚各国质子，如大宛王子、乌孙王子和康居王子，还有匈奴质子等。东汉建都洛阳，洛阳地处中州，于是东来的西域质子、使者和商胡则至洛阳，并深入中国内地。《后汉书·西域传论》云：“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据《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七年（95年），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后汉书·乌桓传》记载：“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同书《梁冀传》记载，梁冀起菟园于河南城西，“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菟。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蔡邕《短人赋》所写即域外人之后裔，其序云：“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当为‘别’字之误）。名之侏儒，生则象父。”[18]由于西域人在中原地区人数不少，汉末的繁钦才能通过观察分辨出各国人相貌的不同，他的《三胡赋》云：“涉车之胡，

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额，高辅陷口，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隅目赤髯，洞额仰鼻。"[19]

考古材料也说明东汉时洛阳成为西域胡人东来的终点和聚居处。上世纪初，马衡收集到出土于洛阳的三块刻有佉卢文的弧形条石。据林梅村的研究，此类刻石原为东汉时当地世俗井栏之构件。佉卢文（kharosth）又作佉留、佉卢虱底，是古印度的一种文字，属塞姆（闪）语系的阿拉米文系统，横书左行。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盛行于印度半岛西北部。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讲到佉卢文的起源，他说曾统治印度西北部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留给印度的一个重要遗产是关于文字的，"位于苏萨的波斯政府采用了阿拉米（Aramaic）语言和文字，作为整个帝国的官方来往媒介（这一文字在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是和楔形文字同时使用的）。于是，阿拉米字母开始被塔克西拉和印度西北部地区的当地居民使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阿拉米语言肯定也被采纳了。当阿拉米字母表无法表达当地俗语（Prākrit）的所有发音时，人们对字母表进行了添加和修改，逐渐演化成了佉卢文书写体"。直到公元四、五世纪，由于受到梵文的排挤，佉卢文才逐渐绝迹，而在此之前包括塔克西拉在内的中亚地区盛行佉卢文。由此可以推知东汉时京师洛阳地区已有属于犍陀罗语族的中亚人士于此聚居。1987 年洛阳东郊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羽人铜像，深目高鼻，紧衫窄袖，其造像形式明显模仿西域胡人个体形像的特征[20]。

《史记》、《汉书》记西域诸国至中国道里远近，以长安为坐

标,《后汉书》则以洛阳为坐标。如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大月氏"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莎车"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疏勒"去洛阳万三百里"。异域贡物所至乃中州洛阳,正如王逸《荔枝赋序》所云:"大哉圣皇,处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西旅献昆山之蒲桃,北燕荐朔滨之巨栗。"[21]在"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东汉时代,西域商胡千里迢迢赶至洛阳进行商业活动。据《河南志》卷二引华峻《洛阳记》云,洛阳城中位于南北二宫之西的金市、城东的马市和城南的南市都是当时的工商业区,因丝路起点的东移而盛极一时。西人以丝路西端的罗马相比较也举出洛阳,赫德生(G. F. Hudson)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说:"二世纪时,丝绸在罗马帝国极西的海岛伦敦,风行的程度甚至不下于洛阳。"佛教之东传,西域僧人之入华传教首至洛阳。《高僧传》卷一记摄摩腾云:"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竺法兰与摄摩腾同至洛阳译经。安清则"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支娄迦谶则于"汉灵帝时游于洛阳。"入华第一批高僧皆至洛阳。

洛阳既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洛阳自古以来便有"居天下之中"之说,以此为中心,交通全国各地。自洛阳往南,第一大商镇是当时被称作南都的南阳(宛),从南阳南下可达江夏与江陵;自江陵往南,经长沙、桂阳而至番禺,番禺是南海贸易的中心,这就把海陆两道丝路联接起来。洛阳这种交通中心的地位是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

从国际环境看，东汉时东西方陆路贸易的条件更为便利。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四大帝国都处于昌盛发达的阶段，他们在军事上都日益强大，逐步吞并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疆土。西方的罗马帝国处于全盛时期，东方的东汉王朝也正如日中天，西域的贵霜王国统治着今阿富汗和印度北方的广大地区，处于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安息则处于三大帝国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和缓冲作用。四大帝国都希望在丝路贸易中获利，他们都推行着有利于对外交流的贸易政策，东西方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南海航道的起点和终点由西汉时合浦、徐闻而变为交趾，又由交趾而日南。汉武帝时通过南海航道发展了与南海沿岸诸国的交通之后，通过海道东来的异域人则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今广东、广西沿海地区成为汉代异域人入华的落脚点。据考古学的报告，岭南地区出土的灯座中有一种陶俑灯座，陶俑多为男性，深目高鼻，与西亚人种相似。有的陶俑头型较短，宽鼻厚唇，与中国人不同。陶俑常裸体，体毛发达，跽坐或箕踞，头顶灯盘。也有单腿下跪，一手托举灯盘。这些异域人俑所代表的可能是随番商入汉贸易，流落汉地，沦为富家奴仆的外国人。1955 年，广州大元岗出土的西汉后期陶俑灯座，灯座高 25.7 厘米，灯盘径 10.4 厘米。造型为一异域人单腿屈膝蹲坐，左手托举灯盘，右手支于腿上，仰首注视，张口吐舌，遍体划毛。1956 年，广州东山三育路墓葬出土的东汉陶俑座灯，泥质灰陶，高 28.5 厘米。俑为深目高鼻，口微张，上下划须，身躯肥硕，肌肉发达，裸体，遍身划毛，头上缠巾托灯，双足上曲作箕踞蹲坐

状，双臂置于膝上。1984 年，广东顺德县东村西淋山墓葬出土的东汉陶俑座灯，高 24.5 厘米，俑高鼻贯耳，遍体划毛，裸体而坐，头顶灯盘。1988 年，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三水县金本竹丝岗墓葬出土的陶俑座灯，高 18.5 厘米，俑头顶灯盘，为异域人形象，裸体，遍体刻划毛发。杨孚《异物志》记载一种“瓮人”：“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卑，强勤力。”从其相貌特征看，似为印度达罗毗荼人或东非人，可能也是被番商出卖沦落中国的奴隶。

汉武帝平南越设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皆在今越南中部和北部。此后交趾成为西汉对外交流的重要商埠，《旧唐书·地理志》云：“自汉武以来，朝贡皆必由交趾之道。”有人甚至认为交趾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西部的敦煌。但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汉朝并不能对三郡实行有效的统治。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地处今海南的儋耳、珠崖两郡，“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更远之交趾等三郡则更不用说了，虽然由徼外变为域内，汉文化南渐，但由于道途悬远，其间的政治联系并不密切。东汉王朝势力在南方的发展，造成海上丝路起点南移，一方面交趾在中西交通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方面日南也逐渐成为重要港口。

光武帝建武年间，马援率大军南下，破征侧兵，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东汉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牢固的统治。自汉置三郡以来，中原士民大量南迁至此。西域海商东来，其终点则为交趾。于是交趾成为东汉时中西间海上交通的起点和终点，交趾

在今越南的北部。由于交趾港口在当时国际贸易中被利用，东汉时希腊罗马人知道了这个地方。在公元二世纪成书的托勒密《地理志》介绍公元一世纪的中印商道时已经提到它。他说：

> 我们从航海家们那里也搜集到了关于印度及其所属各省以及该地内部直至金洲，再由金洲直至卡蒂加拉的其它详细情况。据他们介绍说，为了前往该地，必须向东航行；从该处返航，须向西驶。另外，人们还认识到全航程的时间是经常变化的，无规律的。他们声称赛里斯国及其首都都位于秦奈以北，其东方是一片未知之地，遍地覆盖以泥潭沼泽，丛生着高大茂密的芦苇，这种芦苇之厚可供当地人拿来横渡泥潭沼泽使用。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途经石塔前往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氏城而通往印度的路。这些人进一步补充说，从秦奈首都到卡蒂加拉港口的路是向西南方走的[22]。

他称中国为“秦尼”，西南行有港口曰卡蒂加拉（Cattigara）。据李希霍芬考证，卡蒂加拉即交趾的音译。戈岱司说，李希霍芬“把这一港口确定在红河入口处附近，即今之河内城郊。这样看来，秦奈地区相当于交州（东京湾）和中国的南部，而位于卡蒂加拉东北部的秦奈首府显然就是古都洛阳城，即今之河南府”[23]。拉古贝里解释：“中国古代交趾之读音为‘交梯’，故托勒密之卡蒂加拉即交趾国。”希腊人未到卡蒂加拉之前，已有“柴巴港”（Zaba），为“占婆”之转音，即今占城。说明交趾海口

在东汉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成为沟通中国、印度和中亚、西亚的重要通道。东汉末年，士燮任交趾太守，《三国志·士燮传》记其事迹云："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谷焚香者常有数十。"按照中国修史通例，所谓"胡人"通常指中亚或波斯人[24]。这些中亚和波斯人来到交趾，显然是通过海道辗转而来的。《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康僧会于献帝末年从交趾避乱入吴，他的一家便是汉末侨居交趾的一户胡人。

汉代日南郡位于今越南中部横山至柴市江一带，郡辖朱吾、比景、卢容、西卷、象林五县。东汉时日南越来越成为汉王朝海外贸易的窗口。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遣使贡献，起初通过西北陆路。后来"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同书又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据不完全统计，东汉一代有关海外诸国使节和商人抵达日南郡贡献的就有11次之多[25]，海外各国都把日南郡视为进入中国与汉王朝交通和贸易的首站。据考证，日南郡最著名的港口是卢容浦口。卢容浦口位于今越南中部顺化附近。《水经注》卷三十六引《林邑志》（大约成书于公元五世纪），写卢容浦口的通商盛况和繁荣景象："尽纮沧之徼远，极流服之无外，地滨沧海，众国津逕。"汉代日南郡的外贸港口地位维持了二三百年之久，直到东汉末叶才开始衰落。

注　释

〔1〕《后汉书·西域传》。

〔2〕同上书。

〔3〕《后汉书·班超传》。

〔4〕《后汉书·西域传》。

〔5〕《后汉书·班超传》。

〔6〕《后汉书·西域传》。

〔7〕《后汉书·班超传》。

〔8〕同上书。

〔9〕同上书。

〔10〕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中心，1987 年，40 页。

〔11〕《汉书·娄敬传》。

〔12〕贾谊《新书》卷四，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742 页。

〔13〕《史记·匈奴列传》。

〔14〕刘庆柱《秦汉考古学五十年》，载《考古》1999 年第 9 期。

〔15〕《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见《史学集刊》第五期，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 年，107 页。

〔16〕应劭《汉官仪》，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贤注引。

〔17〕参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60～61 页。

〔18〕蔡邕《短人赋》，见《全后汉文》卷六十九。

〔19〕繁钦《三胡赋》，见《全后汉文》卷九十三。

〔20〕林梅村《洛阳所出东汉卢文井阑碑记》，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 年第 13－14 期合刊；《洛阳出土文物集粹》图版 49，朝花出版社，1990 年；张乃翥《论洛阳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相关的若干考古学资料》，见

《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267－270 页。

〔21〕王逸《荔枝赋》，见《全后汉文》卷五十七。

〔22〕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2001 年，29－30 页。

〔23〕同上书，导论，23 页。

〔24〕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见《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53－54 页。

〔25〕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358 页。

第四章　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开辟和发展

古代中国与西域各国的海上交通，主要通过南海与印度洋航路相连接，人们称这条通往地中海而达欧洲的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路线的主要线段是南中国海、印度洋（安达曼海、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在苏伊士运河没有开辟之前，从红海到地中海要经古运河或走一段陆路至尼罗河，由尼罗河进入地中海。这条贯通欧亚非三洲的海上交通路线应该说首先是从西端得到开辟的，其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历史上，活动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的各国各民族如古代希腊人、埃及人、阿拉伯人、苏美尔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印度人等，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地中海、红海、东非沿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和孟加拉湾分段从事近海航行，为这条海上交通线的开辟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至中国汉代，中国人西行至印度和斯里兰卡，罗马人东来至印度，进而至中国，将东西间海上交通线贯通起来。

一　希腊至埃及地中海航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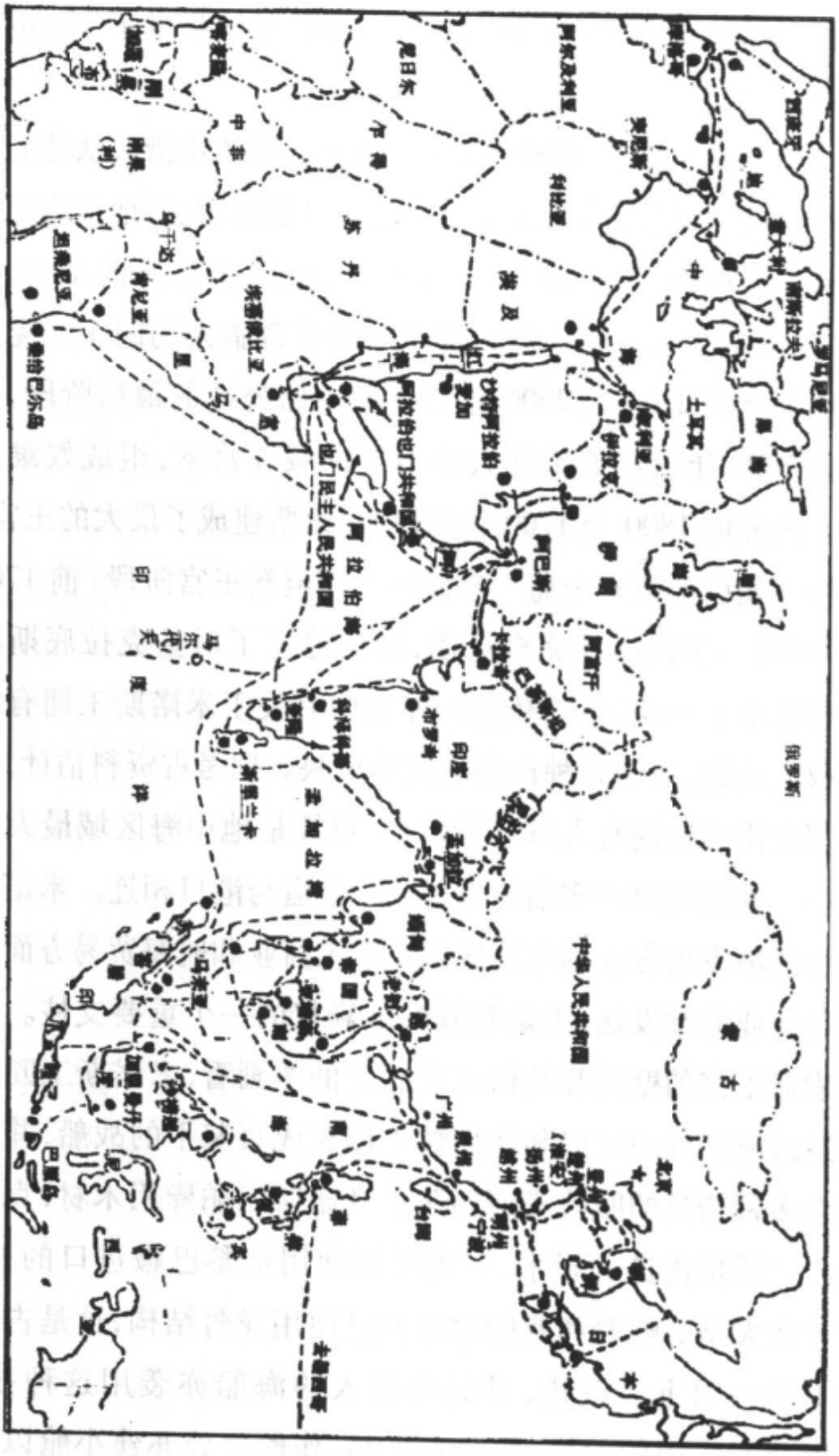
古代希腊人自古便与航海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地中海很早便是他们航海事业的用武之地。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的爱奥尼亚海的群岛和岛屿，以及今土耳其西南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区。希腊地区有丰富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欧洲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彼特拉隆那直立人（约30万年前）就发现于希腊北部。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爱琴海成为远古航海业的摇篮，这儿的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开始航海活动，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的古人类已开始出海捕鱼，行踪渐及近海岛屿。新石器时代的希腊本土则与爱琴海各岛有了较密切的航海联系，例如伯罗奔尼撒当地的石器多使用爱琴海中基克拉底斯群岛的米洛岛特产的黑曜石，此岛距大陆约150公里，按当时的条件说已是一段不短的航海路程。因此在新石器时代，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各岛的文化由于航海的成功而取得密切联系，并从爱琴海而连接于小亚和北非。在克里特岛、基克拉底斯群岛和希腊本土都发现了延续数千年的新石器文化（前6000－3000年）。

古代希腊的历史长达两千年，可以分为爱琴文明、荷马时代、古朴时代、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航海活动进入文明时期以后更见发达。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到3000年间，爱琴海各岛屿和希腊本土逐渐转向铜器或早期青铜文化，这个阶段约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铜器使用渐广，基克拉底斯群岛的海上交通尤为活跃，成为由小亚沿岸和塞浦路斯岛向希腊各地转运铜等金属原料的中心。铜器时代以后，海洋成为希腊联系东方先进文明的主要通道，希腊人东航经叙利亚即可达两河流域，与爱琴海南边最大岛屿克里特岛隔海相望的就是埃及。这两大文明

古国和其他东方文明民族都为后起的希腊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属于印欧语族的希腊人从他们的故乡多瑙河、顿河流域由北而南逐渐移居希腊，此后地中海原有居民或曰地中海民族逐渐同化于移入民族，至公元前1000年以后，整个希腊成为清一色的讲印欧语的希腊人的国土。克里特岛在公元前2200至2000年间进入原始公社的最后阶段，在公元前2000年后各地出现大小不等的城郭宫室，组成奴隶制小国。公元前1800至1700年间，克诺索斯建成了最大的王宫，米诺斯王朝已经统一全岛。米诺斯王朝至新王宫阶段（前1700－1500）统一王权已经完全巩固，而且建立了对基克拉底斯群岛和希腊本土一些地区的统治，神话中有关于米诺斯王拥有海上霸权的传说，当是此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据考古资料估计，当时首都克诺索斯拥有人口八万以上，可算是地中海区域最大城市之一。其他城镇亦多临海而建或有大道与港口相连。米诺斯文明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成就在于工商业和航海贸易方面。它的造船业非常发达，无疑是其海上霸权的一个重要支柱。从克诺索斯王宫的壁画和其他工艺品上的图画看，米诺斯工匠已能建造远航海外的帆船和使用数十以至成百桨手的战船，并组成混合多种船只的舰队或商船队。米诺斯船舶皆用木材，克里特岛出产质量优良的杉木，但也可能使用从黎巴嫩进口的材料。在建造大型的帆船和战船时可能已使用龙骨结构，这是古代造船术的一项重大改进，日后希腊人的海船亦袭用这种技术。船上建有牢固的舱房，船尾置长桨，作舵之处亦建小舱以避风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中国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布到的国家和地区（均用现名）

雨，这些都是有利于航行海外的设施。由于有一只强大的海上舰队，米诺斯首都及其他大城市都无厚墙碉楼等城防工事，形成这个海上强权有异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特色。

由于先进的造船业和强大的船队为米诺斯王朝保证了海外航行的畅通，克里特与埃及的联系便持续不断。克里特所用的黄金、象牙、皂石印章以及昂贵的石瓶、首饰等可能都来自埃及。米诺斯王朝旧王宫时代（前 2000 – 1700）埃及中王国第十二王朝的文物曾流传于克里特，当地工匠多有仿效。在壁画、陶器、工艺品和图画文字的演变方面都可看到埃及的影响。克里特的陶器在埃及也有发现。但米诺斯和埃及联系最密切之时则在新王宫阶段，尤其新王宫晚期，其时正是埃及新王国的第十八王朝。在埃及底比斯的列赫米拉坟墓壁画上，有一幅欢迎进贡的外国使节之图，其中一些人的服饰穿戴和奉献礼品的瓶盅形制都类似克里特壁画中的人物，一般认为他们就是米诺斯王朝派出的使节。此图的题词："海中诸岛及克夫提乌大君的和平到达。"也明确提到克里特岛国的特色，而克夫提乌则可能指克里特。列赫米拉曾在图特摩斯三世（前 1504 – 1450 年）和阿蒙霍特普二世（前 1450 – 1425 年）两位法老手下担任宰相之职，在他的坟墓中反映这类情况表明克里特此时已和埃及建立了一定的外交关系。

在克里特，也相应地发现了阿蒙霍特普三世（前 1417 – 1379 年）的印章及其王后泰伊的甲壳虫章，可见交往之密切。从其他遗物看来，公元前 1600 – 1400 年间，克里特和埃及的交往似乎始终处于类似的水平。在新王国的埃及，克里特陶器虽

有发现,但数量相对不多,论者以为此时克里特运往埃及的大宗货物可能主要是皮革、肉类、果品、木材等等,而不是那些必用陶瓶装运的橄榄油和葡萄酒。埃及而外,克里特海外贸易接触较多的还有叙利亚沿岸和塞浦路斯岛,两地皆有相关的文物发现。但和克里特贸易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还是爱琴海及其周围地区。在西部地中海,米诺斯的影响已达意大利的利巴拉群岛,可能也及于意大利南部沿岸和马尔他岛。由此可见,米诺斯海上霸权的意义就在于它控制了东部地中海的海运贸易网,它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一个以克里特岛为中心,东达洛德岛,西连伯罗奔尼撒的环形带,正好处在东岸高度文明国家和其他待发展地区中间,特别是这些地区和当时最富裕的国家埃及进行交往,都得通过这一环形带,从而使它得以攫取欧、亚、非三大洲的内陆资源。在米诺斯王朝新王宫后期,克里特北面约 69 海里的锡拉岛曾有一次火山大爆发,全岛一分为三,古城被火山灰掩埋,因此部分遗址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经 1967 – 1974 年周密发掘后,在古城中央广场周围的一些楼房中发现了许多精美的壁画,题材以反映渔民生活和航海经商活动的为多,在古代壁画中独具一格。

米诺斯文明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迈锡尼文明在海外贸易方面较之前者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埃及、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以及意大利南部、利巴拉群岛等曾有较多的迈锡尼陶器的发现,数量皆超过各地曾发现的米诺斯陶器。例如,在埃及法老埃赫那吞进行宗教改革时建立的新都阿马尔纳,迈锡尼陶器曾有大量进口,数量之多是在此之前输入埃及的米诺斯陶器无法

比拟的，它说明这时迈锡尼的海外贸易已把橄榄油、葡萄酒等希腊特产作为出口的大宗货物。迈锡尼人已在上述各地建立自己的商站，这些联系为希腊本土带来不断增长的财源。在小亚沿岸，移居当地的希腊人还和土著居民混合建立起了强大的城市，特洛伊便是其中之一，不仅为迈锡尼商业提供了据点，也是当地一支活跃的军事力量。小亚内陆的赫梯王国就很重视这些本地的和海外的希腊人，赫梯文书中称此时的希腊人为“阿恰耶伐人”，与荷马史诗所称的“阿卡亚人”相符。赫梯国王曾把“卓越的”阿恰耶伐王和埃及法老相提并论，又曾称之为“兄弟王”，可见迈锡尼声威之盛。

二　红海亚丁湾航线

在这段航线上，古代埃及人、阿拉伯人、亚述人、希腊人、阿克苏姆人等都进行过早期航海活动。

埃及东临红海，北濒地中海，尼罗河从南至北贯穿其间，注入地中海。与尼罗河有关的技术发明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内容，这种发明集中于造船和航运方面。古埃及人早就开凿了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这条运河在历史上多次重挖和疏通。

在埃及水上运输比陆上运输重要，古埃及人很早便发明了船，前王朝时期多是芦苇编制的船，形制与两河流域的芦苇船差不多。第一王朝以后就发明了木制船，有大小船只适应尼罗河航运的需要。1954 年在狮身人面像后齐阿普斯金字塔旁出土了一条距今 4700 年的“太阳船”残骸。经过西方学者的研究，

终于复原了这条船。这是一条"缝合"船,每块船板的四角均凿有孔,板与板之间用椰棕绳索连接。古埃及的壁画中有许多行船的场面,例如约公元前3300年的希拉康波里画墓的墓室西壁上的壁画,内容有尼罗河上穿梭往来的船只,有的船上还陈列着用于祭祀典礼的物品。近年在萨卡拉墓地中的捷特王陵发掘到一艘长达50英尺的木船遗物,据信这只船是护送国王遗体至墓地的航船,选料做工皆达最高水平,造船用料可能是取自黎巴嫩特产的云杉或者是经红海运来的东非木材。据研究,这类大船由于采取木料构造,船体要轻捷牢固得多。王室用船往往以百十名桨手列队划船前进,而一般货运则已使用风帆,尤其是地中海和红海上的航运更需要使用风帆和较高技术的航海条件。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古埃及人成为航海的能手。古埃及人的航海活动沟通了地处印度洋水系的红海和大西洋水系的地中海之间的海上交通,使古埃及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捷径。考古发现,埃及地区早就与两河流域有文化上的联系。希拉康波里墓室壁画有一组表现一人张臂与双狮搏斗,双狮侧立两边,布局齐整,与壁画其他部分的构图散漫不同,显然是一种徽章性质的图案。这种双狮图徽,是来自两河流域的文物。它出现于埃及王陵之内,说明了两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联系。发现于埃及的吉贝尔·埃尔·阿拉克的一把石刀的象牙柄上,还以更为贴近两河流域的风格刻画了一位戴毡帽着长衫(皆非埃及习俗)的人搏斗于双狮之间,其背面刻有战争搏击掠夺俘虏和舟船水战等图,舟船形制亦与两河流域相似,就更说明两地交往的密切。实际上这些交往不仅限于文化方面,也包括经济贸易。

有人估计当时不仅存在一条由埃及经西奈、巴勒斯坦达于西亚各地的陆上交通线，可能还开辟了一条经红海沿波斯湾达于两河流域的海上交通线。古埃及"缝合"结构的造船工艺后来为西亚许多国家所接受，一直使用到中世纪。因此前王朝时期西亚与埃及交往之频繁甚至超过以后的王朝时期。

阿拉伯人在红海航海活动中也充当过重要角色。沙特国王大学文学院考古博物馆系教授阿里·本·易卜拉欣·哈米德·阿班在讲过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及其海域的航海活动后，概括了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一、二世纪时，阿拉伯人经由红海的航海和贸易活动：

> 现在我们将话题转到海上丝路另一条通道上来，这就是那条通向红海抵达埃及和地中海沿岸之路。我们发现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和沿红海沿岸对岸陆路的北部建立的阿拉伯王国已控制了进入红海的东方贸易和航海权，这是因为红海多珊瑚礁，通过其深海水道和出入这些港口需要经验帮了他们大忙，他们热衷于掌握这些资料。有一位也门商人的故事，他叫玛阿尼·宰德，在埃及的吉萨发现了一块上面刻有他的名字的雕刻，雕刻上记载了埃及给他的布匹，要他用船运走。这可能是发生在托勒密二世时期（公元前3世纪）的故事。巴拉米阿拉伯人原是汉志北部沿岸的居民，他们是最早定居在埃及南部沿岸的阿拉伯人，从事与托勒密人的贸易，到达埃及沿岸的红海港口。一些学者认为巴立米人属现在仍定居在瓦季港地区的巴立部落[1]。

布尔努瓦《丝绸之路》一书谈到阿拉伯人对红海贸易的垄断和海上贸易活动，他说："红海沿岸的全部贸易都程度不同地被阿拉伯人所操纵，如纳巴提安人和那些拉丁文著作中所提到的其他民族，或者是一些附属于他们的部落。他们的目的就在于阻止印度船员们越过曼德海峡，谨慎地保护着自己与东方贸易的过境权。实现这一计划也并不太困难，沿海居住的阿拉伯人对外来民族的态度特别冷淡和不善交际，由于这一地区烈日炎炎，他们根本无法再向那些印度船员们提供食物和水。一只从印度坎贝湾或锡兰出发的货船，在穿过印度洋之后，只要红海沿岸居民稍带仇视之意，船员便不可能上岸补充生活必需品和进行交易。特别是那里的居民只允许外国商人与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必须如数缴纳固定的商品过境税。"然而阿拉伯人的红海贸易也充满风险，布尔努瓦又说："当时陆路和海路的盗贼简直是多如牛毛，并且嚣张一时。然而，在这一商业网中，强盗和商人的这种双重垄断状态对于双方都没有任何束缚。阿拉伯的海员们在沿途各港口一程一程地转运那些神秘的货物，他们把这些商品小心翼翼地装入船舱，但从来也不想泄露商品的原产地。他们远涉重洋，越过紫蓝色的红海，夏天顶着火辣辣的骄阳，冬天饱经海风的袭击，为了运送商货，真可谓历尽了千辛万苦。但他们的盗贼弟兄们却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所获利润的大半勒索而去。所以，这条通商大道实际上是养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居民。"

公元前一世纪，经由也门和阿曼港口的东方贸易繁荣起来，

控制阿曼南部水域的沙布王国的一位国王在佐法尔地区建了一个港口，原称耶姆海拉姆，成为航向东方船只的停靠港。在这期间访问过这一地区的希腊旅行家描述过红海南北港口贸易活动的情况。关于木札（木哈）港，《厄里特利亚海航行记》的作者说：他发现这个港口船只拥挤不堪，船主和阿拉伯船员和所有的人都忙于做买卖，港口属于希木叶尔国王卡尔巴伊勒。在红海的北部，迪丹和利哈延王国参加途经他们港口的海洋贸易。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斯特拉波描述过他们的同盟者奈伯特人的贸易活动，他们控制了红海北部的不少港口，如鲁基·库非（达巴北部的哈利巴港）和阿克拉·库米（瓦季南部的卡尔卡玛码头）。货物从鲁基·库米运往佩特拉，从佩特拉运往腓尼基，从腓尼基运往其他地方。他说，奈伯特人是一些酷爱财富的民族，他们贩运的货物有的完全是贩运来的，有的不完全是贩运，而是按货物清单提供，清单上的货物除了其他东西外，还包括绣花服装、大黄、番红花、肉桂、雕塑、绘画、雕刻等，清单上的一些货物很可能是从东方输入的。

亚述帝国至巴尼拔统治时最为强盛，公元前639年，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俘获其王，平定了埃兰全境，从而战胜了最后一个顽敌。其版图拥有西亚全境，并一度占领埃及，号称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成为世界历史空前的大帝国。亚述帝国使用大量奴隶从事修建运河，发展商业，各地交通的便利和文化的交流达到新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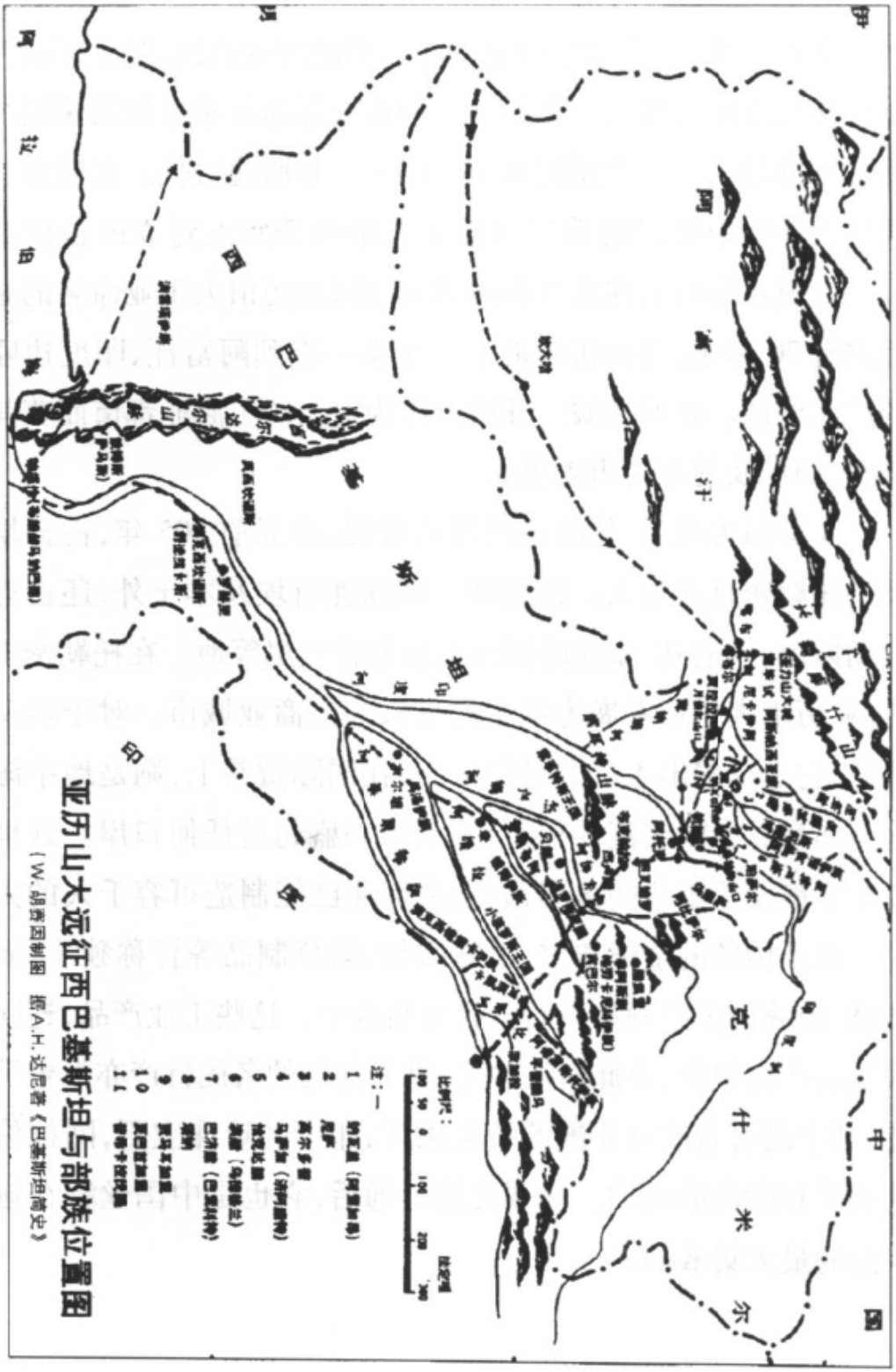
希腊人在红海航线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阿班教授讲到希腊人对红海航线的控制：

但对途经红海的东方贸易的控制权并非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内一直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里，因为这一贸易已将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拉进国际角逐和竞争的舞台，将他们卷进同地中海沿岸欧洲列强直接的对抗之中。首先是希腊，其次是他们的同盟者罗马人，而后是拜占庭人。因而当时红海的状况并不比阿拉伯海湾的状况好多少。希腊人刚一控制阿拉伯半岛周围地区埃及、沙姆和伊拉克，就迅速将海上丝路予以完全控制。对此，阿拉伯商人和海员并没有表示不满。马其顿亚里山大还制定了一项控制阿拉伯半岛沿岸的计划，旨在全部控制半岛的领土，进入东方商品的产地，而不用坐等中国和印度的商品用船或阿拉伯骆驼商队运到埃及和沙姆，在那里高价出售。但亚里山大的计划在实施之前他就去世了，感谢真主！他的计划以他的死而以失败告终。在亚里山大在埃及的继承人时代，托勒密人重开了连接尼罗河、红海和地中海的古运河。公元前285年至前246年，托勒密二世命令重开这一运河，船只从埃及进入印度。为保护东方海上的贸易，托勒密人安排希腊侨民在红海的一些港口居住，并给他们的定居点起了希腊名字，其中艾姆布鲁尼港据认为位于沙特阿拉伯王国西北的瓦季港处。但在红海沿岸发掘的古迹证明艾姆布鲁尼位于法尔散岛，在那里确有希腊式建筑遗存和希腊的雕刻。

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开始远征，他率领马其

顿希腊联军，挥师东向，夺小亚，入埃及，灭波斯，进中亚，一直打到印度西北部，大大超越地中海古文明的传统范围，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的远征标志着希腊以及希腊统治的东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希腊化时代。在东方承袭传统体制中增添的希腊因素主要是指希腊人建立的自治城市。据说亚历山大在东方各地建立的以亚历山大里亚命名的城市共有70多座，分布在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到阿富汗、印度边陲的广大地区。有的新城一开始便作为宏大的工商业都市而奠其基石，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迅速分裂，公元前305年，占据埃及的托勒密自立为王。托勒密王朝除拥有埃及本土外，还占有巴勒斯坦、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北非的昔兰尼等地。在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里亚发展为地中海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对于埃及来说，它是全国出入口贸易的中心，在国际贸易上，则是地中海地区和东方各国交流的枢纽，买卖的兴盛超过任何口岸。这里集中了埃及手工业的精华，它的造船业已能制造可容千人的大船。埃及传统的金银珠宝、毛麻织物、纸草制品等皆称独步，而玻璃、琉璃的生产则居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这些工业产品，连同埃及盛产的粮食，由此输往国外，世界各地的名优特产亦汇聚于此，其中最著名的有非洲的黄金象牙，印度的珍珠宝石，阿拉伯的香料和欧洲的琥珀。丝绸之路开通后，它也是中国丝绸在地中海的最大集散地。


亚历山大远征西巴基斯坦与部族位置图
（W.胡赛因制图 据A.H.达尼著《巴基斯坦简史》）

托勒密二世时修复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遂使亚历山大里亚的商船可循水道直接入红海、渡印度洋而至远东。来自印度、东非的商品在今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两岸，即阿拉伯半岛的亚丁、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吉布提附近过驳卸货，转由红海沿岸的商人贩运到地中海边。产自中国的丝绸直接或经过一次次转手运抵印度后，也经由这条途径转往欧洲。不仅中国丝绸可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运抵亚历山大里亚，它的商人和水手也循海道了解甚或到达中国。公元一世纪末，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水手写了《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一书，厄立特里亚海即红海。书中提到中国的名字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虽然此书写于托勒密王朝之后，但一般相信此路之畅通始于托勒密王朝时期。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克列奥帕特拉女王以身着中国丝袍而炫耀一时。亚历山大里亚和印度、中国的联系还由于海路的开通而受益，使它能从陆上和海上两条路线获得东方宝货。

阿克苏姆王国兴起后，曾在罗马人的红海航海贸易中起过阻碍作用。阿克苏姆是非洲东北部的古国，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北部，约公元一世纪前后建国，首都阿克苏姆城。阿克苏姆王国红海沿岸的阿杜利斯港是出入亚丁湾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道。《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书中写道阿杜利斯港，说它是“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港口”。当代“希夫达”（shiftas，埃塞俄比亚语指“强盗”）的祖先曾经给航运造成了某些困难。这位水手写道，“在港口的前面横卧着所谓的高山岛，它离港湾的尽头处约二百希腊丈（stadium，注：一希腊丈大约相当于 180 公尺），两侧距大陆的海岸线都很近。驶向这个港口的船只现在都在这里抛

锚,因为陆地上有人袭击"。这是一个劫匪猖獗之处,所以袭击罗马船只的也可能是当时的希夫达。据同书记载,阿克苏姆的统治者也确是贪婪之辈,书中写道,从阿杜利斯港到阿克苏姆城要走八天,"这些地方受佐斯卡勒斯的统治。他为人吝啬,总想多捞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佐斯卡勒斯就是阿克苏姆的国王扎·哈克尔。大约在三世纪初,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罗马船只曾在这里被阿克苏姆人劫夺,而劫夺事件可能就是国王埃拉·阿米达,因为当时他的盟友受到罗马人的攻击。当然有人认为可能是海盗或非法之徒所为。阿杜利斯港在东西方海上交通方面发挥过作用,同书提到阿克苏姆王国大量的舶来品,其中有软铜薄板、小斧、少量的罗马葡萄酒、国王要的罗马式金片和银片、军装以及印度的钢铁和棉布。这个古代港口毁于八世纪某次不见记载的灾害,其遗址后来被发掘出来,人们称之为"阿祖利",在那里现在还有柱基、石堆和陶器碎片等遗物[2]。至三世纪后半叶,处于极盛时期的阿克苏姆国,还统治着阿拉伯西部的部分地区,控制了红海的航运,迫使东罗马不得不寻求陆路与中国的交往。

由于红海航运的开展,这时很早便成为来自印度洋的商贾进入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商人前往亚洲的天然通道。古埃及时期开凿的沟通红海和尼罗河的运河,更使属于大西洋水系的地中海和属于印度洋水系的红海联结起来,成为中西间交通的一条捷径。

三　亚丁湾至印度、斯里兰卡航线

在这条航线上，古代苏美尔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很早就进行了航海活动。至公元一世纪，罗马人也开始进入印度洋，从事这一航线上的贸易活动。

在西亚苏美尔文明捷姆迭特·那色文化（约前3100年至前2900年）的考古文物中，发现那时的苏美尔人在用芦苇编制的船只之外，也开始用木料造船。而且对外联系也有很大发展，苏美尔文化已传至两河流域中、上游，和东面的埃兰、西面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和埃及的联系，在它之前的乌鲁克文化中已经出现，此时仍在继续。在埃及的涅加达，发现好几枚苏美尔的圆柱形印章，皆以青金石刻成，埃及前王朝文物上还多次发现采取苏美尔神话形象（如人狮搏斗）的图案。近年在伊朗东南部的铁佩·雅亚发现的早期埃兰文化遗址，据研究此地是苏美尔和伊朗东部以及阿富汗、印度河流域贸易联系的中转站，它把本地出产的皂石和阿富汗的青金石运销于苏美尔各城邦，后者则以工艺品、毛呢、金银相交换。张星烺说："波斯湾沿岸诸地，海道通中国为期甚早。未有历史以前，或已有船舶，沿印度洋岸，往来东西矣。"[3]便指史前西亚、阿拉伯半岛居民的航海活动，但对波斯湾通中国的航海活动估计可能有些过早。

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在半岛西南端的也门，很早就发展了农业文明。这里的南部阿拉伯人称赛伯伊人，在漫

长的历史时期内，他们曾独占南海的贸易，把从印度来的香料、布匹和刀剑，从中国来的丝绸，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奴隶、象牙、黄金等，经过红海转运到西方去。关于古代阿拉伯人的航海事业，阿班教授曾有这样的论述：

> 由于中国、印度商品运到阿拉伯半岛的港口，阿拉伯商人通过海运或通过陆路商队运输到波斯、两河流域、沙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沿岸，许多阿拉伯人从经营他们半岛生产的产品和从印度、中国进口的贸易中发财致富。阿拉伯人和效仿他们从事远东贸易的半岛地区的人民获得的财富引起一些势力的不满，因而从公元前三千年末，亚述人就企图控制阿拉伯人作为中介所进行的东方贸易。一份古文献记载阿卡德国王赛尔贡皇帝（公元前2300年）成功地使马干、达勒盟和马鲁哈的船只进入阿卡德港。众所周知，马干即阿曼，达勒盟即巴林，马鲁哈即印度。从很早以来，波斯人也企图与阿拉伯人竞争这一贸易的利益。公元前521至前485年，在大流士皇帝时代，波斯人发动了一次征讨，从阿拉伯海湾到苏伊士湾包围了阿拉伯半岛取得成功，并抵达埃及，旨在控制海上丝路的两条通道：阿拉伯海湾通道和红海通道，从而控制远东贸易，将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人排挤出去。但大流士国王的征讨取得的成功维持时间不长，而且在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征讨，因而他们还称不上是冒险家。同样希腊人也企图控制红海和阿拉伯海湾的航海权，他们在现在的科威特国法拉尔岛上建立了定居点。在过去

的时代，波斯人控制了途经阿拉伯海湾到印度、中国的贸易。但他们的控制没能剥夺阿拉伯人有效地参与这一贸易活动，因为阿拉伯人有着长期在印度洋航海、造船的经验和丰富知识。由于波斯人需要作为中国、印度船只航行起点的阿拉伯人的港口，因而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对东方贸易的争夺在过去的时代此起彼伏。

据他的论述，阿拉伯人的船舶直到中国秦汉时代，尚未经过南海航道东至中国：

中国人自公元前各时期以来航行在印度洋水域，他们的船只在中国港口和西印度港口之间进行远航。阿拉伯人也是如此，他们的船只从阿拉伯海湾和也门沿岸港口起航，前往西印度港口和印度南部沿岸，在那里同中国商人会合，从中国商人和印度商人那里获得中国和印度的商品，并向他们出售阿拉伯半岛出产的贵重商品，其中最贵重的商品有香料、铸铜、乳香、珍珠等。

阿拉伯人可能是最早掌握海洋季风特点的民族。当夏季印度洋刮起西南风时，他们的商船趁机在海洋上顺风东航，这比近海沿岸航行要快捷得多。过去认为，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商人积累其海上航行的经验，发现了季风的作用。欧洲人把季风的发现归功于希腊海员希帕鲁斯（Hippalus），但希腊拉丁语“季风”（monsoon）一词来自阿拉伯语“季节”（mauzim），证明阿拉

伯人早就了解了季风[4]。

公元前521年，大流士平息了波斯帝国的内乱，使波斯帝国达到最大范围。大流士重视海运的开辟，他曾派希腊人斯基拉克斯自喀布尔河与印度河会流处出发，由印度河顺流而下，入印度洋，过波斯湾，环绕阿拉伯半岛而抵红海，在今苏伊士港登岸。这次航路探测，显然是为了核实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的印度到巴比伦和埃及的海上航线。波斯在印度设省以后，印度和埃及、巴比伦的交通便是水陆并进，联系较前密切许多。这条航线和中国经南海而达印度的航线连接起来，成为沟通欧亚非的海上交通大动脉。为了便利埃及和地中海沿岸至红海的交通，大流士还继续开通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原来这项工程在埃及中王国时期便有开端，那时从尼罗河支流开了一条通向东南的水道，缩短了有关的陆上路程。后来26王朝的法老尼科二世又企图延长这条水道使它经苦湖而达苏伊士湾，可说是今天苏伊士运河的前身，但计划未成而废。大流士遂决定续成其事，使运河终告竣工。据说运河全长达四日航程，宽可容两艘三层桨座的战船并行，可见工程的浩大和船只来往的方便。波斯是一个传统的海上强国，地处西亚的位置使波斯海商长期以来扮演着古代东西贸易中间人的角色。公元前四世纪以前，波斯帝国的海军曾经驶出波斯湾，进入阿拉伯海，远征过厄立特里亚。这些海运的开拓使东亚、印度和西亚、北非、欧洲的交通更为发展，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在印欧语系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之前，那里已经出现了被称为哈拉巴文化的印度河文明，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

2000年印度河文明盛期，已达于奴隶制大国的发展阶段。考古发现大小城镇遗址二百多处，其中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是印度河文明的典型代表。从印度河文明城市的发达可以看出它的商业相当活跃。不仅国内贸易频繁，而且还有兴盛的国际贸易，与中亚、伊朗、两河流域常有往来，哈拉巴文化居民通过印度河进入阿拉伯海，航行远达波斯湾或驶入红海，与西亚文明保持着联系。当时的两河流域正处于苏美尔文明后期，在苏美尔文献上常提到的一个海外经商之地梅路哈，一般认为即指印度河文明。同时苏美尔城市如尼普尔、乌尔等皆发现印度河文明特有的印章（它与苏美尔的圆筒形印章不同，是方形压印的，与中国印章相似，其文字图案亦极具特色而与苏美尔判然有别）、内红玉髓串珠和其他产品，说明两地联系确实比较频繁。从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常用工艺原料的产地也可看出它国外贸易的发展，如它所用的青金石皆从阿富汗得来，这与两河流域所用的青金石来源相同，可以设想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青金石贸易路线。印度文明遗址发现的镶嵌用贝壳来自南印，孔雀石和皂石来自伊朗，玉石来自中亚、缅甸甚或中国。其青铜冶炼业必需的锡本地也无出产，只能求于中亚。近年在中亚奥克苏斯河沿岸（今阿富汗北部）发现的一些印度河文明遗址可能是锡的开采和转运点。

50年代的两个重大考古发现对印度河文明的商业活动也有较多说明。其一是在印度西海岸发现的罗塔尔遗址（在今印度阿赫麦达巴德附近），它显然是印度河文明的海港城市。虽然罗塔尔位于摩亨约·达罗东南有700公里之远，城市规划一

如后者,有上下城之分、谷仓之设和完备的排水设备。作为海港,罗塔尔最惊人的建筑是一座长225米宽37米的船坞,以烧砖、沥青筑成,有闸门开启,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航海船坞(在公元前2100年至前1900年间),反映了当地与苏美尔的海外商业已经经常化,和近年海洋考古学界以苏美尔芦苇帆船航行两地的实验所揭示的古代海运情况相符。另一发现是在波斯湾中部的巴林岛以及科威特的菲拉卡岛上的古文明遗址,表明它们是两河流域经波斯湾与印度河文明往来的中继站。它们基本上是苏美尔文明的外延,但也有印度河文明的印章等典型文物。一般认为,巴林就是苏美尔文献经常与梅路哈并提的狄尔蒙,有了这个中继站,双方的海运就更为方便了。

雅利安(Ariya,意为"高贵的")人进入印度河流域,摧毁了已经走向衰微的印度河文明。当时雅利安人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阶段。灭亡印度河文明之后,他们并未据其城市而组成国家,继续过部落生活。至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少数发达的部落才开始建立王国,到公元前六世纪时,北印各地的奴隶制小国已达数十之多,其中有些已经扩张为较大的王国。因此当后期吠陀时代结束之时,印度已经进入其列国时代。列国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孔雀王朝兴起之时。在列国时代,恒河中下游经济最为发达,城市众多,工商业兴盛,各王国首都都是巨大的工商业城市,如王舍城、舍卫城、波罗奈、吠舍厘、怛叉始罗、华氏城等。当时铁器已普遍使用,农业生产水平和产量大有提高,手工业分工细密,产品技艺专精。佛经中所记手工匠人即有十八种之多,金银珠宝、香料香水、精纺纱麻等印度传统工

艺品蜚声国外，交易频繁。因此，在繁荣的国内市场之外，印度还有活跃的海外贸易，与斯里兰卡、缅甸和西亚有海运联系，由犍陀罗经阿富汗则可通中亚，西连波斯。当时波斯帝国在印度设省，已统治犍陀罗西部和阿富汗一带，印度在波斯各省中独以黄金岁贡，且数额亦最大，可见印度富裕。据佛经所载，波罗奈城有一富商曾带领500名商人入海采宝，最后到达锡兰。

在列国时代称霸的摩揭陀国至孔雀王朝时，版图北及今阿富汗的喀布尔、坎大哈和赫拉特等地。向南扩张至于迈索尔一带，从而在印度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规模最大、开拓疆土最广的的奴隶制帝国。孔雀王朝建立者旃陀罗笈多时，印度工商业很活跃，尤以对外贸易表现突出。印度传统出口产品如金银珠宝、纺织品、象牙工艺品在国际市场获得崇高声誉，西亚和中亚的货物也源源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政治理论家高底里雅所著的《政事论》一书已经提到中国的丝绸，而且还有蚕丝的输入，使善于精纺的印度纺织业能生产出精美的丝织品。孔雀帝国的极盛时期是其第三位国王阿育王之世（约公元前273年—前236年），他曾征服了海上贸易发达的羯陵迦国。继阿育王的太平盛世之后，孔雀帝国终因各地发展很不平衡而趋于分裂。公元前30年，为南方的安度罗所灭。

安度罗没有能够在北方长久立足，它始终是一个南印国家，其全盛期在公元二世纪，三世纪后衰亡。与之同时，北方的羯陵迦也一度兴盛，它在公元一世纪卡罗维拉国王当政之际曾两次进攻北印度，占领了摩揭陀等地，他还远征南方，令潘地亚等国俯首称臣。从现存安度罗、羯陵迦和中印、南印等地的文物和考

古发掘情况看，这时南印东西海岸的经济仍在继续发展，商业兴盛，一些较大的海港城市与西亚、埃及的国际贸易往来密切。阿班教授论述古代阿拉伯水域的航海活动时说：

> 我们尚未发现有关阿拉伯人船只在公元前历史时期或在公元初几个世纪抵达中国沿海或中国人船只抵达阿拉伯半岛港口的史料和证据。但一些史料表明由海上丝路运抵印度的中国货物是由中国和印度的船只运输的，而由印度、锡兰市场运往阿拉伯半岛的货物是由阿拉伯、波斯、印度船只运输的。因为在伊斯兰的时代，印度船只就已在阿拉伯水域航行，抵达索克特拉岛、亚丁海岸、苏哈尔、巴林和艾卜拉港口。在这期间，在这些港口居住有来自印度的侨民。在海湾水域航行的印度船只一直享有盛名，伊斯兰前的一位名叫拉比德·本·拉比阿的诗人对印度的船只这样形容："纵横海上，准确无误。"

南印度人在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们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所以其航海活动缺少自己的文献材料，只能靠考古材料给予说明。南印度航海者西行的终点是红海海口。据布尔努瓦《丝绸之路》一书中所说，印度西部与阿拉伯海岸之间的贸易关系，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印度航海者把他们的商品一直运到红海海口后，就转到了红海沿岸民族的掮客手里，有的通过陆路，有的通过海路而转送到地中海地区，如埃及海岸边的亚历山大港，阿拉伯海岸的加沙和皮特拉。红海沿岸的全部

贸易都程度不同地被阿拉伯人所操纵，如纳巴提安人和那些拉丁文著作中所提到的其他民族，或者是一些附属于他们的部落。他们的目的就在于阻止印度船员们越过曼德海峡，谨慎地保护着自己与东方贸易的过境权。

当时西亚、埃及皆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由于地缘的相近开创了印度和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局面。中国的丝，印度的香料、棉布、象牙、特别是胡椒，斯里兰卡的真珠宝石、特别是璧流离，皆为罗马人所喜好。为了得到来自东方的珍宝奇货，罗马人需要逾越两大障碍，一即在叙利亚一侧的安息人和且兰人，二即红海一侧的阿拉伯人。罗马人与安息人长期进行战争，与之和解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罗马人便努力开拓经由海上与东方进行贸易的途径。罗马人注意保护海上交通道路的安全，发展海外贸易以获得东方的物产，所以海上的交通自罗马帝国初期便日趋繁盛，这种交通自奥古斯都（Augustus）至尼禄（Nero）帝时达到高潮。罗马执政官庞培（Pompeius）曾奉命剿平海盗，不仅使罗马完全控制了地中海洋面，而且拥有了对且兰（巴尔米拉）和皮特拉施加压力的手段，而这两个地区都是倾销异国物品的通商小径的桥头堡。且兰处于安息与罗马之间，控制着通向东方的通商要塞；由此亦可到达波斯湾，那里可以直通印度港口。皮特拉则是一座由纳巴提安人居住的城市，其一端与且兰相连接，是一条海路的终点，可以沟通红海与印度洋的之间的贸易。为了避开阿拉伯人作为中介，罗马人冒险越过曼德海峡，穿过印度洋，直接同印度商港做生意。

一个偶然的事件建立起罗马人和锡兰的联系。据老普林尼

《自然史》记载,在喀劳狄一世在位(41 –54 年)期间,有一位负责红海税务的收税官叫普洛卡姆斯,他派遣一位名叫布勃里乌斯(Publius)的获得自由的奴隶赴红海照料当地的税收,这位代理人在被称为"香料之角"的瓜达富伊角被劲风卷走,在汪洋大海漂流了 15 个昼夜之后,在锡兰的港口伊布鲁斯(Hippuros)翻船。他在此地滞留达 6 个月,受到本地国王的殷勤款待,并学会了当地居民的语言。他向这位国王介绍了罗马的情况,国王对于罗马政府充满钦佩,决定与罗马结盟。他派出四位使节出使罗马,首领是拉奇亚斯(Rachias)。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公元 47 年,希腊水手希帕鲁斯(Hippalus)利用海洋季风,渡过了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由于发现了印度洋上极规则的定期西南风(Monsoon),大大促进了印度洋上的航海贸易,后来人们便称这种季风为"希帕鲁斯风"。当时自埃及至印度之间的航海活动已经开始利用海洋季风,罗马商船频繁出没于红海和印度洋,从此以后,"西方商人在红海和印度洋之间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中国文献中对此也有所反映,《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与海中,利有十倍"。实际上印度人和阿拉伯海员早已掌握了季风的规律,希帕鲁斯可能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到关于季风的知识,但经他介绍对罗马人的海上贸易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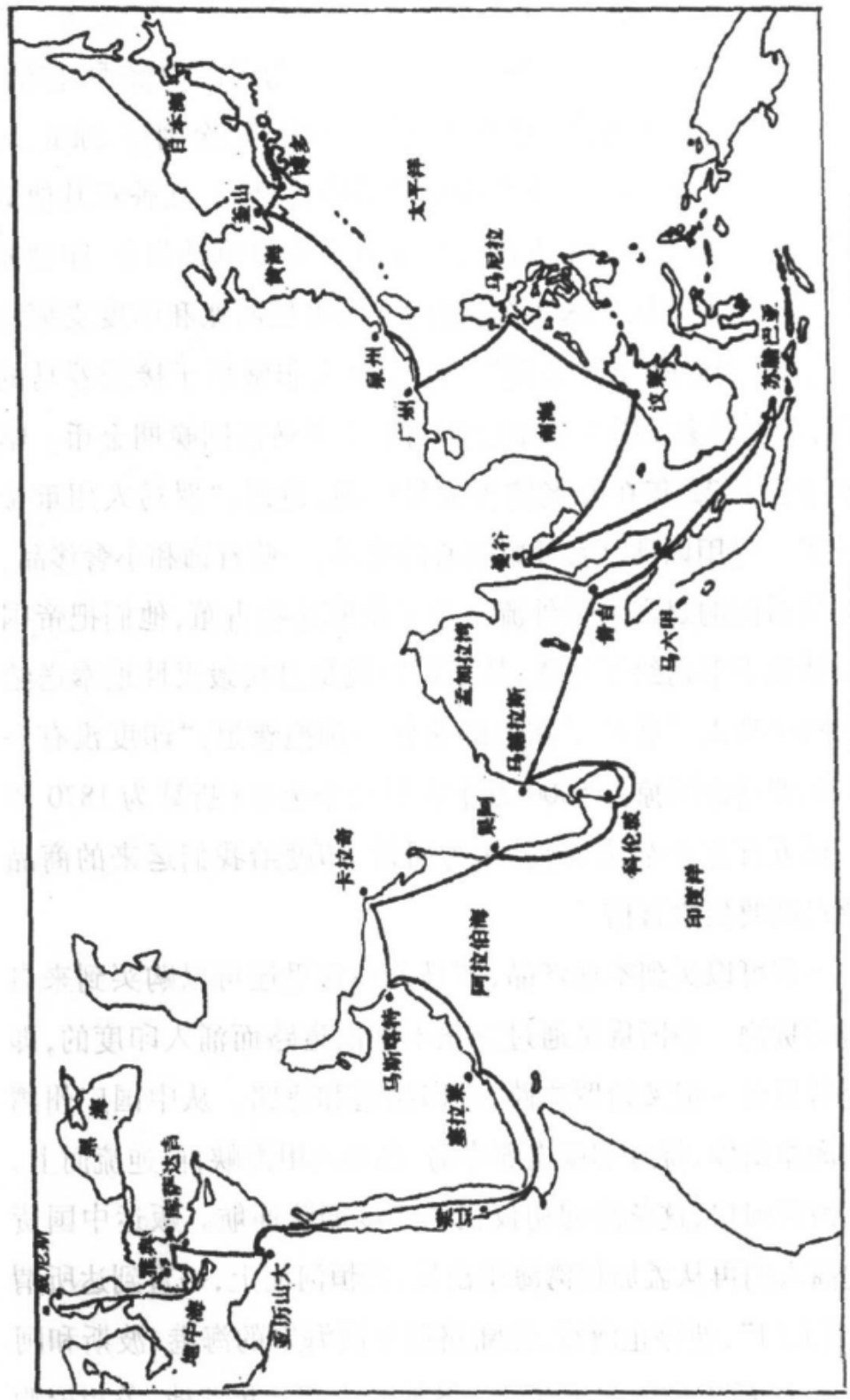
反映这种海运联系最为突出的是印度海岸古代海港遗址的发现。上世纪 30 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塔比拉明(P. Z. Pattabiramin)发现了阿里卡梅杜(Arikamedu)海港遗址,它位于印度东海岸的奔迪治里市附近,是公元一世纪时印度与罗马交通贸易

的中心商埠之一。帕塔比拉明多次到这里调查发掘，发现了一些可能直接由罗马商人或地中海东岸各地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这里出土有希腊和罗马的陶器、玻璃器以及罗马帝国钱币，本地货物则有香料、宝石、珍珠及薄棉轻纱等类。此外还发现了公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的20件带题铭的陶器，铭文系婆罗谜文拼写的泰米尔语。后来英国考古学家惠勒(M. Wheeler)和印度考古工作者又在此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查明此地早在公元前1000年后期已经成为商埠，而从公元前一世纪后半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14年)时代起到公元二世纪末，成为印度与罗马海上贸易的重要中心。有意思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市附近古罗马庞培城遗址出土了两枚印度象牙雕刻。我们知道，公元79年，庞培城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遭毁灭。这两枚印度象牙雕刻作品正是公元一世纪时罗马与印度频繁进行海上贸易的物证[5]。

罗马人到达印度沿岸，便在这里得到中国的产品。布尔努瓦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佚名作者《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和老普林尼《自然史》等书的记载，描述了从罗马至印度的航程，这些著作反映了公元一世纪时海上交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前者作者可能是一位居住在埃及的希腊商人，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原籍为贝雷尼斯，他可能经常赴印度旅行。按照布尔努瓦的描述，人们从亚历山大港经由陆路沙漠到朱利奥波利斯(Juliopolis)，从朱利奥波利斯顺尼罗河到达科普多斯(Cpotos)，在科普多斯重新编队，接着日夜兼程至贝雷尼斯，这一段行程需要24天。为了赶上季风，人们当盛夏之季乘船南下红海，又需一个月

的时间。在红海航线，人们成群结队前进，并由步兵弓弩手护送，因为这一带是海盗频繁出没之地。到印度的航海家要在奥切里斯（Ocelis，策勒）稍事停留，这是阿拉伯海岸的一个港口，与巴林岛只隔一条狭窄的海峡，恰好位于红海的出口处。这个地方就是印度航海家的终点，越过这个停泊点，印度人就无权继续西行了。从奥切里斯到印度第一个港口即西北部的婆罗羯车（即布罗奇），需要大约 40 天的行程。当时从罗马到亚历山大港平均需要 24 至 25 天，渡过红海需要一个月。再考虑到沿途停泊、补充给养、装卸货、其他海损以及各种耽搁，统统计算在内，从意大利到印度一般的平均时间是三个半月。船队于 10 月份进入印度港口，到来年 4 月乘反向风返航。

在印度沿岸各港口如婆罗羯车、谬济里斯（今柯钦岛的格朗加诺尔，胡椒盛产地），或者是在科罗曼德尔海岸上，如卡马拉（当今之特兰克巴尔）、波杜克（今之本迪治里）、索巴特马（当今之马尔卡纳姆），罗马商人们在成群结队的译员的协助下购买当地的土特产。罗马人购自印度的产品最重要的是胡椒，胡椒可以用作调味品和医药，因此罗马对胡椒的需求量很大。据说作为一种便民措施，罗马政府曾决定免征胡椒进口税。胡椒在罗马的售价是每罗马磅 15 个古罗马银币。印度著名的细棉平纹布也是受罗马人非常欢迎的产品，据说因为这种布纤细而轻盈，所以罗马人称之为“云雾纱”，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织一匹，一匹宽达 90 厘米，长 18 米。由于当时罗马人追求服装的透明，所以大量进口这种细棉平纹布。罗马商人还购销印度的象牙，以代替来自非洲的产品。象牙制品是专供行省总督、宠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路线图（选自《明报》月刊，1991年第7号）

和爱姬等富有者使用的，或为帝国境内各种宗教庙宇服务。此外，罗马还从印度进口各种染料和许多医药产品如檀香、棕油、蔗糖、芳香树胶、枸杞等，还有马纳尔湾的珍珠、金刚钻、绿玉、玛瑙或光玉髓。罗马人用来交换的产品则是珊瑚、乳香和其他玻璃器等。罗马人与印度人进行贸易的主要货币是黄金，印度航海者到东南亚地区寻求黄金，他们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称为“金城”、“金地”或“金洲”。印度商人非常乐于接受罗马的金币，考古学家在锡兰和印度发现不少罗马帝国晚期金币。喀劳狄于公元22年在元老院曾大发牢骚，他说：“罗马人用重金购来了一些用以满足女性虚荣心的物品，一些首饰和小奢侈品，这就使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为了换取这些古董，他们把帝国的金钱拱手奉送给了异族，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毁灭性地奉送给了罗马的敌人。”普林尼在他的著作中则抱怨道：“印度没有一年不从罗马帝国掠去5000万个古罗马小金币（折算为1870年的一亿五百万个金法朗）。作为回报，印度给我们运来的商品在罗马则要贵之百倍。”

不仅可以买到本地产品，罗马人在这里还可以购买到来自中国的货物。中国货是通过三条不同的道路而涌入印度的，即巴克特里亚－怛叉始罗之路、中印缅道和海路。从中国广州湾的南海岸出发，绕过印度支那半岛，经马六甲海峡，再逆流而上，直至恒河河口，这条路起初仅仅由印度船队通航。贩运中国货物的商人们再从孟加拉湾海岸出发，溯恒河而上，一直到达所谓“恒河大门”，便停止海行，经陆路运至西海岸的海港、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后来也运销于欧洲。各地商人都云集此地，争相抢购

东方的畅销商品。在公元一世纪以前，地中海地区所进口的大部分丝绸是经过海路而运输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曾记载来自中国的货物诸如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医药和丝绸等在印度港口装船。

四　自印度至中国南海航线

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是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贸易网的一部分，在这条线路上，开拓了海上交通的是古代印度人、昆仑人和中国人。

中国海商在海外活动必须依靠当地商人，在东南亚基本上依靠的是当地的“昆仑人”，昆仑人是东南亚诸岛上的主要居民之一，即马来人和其他东南亚土著民族，他们是善于航海的民族。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操马来语的居民迁出马来半岛，航海进入今印尼诸岛和菲律宾诸岛。与此同时，起源于我国东南的百越族逐步进入东南亚。马来人与印度次大陆及东非有着传统的联系。“昆仑”海商贸易的对象除了东南亚本地以外，主要是北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印度。当中国商船尚未进入印度洋的时代，他们担当了中国与北印度洋诸国和地区以及更远的国家和民族间贸易联系的任务。后来中国商船进入印度洋以及更远的沿海交通线上，也主要是在他们和印度人的帮助下实现的。公元一世纪末成书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曾谈到古代印度以东沿海民族的航海与贸易活动。他说位于恒河附近有一片地区，叫做“金洲”，河滨则有一个称为“恒伽”的市场。“香叶、恒

河甘松茅、固着丝以及号称为恒河麻布的优良麻织品等，都在那里转口”。恒河河口附近有一个名为“金洲”的海岛。“经过这一地区以后，就已经到了最北部地区，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秦尼’(Thinai)，哪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 Serikon(意为‘丝国的’)的丝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或通过恒河运至利穆利(Limurie)”。根据他的记载，东行的希腊罗马人在印度以东沿海地区了解到当地民族的航海与贸易活动：

> 在那些利穆利或北方人登陆的当地市场和港口中，最重要的是吉蔑(Kamara)、波杜克(Podouke)、索巴特马(Sopatma)等著名市场，这几个地方互相毗邻。人们在那里可以发现土著人的船舶，它们沿着海岸前驶就可以直抵利穆利地区，还有另一些由单一的横梁装配而成的很大的船只所组成的船队，人称这种船为“桑伽拉”(Sangara)，至于那些驶往金洲或恒河河口的帆船，十分庞大，人称为“科兰迪亚”(Kolandia)。

戈岱斯(George Coedès)在《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中指出，书中提到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容易考证清楚。“赛里斯国”和沿海岸北上而支达的“秦尼城”显然系指中国，“金洲”则是印度文献中的 Suvarnahūmi 之意译，它指的至少是孟加拉海湾东部沿岸地区的一部分，而“金岛”则是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或马来半岛本身。那么所谓“土著人”及其船舶便

是对古代东南亚民族及其航海活动的描述。

印度洋东部传统的国际商业语言是印度的古泰米尔语及其祖先达罗毗荼语和东南亚的古马来语。马来人在古代海上东西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们的历史编年晚至1365年的《爪哇史颂》才开始，所以他们在海上交通中的贡献缺乏文献记载。东南亚发现的中国的钱是西汉王莽时铸造的，其中包括“五十大钱”，还有东汉时代的“五铢钱”。说明汉代中国已与这一带居民有贸易往来，司马迁《史记》已经记载外币的形制[6]。

在这条中西之间交通的海上航线上，中国人的开拓要晚于印度洋以西诸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了征服海洋的斗争，但其发展方向主要是东南向太平洋诸岛国。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察结果说明，早在7000多年前，河姆渡一带的先民就用原始舟筏进行海上活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有段石锛”在台湾、菲律宾、太平洋群岛都有发现。考古资料说明，这种工具首先是从大陆传向台湾，大约在3000年前，又从台湾传至菲律宾，进而传至玻利尼西亚、太平洋群岛。说明那时已经有了原始的渡海航行的活动。古代的航海事业到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广州发现的秦汉时代的造船场遗址看，当时中国船舶已经具备在南海进行近海航行的能力。秦朝在公元前222年至214年间征服“百越”，其势力达到南海，秦在沿海建立了闽中、南海、桂林、象等郡。当时的造船场遗址说明，秦已积极发展南海海上交通。但直到秦时，文献上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人通过南海海上交通西行进入印度洋的活动迹象。

秦二世即位，其南海尉任嚣死，龙川令赵佗继任。中原发生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赵佗绝道聚兵自守，击并桂林、象郡，建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汉初，高祖刘邦册封赵佗为南越王，称南越国，赵佗接受了这一封号，愿为藩辅。后来因为不满意吕后对南越的政策，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进攻长沙国，控制闽越、西瓯，割据南方沿海地区，“东西万余里”。文帝时赵佗又去帝号，愿为藩辅。直到武帝平南越，南越国立国达60余年，发展了海上交通。汉文帝与南越王修好，在《赐南粤赵佗书》中说到“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7]说明南越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有交通往来，其中应当包括沿海国家和地区。

1983年发掘了广州解放北路象冈山南越国第二代王文帝赵昧墓，其西耳室中出土的5枚大象牙，成堆叠置在一起。每支长度超过1.2米，最长的达1.26米，全属粗壮形，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与亚洲象的纤细形牙区别明显，应为非洲象牙[8]。在此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带盖的扁球形波斯银圆盒，据考证是墓主生前盛药的器物。这个银盒与伊朗苏撒城(Susa)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阿黑美尼德王朝时期制造的刻有波斯王薛西斯(Xerxes)名字的银器类同，说明其生产时间之早。由此可见，西汉时自东非通过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的航路早已走通，非洲、波斯的物产通过辗转贩运，已经进入中国。很可能在先秦时代，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印度洋西部地区和非洲就有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海上往来。

当南越国存在时，内地与南方沿海地区的交通常受梗阻。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10万人平南越。元封元年(前110年)，又由合浦(今

广西合浦东北)、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出海,进占儋耳(今海南岛),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汉朝开始了利用南海海道与西洋诸国进行交通的活动。西汉末年的扬雄在《交州箴》中已经写到武帝时南海交通的开辟:

> 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羁不绊。周公聽祚,白雉是献;昭王陵迟,周室是乱。越裳绝贡,荆楚逆叛。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抗(当作航)海三万,来牵其犀[9]。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粤地"条,更具体地记述了武帝以后船舶出海汉使西行路线,云:

> 自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南入海,得大洲(今海南岛)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凌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自日南(今越南广治省)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唐玄奘称建志补罗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

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转（当为"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在今马来半岛，今马六甲海峡东部的 Pidang 岛，今称香蕉岛），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日南郡属县最南一县）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至此还矣。

这里涉及不少古地名，对这些地名的具体位置，学术界众说纷纭，因为航程与所记国名的对音，很难一一确考。费琅考证，夫甘都卢国当为缅甸之蒲甘（Pagan）古城，遗址在今伊洛瓦底江东岸。皮宗是蒲牢皮散岛（Pulaw Pisan），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冯承钧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按照另外的说法，都元国在今越南南部，邑卢没国在今曼谷湾沿途，谌离国在克拉地峡东端暹罗湾西岸，夫甘都卢国在克拉地峡西端安达曼海东岸，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岸的康契普腊姆（Kanchipuram），黄支是 Kanchi 的音写，puram 义为都城。还有人认为，已程不国为阿比西尼亚国（Aethiopia）。关于汉使西行的路线，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当时船小，抗风浪能力差，不宜深海航行，所以船行至马来半岛克拉（Kra）地峡东岸后，便舍舟登陆，向北经今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再西航经孟加拉湾抵达印度东南部。但有两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一是黄支国在印度境内，一般都认为黄支国

应是印度东南沿海泰米勾那度省的建志补罗(Kanchipura),即现在的康契普腊姆,它曾是达罗毗人的国都[10]。二是汉使的终点到已程不国,即斯里兰卡。汉使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购得璧琉璃,从语言学角度也证实汉使到达了印度沿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从语源上说,璧琉璃出自梵文俗语 Verulia 或巴利文 Veluriya,又被译为吠琉璃、毗琉璃等。当中国商使到达了黄支国和已程不国时,中国人便正式加入了中西间海上的交通和交流活动。

除了印度之外,斯里兰卡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不仅中国汉代文献中记载了已程不国,罗马文献中也提到它的名字。老普林尼(Pline L' Ancien,23－79 年)《自然史》称之为 Taprobane,《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称为 Palaesimundu,托勒密《地理志》中名之为 Salike。六世纪时克斯麻斯称其印度名为 Selediba,藤田丰八以为乃梵语 Simhaladvipa 之讹,意译即中国文献中的"师子国"。当中国人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时,罗马人则早已了解并来到这里。如前所述,据老普林尼的记载,在红海航行中遇风,在海上漂流 15 天后到达斯里兰卡的那位监税官,在停留半年后,与斯里兰卡使节拉奇亚斯(Rachias)一起返回罗马。据这位斯里兰卡使臣说,他的父亲就曾到过"赛里斯国"。可知斯里兰卡在中国与罗马之间起了联接东西方航线的作用。

从《汉书·地理志》的这段记载来看,中国与斯里兰卡、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一定要经过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半岛和缅甸沿岸。中国与越南的文化联系历史悠久,由于两国的毗

邻关系,有信史可考者,至少在2000年以上。在越南东山文化中,青铜器以兵器为主,其中有剑、盾、匕首、刀、矛、戈、箭镞、靴形斧和钺等。据说,这些兵器"具有秦汉时代中国兵器的风格","装饰品主要是铜耳环和手镯,还有作工精巧的铜带钩和铜泡,都与中国汉代的样式极其相似"。越南的铜鼓"形制花纹与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鹭翔、羽人竞渡铜鼓非常相似"。"此外,还发现一些铁器,有铁矛、铁剑、铜柄铁剑等。还出土一批汉五铢钱和王莽钱(9－23年)。这些铁器和货币都是由中国内地输入的"[11]。秦汉时中国与越南沿岸间的海上交通也有新的发展。秦平南越,水军取道海上直趋今顺化沿海地区,置象郡,为古代中越海上交通辟一新的途径。汉武帝时平南越,于南方沿海地区置九郡,在今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交趾、日南、九真等郡进入汉朝势力范围,与今两广地区和内地有着水陆交通线,"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记载汉代以来大秦商人东来,云:"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则其东来最东的终点便是交趾。而且由于地当南海交通要冲,中国人从合浦、徐闻南入海西行,印度、阿拉伯和罗马人东来入华,都要经过今越南沿岸港口。

柬埔寨古称扶南,《汉书·地理志》此段记载虽然没有提到柬埔寨某地,但因为当时航海水平的限制,船只只能近海航行。汉代船只还不可能从越南港口直航马来半岛,则途经柬埔寨沿岸是必然的。据上引《梁书·诸夷列传》记载汉代以来大秦商人东来,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则扶南沿岸当然有商船停泊之港口。考古发现在今越南沿岸古海港奥高(Oc－èo)遗址就

是古代地处扶南的中西间海上交通路线上重要的港口。1942至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马勒尔(L. Malleret)在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发掘了一处公元二至六世纪的海港遗址,即奥高古海港遗址。马勒尔陆续发表了他的考古报告《湄公河三角洲考古记》。金欧角当时属于扶南国,扶南古海港的发现引起研究中西海上交通史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法国格鲁塞、考狄尔,日本梅原末治、冈崎敬,中国学者宿白等都撰文研究其中出土的文物,分析奥高遗址的发现及其对研究东西方海上交通史的意义。据林梅村的介绍,扶南古海港奥高遗址距离现代海岸25公里,当时应在海边。这里发现的建筑遗址多为干栏式,古墓为砖石墓。在这些古代遗存中发现了许多金锡制品,包括指环、耳环、钗等佩饰和小型铸像。铸像的相貌类似印度和中亚胡人。锡制品多于金制品。从遗址中发现铸造锡耳环的砂岩石范,可知锡制品是当地居民自铸。奥高距离盛产锡矿的缅甸和我国南方不远,所以有发达的锡铸造业。在一些锡制印章上和小锡片上刻有文字,采用印度流行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其铭文内容多为"小心"、"注意"等等,似为商品标签。奥高遗址与天竺商人关系密切,这里出土的铜佛像多数为南印度式,也有个别犍陀罗式佛像。奥高出土的中国文物有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残片,如西汉流行的规矩镜和东汉三国时期流行的八凤镜。奥高遗址还发现一些罗马文物,其中有公元152年发行的罗马金币和公元161－180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是汉文史料中提到过的罗马皇帝大秦王安敦在位时发行的。这里还出土了罗马玻璃残片,而类似的玻璃器在中国东南沿海汉

晋古墓中屡有发现。奥高遗址还发现一定数量的金银首饰和凹雕宝石，这些物品有的可能是直接来自罗马，有的可能是受罗马风格的影响而制造的。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光玉髓质的，是安敦时代的圣牌和其他物品。有一种被称为“多面金珠”的装饰物，这是一种镂空的小金球，直径 1.4 厘米，十二棱形，每面正中有个圆形穿孔，每个角有突起的圆珠四粒。类似的金珠曾见于印度河流域的怛叉始罗遗址，近年在中国广州东汉前期墓（编号 4013）中发现一例[12]。这些文物显示奥高古海港遗址曾是中国、印度、罗马古代交往的一个重要中继站。中国文献中记载大秦商人东行往往至扶南，当与此海港有关。

从柬埔寨海岸西行则至泰国沿岸。汉使商船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发，航行大约五个月到都元国，此都元国为现在何地，学术界争议很大。藤田丰八认为是《通典》所载的都昆国，或称都军，在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附近。岑仲勉认为在泰国克拉地峡以北之 Htayan（今属泰国），南去万仑湾不远。许云樵不同意藤田的看法，认为都元国和邑卢没国决不可能远至苏门答腊或缅甸，应求之于婆罗洲及暹罗南部。都元既在婆罗洲，又是《通典》所谓都昆或都军，而《通典》言其方位则云：“扶南渡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国。”那么金邻大湾肯定即暹罗湾，所以都昆不在马来半岛，就在婆罗洲。而以都元国之行程推算，后者为妥。朱杰勤认为都元国在越南南部的沱灢。谢光认为都元国即《新唐书》的陀洹和乾陀洹，即今泰国之碧武里[13]。泰国籍华裔学者黎道纲研究了《汉书》以来的大量有关材料，认为后来诸种史书中所谓“屈都昆”、“都昆”、“都军”、“屈都乾（读如‘干’）”

等，都是都元的异读。屈都乾汉时就存在，唐代的陀洹就是早年的都元国；根据古代文献关于其地方位的记载、后世学者的研究和现代考古发现，都元国即泰国巴真府摩诃梭古城，乃泰海湾濒海古城[14]。

自都元国船行四月至邑卢没国，再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邑卢没国和谌离国又在哪里呢？学者们亦众说纷纭。岑仲勉认为邑卢没在苏门答腊北端的蓝无里，谌离是仰光附近的沙廉（Syriam）。藤田丰八以为邑卢没即《唐书·南蛮传》中之拘萎密，在今之暹罗或缅甸附近，后又说在缅甸南部勃固附近。谢光认为邑卢没在泰国甲米府攀牙府到缅甸南部丹那沙林一带。谌离是今白古地区。韩振华认为邑卢没即罗斛或华富里，谌离为 Samarattha 或 Syamarstra，其首都在今佛统[15]。许云樵说邑卢没“当在今暹罗湾东岸”，“吾人既以步行之地为地峡，则谌离国应在东岸。”谌离即顿孙，今缅甸的 Tenasserim 的对音。岑仲勉说，《梁书》谓城去海约百里，则古代或别有滨临海岸之城市，非今日舆图中去海约百里之 Tenasserim。朱杰勤则同意谌离之对音即 Tenasserim，他还认为“邑卢没应该是近海的商港。商船经过暹罗湾时，势必在暹罗湾西岸下碇。”“邑卢没可能就是暹罗湾最大人口处（今之叻丕）。”姚楠则有与朱杰勤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当时的中国商船是沿海逐岛小心谨慎地向南海诸国前进的。邑卢没应该在泰国西岸求之，可能就是曼谷湾西岸之叻丕一带[16]。黎道纲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说：“汉使海行五个月来到金邻大湾东侧之都元国。然后再沿海湾逐岸小心而行，来到海湾的西岸亦颇费时日。我认为，邑卢没国应是今素攀府

乌通古城。当日乌通近海,是中西交通的重镇,这里有丰富的文物遗存可以为证。从乌通船行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此湛离国应在今北碧府境,这里的篷迪遗址和 Panomtuan 县的 Ban Dontapech 遗址,皆有丰富的遗物可为证据。从这里,沿夜功河上游的小桂河逆行至源头,再上岸步行,沿着 Tongpapun 和今日考廉水库底的古道,不需三日,就可到达 Tenasserim 山脊的三塔关,从此进入缅境,下得山岭,朝夫甘都卢走去。"这种看法与韩振华看法相同,但韩振华认为汉使在谌离都城佛统舍海登陆,黎道纲认为失之过早。汉时今日之佛统尚不存在,那时这里有河道可通夜功河,直至小桂河,这一带即谌离古国之所在。总之,都元国、邑卢没国和谌离国都在今日泰境中部,古之金邻大湾内。

从谌离国步行十余日至夫甘都卢国。据中外学者考证,大多数人认为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境内,即旧蒲甘,今缅甸太公城,濒临孟加拉湾。我们同意黎道纲的见解,上引《汉书·地理志》中所述汉使商船的航程,并未经马来半岛沿岸南端,过今之马六甲海峡进人印度洋。否则"步行可十余日"云云便不好理解。从地图上一看便知,在当时航海技术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在近海诸岛之间航行经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进人印度洋,其航线甚长,肯定多费时日。许云樵说:"二千多年前,航海技术未精,出海船舶习于沿海而行,应循北部湾北岸,沿今越南、柬埔寨之海岸,绕泰国湾,而后才达马来半岛。除了偶然的情况,一般不会由南海直驶马来半岛南端,更无法使之成为一条固定的航线。"实际上,汉代西域商人经海道至扶南、日南、交趾

者，亦不经马来半岛的南端。他们“自印东来，初时大抵沿孟加拉湾航行，至马来半岛北部之地峡，舍船登陆，将货物运至东岸，再搭船续航至中土”。公元二世纪成书的托勒密的《地理志》曾附一张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中，马来半岛附近没有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几个大岛，说明这些岛屿不在当年罗马人、阿拉伯人东来的航线上。他们的船舶只停在马来半岛，没有到中国。黎道纲据此认为，在2000年前，汉使经南海到印度去，一般也不必到苏门答腊，因为苏门答腊不在当日的航线上。

从今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又船行至黄支国、已程不国，就到了汉使西行的终点今日之印度和斯里兰卡。这时汉使的行程便是“蛮夷商船，转送致之。”缅甸沿岸港口是中印间海上交通要道，《汉书·地理志》上引记载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徐闻、合浦入海，至黄支国和已程不国，途经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汉朝商使以金帛交换沿途各国的明珠、碧琉璃和奇石异物。古代航海是近海沿岸进行的，缅甸的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一带，有地名苏伐那斯（sobanas），是古代重要的港口，是中国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至迟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丝绸通过海陆两路传至缅甸，再由缅甸传至印度和更远的其他地方。“掸国西南通大秦”，指的就是从缅甸经海道西南行至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这条中西之间经海路交通的道路现在称为海上丝路。

但我们并不否定汉时商船曾至马来半岛南部，一是《汉书·地理志》此段记载只反映了武帝以后至班固时代的南海航行情况，不能表示班固以后航海事业的发展；二是汉代商船、商使

出洋，未必都是直奔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而去，应当有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活动。从泰国沿岸向南航行，则至马来半岛南端。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代文物中，有许多与中国秦汉时代陶器相似的残片。可以肯定，早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中国和马来半岛南部居民已有贸易联系。过去人们通常认为主要是过境贸易，马来半岛是中印间贸易的中继站，是中印两地商人汇集的地点，看来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沙捞越河口的山猪墓山麓曾发现汉代的五铢钱，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岛的墓葬中也曾出土大批汉代陶器。这些都是汉代与东南亚地区通过海路进行交通的物证。《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西南夷传》记载："顺帝永建六年（131 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叶调国，伯希和、劳费尔（Berthold Laufer）、费琅都以为在今印尼苏门答腊或爪哇岛[17]。

从这条记载可知，西汉的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并且很快便有了相当的规模。汉使每年皆有出洋者往返，行程有远有近，行期有长有短，他们出洋携带与诸国交易的商品主要是"黄金杂缯"，而从沿海各国所得则是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罗马人在印度得到中国丝就是从中国自海道运至者。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王莽遣使厚遗黄支王，可见双方交往的频繁，黄支国通过海路朝贡的物品则有生犀牛。从"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可知，中国商贾是得到各地舟人的协助的。据这段记载，汉朝译使可一直承担从中国到已程不国的翻译工作，他们掌握的可能就是古泰米尔语和古马来语。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朝使臣已经到达"犁轩"，犁

轩又音译为“阿荔散”。佛藏中《那先比丘经》记中亚希腊化王朝弥阐陀国王自称：“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阿荔散即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而犁轩的善眩人即杂耍艺人也经过安息入汉。《新唐书·地理志》云，海南诸国“自武帝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徐闻、合浦当时是重要的海港，今合浦县城东南郊环城镇辖区内，东西5.5公里、南北约12.5公里的范围约有两汉墓葬5000多座，在经过清理发掘的300多座墓中，出土了大批铜、铁、金银、陶、玉器及水晶、琉璃、琥珀、玛瑙等饰物，其中的玻璃杯更是珍品，这些便是汉朝经海路与西域诸国交通交流的见证。

由于航海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出洋交易是很辛苦和危险的。除了水波之险等自然因素，还有强盗劫掠杀人的人为因素。按《汉书·王莽传》所称“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这样遥远的路程，即便顺利往返，亦需数年之久。《宋书·蛮夷传》史臣论赞云：“汉世西译遐通，兼途累万，跨头痛之山，越绳度之险，生行死径，身往魂归。……二汉衔役，特艰斯路。”商贾逐利，在陆路不通时，便利用海路交通。故本条又云：“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同此自出。通犀翠羽之珍，鲛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合称旧大陆，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与摇篮。早在公元前五千纪至三千纪，旧大陆不同地点产生了几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中心，即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黄河、长江流域文明。比较而言，中

国文明中心黄河、长江流域与其他文明中心之间比其他诸文明中心之间的距离较为遥远，在其他诸文明中心之间早就发生密切联系的时候，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联系还没有发展起来，或者仅仅存在间接的了解和交流。而当汉使进入印度洋，则与诸文明之间的联系便变为直接的和密切的了。因此，《汉书·地理志》中这段记载所反映的汉武帝时中国人西行至印度、斯里兰卡的活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条海上交通的航线贯通以后，便成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在它的西端，以地中海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其触角延伸至西非、西欧和北欧各地；在东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各城市，向东亚、东南亚各国延伸，与中国至地中海东岸的陆上丝路共同承担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任务。在这条贯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海上交通线上，还有几条可以通航的世界闻名的大江大河，从各大陆注入西太平洋、北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如长江、黄河、湄公河、伊洛瓦底江、恒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联接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等，把沿海交通的触角延伸到旧大陆各地，在联系古代世界各文明中心和推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随着历史发展，海上交通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陆上交通，在传播人类各地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

东汉时，南海海道上的交通日益频繁，航路进一步拓展，南方沿海地区利用海路向朝廷进贡物品，更多的国家经由海道与中国建立联系。《后汉书》卷六十三《郑弘传》云："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在今泉州，当时航运的条

件还很差，“风波险阻，沉溺相系”。同书卷一一六《南蛮西南夷传》记载：“顺帝永建六年（131 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注引刘攽曰：“国名叶调，王名便，此作调便，衍一调字也”。叶调国（Yava－dvipa）名又见于同书卷六《顺帝纪》永建六年条，云：“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章怀太子注引《东观纪》云：“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又掸国王雍由，亦赐金印紫绶。”徼，边界，颜师古注：“犹言塞也”。掸国故地一般认为在今缅甸东北部，包括掸邦一带。有人认为掸国使团通常取道西南缅道，此次与叶调国同至，或许亦从海路而来。这是一个错误的估计，史书同记，只能说明两国同时来朝贡，并不一定沿同一路线。据《后汉书·陈禅传》可知，掸国使团则经由罽宾道而来。同书卷七《桓帝纪》记载，桓帝延熹二年（159 年）十二月，“天竺国来献。”延熹四年（161 年）十月，“天竺国来献”。同书卷一一八《西域传》记载，月氏征服身毒后，陆道比较畅通，和帝时，天竺多次遣使经陆路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即从海路入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梁书·诸夷列传》记载这次外交活动是罗马与中国的“汉世唯一通焉”，又说：“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托勒密《地理志》称中国为“秦奈”，有港口曰卡蒂加拉（Cattigara）。拉古贝里解释：“中国古代交趾之读音为‘交梯’，故托勒密之卡蒂加拉即交趾国。”希腊人未到卡蒂加拉之前，已有“柴巴港”（Zaba）一词，为“占婆”之转

音,即今占城。说明交趾海口,在东汉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汉时罗马人沿海路东来和中国人通过海路西行,将中西间交通的海上大动脉联结起来,这一点下文谈中国与罗马的关系时还会加以论述。

由于海路利用日益频繁,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出现了"涨海"的概念,涨海即指中国东南近海。有人以为指南海,似不确,其举《后汉书》记载为例,说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显误。同书《郑弘传》作"泛海",非"涨海"。此后不仅许多汉文文献都提到"涨海",域外史料也使用这一表示中国近海海面的名称,唐代诗人张乔《送朴充侍御归海东》诗云:"涨海虽然阔,归帆不觉遥",则指从中国往新罗的海面。公元九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苏莱曼在游记中写道:"从昆仑岛出发,船队进入涨海水面。"其他穆斯林作家也提到这一海名。随着对沿海国家的认识的扩大,汉代人产生了"西海"的概念。《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安息西数千里"的条支"临西海",班固《汉书·西域传》也说条支国"临西海",大秦国在"西海之西",此西海当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当中国商船到达印度、斯里兰卡后,他们也便了解到自印度以西,仍有大海以通大秦,故称印度以西海域为西海。《后汉书·西域传》云:"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于西海,……皆身毒之地。"西海指印度以西北印度洋。由于汉朝人了解到极西有大秦国,故称大秦为"海西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云:"大秦国一名犁轩,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

汉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造船业得到发展。当时沿海许多地方都设立有造船场所,东莱郡、会稽郡、南海郡等

地都有造船基地。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发现了秦汉时代的造船工场遗址，说明当时已能同时造数艘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汉武帝建立水师，在昆明湖中训练。《汉书》卷六《武帝纪》云："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注引臣瓒曰："《西南夷传》有越隽、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货志》又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也。"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云："昆明池，汉时有豫章船一艘，载一千人。"这种船据《太平御览》卷七六八引《汉宫殿疏》，称为"豫章大舡"，可载万人，舡上建有宫殿。汉代刘熙《释名》记载，有一种"楼船"高达十余丈，除了柁、橹、棹等设备外，船舱的第二层有"庐"，第三层有"飞庐"，第四层有"爵室"。载重 500 斛的大型兵船还建有第五层用于了望的小屋，名曰"斥候"，但这样的大船似乎是用于军舰的。《史记·货殖列传》云"船长千丈"，"亦比千乘之家"。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积数长千丈。"意思说不是一只船有千丈之大，而是有许多船，相连达千丈。有很多船从事贸易的话，其人富比王侯。联系同书同传记载，番禺多珠玑、犀、果、布等，司马迁显然指南方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船户。汉画像石、汉墓壁画有大量反映船舶题材的内容。广东汉墓中屡次发现船舶模型，证明两汉南海地区有发达的造船业。从对西汉木船模型的研究来看，当时的船舶已有较大的舱房，盖顶为四回式，前面有四人划桨，后尾有一人以桨作船舵掌握航向。东汉的陶船模型表明当时船舶形制更大，分前中后三舱，舱上有篷盖，尾部设望楼。船尾装船舵，

船头设有锚。船舱部分横架梁樯八根，使船只骨干加强，加深吃水量，能承受较大的风浪[18]。

汉代航海活动有所发展，汉武帝曾七次巡海。但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汉代航海活动仍保持在近海航行，汉代航海的技术水平还不能估计过高。上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汉朝商船西行已至谌离国。但现在有人据此段记载，以为汉代中国船舶已经进入印度洋，到了印度和斯里兰卡，则不符合史实。因为这段材料明言汉使自谌离国继续西行，要"步行可十余日"，则汉使已经舍船登岸，当他们经一段陆行之后，若继续水行，则只能靠"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了。这段记载正好说明直到班固的时代，中国官方的商船尚未进入印度洋领域。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自交趾至东冶的海路上"风波险阻，沉溺相系"，远行至马来半岛，则更是困难重重，更不用说行驶于印度洋了。

如何随时确定船舶的方位，成了安全航行、保证正确航向以达目的港的最重要因素。在磁石罗盘没有应用于航海时，古代航海采用地文导航，主要是陆标导航。这种导航法要求水手牢记所经地区的岛屿、大陆海岸地标的方位和自然地貌，并能从各个方向和各种气候条件下辨识方位和航向。确定船舶方位的辅助手段还有海底地貌识别法，例如测量水深，在铅锤底涂蜡油或黄油粘起泥沙以核查海底地表土质、察看海水水色等。汉代航海已经开始使用天文导航，水手们利用星辰作为参照系，通过测定某些恒星视角的变化和观测行星运行的位置偏差，来确定船只所在的地理位置。《淮南子·齐俗》中说："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汉代舟人观星的经验和资料已经大量

成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就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慧虹杂占》二十八卷等。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二十八宿则是恒星。这些书的部头都不小，从名称上看，书中可能包含着大量的占卜的内容，而占卜的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海洋气象预测经验。可以说这是后代天文导航和海洋气象预报科学著作的先驱。

南海海道开辟以后，中国海船经常出没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有着众多的岛屿。这些岛屿不仅有助于舟人辨识方位，而且起着中途补给站的作用。人烟众多、经济发达的岛屿常常是商船的停靠点，商贾们不仅在这里卸货上货，而且补充淡水、菜蔬。沿途多站停靠式的远洋航行实际上是近海短程航行的累加，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众多岛屿为这种远航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古时远洋航海的动力主要是自然力即风力和洋流，因而船舶的航速和航线还不能完全由舟人主观意愿操纵。依靠风力，需要掌握风向及其规律，我国古代先民很早就注意辨别风向。相传夏禹时已经发明“司风鸟”。安阳出土的一片甲骨上刻有四方风的名称，此后在历代文献上都有关于四方风或八方风的的记载。如《山海经》中之“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史记·律书》等。《太平御览》卷九引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舜帝与妃娥皇泛海时曾用“相风”的方法来测知四时之风。此虽传说，但反映

很早时舟人已经在海上测风。利用风力加速航行的手段是帆的使用，东汉刘熙《释名》卷八云："帆，泛也。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生活在东汉和帝至顺帝时的李尤在《舟楫铭》中写到："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荦重历远，以济天下。相风视波，穷究川野。安审惧慎，终无不可。"[19]也提到"相风"，说明汉代肯定已经使用船帆行舟，借助风力推进船只前行。

海洋风随季节不同而呈有规律的变化，文献上反映，至少在东汉时，我国舟人已经发现了海洋季风的特点。顾禄《清嘉录》卷五引东汉崔寔《农家谚》诗提到了"黄梅雨"，并曰"舶棹风云起"，说明"舶棹风"是梅雨季节后的行船风，即东南季风。《太平御览》卷二引古史云三国时吴国大臣吴范"善占候，知风气"。此后，利用信风航海的记载越来越多，西晋法显《佛国记》云："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十四日到狮子国。"《宋书·蛮夷传》记载，南朝刘宋时代各国商舶"泛海陵波，因风远至"。说明那时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商贾已经广泛利用信风航海。

注 释

〔1〕阿里·本·易卜拉欣·哈米德·阿班《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贸易关系的历史》，1996年，未刊。以下引文均出此，不另注。

〔2〕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钟槐译《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34－43页。本书中提到的《红海航行要览》一书，今依目前通行译名作《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

〔3〕前揭张星烺《中西交通史》(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5 页。

〔4〕参塔帕尔著、林太译《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104 页。

〔5〕J. Ph. Vogel:"Note on an Ivory Statuette from Pompei," ABIA, XIII, 1938. 见林梅村《中国与罗马的海上交通》,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312 页。

〔6〕参费琅著、冯承钧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中华书局,1957 年;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1995 年,18－19 页。

〔7〕《汉书·南粤王传》。

〔8〕麦英豪《汉代番禺的水上交通与考古发现》,载《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年版。

〔9〕《艺文类聚》卷六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116 页。

〔10〕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载《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 年;费琅著、冯承钧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中华书局,1957 年。

〔11〕王民同《东南亚史前文化述略》,《昆明师院学报》1983 年第 1 期。

〔12〕马勒尔(L. Malleret),L' archologie du delta du Makong, 4vols, Paris, 1959, 1960, 1962 et 1963. 考狄尔(G. Coedès),"Le Site de Oc－èo, Ancient Port du Royaume de Founam," Artibus Asiae, X－3, 1947. 梅原末治《オクォ出土の夔凤镜》,《史学》1946 年 37 卷第 3 期,7 页。宿白《中西交通考古学讲义》未刊稿。林梅村《中国与罗马的海上交通》,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315－316 页。

〔13〕以上诸说见于前揭藤田丰八书;岑仲勉《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载《中山大学学报》1959 年第 4 期;许云樵《古代南海航行中之地峡

与地极》,《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二辑,26 页;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载《东南亚史论文集》,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研究室,1980 年;谢光《泰国与东南亚古代史地丛考》,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 年,39 页。下引诸家之说同此,不另注。

〔14〕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丛考》,中华书局,2000 年,14 页。以下引黎说亦见此书。

〔15〕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载《厦门大学学报》1957 年第 2 期。

〔16〕姚楠等《七海扬帆》,香港中华书局,1990 年,134 页。

〔17〕费琅著、冯承钧译《叶调斯调与爪哇》,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 年。

〔18〕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 年,332 页。

〔19〕《北堂书钞》卷一三七引,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五十,前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51 页。

第五章　汉朝与西域各国关系的发展

汉朝是围绕着建立反匈联盟、保证丝路通畅和发展丝路商贸关系而经营西域，并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关系的。随着反击匈奴的逐步胜利并最终驱逐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后者则显得越来越重要。汉与西域各国关系的发展是与一些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汉朝最先发展了与乌孙的关系。汉武帝谋与中亚各国建立联盟，但张骞出使大月氏未能达到目的。北逐匈奴之后，武帝屡向张骞探询大夏情形，张骞窥知武帝意图，则乘机劝武帝联络乌孙。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经历，使张骞对乌孙已经有很多了解。他向武帝介绍了乌孙的历史，说明蛮夷贪汉财物的性格，提出了为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采取"厚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的外交手段。武帝派张骞出使乌孙，张骞与乌孙使者数十人同归，乌孙派向导和译使送张骞归汉，赠汉数十匹马。以报谢为名而窥探汉之虚实。乌孙了解了汉之广大，物产富饶，于是与汉亲善，建立了联盟。汉以细君出嫁乌孙，与之建立了和亲关系。

与乌孙结好的同时或稍后，汉朝与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的建立起联系。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把他亲身到达的国家和传闻所得附近邻国报告武帝，司马迁

将张骞的报告录入《史记·大宛列传》,汉时中国对西域的认识始于此时。张骞亲身所到的国家为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乌孙五国,其所传闻之国葱岭以东为扜弥、于阗、楼兰、姑师五国,葱岭以西则为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张骞出使乌孙,带有多位副使。他们出使到上述诸国,一年多以后,不少国家都派使者与之同归出使汉朝,《史记·大宛列传》云:"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所谓西北国即指上述诸国。

降服楼兰对汉朝发展与西域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汉朝与上述诸国通商通使后,立刻面临葱岭以东地区的交通问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道当道诸国一方面为匈奴所胁迫,一方面利汉使财物,常常攻劫或遮杀汉使。匈奴虽北却,仍然不断出兵干扰丝路交通。《史记·大宛传》云:"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他们还抢劫西域各国使节进贡汉朝的礼品,昭帝元凤四年(77 年)四月《封傅介子为义阳侯诏》云:"楼兰王安归常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甚逆天理。"汉初已有南北两道之认识,西汉时西行均须经罗布泊低地,一傍南山,一沿北山。楼兰在罗布泊北岸,当两道要冲,所以西汉一定要和匈奴争楼兰。为了保证连接中原与中亚以远地区的这条交通线,西汉首先着手解决楼兰、姑师的问题。楼兰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他是南道最东端之国,汉使出盐泽,首先至此,是继续西行的良好歇脚点和新的出发地,行人在这里可以取得补给前行。姑师亦为北道当道之国,沿北道西行必经此。汉欲交通中亚以远之国,必

须控制此二国。《史记·大宛列传》云："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

李广利远征大宛取胜，威震西域，对发展与西域诸国的关系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越葱岭西行，大宛是大国，并处交通要道，"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弥、于阗"。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曾路过大宛，并施以利诱，获得大宛帮助，至大月氏。对于大宛，汉朝先是以交好的态度与之交往的。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马，"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大宛因汉绝远，不予。汉使亦怒，椎碎金马而去。大宛人则派人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汉兵破楼兰后，武帝便兴兵伐大宛。汉军远征艰苦备尝，而武帝不惜代价，决心征服大宛，其目的仍在于政治上的意义，即维护汉朝在当时国际上之地位，巩固和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保证汉使西行的通畅。《史记·大宛列传》云："天子已业攻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益苦汉使矣。"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最终获胜，得大宛良马，并立对待汉使友好的昧蔡为宛王，与之结盟而去。后来宛人杀昧蔡，立蝉封为宛王，遣其子入质于汉。大宛降后，中亚各国皆遣使贡献。《拾遗记》卷五记载，武帝"元狩六年，渠搜国献网衣一袭"。据同书同卷记载，此种网衣出于渠搜国之西之祈沦国，"其国人缀草茅为绳，结网为衣，似今之罗纨也"。此类传说即以大宛降服为背景而产生的。

甘延寿、陈汤远征康居，诛讨郅支，对扩大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和与西域各国的往来起了重要作用。元帝时，甘延寿和陈汤矫诏进兵康居，诛讨郅支单于获胜，汉之声威波及更远的地区。刘向《理甘延寿、陈汤疏》言二人之功云："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翊侯之旗，斩郅支之首；悬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折服，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向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元帝建昭四年正月《赦甘延寿、陈汤矫制罪诏》称他们"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源息，边境得以安。"

昭君出塞和亲，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造成半个世纪边境地区的安定局面。元帝时，匈奴分裂，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诛，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据《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常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王昭君为之生一男，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死，其子雕陶莫皋立，依匈奴之俗，又以昭君为妻，又生二女。昭君出塞后的五十余年间，汉匈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边境安宁。由于汉匈的和好，丝路交通没有障碍，通行无阻，大大促进了中西之间的交通和交往。

总的来看，西汉武帝时，西域各国开始归顺汉朝，昭帝时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宣帝时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神

爵二年(前60年)郑吉为西域都护,驻节库车附近乌垒城,全境皆在汉朝都护管辖之下。从此西域都护历十八任,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不断发展。直到西汉末王莽专政篡位,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最终导致汉匈关系破裂,丝路交通再次中断。

东汉征服匈奴,最终解除了丝路交通中的大患。王莽时汉与西域的关系一度瓦解,光武帝时,虽与西域也有某种交往,甚至还有莎车、鄯善等遣使贡献的活动,但西汉时的局面未曾恢复。光武帝时东汉王朝无暇顾及经营西域,焉耆首先叛附匈奴,匈奴势力再次进入西域,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断绝。此间莎车曾一度称霸西域,遭致汉、匈及西域各国的普遍不满。自东汉明帝开始重新经营西域,经过对匈奴的军事反击和班超30余年的奋斗,至和帝时,使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而内属于汉。班超归国后,和帝薨,任尚失和于西域,诸国再叛。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西域屡攻都护,汉又弃西域。至延光二年,用敦煌太守张珰之策,以班勇为长史,重新经营西域,于是西域十七国内属。西域三绝三通。至桓帝元嘉二年(152年),由于中原地区的内乱,汉朝无力控制西域局势,造成丝路交通的又一次断绝。

第六章 汉代中印之间的交通

古代印度在地理学上称为南亚次大陆或次大陆，主要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但在古代，南亚次大陆从未统一，其大小王国都不自称印度，印度之名只是泛指其地。在汉代，中印之间的交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更重要的意义。印度是中西交通的联结点，丝绸之路两端中国与罗马通过海道的交通是以印度为中介的。中印两国同为世界两大古老文明，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显得比别的国家更为重要，特别是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更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一 印度的名称与中印早期接触

历史上中国与印度的交往源远流长。在汉文文献中“身毒”、“天竺”都是对印度的称谓。“身毒”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其（大夏）东南有身毒国。”梵文中有“Sindhu”一词，本义为河流，后专指印度河。古时侵入印度西北的波斯人遇此大河，就以河名称其所在之地，后来人们又进而用以指称整个南亚次大陆。“身毒”是张骞在大夏时得自大月氏人读法的音写。“天竺”古音当读“Xien - t‘iuk”，原词应是伊朗语，始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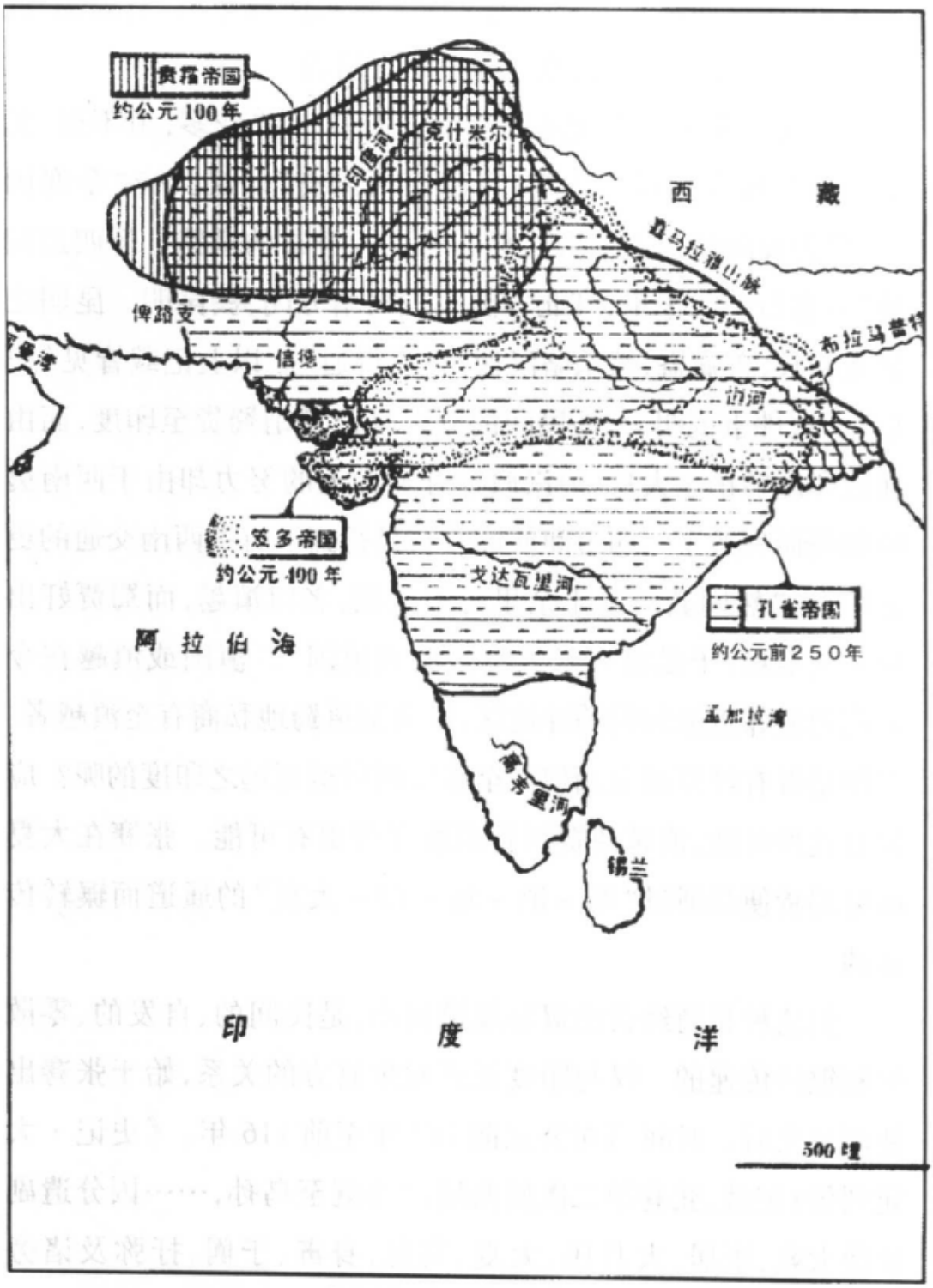
氏之东南数千里”。此后《晋书》、《魏书》、《新唐书》等皆沿用此称。而用“印度”这两个字，则是从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才开始的，他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中国与印度的接触和交往，其时间之早，有人认为早在古帝舜时已有交通。论者以为印度产大象，而中国古代之象一定是来自印度，舜有异母弟叫象。还有人据《吕氏春秋》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话，以为中印交通始于其时。实际上根据考古材料可知，中国远古时代就有象。《禹贡》中“九州”有豫州，豫字，《说文》解释为“象之大者”，段玉裁云：“此豫之本义”。也有人考证，以为豫字乃一人牵象之会意，证明古时今河南、湖北一带有象。甲骨文中“象”字多处出现。《史记·宋世家》和《韩非子·喻老》都说商纣王有象箸，即象牙筷子。《诗经·鄘风》中《君子偕老》和《魏风》中《葛屨》都写到象牙之栉，名曰象揥。《诗经》中还提到象笏，即象牙制成的簪子。《战国策·齐策》记载有象床。《尔雅》卷四释“磋”为治象器者；又说：“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说明商周之时，中国有象。《说文》释“象”云：“长鼻，南越大兽。”可见中国早有象，并产生了象字，并不一定来自印度。

《后汉书·襄楷传》记载襄楷上书桓帝，其中有云：“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鱼豢《魏略》云：“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意谓老子已经到了古代印度，佛祖如来是其弟子。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以为佛乃老子之

化身。此乃道士编造的神话，目的是抬高道教教主老子的地位以压倒佛祖。后世伪造的《列子》一书云："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乃借孔子之口颂扬佛祖为圣人，似乎春秋时中国人已经了解到印度佛教，亦不足信。宋释志磐《佛祖统记》卷三十四引朱士行《经录》，云："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其异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朱士行乃曹魏时人，甘露五年(260年)赴于阗求经。其言亦无凭信，出于虚构。隋时费长房著《历代三宝记》记载此事，显然是抄袭朱士行之说。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古代中印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可是中印之间的交通和交流却产生很早，虽然上述诸说皆难可信据，却不像有的人所说始于张骞通西域。前面已经讲过，早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和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如西藏地区和古代印度间就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春秋战国时，印度人已经得到中国的丝绸。据古奇(M. M. Ghosh)研究，公元前五世纪，波斯阿赫曼尼德朝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他派出的商队多次到达葱岭以东的地区，其中包括印度的商人[1]。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至大夏，已见到大夏有中国蜀地出产的邛竹杖、蜀布等物品，问之大夏人，则知其地商人"往市之身毒"。根据大夏人的介绍，张骞知道："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这个介绍非常确切。张骞据此判断，从蜀至印度必有路可通，而且不会太遥远，他向汉武帝说"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



古印度时代印度诸帝国

（选自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

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张骞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汉朝本来早就有交通西南夷的打算，但"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汉武帝"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勘查自蜀人身毒的道路。但四道间使"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雋、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以上记载皆见《史记》。这件事说明，蜀地民间的商人早已运销蜀货至印度，而由通过印度转销至大夏，但汉政府开通此道的努力却由于西南夷的阻隔而失败了。四道间使的收获是得到了有关西南交通的更多信息，"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滇国或滇越在今云南边境邻近缅甸的腾冲地区，汉使知道蜀地私商有至滇越者。汉使是否有经滇越至缅甸甚至继续西行至更远之印度的呢？应该有这种可能，滇越商贾西行至缅印者更有可能。张骞在大夏所见蜀货便是通过"蜀－滇－缅－印－大夏"的通道而辗转传递的。

但这种私商经营的贸易规模很小，是民间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辗转传递的。汉与印度正式发生官方的关系，始于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时间当在公元前117年至前116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二次使西域，"骞既至乌孙，……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身毒国使有经海道入汉，如《汉书·

地理志》"粤地"所记载的"武帝以来皆献见"。也有经西北陆路来者。《汉书·李广利传》载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封李广利为海西侯诏》中说:"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支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中郎将朝及身毒国死(当为'使'),隔东西道。"汉代中印之间的交通首先有海道,即前面讲过的经南中国海,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或至马来半岛东岸登陆,走一段陆路入印度洋,再入海至印度。陆行则有三条通道,即罽宾道、雪山道和中印缅道。

二　罽宾和罽宾道

据于阗建国传说,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时,于阗还是无人之地,东土移民一万人在王子瞿萨旦那率领下到达于阗河下游。不久阿育王宰辅耶舍又率七千人越大雪山也来到于阗,双方经过争执,决定联合建国。瞿萨旦那成为于阗王,耶舍居相位。两部移民起初划地而居,后来逐渐融合,兴建城市,世代相传。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条亦记于阗建国事,略有不同:

> (瞿萨旦那国)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于此栖止。无忧王太子在怛叉始罗(塔克西拉)被抉目已,无忧王(阿育王)怒遣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物,至此西

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当是时也，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岁月已积，风教不通，各因田猎，遇会荒泽，更问宗绪，因而争长，忿形辞语，便欲交兵。或有谏曰："今何遽乎？因猎决战，未尽兵锋。宜归治兵，期而后集。"于是回驾而返，各归其国，校习戎马，督励士卒。至期兵会，旗鼓相望，旦日合战，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斩其首。东主乘胜，抚集亡国，迁都中地，方建城郭。

《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卷五则云，于阗王先祖是无忧王太子，来自怛叉始罗国，是一个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据以上记载，印度移民最初是经过大雪山中的谷道而进入南疆的，他们大约开始居住在于阗西部的子合（me－skar），而于阗境内部民以氐族为主，《西藏纪》中称为 Li－yul，意即氐国。于阗即氐族与印度移民经过斗争融合以后共同建立的王国。于阗建国的历史说明早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克什米尔和于阗一道已经成为沟通中印间的一条通道，至西汉时发展为罽宾道。

罽宾是古代西域国名，所指地域因时代而异，汉代其地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即喀布尔河下游及今克什米尔一带，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赫拉特）相接。都循鲜城（南北朝作善见城，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附近），"户口胜兵多，大国也"。居民主要从事农业，金银铜锡器物，制作精巧。一般认为，罽宾是梵文"Kasmira"、希腊文"Kaspeiria"的音译。罽宾与其西南的乌弋山离共同组成丝路南道的要冲，史称罽宾—乌弋山离道，是古代沟通东亚、西亚、南亚、中亚的交通要道和战略

要地。波斯阿赫门王朝，希腊亚历山大大帝都曾占有此地。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即大夏）和安息（在今伊朗东北部）相继统治罽宾。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受大月氏逼迫迁离伊犁河流域的塞人一部分进入此地，另一部分南迁大夏。当大月氏西迁至阿姆河流域时，西南方的塞人部落联盟受到威胁。公元前 127 年（汉武帝元朔二年），马萨革泰、萨卡拉瓦和帕喜等塞人冲破安息北部边疆，从马里和赫拉特大道大举南侵安息，杀死安息王弗拉特二世（前 137—127 年），占据了德兰琴那和阿拉科西亚二郡。此后大部分塞人和安息人杂居，占据这块被称为锡斯坦的地方。另一部分塞人不愿受安息人控制，在公元前 120 年左右向东越过苏里曼山的木拉山口，到达印度河中游。二三十年后，这些塞人陆续南下占据了次大陆西海岸巴塔拉和苏拉斯特拉一带，建立若干塞人小国。还有一部分塞人溯印度河北上，由喀布尔河流域和旁遮普进入克什米尔。塞人于此立国，形成“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的局面。塞人立国的具体时间不能确知。据塔恩研究，罽宾在弗拿那统治时期，阿拉科西亚和喀布尔由贵族斯帕立里斯（Spalyris）和斯帕拉卡达姆（Spalagadama）父子掌权。《汉书》上的罽宾王乌头劳是斯帕立里斯钱币上铭刻的“王兄”或“王弟”的音讹，意思是“宰辅”，大致是安德烈（Andrè）和安东尼（Antonius）的塞语读法[2]。

张骞通西域后，此道始通，张骞派副使往身毒，可能走的就是这条路。汉武帝遣使者至罽宾，汉与罽宾始有往来。汉至罽宾的路线为：从西域南道上的皮山（今新疆皮山南）西南行，经

乌秅(今新疆叶尔羌河上游),越过帕米尔高原上的县度(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西南),到达罽宾。县度一作悬度,古代山名,据《通典》卷一九三记载,山在涅槃陀(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四百里,山有栈道,有的地方要悬绳而渡,故名悬度。自汉以来,为西域重要山道之一。从罽宾西南行至乌弋山离,即通往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上之罽宾—乌弋山离道。由罽宾向南即印度。罽宾地处交通要道,因此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中有重要地位,不仅是重要的贸易路,又是古代各种文化汇聚之地,又是佛教大乘派发源地,汉代以后不少僧人由此入华译经传教。因为由缅甸可通印度,因此在今缅甸境内的掸国也经由此道入华。《后汉书》卷八十一《陈禅传》记载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谏议大夫陈禅认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尚书陈忠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门,……今掸国越流沙,逾悬度,万里来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而(陈)禅廷讪朝政,请劾禅下狱。"

但这条路不是畅通无阻的,除了道途险远,罽宾统治者与汉朝的关系也一直很紧张。西汉昭帝、宣帝时,罽宾王乌头劳以"汉兵不能至",曾数次剽杀汉使,劫夺财物。乌头劳死,其子代立,遣使奉献。汉朝派关都尉文忠送其使回国,罽宾王却欲加害文忠。文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Hermaeus)合谋杀之,立阴末赴为王,授以汉朝印绶。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引冯·古特什米特(Von Gutschmid)之说,认为"容屈"即"约拿基"(Yonaki),意思是"希腊城镇"。阴末赴是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统治者的儿

子，他在公元前50—30年在汉人帮助下登上罽宾王位。但不久阴末赴又与汉使失和，锁系军侯赵德，杀副使以下70余人，却又遣使谢罪。汉元帝为此与之绝而不通。汉成帝时，罽宾王又遣使谢罪，贡献方物。汉欲遣杜钦报送其使。杜钦就与罽宾的关系向大将军王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慢，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恩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今县度之扼，非罽宾所能越也。其向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服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卖。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返。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坂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

之众，涉危难之路，疲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3]。

王凤奏于成帝，朝廷采纳了杜钦的意见，因越历县度过于艰险，命汉使止于皮山。但"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一至"。阴末赴就是在印度的最后一个希腊统治者赫尔梅奥斯，在世时占有整个帕拉帕米撒达(Paropamisadae)，他死后，帕拉帕米撒达又归塞人统治。成帝鸿嘉二年(19年)后，乌弋山离国占领了罽宾，至公元一世纪初，罽宾与高附国又被贵霜王朝吞并。但罽宾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贸易方面的联系，至唐代称为个失密，或作迦湿弥罗，后译作克什米尔。

由于交往不断，汉对罽宾颇有了解。《汉书·西域传》对其地理位置、物产工艺、塞种兴衰、政治状况等均有记录，其中言其物产云："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杯、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冶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罽宾这些特产汉时亦曾作为贡礼输入中国。

三 中印间雪山道

雪山是古代印度人和中亚南部人对喜马拉雅山和兴都库什

诸山的总称，亦作大雪山。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条记载有大雪山龙池，云：“王城西北二百余里至大雪山。”同书卷二“滥波国”条又云：“滥波国，周千余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岭。”

罽宾道虽然距离较近，但既有县度那样的自然险阻，不利于大群的商队通过；又有罽宾统治者的剽劫，汉朝统治者不乐意经此道遣使与这样的国家交通，因此汉代中印间的贸易往来大都经过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沿喷赤河上游西行，至昆都士或巴尔克南后，东南向越兴都库什山，经过喀布尔（在今阿富汗）、白沙瓦（在今巴基斯坦），进至怛叉始罗（在今巴基斯坦沙德里西北之哈桑阿卜杜勒）、旁遮普（在今印度）。此道比罽宾道绕行较远，但道路较通畅，人为的障碍少。当年马其顿王由中亚侵入印度便是经行此路。

雪山道经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既是印度河、两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交往的主要交通干道，也是汉代中印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中转枢纽。公元一世纪末希腊佚名船长《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中国的“生丝、丝线和丝织品由巴克特里亚经陆路运到巴里格柴（今巴罗哈港），或由恒河经水路运到泰米尔邦（Damirike）”。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成书于150年时的《地理志》一书中，根据马利纽斯的材料，从由西方到过赛里斯国的人那里知道，“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赛里斯国）途经石塔而至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氏城（梵文 Pataliputra，希腊文 palimbothra，今巴特那）而通往印度的路”。这条不经大夏的路应该就是取道昆都士或巴尔克，越兴都库什山，由怛叉始罗南下

的雪山路。

这条路线是张骞通西域后开通的，张骞遣副使至身毒当经此道。东汉时由于贵霜王朝的兴起，中亚、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和西亚一部分皆归属贵霜王国，此路在中印交通方面更为重要。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孟加拉），皆身毒之地。”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也是西域大国，风俗似印度，民善贾贩，内富于财。兵弱畏战，故容易征服，常附属别国。“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翎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公元一世纪中叶后，大月氏贵霜王朝又征服身毒，“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贵霜西与罗马，东与中国交通频繁。在贵霜强盛陆路通畅时，天竺通过陆路与中国交通十分频繁，汉和帝时多次遣使贡献。

四　中印间西南缅道

这条经四川、云南至缅甸，再由缅甸至印度的道路，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早已存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讲道：“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南可数千里”[4]。这说明当时四川生产的竹器、布已经通过印度销往大夏。张骞由此

推断，从蜀地往印度必有路可通，于是汉武帝命张骞负责探查西南通道。张骞以蜀郡、犍为郡为中心，分四路“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探查前往身毒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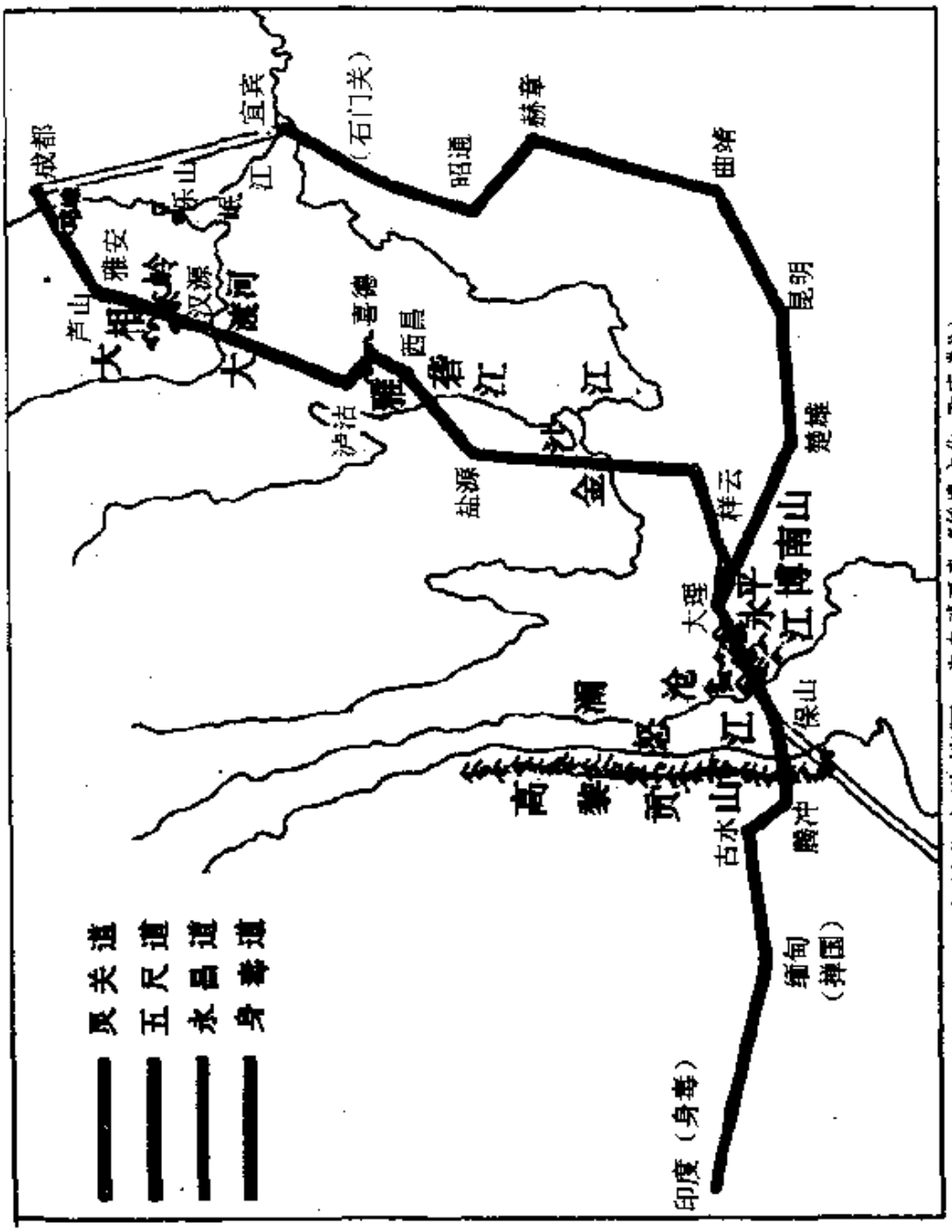
但是当时蜀地和缅甸、印度并不能直接交通，这中间隔着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当时称为“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探查西南通道的工作由于当地部落的阻挠而未成功，出駹、出冉两路（犍为郡以西之地）在今阿坝一带为氐族部落所阻；出徙（在今四川天全县）一路在今甘孜一带为笮族部落所阻；出邛（今西昌）的一路在云南大理为隽族和昆明部落所阻；出僰（今宜宾）一路，从犍为郡出发南行，经秦朝开凿的“五尺道”（北起犍为郡治所在的僰道，南抵夜郎所在的云南关岭，因道宽五尺而得名）西行，亦为隽族和昆明部落所阻。“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四路“皆各行一二千里”而不得继续西进。

元朔四年（前125年）和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两次出兵伐滇，滇王降，以其地置益州郡（在今云南晋宁东），武帝再次遣使出益州，开辟通往身毒的道路，仍为当地部落所阻，未能成功。有学者以为西南夷阻隔交通，其目的在于“垄断商务”[5]。经过上述各种活动，汉朝扩大了对西南商道的认识，汉使了解到昆明以西千余里有滇越，而蜀地商人有到那里从事走私贸易者，“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国在今何处？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徐中舒认为是云南保山以西的一个部落；陈茜认为古代傣族在云南腾冲、梁河、盈江、瑞丽一带建立的早期国家；汶江认为应是印度阿

萨姆地区的迦摩缕波国[6]。不管滇越国在哪，它是蜀地民间商人与身毒国交易的一个中转站则是可以肯定的。

秦汉间西南交通以四川成都为中心，西南行有三条路线，皆从益州出发，一为五尺道，其具体走向是：从成都出发至武阳（今彭山），沿岷江南下，经南安（今乐山）至僰道，南行经朱提（今昭通）至味县（今曲靖），向西经昆明至不韦（今保山东北），向西至腾冲，循大盈江南行至缅甸境内八莫，从八莫至印度有水陆两道。陆路从八莫至密支那，向西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抵达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再沿布拉马普特河谷到印度平原。水路则从八莫顺伊洛瓦底江南下入海，然后航海至印度。二为青衣道，或曰灵关道，其具体走向是：从成都出发，经青衣（今名山北）南下，过笮都（今汉源北）、阑县（今越西）、邛都（今西昌）、会无（今会理），渡金沙江至青蛉（今大姚），西行至不韦。然后由不韦接前述经缅甸至印度的水陆两路。三为夜郎道，自犍为（今四川宜宾）直至夜郎（今贵州盘县及云南平夷）；夜郎道始于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自今宜宾东南行，经赤水、毕节，至云南之宣威、曲靖，由曲靖向西则接前述西行至缅甸路线。另外由味县（今曲靖）南下，可以取道麋水（红河）进入交趾郡，从而与海上丝路相通。

西南缅道起于何时，难以说清，有人认为战国时代已经走通。在云南、四川一带，多次发现来自西亚的物品，如琉璃珠、宝石等。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曾发现一颗琉璃珠，重庆巴县冬笋坝49号巴人船棺墓中出土两颗，年代约在战国末期。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滇墓、重庆马鞍山西汉墓和茂汶的石棺墓中，也



西南丝绸之路简图（选自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

发现过琉璃珠。经测定属于来自西亚的纳钙琉璃，说明是经印度传入的。李家山24号墓和石寨山13号墓中各发现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器形大小和花纹都和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以及白沙瓦附近出土的同类型器物相同。蚀花珠最早发现于印度哈拉巴文化(Harappa)，其年代为公元前3千纪。根据在昌胡达罗(Chanhudaro)和楼特尔(Lothal)等地对制珠工场的发掘情况来看，当时印度的制珠工艺非常发达，其产品曾在苏末尔(Sumer)、埃及、西亚等地发现，都是从印度交换而来的。考虑到在滇文化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石珠中，蚀花者仅此两颗，可以认为这两颗蚀花肉红石髓珠来自南亚。有学者就说"很可能就是古代云南－印度那条不被更多人所知的商道。"[7]

战国至西汉时的许多云南墓葬中所发现的海贝，有人认为是受印度的影响，可能来自印度洋。滇人曾经用贝壳作为货币，在上层人物的墓地中发现大量的贝壳，并有特制的铜器来储存。晋宁石寨山滇墓中发现一只铜贮贝器，上面刻有一组纳贡人。其中有穿窄衣裤高鼻深目多须的形象，有人认为是从中亚南迁的斯基泰人，还有人认为是将饰花肉红石髓珠带入云南的身毒人。那时滇人用什么样的计算单位来数他们的贝壳，没有直接的证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南诏人"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这种以"觅"为计算单位的十六位进制，不同于当时中原地区的系统，而是另外一种系统，这种系统可能来自印度。早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印度哈拉巴文化中就发现了一种非常标准的计量系统，其重量是由玉髓或黑色卵石做成的立方体来计量，而进制单位则是二进制。传统的印度1

-16 进制(1 卢比等于 16 安那)可能来源于此[8]。滇人的十六进制很可能与贝币一起来自印度。

战国和秦汉时期滇文化中盛行的牛崇拜和蛇崇拜,可能也是来自印度。牛的形象是滇文化青铜器中最常见的装饰之一,表现手法有圆雕、浮雕、线刻等多种。在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处墓地出土的2329 件青铜器中,就有圆雕的牛 128 件,浮雕的牛 37 件,线刻的牛 8 件,外加牛头 7 件,牛角 35 件。牛在当时的社会上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所以绝大多数牛形饰品都发现于大墓之中。牛在当时的宗教生活中也很重要。很多青铜铸造的场景都显示牛祭、牛牲、剽牛等当时仪式中常见的内容。这种原始的动物崇拜当时已不见于中原地区。在印度哈拉巴文化中发现的印章上,作为祭祀和崇拜对象的牛却是最常见的形象。在以后印度宗教里,牛崇拜始终是重要的内容。

在滇文化青铜器的纹饰中,另一重要的动物就是蛇。很多青铜铸造的场景描绘了蛇在宗教仪式中的重要作用,如蛇缠绕在广场中央的铜柱上接受人牲,蛇盘在竖立在房屋前面的木板和铜立柱上,蛇作为其它仪式活动的基底,如三兽噬牛镂花铜饰物,二人猎鹿镂花铜饰物等,人、牛、鹿的脚下都踩着长蛇。这种信仰也不见于战国至秦汉时的中原地区。根据印度的神话,蛇是沟通人类社会和地下灵界的象征。此种信仰之残余在以后印度的宗教艺术、宇宙观和哲学中随处可见。如印度三大神之一的湿奴(Visgnu)在开天辟地以前,睡在神蛇阿那塔(Ananta)身上。另一个神灵那加斯(Nagas)就是一条蛇。蛇母马那萨(Mamasa)则是牛殖的象征。滇社会中盛行的牛、蛇崇拜,是否

与印度的古代信仰有关，有否意味着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互相之间的传播还是文化因素的同源，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9]。

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一枚翼虎饰银错金带扣，时代为西汉中晚期，明显为来自异域之物品，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来自印度。此扣通体作盾形，长10.1厘米，前端宽6.1厘米，后端宽4.2厘米。据报告描述："正面压出突起的纹饰，中央作有翼的飞虎一只，右前爪持一树枝状物，翘尾昂首，雄视耽耽，姿态极为生动。虎的双目用橙黄色玛瑙嵌镶。……作风和汉代铜器上的铺首及石刻中的狮虎等不同，而与古代希腊的所谓亚述式翼兽颇为近似"[10]。有人认为虎的双目镶嵌的是黄色透明琉璃珠而非玛瑙珠。童恩正不同意此翼虎为亚述风格的说法，在亚述文化的石雕和金属工艺品中，带翼之神话动物确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如门卫兽中有人头牛身带翼兽、人头狮身带翼兽、带翼狮、带翼人鱼、人身或兽身秃鹰等，金属工艺品中有银制带翼山羊、带翼羊头狮身象牙浮雕等。在众多的动物主题中，独不见这一类的"虎"。所以这件器物来自西亚的可能性不大。与此相反，南亚为产虎的区域，而翼虎则是古印度的传统艺术母题之一，类似的形象见于北方邦（Uttar Pradesh）、马图拉（Mathura）发现的贵霜时期（Kusgana Period）之石刻，时代为公元二世纪。从这来看，此带扣从印度直接从南路输入的可能性更大[11]。

石寨山13号墓出土一件鎏金铜扣饰，原报告称之为"双人舞盘铜饰物"。据学者描述，此乃青铜铸高浮雕，男舞俑二人手托圆盘载歌载舞，足下踏一长蛇。舞俑高鼻深目，梳髻，着长袖交襟有领上衣，细裤腿至足踝，跣足佩长剑，衣裤满布月芽形或

卷云纹。有的研究者认为其种族与中亚草原民族有关。汪宁生指出其人深目高鼻，“疑来源于西方”，并考证其手持之物不是盘而是钹[12]。《通典》卷一四四记铜钹“出西戎及南蛮”，据日本学者林谦三《东亚乐器考》的研究，钹首见于印度。石寨山13号墓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即公元前175年至前118年之间。童恩正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有剽越人、身毒人，从13号墓的下葬时代到永昌郡的设立，其间不到两百年，说：“如果将此二钹舞者直接视为印度人，当不致过于牵强。如此，这件铜饰物也许应视为当时中印文化直接交流之产物。”[13]

然而西汉以前，这条路线上始终只有民间的来往，而中国与缅甸诸王国的官方交往到东汉才见于记载。西汉末年，汉朝的政治势力在西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汉在今四川、贵州、云南已经设置四郡即犍为郡、越隽郡、益州郡和牂牁郡，辖68县，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至东汉初，汉朝的政治势力达到云南西部，中缅间交通更加便利。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夷降附东汉，东汉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又分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不韦、隽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六县，合并而置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这样，楚雄以西直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全归属汉朝，汉族移民越过了澜沧江，进入高黎贡山以西缅甸北部。永昌郡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西与缅甸东北部诸王国相接，中缅之间的交往频繁起来。由于永昌地处中印缅道要冲，商业发达，中外贸易昌盛，加上本地物产丰富，因此有“金银宝货之地，居官者富及累世”之称。

据《后汉书》记载，和帝永元六年（94年），永昌徼外夷敦忍

乙(国名,今缅甸北部)王遣使献物。永元九年(97 年)西南夷徼外僬侥(今缅甸北部)等内附献物。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僬侥部族又遣使"献象牙、水牛、封牛(双峰黄牛)"。永宁元年(120 年),掸国(今缅甸东部)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永建六年(131 年),掸国王又来献见。敦忍乙、僬侥、掸国诸国皆在今缅甸境内,与中国西南相邻。夏光南认为敦忍乙即下缅甸的得楞族(孟族),方国瑜则以为是都卢的对音,当即上缅甸的太公族。《史记》和《列子》中都提到僬侥,说他们身高不过三尺,学者们认为可能就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还有人认为掸国就是现在缅甸境内的掸邦[14]。

上述诸国使团、乐队、幻人来中国所经行的路线,有时经印度和罽宾-乌弋山离道,有时当经中印之间商人经行之缅道。随着与缅甸境内诸王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印度之间的直接交通也有了可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掸国通大秦",能通大秦,更能通印度。同书同传"哀牢夷"条记载,其地出产"有光珠、琥珀、翡翠、琉璃、轲虫(海贝)、蚌珠"。这些都非哀牢地区的土产,而是来自缅甸和印度。《华阳国志》卷四记载:"明帝乃置(永昌)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有闽濮、鸠獠、鹿越、裸濮、身毒之民。"学者据此认为东汉时在今云南西南部,已有印度人居住。同书同卷记述永昌郡之物产,有"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桐华布、兰干、细布,又有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其中不少物品非永昌本地所产,而帛叠即棉花,来自印度。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和李家山等汉代墓葬中发现大量琉璃、玛瑙、玉石和

海贝(古代用作钱币),在腾冲八里宝峰下核桃园中发掘汉武帝时铸造的五铢钱上千枚。考古学者认为这些遗物都是汉时中、印、缅三国商人进行贸易交换的物证。这条道路的起点益州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丝织中心,蜀锦东汉时已是驰名产品,因此这条路线现在被称为西南丝路。

东汉时,可能已有中国人经此道至印度者。《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东离国(《魏略》作车离国),都沙奇城(Sāketa),在天竺东南三千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后为大月氏所征服。车离即乔萨罗国,今印度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沿岸。《魏略》说此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沛隶是古代居住在恒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Pundra)人。其南方为孟加(Vanga)人,汉代文献中写作盘起,《魏略》称盘越国,又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古称高达—孟加(Gauda – Bang, Gauda – Bengala)。高达泛指三角洲巴吉拉提河两岸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孟加拉南部地区。此地除了西北丝路南道越葱岭,经贵霜至天竺,转向东南恒河流域入海口可至,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人大概也有经缅道而至者。从益州(成都)至此便是中印缅道的起始和终点。

若从东汉的益州(东汉时治所在四川雒县,中平中移至绵竹,兴平中又移至成都)出发,南行折西,经今大理过澜沧江,到永昌郡(今云南保山),西行过怒江,出高黎贡山至腾冲,再从这里西南行到蒲甘(在今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由蒲甘沿亲敦江而上,经胡康河谷由曼尼普尔进入阿萨密,再南下达卡地区(在今孟加拉国),由此溯恒河而西,从陆路入印度。在

印度经华氏城(巴特那)、曲女城(开瑙季)到亚穆纳河畔的马土腊,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罗(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塔克西拉(今锡尔卡普),过普尔山口至大夏(今阿富汗),与西北丝绸之路在木鹿(Merv,今吐库曼斯坦境内的马里)汇合;除了走陆路完成与西北丝路的联接之外,从缅甸亦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出孟加拉湾航行到印度,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魏略》记载,大秦国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当由缅甸海岸登陆而达永昌。成书于一世纪后半叶的大秦国佚名作者(埃及的希腊人)所著《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关于印度东海岸以东地方的描述也可以印证这条路线。英国历史学家哈威在《缅甸史》中说: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ChindwinR,今亲敦江)经曼尼普尔(Mannipur)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15]。

唐高僧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支那寺等寺"条记载,支那寺故址在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义净赴印在七世纪末,他离开印度至室利佛逝乃武后天授二年(691年),上溯五百年,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室利笈多王约在209至219年在位,其时为东汉末年。因此有

学者认为东汉后期有一批蜀地的僧人，从这条中印大道结队来到东印度巡礼。但多数学者认为，东汉时中国似乎还不可能有往印度本土求法的僧人。义净所言，只是估计，其实不大可能有五百余年。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认为室利笈多大王是建国于320年的笈多王朝，因此季羡林《中印关系史论丛》以为是四世纪蜀僧西行[16]。

吴焯认为，《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记载的"身毒之民"并非来永昌通商的印度侨民。此志总序云："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见邛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国，蜀之西界，今永昌是也。"据《慧琳音义》卷八十一注释"牂牁"一词，有云："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隽、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按即哀牢夷，'玉'与'夷'通假），汉朝始慕化，后改身毒国，隋王之称也。"原来，身毒国是哀牢夷后来改称的国号，其居地即在永昌。"隋王之称"一句中，"隋"当为"随"字之误，是哀牢夷某代国王名"身毒，故国亦随王改称身毒。因此，《华阳国志》中所谓永昌郡有身毒之民，此"身毒"不过是哀牢夷的代称，以此印证汉时，甚至西汉初年的中印交通，作为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他还认为义净书中提到的牂牁道，并不能经陆路通往缅甸和印度，牂牁道的最早出处见于汉代的史学著作，它的起点为今四川宜宾，终点为广东广州。唐僧二十许人经牂牁道而赴印路线必定循陆路（包括北盘江、红水河和西江的水路）由宜宾至广州，再由广州循海路穿越马六甲海峡或克拉地峡，沿中南半岛的西海岸从恒河入海口进入南亚次大陆。支那寺的地点在恒河下

游,也给人一种由海路而至的印象。学者经常引证这一材料,说明中印缅道交通,有可商榷之处[17]。这一论述很有道理,汉武帝时唐蒙《上书请通夜郎》建议通夜郎,发其兵十余万以进攻南越国,便说:"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此事或许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至东汉时中印缅道必然存在而且是畅通的。

注 释

〔1〕《梵文"支那"名称的源流》(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Sanskrit word cina as the name of china),载《巴达伽东方研究所年刊》(ABORI),普那,1963 年,42 卷,214 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46 页。

〔2〕塔恩(Tarn, w. w.)《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108 页。Chicago: Ares Publishers, Inc, 1985.

〔3〕《汉书·西域传》"罽宾"条。

〔4〕《史记·大宛列传》。

〔5〕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 年,143 页。

〔6〕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2 辑。

〔7〕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见《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234—244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年。

〔8〕Agrawal, D. P., "The Archaeology of India", 146, London: Curzon Press, 1982.

〔9〕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 年第 4 期。

〔10〕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载《考古学

报》1975 年第 2 期。

〔11〕前揭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

〔12〕傅天仇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图版说明,27 页;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载《考古学报》1979 年第 4 期。

〔13〕前揭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

〔14〕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23 页;方国瑜《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载《人民日报》1965 年 7 月 27 日;波巴信《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 年,10 页;陈炎《中缅两国历史上的陆海交通和文化交流》,见氏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270 页。

〔15〕哈威著、姚楠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 年,51 页。

〔1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5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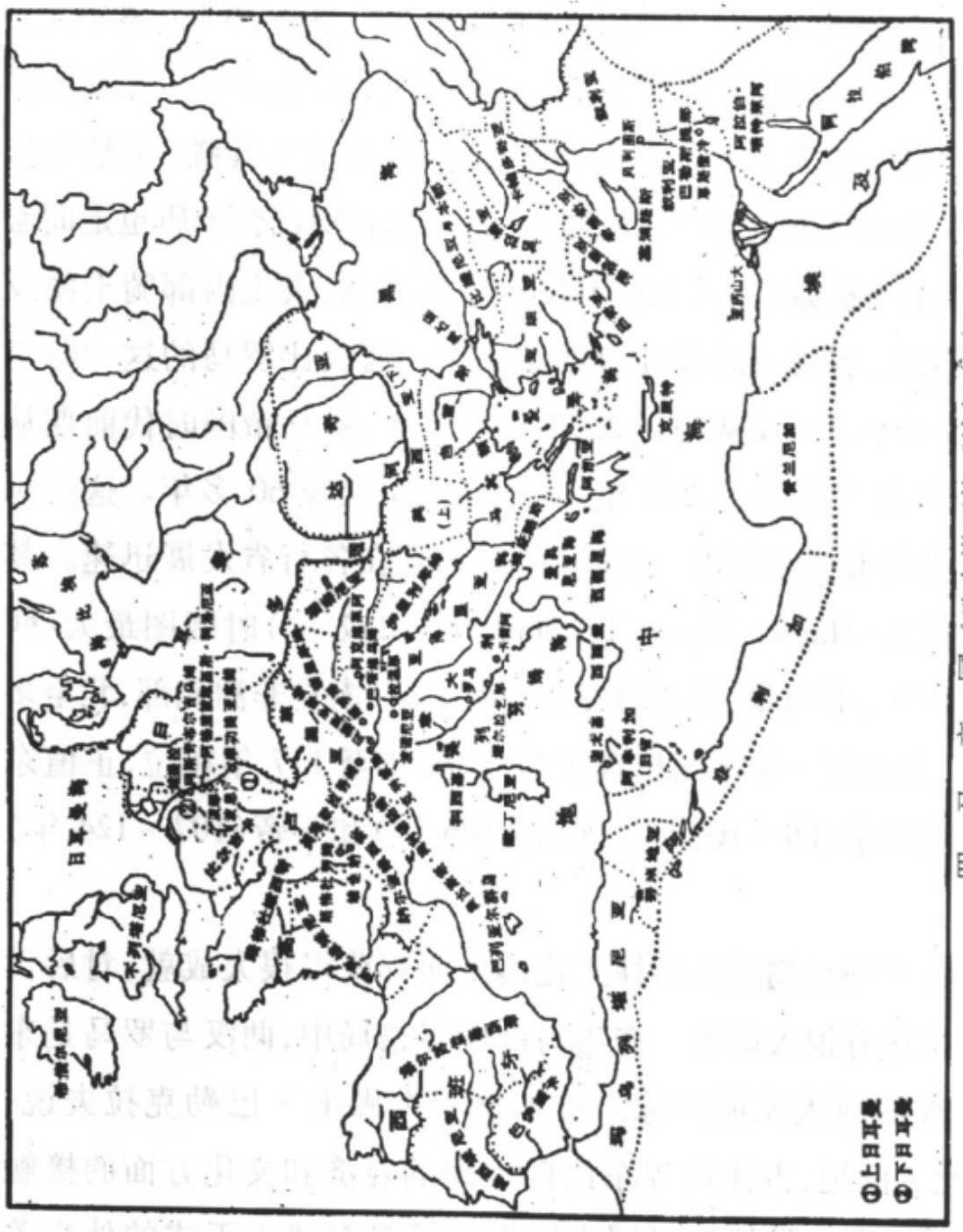
〔17〕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载《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第七章 两汉与罗马的东西辉映

两汉时丝路最西端的罗马帝国，与西汉和东汉王朝遥相辉映，都是代表当时先进文明的古国。因此汉与罗马的交通往来代表着当时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最高水平。在公元前后的一两个世纪中，汉与罗马间的直接接触从无到有，彼此间互相认识从朦胧到逐渐清晰。特别是罗马人沿海路东来，汉朝中国人通过海路西去，使贯通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线东西串联起来，为此后中西交通展示了广阔前景。

一 汉时丝绸之路的西端罗马

汉代丝绸之路的西端是罗马。最早的罗马本来是意大利半岛的一个城邦，后来发展为横跨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制大国。罗马的发展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帝国时代、东西罗马时期，后来西罗马首先瓦解，东罗马则存在了更长时期。西罗马的灭亡，在历史上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端，取代西罗马的各蛮族王国逐渐转变为封建国家，东罗马帝国也走上封建化道路。罗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公元前 754 年至前 753 年，罗慕路斯在台伯河畔建罗马城，开创王政时代。到公元 476 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帝被废，西罗马灭亡，延续 1000 多年。



罗马帝国（选自塔西佗《编年史》）

两汉大致相当于罗马共和时代"内战"时期和帝国时代前期,皆400多年。西汉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4年,包括王莽篡汉的短暂时期。罗马则从公元前150年至前30年,属于共和时代后期,被称为"内战时期",这一时期,在先前向外大规模扩张,征服了迦太基(北非)、西班牙大部分及马其顿、希腊等地后,奴隶制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同时内部各种社会矛盾也走向激化,奴隶反抗奴隶主、无权者反对当权者、奴隶主内部骑士派反对元老派,各种矛盾和斗争错综交织。西汉比罗马的这一时期早50多年。东汉从公元25年至220年,罗马帝国时代前期从公元前30年至公元284年,其结束比东汉晚60多年。这一时期罗马奴隶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各行省发展迅速。其中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53－117年)时版图最大: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达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自非洲北部,北至多瑙河、莱茵河一带。图拉真于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正值东汉中期和帝(89－105年)、殇帝(106年)和安帝(107－124年)时。

古罗马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两方面都获得很大成就,对后世西方文化有很大影响。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两汉与罗马是东西辉映的两大文明国家。英国学者杰佛里·巴勒克拉夫说:"公元二世纪,古代世界东西两端间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接触达到了高潮。虽然罗马同中国汉朝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各自都清楚地知道对方的存在。"其实,希腊人早就知道中国的存在,并不始于罗马,更非公元二世纪。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西方人称中国和中国人为"赛里斯"和"支那",现在,

罗马人更多地称中国和中国人为“赛里斯”(Serce/Seres),意思是丝国或丝国人。

二　罗马人所了解的中国

当罗马成为地跨欧亚非大陆的帝国之后,特别是希腊、罗马文化扩大至于西欧以后,拉丁文“Oriens”(东方)一名便越来越引人注意,在罗马人心目中成为另一特殊世界,东方文化被视为欧洲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统。于是“亚细亚”之名在罗马人的著述中,其意义便是欧洲和非洲以东另一世界。但是罗马人所掌握的关于东方现实状况的材料却不出希腊人范围。庞贝依乌斯(Pompeius)经黑海、里海间远征高加索时曾得到某些有关地理方面的知识,可是对于里海的位置,记述还不正确。阿帕洛杜勒斯(前130—87年)记述,巴克特利亚欧多台墨王的领土在公元前201年已扩张至和赛里斯国接壤之处,据说赛里斯人都是碧眼红发。显然他所说的并不是黄河流域的汉人,大约是操东伊朗语的塞人或大月氏人。赛里斯人养蚕织丝制成文绮,对希腊、罗马人看来还是非常神秘的事情,他们相信丝是生在树上的,丝绸的底纹和花纹都是斜纹的织法更是奇妙。由于中国丝绸的大量输入罗马,罗马诗人的作品中屡次提到赛里斯国和赛里斯国人,意即丝国和丝国人,但认识仍很模糊,存在不少疑问。维吉尔(Vigile,前70年至公元19年)《田园诗》有云:

爱底奥比亚(Aethiopia)人的丛林里怎么会产生细软洁

白的羊毛？赛里斯人怎么会从他们的树叶中抽出纤细的线？[2]

霍拉赛(Horace,前65至公元8年)的五首诗中都提及赛里斯：

这些乱放在赛里斯国坐垫上的斯多噶派(Stoici)论著对你又有何用处呢？(《希腊抒情诗集》VIII,前29－30年)。

也许他(奥古斯都)能击退帕提亚人(Parthes,安息人),使他们遭受应得的惨败,因为帕提亚人威胁着拉丁地区(Latium);也许他能战胜东方各地的居民,赛里斯人和印度人,成为您(指朱比特,Jupiter,罗马最大的神)独自的附庸,他将公正地统治天下。(《颂诗》I,12。前24年)

那位秀发馨香的王孙是谁？他举手向你敬酒,这只手善于用祖传的弓弩射出赛里斯国的利箭。(同上I,29)

梅赛纳(Mécéne),你为小镇而惴惴不安,为大城而忧心忡忡。怕引诱来赛里斯人、大夏人或正处于居鲁士(Cyrus)的统治之下和正为内乱所苦的泰内伊斯人(Tanais).(同上IV,29)

不,那些饮用深深的多瑙河深水的人们,基提人

(Gétes)、赛里斯人、不讲信义的帕提亚人以及那些诞生在泰西伊斯河畔的诸民族,他们决不敢违抗恺撒大帝(Julius)的王法。(同上 IV,15)[3]

普罗佩赛(Properce,前 50 年至公元 15 年)在《哀歌》中的两首诗中提到"赛里斯":

赛里斯织物(Serica)和绚丽的罗绮,怎能抚慰他们(不幸的情人)的忧伤?(I,14)

因为我没有提到你年幼的侄子的赛里斯战车。(IV,8)[4]

奥维德(Ovide,前 43 至公元 17 年或 18 年)的《恋情》诗云:

怎么?你的秀发这样纤细,以至不敢梳妆,如像肌肤黝黑的赛里斯人的面纱一样。(I,14)[5]

西流士·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25 至 101 年)的《惩罚战争》中有三次提到"赛里斯人":

旭日的光辉已经照遍塔尔泰斯海(Tartesse)面,冲破黑夜的重重暗影,照临东国的海岸。晨曦照耀中的赛里斯人前往小树林中去采集枝条上的绒毛。(VI,1-4)

我不是已经谈到过酒神巴卡斯(Bacchus)了吗？高加索的猛虎拖着他凯旋的战车奔驰过大小城镇，束缚了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之后，他带着缴获的武器从东方胜利而归。(XV,79－81)

赛里斯人居住的东方，眼看着意大利(火山)的灰烬漂白了他们长满羊毛的树林。天哪！这真是蔚为奇观！(XVII,595－596)[6]

此外，生活于公元39年至65年的卢加努斯(Lucanus)、40年至96年的斯塔西(Stace)和大约生于60年至125年前后的朱维纳尔(Juvénal)等拉丁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提到丝、丝国或赛里斯人等等。

希腊人斯特拉波(前58年至公元21年，一说前63年或54年至后24年或25年)著《地理书》(Geographica)，此书大约成于公元一世纪初，其中引用克泰夏斯的记载，自谓其材料取自亚历山大部将奥内西克利都斯(Onesicritus)，其人卒于公元前328年(周显王四十一年，秦惠文王十一年)。斯特拉波书中的内容或许有伪托，但因为其成书时间很早，因此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多处讲到有关赛里斯人的内容：

大夏国王们始终不断地把自己的领地向赛里斯人和富伊人(Phrynoi)地区扩张。(XI,II,1)

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气候的酷热),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羊毛。尼亚格(Néarque)说: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马其顿人用来制造座垫和马鞍。这种织物很像是足丝脱掉的皮织成的赛里斯布一样。(XV,I,20)

然而,有人声称赛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岁的穆西加尼人(Musicaniens)还要长寿。(XV,I,34)

人称赛里斯人可长寿,甚至超过二百岁。(XV,I,37)

斯特拉波还有《古典名著选》(Christomathia)一书,也提到赛里斯人:

印度的地势呈菱形,其北端是高加索山脉,从亚洲一直延伸到它最东方的边缘,这一山脉把北部的塞种人(Sakai)、斯基泰人(Scythes)和赛里斯人同南部的印度人分割开了。[7]

至公元一世纪,罗马作家笔下更具体地记述了赛里斯国和赛里斯人,内容更加丰富,材料也较为翔实了。塞内克(Sénéque,前4－公元65年)是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曾为罗马皇帝尼禄之师,并曾为执政大臣。在他的书信和悲剧作

品中,曾述及丝国人:

还有哪位告诉别人和自我告诫,自然界不会强加给我任何艰苦,我们无求于石匠和铁匠就可以住房,不同赛里斯贸易也可以穿衣服的人呢。(《致鲁西流士(Lucilius)的信件》,No. 90)

女子们,请为我脱掉这些缀金和紫红的服装!我不要推罗人的紫红染料,也不要遥远的赛里斯人采摘自他们树丛中的丝线。(《悲剧作家赛内克》)

纵使他受到那些敢于进犯到多瑙河滨的人和以其羊毛而驰名的赛里斯人的攻击也安然无恙,不管他们居住在哪个地方。(同上)

居住在天涯地角的赛里斯人也歌颂他(按:指海格立斯,Hercules,最高神犹比得神的儿子)的胜利。(同上)

她也不用针刺绣旭日出处的赛里斯人采自东方树上的罗绮。(同上)

假使可以称为衣服的话,我曾见过丝国的(Sericus)衣,不能蔽体,甚至不能遮蔽私处。穿上这种衣服,妇女可以宣称自己并未裸体,只是稍稍明亮(裸露)些。为了这个重大

的理由，无知的外国人，已被禁止来贸易。我们的妇女们已受到警告，除了在自己的闺房内，不许在公共场所显露，以免诲淫之嫌。（此段据方豪《中西交通史》译文）[8]

罗马学者梅拉（Pomponins Mela，公元一世纪人）在所著《地方志》（De Situ Orbis）一文中，提到丝国的位置和丝国人经商的方式：

从东方出发，人们在亚洲所遇到的第一批人就是印度民族、赛里斯人和斯基泰人。赛里斯人住在临近东海岸的中心，而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却栖身于边缘地带。（I,11）

然后又是一片猛兽出没的空旷地带，一直到达俯瞰大海的塔比斯山（Tabis）；在辽远处便是高耸入云的陶鲁斯山脉。两山之间的空隙地带居住有赛里斯人。赛里斯人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民族，由于其贸易方式奇特而十分有名，这种方式就是将商品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买客于他们不在场时才来取货。（III,60）[9]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 年）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多处都写到赛里斯，这本书成书于公元 77 年。其中涉及赛里斯的内容：

从里海和斯基泰洋出发，我们的航线转向了东海，沿海

岸前进。第一部分开始于斯基泰海岬，由于常年积雪而无法居住；第二部分地区由于其居民的残暴也无法耕耘。这里所指的是一些食人生番的斯基泰人，他们靠吃人肉为生。周围是一片荒野，无数野兽出没其间，袭击那些也不比它们怯弱的来往行人。接着又是斯基泰人，又是由野兽繁殖的不毛之地，一直到达一座延伸至海的大山。人称之塔比斯山。只是到达为海岸长度一半，面对夏季太阳升起的地方才有人类栖身。(VI,53)

人们在那里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按即丝)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而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赛里斯人本来是文质彬彬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却显得野蛮，他们不与别人交往，坐等贸易找上门来成交。(同上,54)

在喀劳狄执政年间，由锡兰(按：即斯里兰卡)前往罗马的使节们介绍说，锡兰岛的一侧朝东南方向沿着印度延伸，有一万节(Stade)之遥(按：Stade 乃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 180 米)；这些使节们曾在赫摩迪山(Hemodi)以外地区见过赛里斯人，并与他们保持着贸易关系；使团长拉西亚斯(Rachias)的父亲曾到过赛里斯国；赛里斯人欢迎旅客们，

他们的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不轻易和外来人交谈。另外，由他们所提供的资料与我们西方商人们的所说也相差无几，即商品只堆放在赛里斯人一侧的江岸上，如果商人们感到价格物品合适的话，就携走货物而留下货款。（同上，88）

据伊希戈内（Isigone）认为，印度的赛利尼（Gymi）民族可以活到一百四十岁。他还认为埃塞俄比亚人和赛里斯人也能享受同样的寿数。（VII，27）

在文章的一开头，就使人越来越感到惊奇，即人类甚至可以劈开大山挖出其中的大理石，可以向赛里斯国索取衣料，可以到红海海底去探求珠宝，可以到地心深处去寻觅碧玉。（XII，2）

我们在提到赛里斯民族时就曾谈到过该地的羊毛树。（同上，17）

在推罗（Tylos）岛上的最高地带，还有一种与赛里斯品种不同的另一种羊毛树。（同上，38）

珍珠是由阿拉伯海提供的。我国每年至少有一亿枚罗马银币（Sestertius）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阿拉伯半岛夺走。这就是我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同上，84）

第五种葡萄树被称为羊毛树，这种树长满了绒毛，所以我们对于印度国和赛里斯国的羊毛树就不要大惊小怪了。(XIV,22)

在各种铁中，赛里斯铁名列前茅。赛里斯人在出口服装和皮货的同时，也出口铁。(XXXIV,145)[10]

卢坎(Lucain，公元39－65年)在《法尔萨鲁姆》(Pharsale)一书中提到赛里斯：

我们已经使赛里斯人和蒙昧的阿拉克西斯人(Araxe)就范，而且还降服了看见过尼罗河源头的那些民族。(I,19－20)

克利奥帕特拉(Cléopatre)的白腻酥胸透过西顿的罗襦而闪闪发亮。这种罗襦是用赛里斯人的机杼织成，并用尼罗河畔的织针编出粗大透亮的网眼。(X,141－143)

赛里斯人首先见到你(尼罗河)，并探询问你的泉源。然后你又在埃塞俄比亚田野掀起了奇特的波涛。(X,292－293)[11]

公元一世纪末佚名作者《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有关于

中国的记载。本书作者是侨居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并在公元80年至89年（东汉章帝建初五年至和帝永元元年之间）航行于红海、波斯湾及印度东西海岸。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方豪翻译如下：

过了这地方（Chryse，即马来半岛），就到了最北部，海止于[秦国]（此处赛特注云："原抄本此处有脱文。"又说"决非指丝国"，但其法文译本仍译为"丝国"。玉尔本则译为"秦"Thin）。在这国家的内地，有一极大城名秦尼（Thinae 或 Thinai），远在北方。那地方出丝、丝线和名为 Serikon 的布（指绸绢）。由陆路经巴克特利亚（Barygaza），又经恒河，到里姆利亚（Limuria）。进入秦国是不容易的，因为从那里回来的很少，也很难得。那国家正处于小熊星之下，并且据人说，那国境就在黑海和里海的东岸。其旁有梅奥底斯（Maeotis）湖，可通大洋。

每年有矮人到秦国边境，这些人面部宽大，而极聪明。据说他们称为贝萨台（Besatai）人，类似野人。他们率妻儿同来，携有大包货物，又有大筐，那颜色和还在发青的葡萄树叶相同。他们到了本国和秦国之间的地区，便停留一段时间，庆祝若干日。这时他们就用大筐以代床用。然后回到其国内地。当地的人民看到他们离开，便来到那地方，收取他们的卧具。

比那里更远的地方，或因气候太冷，或为冰雪所阻，无法通行；或由于神力不可抗，还没有人去探查。[12]

其中“Thin”即指“支那”（秦），书中提到的极大城 Thinae，即长安。公元 100 年左右的查理同（Charriton）在《加拉和卡利赫》一文中讲到赛里斯人精工制作的箭囊和弓弩，被罗马人挂在自己身旁。

公元二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émée）《地理志》记述更为详细，此书约撰于公元 150 年（东汉桓帝和平元年）。书中谈及中国的内容很多，反映出海道畅通之后罗马人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了。方豪将有关中国的史料作了如下翻译：

世上无人居住的地方，东至无名地（Terra Incognita）和大亚细亚的极东国家，支那与丝国为邻。

已经为人所知的世界，极东止于支那的都城。离亚历山大港，经度一百十九度半，相差约八小时。

关于幼发拉底河渡口和石塔之间的距离，照他（马利努斯）说是八百七十六雪尼（Schoeni）或二万六千二百八十斯大特（Stades，有人译为“节”）。而在石塔和丝国的首都赛拉（丝城）之间，根据步行需时七个月来推算，应有三万六千二百斯大特。照我们修正的方式，两处的距离，我们都

要加以削减。

他(马利努斯)确实说有名梅斯(Maes)者,又名底启亚诺斯(Titianos),原籍马其顿,是商人,一如其父,他曾记下这路程。他虽没有到过丝国人地方,但他曾派了几个手下人去。

赛里斯人的国和都城,都在支那之上(指其北),他们之东是无名地,布满湖沼。湖中产大芦草,极厚,居民可藉以渡过(沼泽地带)。(他们又说)从那边,经石塔而到巴克特利亚那(Bactriana),不止一道,另有一路,可经巴林波脱拉(Palimbothra)而到印度。(他们又说)从支那的都城到加底加拉(Kattigara)港口的路,是向西南走的。

丝国西界西徐亚,在伊毛屋斯(Imaos)岭外,照指定的线而更高。北止于无名地,与都耳(Thoule)岛在同一纬度。东亦与无名地为界。界在东经一百八十度六十三分,至一百八十度三十五分。南界印度恒河东岸。边境是沿东经一百七十三度三十五分。再进即与支那为邻,而止于已指出的无名地。

丝国四周有阿尼巴(Anniba)山围绕,山自一百五十三度六十分起,迄一百七十一度五十六分止。山的东部有奥萨基亚(Auzakia)山,山的主峰位于一百六十五度五十四

分;阿斯米拉亚(Asmiraia)山,其西端位于一百六十七度四十七分三十秒,至一百七十四度四十七分三十秒。这些山的东部有加西亚(Casia)山,山的主峰位于一百六十二度四十四分;大古隆(Thagoron)山,其中央处位于一百七十六度三十六分;奥笃洛各拉斯(Ottorokotthas)山,其两端位于一百六十九度三十六分和一百七十六度三十九分之间。境内有二河,丝国的大部都受灌溉:第一条名奥依加尔大斯(Oikhardas),有三源:一源在亚斯米拉育农(Asmiraioi)山附近;另一源则在一百七十四度四十七分三十秒,近加西亚山,一河曲位于一百六十度四十九分三十秒,在同一山中,别有(第三)源,位于一百六十一度四十四分十五秒。第二条河名朴底索(Bautisos)山,一源在加西亚山附近,位于一百六十度四十三秒;另一源在奥笃洛各拉斯山附近,位于一百七十六度三十九分;在爱莫大(Emoda)山河附近,有一河曲,位于一百六十八度三十九分。

在丝国,最北的种族是:食人野人;在他们之下,有亚尼博衣(Anniboi)人,居于同名之山上;在他们和奥萨基奥衣(Auzakioi)人之间,有希其杰斯(Sizyges)人;再在他们之下,则有达姆纳衣(Damunai)人和比阿拉衣(Pialai)人,直至奥依加尔大斯河;河以下就是同名的奥依加尔大衣人。

支那人的边境,北与丝国一部分为界,前已述及;东与南为无名地;西边是印度恒河边境,依照已经确定的线而直

到大海湾，大海湾名带利奥特斯(Theriodes)湾，在支那的海湾，有吃鱼的爱底奥比亚人居住。[13]

他曾提到"加底加拉"的一个港口名，有人译作卡蒂加拉，李希霍芬考证在东京湾上今越南之河内或其附近，以为即"交趾"的音译。夏德同意这一观点。藤田丰八则以为占城的卢容浦口。其论据有二，一是梵文 Kutigrha 和占文 Katigaha 意即石舍和石柱，而占城人常于海口置石柱为标记，卢容浦口一定有此种石柱；二是卢容浦口乃当时对外港口，即后来之大长沙海口。《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引康泰《扶南记》云："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可二百余里，从口南发往扶南诸国，常从此口出也。"但托勒密对东方和中国的认识仍很模糊，在他的书中附有一幅世界地图，甚至认为印度洋的南部和东部也与陆地相连，又说这些陆地分别是亚洲和非洲两大陆的延伸，地图上把非洲海岸画得偏东，离曼德海峡很近。因为西方人认为赛里斯位于世界的最边缘的地方，图中把它置于最东方，以为在它之东再没有其他任何地方了。

从罗马作家笔下写到的赛里斯国和赛里斯人，可以知道，由于距离的遥远和缺乏直接的接触，罗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还是模糊和笼统的。比如中国在哪里？他们只知道在东方，确切的位置说不清楚。在他们笔下，大致是指罗马与中国之间的某个地方，在东方靠近印度和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侧，一般指的是中国新疆及其附近地区。而且有时他们对于"支那"和"赛里斯"是什么关系，似乎也很模糊，甚至有以为是二国者，

托勒密就是如此。又如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没见过。老普林尼描写的赛里斯人，“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显然不是黄河流域的汉人。当时中国和罗马等地的丝绸贸易，都是通过西亚、中亚或印度洋沿岸地区为中介的。他所描写的应当是经营丝绸贸易的东方某个中介民族。提到中国，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特别注意丝、丝线和绸绢。但丝是怎样产生的？他们也不大明白。他们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民族，生产一种漂亮的丝织物，所用的原料是从树上采摘下来的一种神密的东西。在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一世纪中，罗马人一直认为丝绸是赛里斯人从树丛中采摘来的丝线，或能抽丝的植物纤维，或森林里所产的羊毛织成的。对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罗马人对中国和中国的产品之所以长期不能有确切的了解，除了缺乏直接的接触，还因为西域民族与波斯—阿拉伯人出于商业的利益，为垄断丝绸市场而故意隐瞒丝绸和丝路的真相，从而使丝路更蒙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

早期西方人为什么对蚕丝的产生有那些奇怪的认识，除了像有的人所推测的那些经营丝绸贸易的中介民族故弄玄虚之外，我们认为更有可能与古代中国人关于蚕桑丝织起源的神话传说有关。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记载的一则故事引起我们的注意：

>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

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娶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当为"惊"字）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织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

细绎文意，此则故事应该是起源很早而又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古老传说，在口耳相传中，也随着丝绸的西传而为希腊罗马人辗转听闻。但在流传过程中，人们逐渐淘汰了马皮裹人的荒唐成分，而蚕与茧生于树枝间较为可信的细节却被保留下来。可见希腊罗马拉丁作家笔下有关蚕丝生于树间的种种趣谈并非空穴来风。

至公元二世纪，他们对中国丝绸和蚕桑技术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了解。公元二世纪《百科书典》编纂人德尼斯（Denys）对赛里斯人精美的丝绸制品和高度的纺织技巧有所了解，他说："赛里斯国内的吐火罗人（Tokharoi）、富尼人（Phrounoi）和其他蒙昧部族都不重视肥壮的牛羊，他们可以织出自己荒凉地区五

彩缤纷的花朵。他们还能够以高度的技巧裁制贵重的服装,具有草原上绿草闪闪的光泽,即使是蜘蛛结网的成果也难以与之相媲美。"[14]包撒尼雅斯(Pausanias)著《希腊志》,才记述丝是一种叫做"赛儿"(Ser)的大虫子的产物,他说:

> 至于赛里斯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它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它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作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

可以看出,这一段关于蚕的介绍已经大致接近事实。但是关于蚕的饲养、赛里斯国的位置和赛里斯人人种等,他仍有不少模糊的或者是错误的认识和想象:"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了,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的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人们还获悉赛里亚(Séria)岛位于厄立特里亚海最边远的地方。我还听说这里不是指厄立特里亚海,而是一条叫作赛儿(Ser)的江河,这条江形成了赛里亚岛,完全像埃及三角洲是被尼罗河,而不是被一个大

海环绕一样，这一赛里亚岛恰恰也具有同样的地势结构。赛里斯人以及所有那些居住在附近岛屿的人，如阿巴萨（Abasa）岛和萨凯亚岛上的人，他们都属于埃塞俄比亚种族；也有一些人声称，他们远不是埃塞俄比亚人种，而是印度与斯基泰混血人种”[15]。这里面既有某些真实的成分，而更多的是似是而非的传闻和想象，连作者自己的口气都不敢肯定。直到二世纪后期的卢西安（Lucien）还说：“整个赛里斯民族以喝水为生。”[16]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的巴尔德萨纳（Bardesane）摘引《阿布德·厄赛波，布讲福音的准备》一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介绍，也显得比较写实：

> 在每个地区，人们都制订了一些具体文字。我想介绍一下自己所知道以及我所能回忆起的情况。首先从大地的一端开始讲述。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内，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经过子午线上空的光辉的阿瑞斯（Arès）战神之星体，不能违背人心而用铁器杀人，同时与阿瑞斯战神有关的昔普里斯（Cypris，一种诞生在塞浦路斯地区的希腊女神）也不能强迫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与别人的妻子私合。尽管在他们之中，阿瑞斯战神每时每刻都在天中央巡视，赛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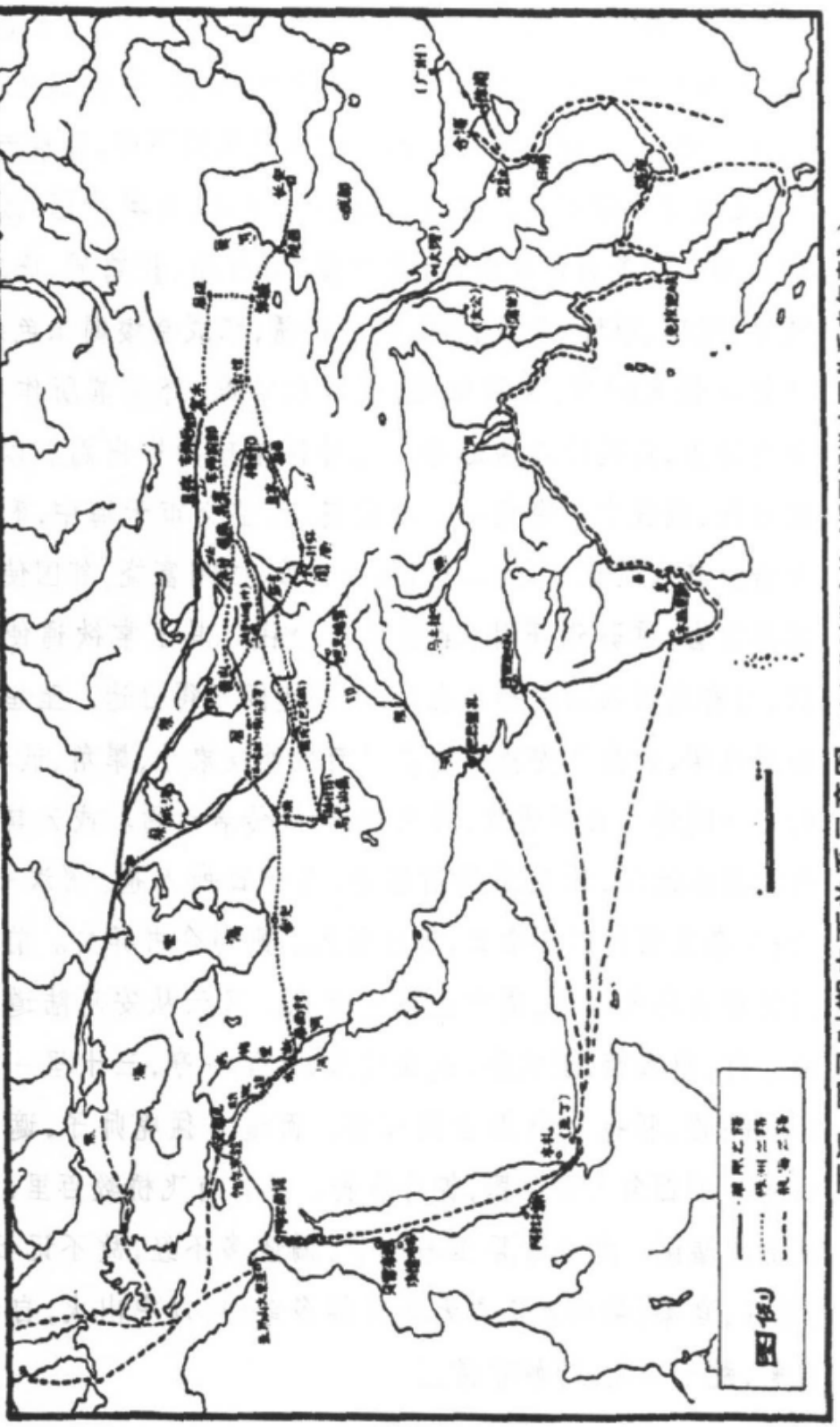
他知道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有关中国社会的描写有点

过于美化的倾向，但也基本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公元200年左右的阿克伦(Acron)在《颂歌》中说："'赛里斯'一名来自赛里斯国。赛里斯民族与帕提亚人相毗邻，以他们善于造箭而广负盛名。'赛里斯人织物'(Sericum，丝匹)一名也由此而来。"[18]奥里热内(Origène，182－252年)《反对赛尔斯》书中说："他(指赛尔斯)曾于那里这样讲过：'无论是斯基泰人，利比亚的游牧人，还是赛里斯人，他们都不懂得上帝。"[19]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反映了随着中西间交通的开展，罗马人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清楚和深入。

三 汉代中国人所了解的罗马

中国人也已经知道罗马的存在，西汉时对西部世界这个新兴起的帝国还没有正式的名字，东汉时称之为"大秦"、"犁鞬"或"海西国"。这些名称在中国文献中最早见于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同时范晔还比较详细具体地记下了汉时中国人对罗马的了解：

>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既之。有松柏竹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骈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石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



西汉-罗马时期中西关系示意图（选自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

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官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镂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原注：置，驿也），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原注：鱼豢《魏略》曰："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此处记述大秦的政治制度，所谓王无常人、简立贤者等，大约指当时罗马帝国仍实行元首制，保留了一些共和制的外衣。而言事者投书囊中以供王回宫后发省、官曹会议国事，废王另立而受放者不怨等，则是对已经逝去的希腊罗马奴隶制民主政治的时代的一种模糊记忆。其中记述的不少物产，有的好象很奇异，分析起来，其实又很平常。比如水精，就是水晶，在这里指的是人造透明玻璃。我国古代习惯把天然水晶和人造透明玻璃相提并论。人造透明玻璃在当时罗马使用非常普遍。“以水晶为食器”，其实就是玻璃杯盘之类。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半岛、帝国东部的叙利亚、埃及等地，盛行以玻璃和各色宝石镶嵌组成的“马赛克”（Mosaic，嵌镶砖）为豪华建筑的装饰，以水精为柱当即指此，考古发现罗马帝国庞贝古城，普遍用马赛克装饰墙面和地板。

但这些介绍也有不少似是而非、模糊不清之处。有的或许有点根据，或者说有点影子，但不很确切。关于罗马政治的描述，其实更接近希腊罗马奴隶制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时代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把中国古代政治理想附会加入的成分。白鸟库吉《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指出，汉代中国人决不会认为世界另外还有国家会优于中国，当他们听说西方极远之地有一国家，与中国不相上下，于是便视之为本国之流裔，称之为大秦。同时因为深信极东有仙境，极西亦有西王母，于是《大秦传》便说其国近于西王母，更进而推想其国人亦必长大，而且较常人为高大，乃命曰大秦。所以此记大秦之文物制度，亦极力以本国之文物制度符合之。关于大秦的位置，正像罗马人以为赛

里斯是极东的国家，再向东便是无人之地，中国人知道大秦是极西的国家，但了解得也不确切。范晔说："几于日所入"，再往西便是"弱水流沙"，近乎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所居处。

关于汉代罗马的名称，一般认为这里的解释所谓"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称之大秦"的说法并不正确。《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引鱼豢《魏略》"大秦"条已经说过："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但并没有据此以之作为其国名的原因，而且古代罗马人无论如何其身材长相都不可能比之其他各地人更加"有类中国"。西晋张华《博物志》"异人"条云："大秦国人长十丈，中秦国人长一丈。"显然是想象之词。对汉代称罗马为"大秦"，前人有不同的理解。1636年（明崇祯九年），基旭尔出版《哥泼多语埃及语孰先论》（Prodromus Goptus sive AEgyptiacus），曾翻译了《景教碑》文中之"大秦"。后来刘应、德经、格拉勃洛德、勃莱脱胥纳窦、李希霍芬等都以为大秦即罗马帝国，夏德先主罗马说，后又著《中国与东罗马》，以为大秦指叙利亚。亚伦（Allen，疑即林乐知）极力反对夏德的立论，认为大秦为亚尔美尼亚。鲍梯埃以为指亚历山大部将赛琉古在叙利亚的后裔。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艾约瑟撰《论罗马与拜占庭》（Aplea for Rome and Byzantium），以为大秦或拂菻即指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而非专指叙利亚，因为叙利亚不在任何大海之西（见《Chinese Recorder》）。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认为大秦指埃及，犁鞬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所以大秦古称犁鞬。《魏略》中说"有河出其国"，"其国"即埃及[20]。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中有《黎轩与大秦》一文，认为"大秦"二字是古波斯语 dasina 的音译，其义为"右"，右者西也。中古波斯语作 dasin，《魏略》云："在安息、条支之西大海之西"，又云"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四用"西"字。汉朝人称罗马为大秦，正像明代以后人称欧洲为"远西""极西""大西""泰西"或"西洋"一样。他还认为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两河之间有一片沃土，当时就叫 Daksina，中国人闻知此名后，便以之称罗马帝国东境之全部地区。古印度语作 Daksina，此例亦说明古印度语与古波斯语同源。沈福伟也主张"大秦"实际上是"泰西"意思，但他从字义解释，认为"大"与"泰"本相通转，"秦"是春秋战国时中国西部诸侯国，西海亦称秦海，大秦或海西都代表极西的国家。

既然"大秦"一词的含义是西方，它所指的地域则有远有近，远则称欧洲，称罗马帝国，近则称印度，称印度附近诸国。《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西南夷传》记载，安帝永宁元年（120年），掸国使者进献幻人，而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有人认为大秦即罗马，幻人来自地中海一带，藤田等人以为则以为指印度，因为《后汉书》明言大秦在掸国西南。而且《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有"悦般国"，"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其地在缅甸之西，印度东南，东汉时掸国进贡之幻人，为悦般国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大秦"在印度或印度之附近。冯承钧认为掸国所献大秦幻人，疑是南天竺幻人，南天竺一名 Daksina－Patha，《法显传》中称为"达楔"，与"大秦"发音相近，其人亦自古以幻术著称[21]。《法苑珠

林》卷七十六记载,唐贞观十二年(646 年),西国有五婆罗门来京师,善能音乐、咒术、杂戏、截舌、抽腹、走绳、续断之类。

方豪不同意藤田等人认为中国文献中的"大秦"都是指印度及其附近地区的观点,他举出《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所记大秦国使者来华的例子,"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此所谓安敦王,近人已考定其为公元 121 年至 180 年在位的罗马国王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安敦即 Antonius 的译音,现在写作安多尼,一作安敦尼。安敦部将伽西乌斯(Avidius Cassius)曾于 162 年至 165 年征安息,奠定小亚细亚一带。故当时在安息一带,一定有不少罗马人。桓帝时来华的罗马使节或许是商人假冒,其实并不是罗马国王所派遣,但他们为罗马人,或者说欧洲,则并无疑义。方豪认为古代文献中"大秦"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狭义之大秦,或近或远,所指不一,当按每一文献,为之考证;广义之大秦,则为西方即海西之通称,犹今日所谓西洋,所指极广。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云:"《后汉书》之大秦,似指罗马帝国全部而言,其国都在意大利罗马京城;魏书之大秦,似乃专指叙利亚,国都为安都城(Antiochia)。"方豪以为此说"颇为适当"[22]。

其中提到大秦一名"犁鞬",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地名。是不是国名?地在何处?史籍上记载不一,今人也有不同看法。史籍上有的写作"黎轩"、"犁轩",如《史记》、《魏书》、《北史》;有的写作"犁靬"、"犛靬",如《汉书》、《魏略》;《后汉书》和《晋书》则写作"犁鞬"。这是当时对罗马或西域认识模糊的表现。

《后汉书》把《史记》、《汉书》中的犁轩或犁靬直接当作"大秦"或"海西国"的别名，因此引起不少人的误会，认为就是罗马。但至于其原音究指何义，又众说纷纭。上引《后汉书·西域传》，以为犁鞬是大秦的别名，指整个罗马。《魏略》亦云："大秦国亦号犁轩。"夏德《中国与东罗马》认为黎轩是 Rekem 之对音，为古代民族名，居住在 Petra，即那巴提国都城彼特拉，地在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三地之间，罗马人称之为 Aradia Petraeca，转变而为 Rekem、Rokom、Arekeme、Arkem。此城曾经在罗马版图之内，在公元前二世纪非常繁荣，张骞在大夏时应该有所了解，所以回到汉朝便提及此地。有人认为即埃及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奥古斯都（前 30～公元 14 年）时代以后，罗马以亚历山大里亚城（埃及）为基地，从事海上运输，开展东方贸易。近年有人以为黎轩乃条支的一个港口。有人认为当指大夏，因为此一地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说："安息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为叙利亚，而在安息北者即奄蔡（Aorsi）、大夏。

有学者从黎轩人的特征判断黎轩为何地，又有亚历山大里亚、条枝，或印度三说。《汉书》卷九十六上云："初汉使至安息，……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善眩人在古代文献中又称"幻人"，即杂技演员或魔术师，亚历山大里亚的善眩人最有名。《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条枝有"国善眩"的话。唐道宣《法苑珠林》卷六十一云："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过江南，其人有幻术，能断舌，续肋，吐火。"古代地中海附近和西亚、南亚各国皆有善眩人，或幻人，因

此难以据此作为判断黎轩人的居地所在。《魏略》"大秦"条云："俗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也是概指罗马帝国广大地区而言。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黎轩是 Ragha 或 Rhaga 的对音，意即"幻人"。但古代文献皆作为地名，没有作为职业名的，所以不能令人信服。有人认为"黎轩"是拉丁 Latium 的对音，还有人以为是拉西文"希腊"（Graecia）一词的对音。有的学者指出皆不合，Latium 虽是罗马人的发祥地，读为"拉启乌姆"，而轩、軒之古音为干，与"启乌姆"连读不合。其民族名读音为拉丁，更黎轩或犁軒发音更不合。至于拉丁人称希腊为 Graecia，从时代上讲，在汉武帝之后，不可能成为黎轩的对音。

有人认为黎轩之读音乃亚历山大之简译，其义相当于梵文 Yavana，即希腊化之地。此说创自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中国学者冯承钧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皆赞同其说。他们引巴黎藏《那先比丘经》（Milinda Panha）之汉译本中记载，弥兰王吉那先（Nagasenn）说："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巴黎本"阿荔散"原文作 Alasanda 岛，Kalasi 聚落。Alasanda 当即现在亚历山大城的对音。而且伯希和还认为此指埃及之亚历山大。希腊马其顿国王的远征，创造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虽然好景不长，马其顿王猝然去世，使他建立的庞大帝国迅速崩溃，但他开创的局面却标志着希腊以及希腊统治的东方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希腊化时期。在西起希腊、马其顿，东至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界多瑙河和药杀水的辽阔地域内，帝国分裂为一系列希腊化的国家。公元前 167 年，马其顿亡于罗马，包括条枝

在内的小亚细亚领土亦为罗马所有。罗马继承了希腊在欧亚大陆上之主权，中国史家视二者为一体。黎轩即希腊殖民地，故也指后来的大秦即罗马为黎轩。方豪同意上述诸学者的意见，虽然他也指出希腊化时代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城不止一处。归纳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他们认为"黎轩"是泛称：(1)指地中海东部，希腊殖民地之所在地；(2)指中亚及西亚，因亚历山大远征，而为希腊人足迹所到之地；(3)指罗马帝国，以其曾有希腊人[23]。

中国史家对黎轩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关于黎轩的知识存在着不甚清晰的情况。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向武帝作的报告中提到的"传闻其旁大国五六"中，应当包括黎轩，此时已在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后200年，中亚各国对西亚和欧洲的形势必然有较之中国人更多的了解，张骞有所听闻是可能的。但他得到的信息显然不够确切，因此造成《史记·大宛列传》中将黎轩与奄蔡皆视为国名，而且以为皆在安息北。有人认为此指中亚细亚木尔加布河以西的特莱西那(Traxiane)。《史记》中似乎又将条支与黎轩相混淆，说前者"国善眩"，后者则有"善眩人"。《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述了张骞报告中所见闻诸国的具体情形，惟黎轩阙如。虽然提到安息王以"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可是"善眩"却并非西域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特色，而是希腊化地区共有的杂技魔术表演。

《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云："西与条枝接"，"北与康居接"，与《史记》中"北有奄蔡、黎轩"不同，说明班固已经了解到安息之北并无所谓"黎轩"。但是在"乌弋山离"条他却又说："西与犁靬、条枝接"，将犁靬、条枝混为一谈。《汉书》亦无对犁

靬的具体介绍，他对犁靬方位的记述是一种推测，造成其推测的错误，因为二者皆有善眩人。有人则认为《汉书》中的犁靬是波斯湾北岸普林尼称之为阿曼西亚（Armysia）之地的亚历山大里亚，在古拉希坎特附近。

大概在班固已后，东汉人对于黎轩的存在已不加注意。《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六年，……其条枝、安息诸国，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据甘英的经历和报告，西海以东，并无黎轩之国。所以可以推测，当时东汉时人大约已能证实所谓安息之北、安息与条枝之间及乌弋山离与条枝之间，并无所谓黎轩。黎轩之有无似乎并没有引起班超和甘英的注意，所以他们没有提到黎轩，也没有明确否定其存在。这就造成后人对前代史书的误解，以为黎轩作为国名，是所谓大秦或海西国的别称。鱼豢《魏略》云："大秦国一号犁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吴谢承《后汉书》云："大秦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云："大秦国（当脱'一'）名犁鞬（衍字）鞬，在西海之西。"皆沿前史之误。

我们认为所谓黎轩，即阿荔散，即亚历山大里亚的简译，但即非上述诸说中某一地方，亦非所谓希腊化地区和国家的泛称，实即亚历山大城。但亚历山大东征，在中亚、西亚和北非广大地区建立很多亚历山大里亚城，据说他在东方各地建立的、以亚历山大里亚命名的城市共有70余座之多，经考证和发掘核实的已有近40座，分布在从地中海海滨一直到阿富汗、印度边陲的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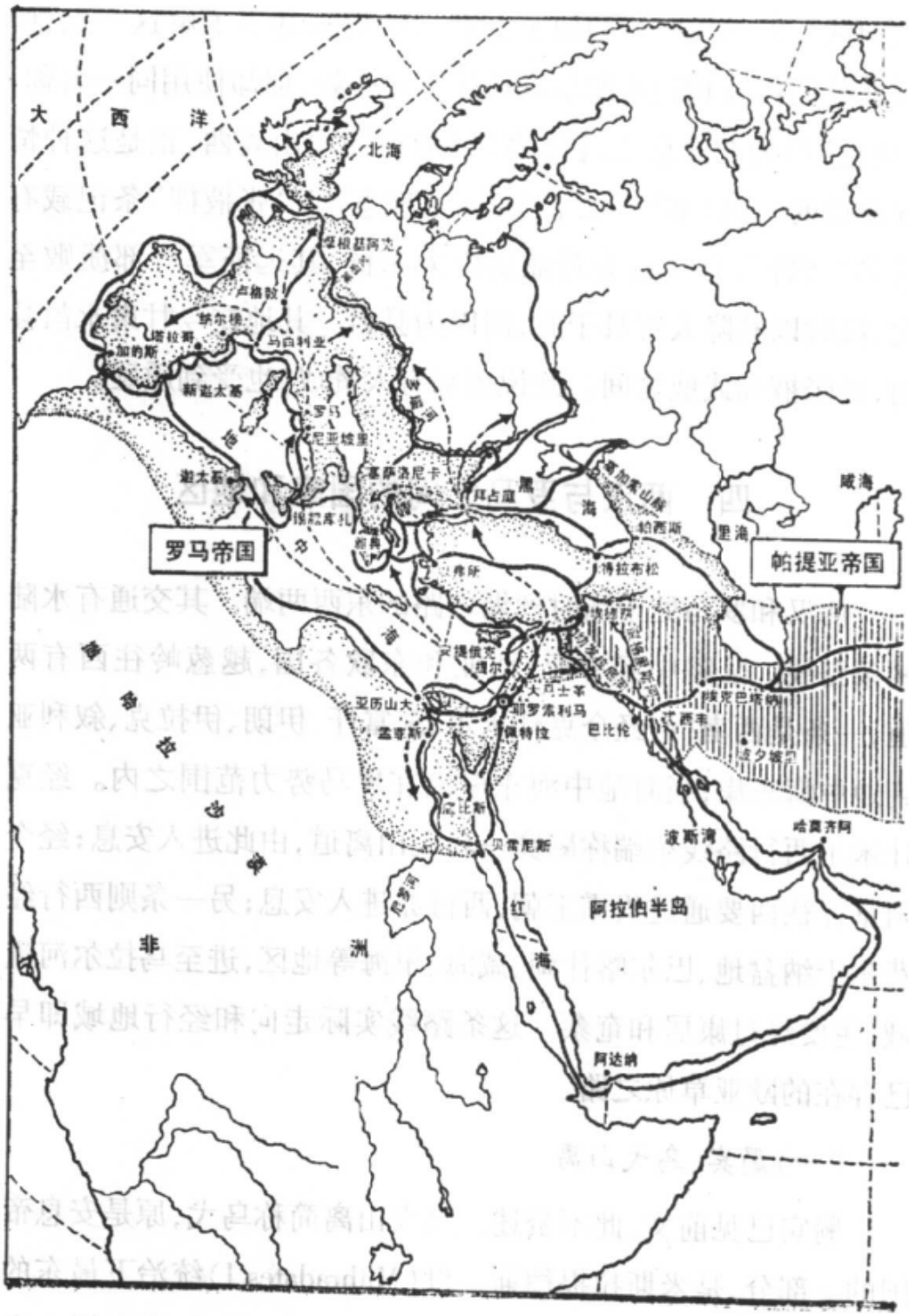
大地区。但汉代西行的使节和此后的史家并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在他们传闻和记述的黎轩往往不在一处，但却使用同一名称。《史记》以为在安息北，《汉书》以为在乌弋山离西，正是这种情况造成的。《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张掖郡"条记载有县名"骊靬"，有人以为乃亚历山大东征，其远征军一部溃败至此，汉时以其降人置县于此，因以为县名。其地在今甘肃永昌县南，处张掖和武威之间。此说历来有人赞成，也受到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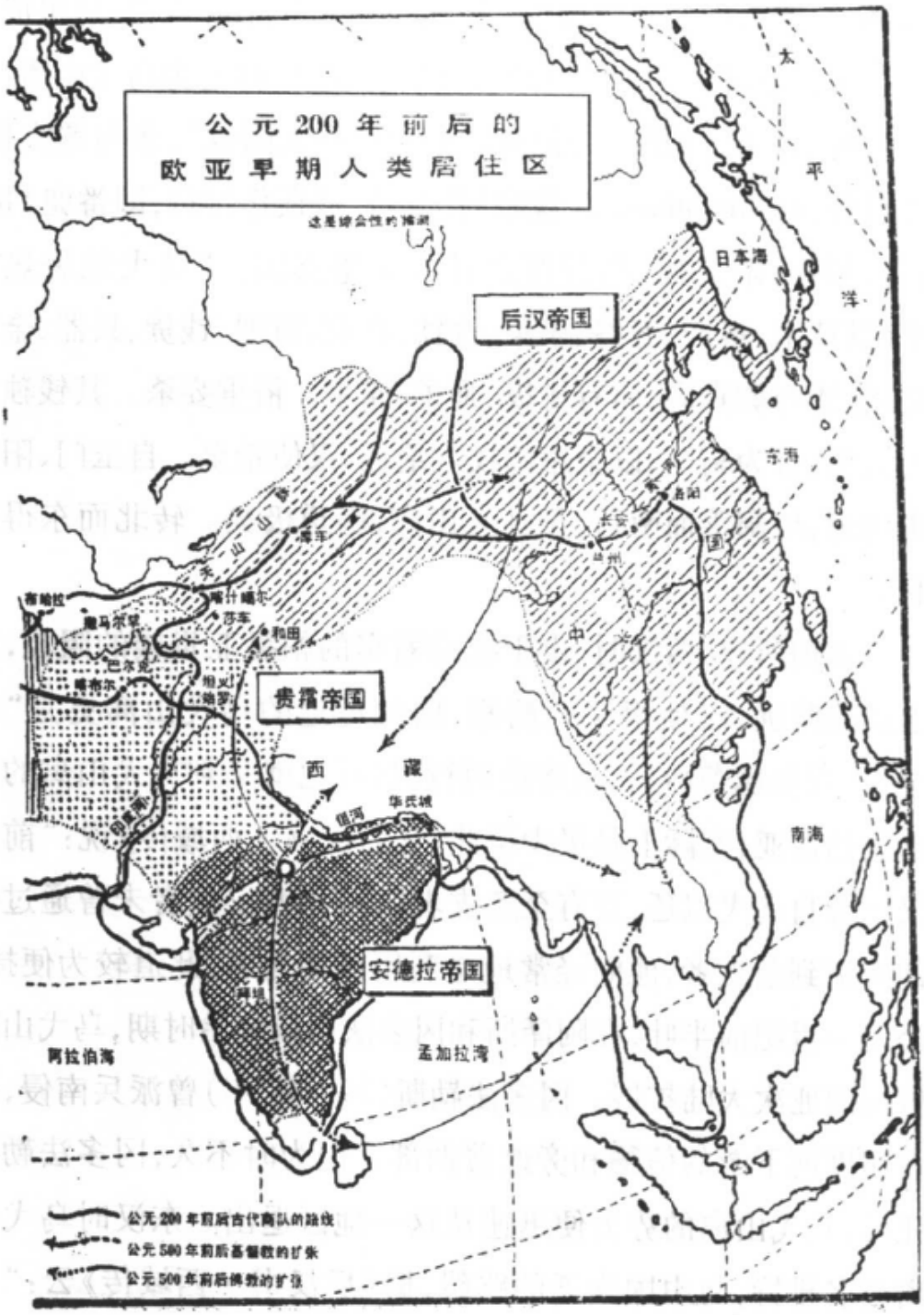
四　两汉与罗马之间的国家和地区

两汉和罗马处于当时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其交通有水陆两条路线。陆路中经中亚、西亚和东欧各国，越葱岭往西有两道，一条是西南行，经今克什米尔、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到地中海东岸，当时地中海东岸已在罗马势力范围之内。经克什米尔西行路线东端称罽宾—乌弋山离道，由此进入安息；经今阿富汗往西要通过贵霜王朝，西行亦进入安息；另一条则西行经费尔干纳盆地、巴尔喀什湖、咸海、里海等地区，进至乌拉尔河流域，主要经过康居和奄蔡。这条路线实际走向和经行地域即早已存在的欧亚草原之路。

（一）罽宾、乌弋山离

罽宾已见前文，此不赘述。乌弋山离简称乌弋，原是安息帝国的一部分，是米斯拉提德斯一世（Mithradates I）统治下最东的两郡，即德兰琴亚那和阿拉科西亚。公元前 127 年塞人侵入安息，安息苏林贵族在镇压塞人之乱中立功，安息王便将二郡赐予


大西洋
北海
罗马帝国
帕提亚帝国
黑海
里海
咸海
红海
阿拉伯半岛
非洲
波斯湾
亚历山大
塞琉西亚
巴比伦
阿达纳
哈雷济阿
贝雷尼斯
加的斯
塔拉哥
新迦太基
迦太基
拜占庭
亚美尼亚
帕提亚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选自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

苏林,其统治中心在锡斯坦。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以后,这里成为安息帝国东部的一个独立政权,汉代文献中称之为乌弋山离。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户口胜兵大国也",东与罽宾接,北与扑挑(Prophthasia,《魏略》作排特,或误作排持,即番兜)接,西与犁靬、条支接,西行百余日可至条支国。"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俗重妄杀。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如前所述,西汉时,由于统治罽宾的帕提亚贵族的阻挠,加上道途险远,汉使很少到罽宾,因此更远的乌弋山离更是"希至"。汉使越葱岭后,从南道西行,最远也就是到乌弋山离的普洛夫达西亚,实际上是极少至此。《后汉书·西域传》说:"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是指西汉使者未曾通过伊朗南道到条支者,他们经常地是利用伊朗北道,此道较为便捷。公元一世纪前半叶,在阿泽斯和冈多法勒斯统治时期,乌弋山离曾向南亚次大陆扩展。冈多法勒斯(19－45年)曾派兵南侵,进占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和旁遮普西部。但为时不久,冈多法勒斯死后,乌弋山离的势力便迅速从这一地区退出。东汉时乌弋山离改名排特,与中国交通的路线,据《后汉书·西域传》云:"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当为'排特'),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说明当时经乌弋山离至条支的道路为汉朝所熟悉,由于

与条支间的贸易频繁，因此也更多地利用了经普洛夫达西亚的伊朗南道。

（二）大夏、大月氏和贵霜王朝

在陆路所经中亚、西亚各国中，最重要的是贵霜王朝和安息王朝。

公元前四世纪末，中亚、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一带被希腊人占据的地区属于塞琉古王国统治。其中最具关键地位的省份是地处中亚的巴克特利亚，中国史书称为大夏。至公元前255年，大夏总督狄奥多特斯乘塞琉古王国西部有事，据地自立，建大夏王国。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大夏人入据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此后大夏的希腊人分裂为两部，欧克拉提德朝仍据中亚，欧提德姆朝占据印度领土。大夏地处东亚、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中心地带，因而各民族来往移居其地者较多。原住我国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受到西迁的大月氏人的逼迫时，有一部分迁居其地。此后大月氏又西迁至此。大月氏人迁居此地时，在阿姆河北建立王庭，仍然拥有40万人口、胜兵10余万人。而大夏各部独立，民弱畏战，因此很快被大月氏征服和吞并，大夏故地成为大月氏的国土。斯特拉波《地理书》曾引阿波罗多勒斯的话，提到四种外国人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其中最早的是吐火罗（Tokhayi），便是汉文文献中的大夏，大夏古读To－kha，即指入侵阿富汗的月氏人。大月氏将王都南迁至阿姆河南的蓝氏城（一作监氏城，今巴尔克）。

贵霜王朝是公元一世纪上半叶由大月氏人和大夏人在中亚联合建立起来的王朝。《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迁于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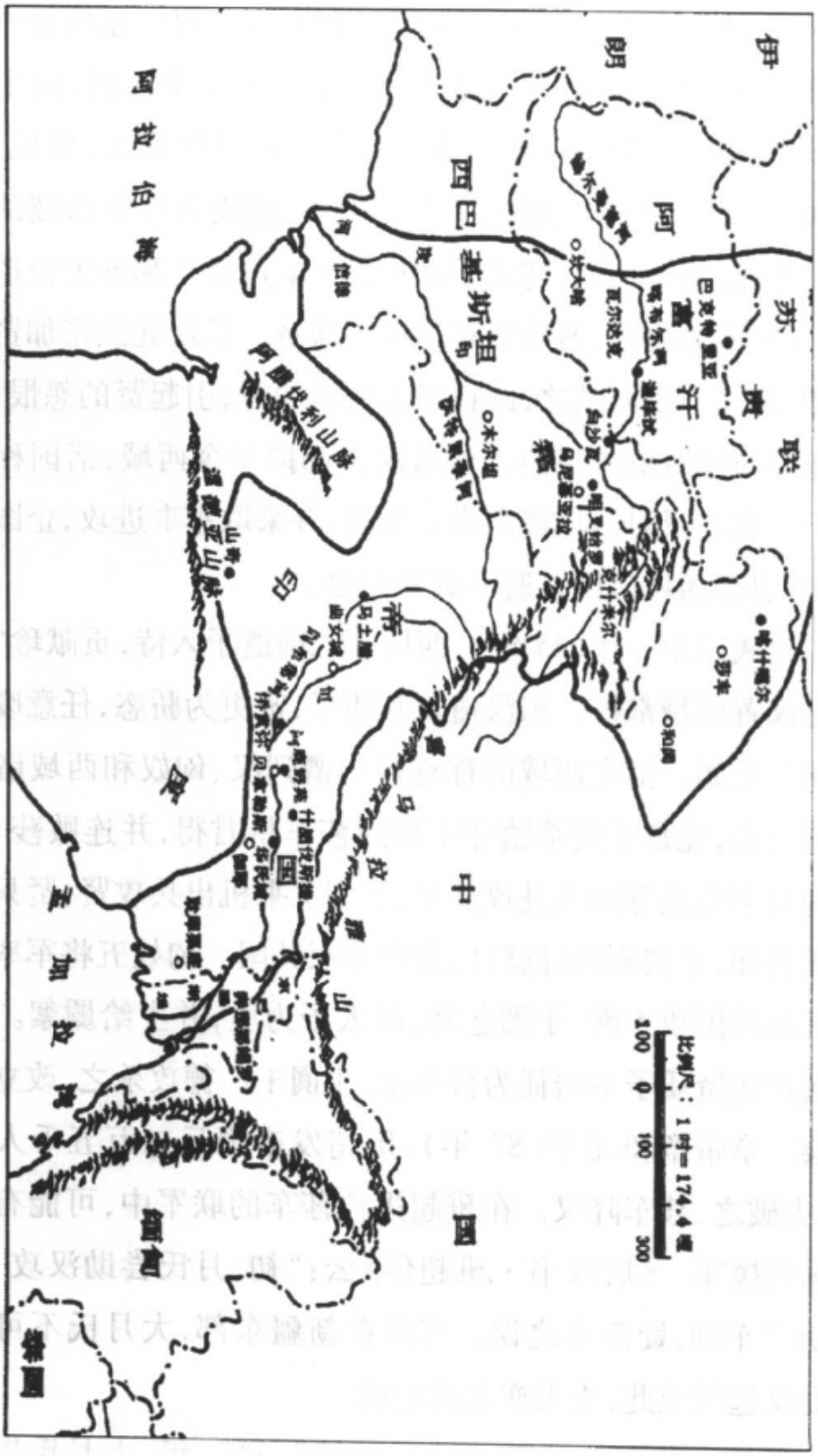
夏,分其国为五部,即休密、双靡、贵霜、盼顿和都密。各部首领称翊侯,地位仅次于王,有五部翊侯,贵霜是其一。公元一世纪时,贵霜翊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攻灭其他四翊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结束了大夏的希腊人统治。丘就却西侵安息,取高附国地;又南下占据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犍陀罗(中国史书中称"濮达")、罽宾(克什米尔),悉有其地。丘就却初步建立了在贵霜的霸权。其子阎膏珍(维马·卡德斐斯,约 65 - 75 年)继位,复侵天竺,占印度河流域上游的旁遮普地区,置将一人监领之。原依附于大夏、安息的中亚各小王国及塞人部落皆臣服于贵霜王国,"自此以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至阎膏珍之子迦腻色迦为王时(约 78 - 144 年)[24],终于形成强大的贵霜帝国。贵霜势力盛时版图包括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中部,东至恒河中游,西接安息,北至锡尔河、葱岭,南达纳巴达河。为丝绸之路东部要道。现代考古发掘,在马土腊、鹿野苑和什借伐斯提等地发现有与贵霜王朝有关的铭刻和雕像,证实贵霜对恒河流域的统治。在公元一、二世纪间,贵霜王朝与安息、罗马以及中国的东汉王朝是世界舞台上的四大帝国,称雄一时。

东汉时,大月氏贵霜王有与东汉通好的意向和行动。《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章帝建初三年(78 年)西域长史班超上疏称月氏"愿归附"。元和元年(84 年),班超攻疏勒,康居遣兵相救,班超以锦帛赠月氏王,月氏王劝康居罢兵。后来班超征服莎车,贵霜王曾出兵相助。莎车王延在西汉元帝时曾为侍子入汉,长于长安,慕乐中国。归国即位,常参汉朝典法,并敕诸子:"世

奉汉家，不可负也。”延死，其子康即位，亦亲汉。东汉初率邻国共抗匈奴，保护汉西域都护吏士妻子。并发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表示思慕汉朝。汉朝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55国皆属莎车。在东汉王朝扶持下，莎车一度成为号令西域的最强国。康死，弟贤代立，建武十四年(38年)，贤与鄯善王皆遣使贡献，于是西域始通，葱岭以东诸国皆属贤。后汉光武帝加贤西域都护，却又下诏取消之，改授汉大将军印绶，引起贤的怨恨，促使贤走上与汉对抗的道路。他以汉大都护号令西域，诸国称贤为单于。然而贤对西域诸国横征暴敛，并采取军事进攻，企图兼并诸国，引起西域诸国普遍不满和惶恐。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贡献珍宝，求请东汉置西域都护。东汉遣返其质子，贤更为骄恣，任意废立各国国王吏属。贤在西域的称霸行为遭到汉、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共同反击，先是于阗杀镇守于阗的莎车将君得，并连败莎车；接着匈奴率龟兹等国兵进攻莎车，于阗又乘机出兵攻贤，贤只好与于阗讲和，于阗则将计就计，擒贤并灭其国。匈奴五将军率西域十五国兵围攻于阗，于阗乞和，以太子为质，并岁给罽絮。匈奴出兵护送贤质子不居征为莎车王，于阗王广德攻杀之，改立其弟齐黎。章帝章和元年(87年)，班超发诸国兵二万五千人攻莎车，大破之，莎车降汉。在班超进攻莎车的联军中，可能有贵霜王国的援军。《后汉书·班超传》云：“初，月氏尝助汉攻车师，有功。”车师，疑莎车之误。车师在新疆东部，大月氏不可能遣兵助汉远征至此，史书亦无此记载。

班超击莎车获胜后，“威震西域”。这一年，大月氏贵霜王



迦腻色伽统治下的贵霜帝国（W. 胡塞因制图，据 A. H. 达尼著《巴基斯坦简史》）

以有功于汉，贡献珍宝、符拔、师子，求娶汉公主。班超遣还其使，退其贡礼，贵霜王怀恨在心。和帝永元二年(90 年)，遣其副王谢率军七万逾葱岭进攻班超。班超坚壁清野，绝其供应，又遮断其与龟兹等联系的要道，使贵霜大军陷入困境。班超的伏兵袭杀了谢派往龟兹求援的使团，以其使首级送示，谢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班超任从月氏军归国，月氏大震，自此岁奉贡献。

后班超归国，任尚失和于西域，丝路交通再次断绝。贵霜王朝与疏勒保持密切关系，月氏人把与疏勒的交往视同与汉王朝的关系。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条，记载其国都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质子伽蓝"，关于其来历，他说闻之耆旧曰：

> 昔健驮逻国迦腻色伽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

历史上并无中国中原政权遣质子入侍贵霜之事，河西之地也不曾成为所谓贵霜王朝的藩维。因此学者们认为传说中的所谓中夏质子可能是指疏勒臣磐。据《后汉书·西域传》"疏勒"条记载，东汉安帝元初年间(107—120 年)，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

罪，把他流放到月氏，臣磐受到月氏王的宠信，或许月氏王认为臣磐对他向葱岭以东扩张有用，因此礼遇臣磐。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疏勒贵族共立臣磐的侄子遗腹为王，臣磐以为自己是遗腹的叔父，应该为疏勒王，月氏遣兵送臣磐归国，为疏勒王。后来莎车与于阗失和，臣服于疏勒，疏勒成为和龟兹、于阗等西域大国抗衡的国家。巴基斯坦历史学家 A. H. 达尼说迦腻色伽王"替前一个国王在中国新疆的失败报了仇；显然他曾派遣了一支军队横越帕米尔高原，征服了和阗、莎车和喀什噶尔地区臣服于中国皇帝的酋长。按照中国求法者玄奘的记载，他向酋长之一要求人质，而将这些人质安置在旁遮普省和喀布尔省"[25]。所谓前一个国王在新疆的失败即指谢逾葱岭进攻班超的军事行动；加腻色伽派军队征服和阗等指月氏以兵护送臣磐回国。但实际上历史上并无伽腻色伽征服和阗、莎车和喀什噶尔等事。不过疏勒王既然得到过贵霜王的帮助，亲附贵霜王国当是事实。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迦毕试国有沙落伽(Salaka)寺，相传是中夏质子所造。而沙落伽在梵语和吐火罗语中正是指疏勒。东汉重新经营西域，经过班勇等人的努力，丝路重新畅通。此后疏勒臣磐亦亲附汉朝，汉顺帝时(126—144 年)，臣磐多次遣使贡献，臣磐的贡品大都来自大宛和大月氏。

大月氏西迁，是欧亚草原民族迁徙浪潮中的重要内容，而且由于它的西迁，还曾经造成其他民族的连锁迁徙，对中西间交通和交往发生了重要影响。当月氏西迁至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之南，居于此地的塞族则被迫西迁，辗转迁至今之土耳其。此后，大月氏又受到天山北部的乌孙的逼迫，西迁至阿姆河中游一带，

占据大夏领土，塞族又南徙于印度北部之犍陀罗（Gandhara）。大夏与安息在公元前三世纪间为中亚之强国，由于大月氏的西侵而衰亡。

大月氏和后来的贵霜王国在中西交通和交流方面充当过重要的角色。贵霜王朝的中心省份犍陀罗当时是一个国际中心城市，由于贵霜王朝的崛起而发展起国际贸易。特别在征服帕提亚以后，更与罗马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在班超与谢发生冲突后的数年，贵霜曾遣使至罗马，其目的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与安息的对抗中与罗马结盟，二是与罗马建立直接贸易关系。考古学家在贵霜与罗马之间的古道上发现许多贵霜和罗马的钱币，在考古发现的贵霜王国境内的钱币上，我们看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克劳狄的半身像，说明罗马钱币随着国际贸易流入了中亚。罗马的货物运销至贵霜王国，又经过贵霜王国的中介再传入中国。其故址出土之钱币用希腊字，而且量小而质高，说明其铸造目的是为了用于东西各国往来贸易。《汉书·西域传》"大月氏"云："所有民俗与安息同。""安息条"则云："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独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南宋洪遵《泉志》引《张骞出关志》曰："凡诸国币货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币率象国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则用国王之面；女人交易，则用王后之面，王死则更铸。"大月氏故地出土之钱币，果与此同。如贵霜王迦腻色迦（Kanischka）时所铸钱币，有希腊字 Shoananshoa，意为"王中之王"。根据布尔努瓦的说法，贵霜与罗马的通商关系是通过两条路线维持的，一条是通过坎贝湾和红海的海路，一条为北路。北路要绕过里海，到达伏尔加河口，接着

再沿江北上到达北部地区的卡马河流域，然后通过高加索的北部和黑海，最后到达罗马帝国。

张骞通西域后，大月氏与汉朝也保持着密切关系。《汉书·李广利传》记载，李广利征大宛后，武帝封李广利为海西侯的诏书有云："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说明武帝时大月氏便常有使者往返汉与大月氏之间。汉与大月氏使节往来的情况，过去的文献缺乏具体记载。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敦煌汉悬泉置遗址的发掘中，获得大量的文献和文物，文献以简牍为主。其中有关于大月氏的简文18条，反映了汉宣帝至西汉末年大月氏与汉朝的密切关系。有的简文记载了汉朝派人送大月氏使者的内容："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诏侍御史曰□都内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与厅侯张寿侯尊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有的简文则记载了汉使者往大月氏的内容，如永光元年四月的简文是"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出使大月氏者与大月氏使相伴而行，其使有"翊侯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诣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据悬泉置汉简，汉使所送常为诸国使者，有一简云："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26]《拾遗记》卷五记载：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国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置于甘泉故宫。"《海内十洲记》记载："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枣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黄。"其所贡物有夸诞难

信成分，但所反映两国交往的史实可以和悬泉遗址出土汉简相印证。

当佛教走出印度国门之后，很快便传入大月氏，大月氏成为佛教重地。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伊存来到汉朝，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支谦、支曜等皆于东汉末年入华，还有不少西域僧人经大月氏而东来。

（三）安息王朝、条支

关于安息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史记》成书正是古代伊朗的安息王朝时代（前256－公元224年），因为王朝创建者的名字叫安息克（Ashk），亦称安尔息克（Arshak），国王均以此名称之为安息王一世、二世、三世等，伊朗人称为安息克尼扬王朝[27]。一说，安息（arthia），音译帕提亚，西亚古国，本波斯帝国一行省，地处伊朗高原东北部。后隶属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西王国。公元前249年，伊朗部落首领阿萨息斯（Arsaces）发动起义，反对塞琉西王朝，两年后称王建国，成立阿萨息斯王朝，都城为番兜（今伊朗达姆甘附近）。至米斯拉提德斯一世（前171－138年），安息最为强盛，地域辽阔，东自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身毒（今印度河流域），西至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北濒里海，南临波斯湾，是当时的西亚大国，东与贵霜、西与罗马相抗衡。

安息地处丝绸之路西部要道，与贵霜王国都是中国与罗马之间进行贸易的必经之地。“贵霜帝国和波斯、安息帝国处于中国和罗马两个古典文明之间，都愿意促成这种贸易，维持并守卫道路，保护商队，同时以征收通行税而自肥”[28]。当时贵霜王

朝、安息王朝和罗马、汉可以并称为四大帝国，它们都为丝路交通做出了贡献。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已经听说安息，在他向汉武帝所作的报告中说："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29]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则遣其副使至安息。当汉使至安息时，安息王命将统二万骑兵至东部边界迎接，行数千里至其王都，行经数十城，人民相属。安息国王遣使随汉使来汉，了解汉朝情况，安息使者向武帝贡献了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武帝大悦。

此后安息与汉通使通商，络绎不断。从安息西行可通罗马帝国的安提阿克和利凡特等商业城市，通过条支还可以经海道而至埃及。东汉时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会合处。由此向西，则分伊朗南道和伊朗北道，汉时主要利用了伊朗北道西进，此道经过伊朗的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的地带。中国丝绸、铁器通过安息远销西亚和罗马，西域诸国的珍奇物品也通过安息传入中国。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王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王满屈复又献师子及条支大鸟，当时称为安息雀。安息欲垄断丝路贸易，因而千方百计阻挠中国与罗马之间的直接通商。据《后汉书·西域传》，大秦"王常欲通使于

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和帝永元九年(97年)，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往大秦，至安息西界，抵条支，临大海欲度，安息西界船人以大海之险相劝阻，甘英闻之乃止。

据《后汉书·西域传》，东汉时中国人还了解到经安息诸国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经行路线：“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阿蛮国(Akbatana)，夏德以为即今伊朗哈马丹城。斯宾国，夏德以为即Ktesiphon，其旧址在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底格里斯河东岸。于罗国，夏德以为即Hira，《新唐书·大食传》中之“夏腊”和《元史·亦思马因传》中之“旭烈”可能即此名之对音。其旧址在今伊拉克之纳杰夫(Najaf)东南纳杰夫湖附近地方[30]。此所谓“南乘海”之海当指波斯湾，“通大秦”则指通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这里是罗马与东方交通和贸易的中心。

安息至公元二世纪末国势转衰，公元226年(三国·魏文帝黄初七年)为萨珊波斯所取代。

条支，古西域国名、地名，是安提阿克(Antioch)的省译。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在安息西界，临西海(指波斯湾)，当在今伊拉克境内。西汉时条支指西亚的安提阿克王国，都城在地中海东岸的安提阿克。东汉时条支指波斯湾头两河出口处的安提阿克城，属安息。古代波斯湾头尚未冲积成沙洲时，在两河汇聚入海处有一个被称为喀拉塞(Charax)

的地方，是商货聚散地。亚历山大东征，在此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塞琉西王朝安提阿克四世（前 175 – 164 年）于公元前 166 年又重建新城，取名安提阿克。约公元前 140 年，阿拉伯酋长史帕西纳占领该城独立，习称喀拉塞 – 史帕西纳（Charax – Spasinu），即安提阿克王国，但不久便从属于安息王米斯拉提德斯一世。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已听说有关条支的不少消息，在他向武帝的报告中说：

> 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31]

所谓“以为外国”，杜佑《通典》卷一九二“条支”条解释为“如言藩国”。条支与安息维持这种役属关系长达大约 200 年之久。西汉时汉使最西就到乌弋山离和条支，去条支可经伊朗北道，亦可经南道。西汉时汉使知道从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东汉时则又知道“乌弋山离改名排持”（当为排特），自乌弋山离向西南马行百余日，亦可至条支。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瓮。再转北而东，马行 60 余日可到安息。这便是伊朗南道，据史载这条路不常用。这条路线穿越安息南部卡尔玛尼亚、波西斯、苏西安那到条支。班超遣甘英往大秦曾至

条支，临海而止，可能沿此路线。

条支也是连接中西交通陆路与海路的中转地区。海路向东通印度贸易大港巴里格柴，向西通埃塞俄比亚的阿杜利港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在公元前后三个世纪中，希腊、罗马、卡尔底、阿拉伯、波斯、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各国商人和船只云集此地港口。陆路向北通安息的贸易中心泰西封，再向西北则通巴尔米拉和叙利亚，其经济繁荣仅次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西汉时只知从条支可乘船西行，但行至何处，却茫然不知，“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近乎神话传说。至甘英时已知可至大秦，即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条支是汉代沟通中国、安息和罗马的重要城市。

（四）康居

康居在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领有粟特地区。《史记·大宛列传》云：“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匈奴。”所谓行国，即游牧民族。据《汉书·西域传》“康居”条记载，康居人游牧于吉尔吉斯草原，其王冬夏徙居，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夏居蕃内，两地相距是马行7日的路程。康居东邻乌孙，西达奄蔡，东南连大宛，西南接安息，正南临大月氏，当时为中亚北部大国，有户12万，人口60万，胜兵12万人。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曾得到康居的帮助，“传致大月氏”。但在此之前，汉朝早已对这个西域大国有所了解，《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对策有云：“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此对策在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或元光

元年(前134年)。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云:"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32]此文作于元光五年(前130年)。王先谦认为:"骞使西域,以元朔三年归。喻巴蜀时,西域康居疑尚未通中国,乃相如夸饰之辞。或其时偶有通贡之事,史无明文耶?"[33]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其副使到了康居,汉与康居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康居并不是对汉友好的国家,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曾试图增援大宛,合击汉军。只是"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李广利派搜粟都尉上官桀攻郁成,郁成王亡入康居。汉军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才交出郁成王。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置西域都护统辖西域,康居为"不属都护"国,而汉西域都护则有"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之职责,而且"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说明康居一直是汉朝用心提防的国家。

当匈奴强盛时,康居为匈奴的属国,张骞的报告就说它"羁事匈奴"。记载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的《盐铁论》卷八也说到匈奴"西役大宛、康居"诸国。但康居既然为西域大国,汉朝欲交通西域,并不放弃与康居的外交关系,汉朝与康居通使不断。这方面过去文献较少记载,新发现的悬泉置汉简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王素对其中有关康居的两条史料进行了考释。其一《黄龙元年诏送康居诸国客文书》反映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使臣宏,给事中、侍谒者臣荣等奉使传诏送康居诸国外宾归国的史实,汉朝对这次送康居诸国客之事十分重视,不仅派给事中、侍谒者等亲信重臣为使传诏,熟悉西域事务的爱幸之臣甘延寿为使亲送,还以河西高级斥候和归义羌人为

主、副负责具体接待，体现很高待遇的一封轺传沿途送行。可以推测，汉朝对康居采取的是一种内紧外松的政策，即外示尊崇而内加防范。另一件为《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反映元帝永光五年（前43年）康居等国遣使前来贡献，然而汉朝对此态度似乎不太友好。不仅不按实际情况给所献骆驼评估论价，入境后也不按惯例依次供食。康居等使提出诉讼后，各级政府对康居等国使臣最关心的所献骆驼评估论价等问题仿佛置之不理，仅对所献骆驼的食用谷数以及所用传马是否停宿及食谷等情况进行调查。宣帝时，匈奴离乱，五单于争立。汉拥立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怨望，杀汉朝使者，退入康居，依其险阻以自保。与汉为敌的郅支单于受到康居的保护，康居欲借匈奴之力而灭亲汉的乌孙，自然遭致汉朝的不满。这件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王朝对康居等使有意怠慢刁难的情况[34]。

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调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但汉朝并未追究康居的责任，双方仍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交通和交往不曾中断。至成帝时，康居遣子入侍贡献。但是康居并没有从郅支事件中吸取教训，自以为离汉绝远，不肯像西域其他国家那样服从于汉朝，态度骄慢，轻侮汉使。西域都护郭舜多次上疏朝廷，请与康居断交。《汉书·西域传》"康居"条引郭舜上言说，过去匈奴强盛时，不能兼有乌孙，是因为康居与乌孙相呼应。乌孙和康居虽称臣于汉，而匈奴并不以为失去了康居、乌孙，因为汉虽受其质子，可是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见便则

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

按照郭舜的说法,结好乌孙,于汉无益,反为中国生事。但既然与乌孙结好在前,现在匈奴降汉,义不可拒,而结交康居则没有必要。康居国不肯拜汉使者,西域都护派人至康居,康居王令都护吏坐乌孙使臣之下座;其王公贵人吃过饭后,都护吏方能就餐;康居王对汉使故意摆架子,以夸视邻国。他们所以遣质子侍汉,不过是“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由于康居的傲慢,连匈奴单于也感到自己臣事汉朝“有自下之意”。郭舜建议“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彰汉家不通无礼之国”。康居、乌孙遣使入汉,途经南道八国和敦煌、酒泉二郡,沿途诸郡诸国皆疲于迎送,“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疲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但是汉朝因为与康居建交不久,重视发展与远方国家的关系,因此一直保持着与康居的交往。

至东汉时,康居对汉朝仍然存在离心离德的倾向。永平十七年(74 年),班超至疏勒,立忠为疏勒王。后来忠发动叛乱,班超发兵进攻,康居派精兵援助忠,抗拒班超,显然疏勒的反叛是与康居的支持有关的。当时大月氏与康居刚刚建立联姻关系,班超向月氏王赠送厚礼,请月氏王劝康居退兵。和帝永元三年(91 年),耿夔在金微山击败北匈奴单于,北匈奴部众离散,单于率残部远走乌孙,又迁至康居。后来这部分匈奴人侵入粟特,并继续西迁至欧洲。因此可以说后来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是从康居出发西迁的。

康居人最早将火祆教传入中国。前引郭舜上言有云:“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

者往来人马驴橐驼，皆苦之。”林梅村据此指出，早在西汉成帝时，康居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干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康居即汉代对粟特人的称谓，《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栗弋”即粟弋、粟特，“栗弋国属康居。”既然火祆教为粟特国教，这些来华的粟特商队中自然不乏火祆教徒，中原人最早接触火祆教可能在西汉年间，从西域商胡那里首先得知[35]。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但有待考古学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康居物产汉代亦输入中原，《后汉书》同传云：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五）奄蔡

奄蔡在咸海和里海以北。这条路线即欧亚草原之路，其实际走向和经行地域难以详考。《史记·大宛列传》云：“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据《史记正义》引《汉书解诂》，奄蔡一名阖苏。《魏略》云：“西与大秦通，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貂，畜牧水草，故时羁属康居也。”《后汉书·西域传》云：“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白草，注：“前书音义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细，熟时正白，牛马所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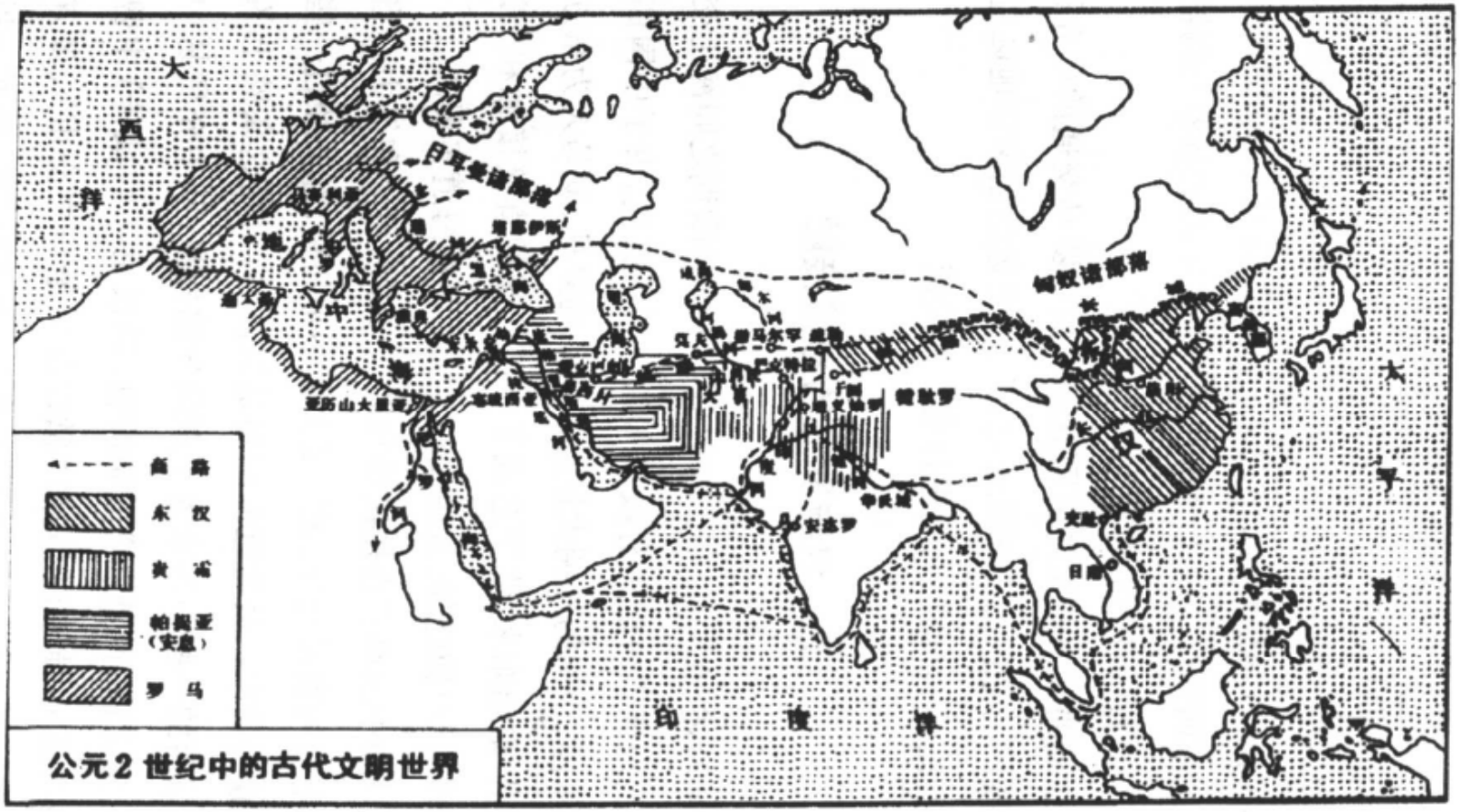
奄蔡北又有严国，亦“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

海道与西洋各国的交通是通过南海与印度洋航路相连接而实现的。这条路线是经印度洋，过红海，进入地中海。红海与地中海之间有两条路线连接，一是在红海西岸的海港登岸后，经若干天由陆路至尼罗河东岸的某镇，然后顺河而下北行，到地中海

南岸的港口;二是在苏伊士湾头经由古运河与尼罗河某条入海河道连接,进入地中海。在这条路线上最重要的是印度,两汉时期印度是中西间海上交通的重要中介国。

当时西方各国海道东来的终点是印度,中国海道西去的终点也是印度。西方各国包括罗马从海道获取中国商品主要是从这里得到的,而不是直接从中国得到。而从中国进入印度洋,则有好些路线可到。一是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二是经罽宾道或雪山道从北路进入印度,然后沿印度河顺流而下,至印度河口巴巴里孔;三是走中印缅道,进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云:"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掸国在今缅甸境内,从缅甸西南至大秦,则可经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入印度洋,亦可经陆路至印度而后入印度洋。

1945年以来,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城以南3公里的阿里卡梅杜(Arikamedu),考古发现了一个古代国际贸易商埠,其中有不少货栈商行,据研究这些货栈商行的经营者可能是来自罗马或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遗物中发现许多来自意大利半岛的阿列丁(Arrentine)式陶器和希腊式水罐(amphorae),还有罗马帝国的钱币。由于地在印度东海岸,因此极便于经孟加拉湾而至东南亚和中国进行交通往来。阿里卡梅杜商埠的繁荣期是公元一、二世纪,即中国的东汉时。从考古上说,在越南等地不断有罗马钱币发现。从文献上看,《梁书·西



公元2世纪中的古代文明世界（选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

域传》记载，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是对南朝梁代以前南海交通的总结。说明中国的汉代，罗马人经印度继续东行至中国已经不是奇怪的事情。成书于公元一世纪末叶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写到罗马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湾及印度东西海岸。阿里卡梅杜商埠遗址中的大量罗马陶器提供了考古学上有力的证据。

上述陆路和海路途经诸国既是中国与罗马交通的中介国，又是主要的对象国。中国既通过它们与更远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交往和交流，同时也与它们进行交往和交流。

五 汉与罗马的直接接触

如前所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与欧洲之间海上交通是由不同地区沿海居民分段进行的。到了汉代，由于中国商使进入印度洋，中国的丝绸大量流入西端的罗马，罗马人为东方宝货所吸引，乘船东来，终于造成了东西两端的直接接触和交流。汉朝中国与罗马欧洲的直接交通首先是通过海道实现的。

罗马和中国都有直接接触和进行交流的愿望和努力。当时罗马和中国的贸易交往，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都要经过一些中介的民族和国家。最为近便的路是绿洲路，可是这条路上的安息及其以西的一些小国家为了垄断丝路贸易，从中介贸易中获取厚利，常常进行“遮阂”。如前引《后汉书·西域传》中曾提到，大秦王欲通使于汉，安息“欲以汉彩绘与之交市”，多方阻难，“故遮阂不得自达”。据托勒密《地理志》记载，公元一世纪

末，原籍马其顿出身商人家庭的蒂蒂亚诺斯（Titianos）曾派遣手下的一批人考察从地中海到赛里斯国的路程，这些人说从西域到赛里斯国需要七个月的时间，但地理学家马利诺斯不肯相信他们的话，认为他们“爱吹牛而故意夸大距离”。公元二世纪初，罗马加强了对叙利亚境内的各小国的统治，如奥斯格赫纳和巴尔米拉。106 年占领了彼拉特，发展埃及与叙利亚的贸易。116 年罗马曾攻陷安息重要城市泰西封和塞琉西，直抵波斯湾头。但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仍为安息人所隔断，安息人从丝绸贸易中获取厚利，扼制着利凡特的丝织业。和帝永元九年（97 年），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告诉甘英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闻之，乃止。甘英是汉人出使西域所至最远留下姓名的一个使者，他的行动留下了汉代丝绸之路西段路线的珍贵记录。甘英所临大海当即波斯湾，有人怀疑所谓安息船人劝告甘英，实际是有意破坏中罗之间的直接贸易，以保持他们在丝路贸易中的利益。

甘英西使大秦，虽然半途而返，功亏一篑，但由于他足迹所至，到了许多前人没有到达的地方，因而扩大了汉朝对于西域的认识以及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甘英西使归来，云：“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张星烺认为蒙奇即马其顿之音译，兜勒即吐火罗之音译[36]。鱼豢《魏略》云：“前世谬以为条支国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这种关于大秦和条支方位的更正，应该与甘英亲临条支实地考察有关。

《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条记载:"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国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国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此段记载正与甘英行程相合,其中材料当是据甘英返回后的报告所写。

在屋大维·奥古斯都执政时(前27－公元14年),埃及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里亚是罗马帝国通往东方的门户。通过海道交通是罗马人避开安息人势力前往东方的唯一途径。公元前100年左右,一位名叫希帕鲁斯(Hippalus)的希腊船长曾偶尔到达印度西海岸。他的这次经历还使他发现了海洋季风的特点,后来印度洋季风便被欧洲人称为"希帕鲁斯风"。据老普林尼《自然史》记载,公元一世纪初,一位罗马商人阿尼尤斯·普洛卡姆斯(Annius Plocamus)购买了罗马帝国红海领土的税收,他派出一名叫做布勃里乌斯(Publius)的获得自由的奴隶作为他的监税官前往红海地区。布勃里乌斯在海上遇风,漂流15日后抵达斯里兰卡,在这里停留半年后,与斯里兰卡的使臣拉西亚斯(Rachias)一起回到罗马。拉西亚斯的父亲曾去过赛里斯国。过去学者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把布勃里乌斯偶至斯里兰卡的史实系于喀劳狄一世在位时(Claudius,公元41－54年)。后在科帕托以南100公里处通往贝仑尼塞港的道路上发现希腊、拉丁文碑铭,始知布勃里乌斯返回的日期是公元6年7月5日。布勃里乌斯的航行也是利用了印度洋上的季风。

希帕鲁斯和布勃里乌斯的远航,使罗马商人发现了前往东

方的海道。罗马人也希望控制阿拉伯海域的航路，但他们的军事征服手段失败了。沙特阿班教授说："在罗马时期，奥斯图斯皇帝企图重温亚里山大的旧梦——控制阿拉伯半岛及其水域，但他的梦想也未能实现。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提到罗马皇帝对自古以来流传的传说垂涎：阿拉伯人非常富有，他们用香料和宝石换取黄金、白银。因此，公元前25至前24年皇帝派他在埃及的总督伊利尤斯·卡鲁斯进行征讨，从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进入半岛，沿陆路直达红海南岸，终遭失败。但失败促使皇帝鼓励罗马海员进入阿拉伯海，直抵印度，在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中取消了阿拉伯这个中介。"此后罗马商人越来越多地出入印度洋。起初的航海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进行短距离的近海航行，希帕鲁斯发现海洋季风的规律以后，罗马商人们开始利用季风从事远海航行。那时每年8月份起，印度洋上刮的是西风和西南风，船只可以顺风东行，10月可到印度和缅甸沿岸。到第二年4月，印度洋面是东北风、东风、东南风，满载东方货物的船只扬帆西去。据斯特拉波记载，那时每年有120多艘载重量达500吨的希腊人的船只利用季风，往来于红海港口与印度之间，利用季风渡越阿拉伯海，大大缩短了原来只能近海航行的距离。中西之间这条海路由于有大量的印度的香料运往西方，因此又叫"香料之路"。罗马商贾发现印度洋航道后，继续东进，他们很快就了解到盛产黄金的印尼地区和中南半岛，并在当时的文献中反映出来。公元初年以希腊文写作的作家把今孟加拉海湾东部沿岸和苏门答腊地区称为"金洲"或"金岛"。

当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侯，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地中海

地区和红海沿岸由一个政府治理，陆上遍布驿站，海道空前畅通。罗马商人大力拓展其商务活动，他们十分重视利用印度洋航路发展与东方的贸易，加上季风的发现，海路贸易迅速增长，一度造成罗马市场上中国丝绸和印度香料价格的下跌。在陆路和海路的重要交通路线上，都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地点，成为商人汇集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这些地方有的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如托勒密和马利努斯笔下的“石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据他们说，“一些沙漠商队从大夏出发先朝北行进，一直抵达科麦德人地区，越过这一山区以后，又迂回向南，直到一个向平野敞开的岬谷；由此朝北，沿着长五十‘雪尼’（波斯衡量路程的单位）之遥的大道而直抵石塔（Lithinos Pyrgos）。从石塔直到赛里斯的首都赛拉城，马埃斯商队的旅行共达七月之久，一路上与骇人听闻的风暴博斗”。李希霍芬《中国》一书阐明了这条路线的行程，关于石塔的位置，他认为：“在沿着阿姆河行进一段之后，大道经过一段山路，一面是这同一条河流和瓦什赫河流（妫水），另一面是卡拉特勒（Karategin）诸小溪（这就是科麦德人地区）。然后又自瓦什赫河谷出来，毫无疑问，石塔正是矗立在那里，其确切地址尚未考证出来。”[37]石塔显然是当时东来的西域商人耳熟能详的地名，是大家东来的必经之地，也是商人进行中转贸易的地方。像这样固定的交易地方沿丝路当然有不少分布。

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间接进行的。当时中国和罗马有没有官方的往来，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东汉人郭宪《别国洞冥记》记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此书语

多不经，所记武帝时大秦与汉交通事，不为学者所信据。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永宁元年（120 年），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杂技艺人），而幻人自称为“海西人”，海西即大秦（罗马），掸国在今缅甸北部，说明罗马人已经到达缅甸，并通过缅甸的进贡来到东汉的都城洛阳。这是文献上所见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同书《桓帝纪》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大秦国王安敦遣使从日南徼外来献象牙、犀角、瑇瑁。这个安敦王通常被比定为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 – 180 在位），但一方面在西方文献中看不到有关记载，另一方面这位使者所献之物不是罗马所产，都是印度、东非所出。因此引起史家的怀疑：“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38]。不少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在印度的或在叙利亚的罗马商人冒称帝国使者，寻求与汉的直接贸易。但这件事说明，罗马人在掌握了印度洋航路以后，终于通过南海航道，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罗马人的航海活动终于将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各地区人民分段航行的海上交通连结起来，他们的商船经阿克苏姆王国的阿杜利斯港，从红海驶出亚丁湾向东航行。南印度西岸的莫西里（Muziris）和东岸的科佛里帕特那（Khabēris）两个港口以及被称为安提布莱（Antibole）的恒河第五河口可能就是罗马作家笔下的“三大名港”，还有被他们称为“金洲”的苏门答腊岛，是他们驶往日南的航程中最重要的中转站。从罗马到中国的航道已经连接起来，它展示出中西之间海上交通的广阔前景。

西方文献中，也有汉朝使者出使罗马的记载。生活在一世

纪末和二世纪初，出生在非洲而长期生活在罗马宫廷中的学者兼诗人福罗鲁斯(Florus)在《史纲》(Epitome)一书中记载，屋大维·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汉成帝河平二年)即位，这一年"万国来朝"，其中有赛里斯使者。他说，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不仅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遣使结欢，远方绝域如赛里斯人、印度人也都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和大象，求与罗马订友好之约：

> 我们见到了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都派遣使者前来与我们媾和。也见到有住在同一天下的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他们带来的礼物中有宝石、珍珠和训练过的大象。他们特别吹嘘旅途的阻长，历时四年才走到。仅仅从这些人的肤色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另一个天地。

但中国典籍中不见有遣使大秦的记载，而且奥古斯都在位时(前24—公元14年，汉河平二年至新莽天凤元年)，正值西汉末衰乱之际，很难有遣使之举。福洛鲁斯笔下的"赛里斯人"或许也是汉朝商人远洋航行到达罗马者，他们冒充了汉使的身份晋见罗马皇帝。

注 释

〔1〕杰佛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毛昭晰等译《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

〔2〕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2001年，2页。

〔3〕同上,2－3 页。

〔4〕同上,3 页。

〔5〕同上,4 页。

〔6〕同上,14－15 页。

〔7〕同上,4－6 页。

〔8〕同上,6－8 页。

〔9〕同上,8－9 页。

〔10〕同上,9－13 页。

〔11〕同上,14 页。

〔12〕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 年,180－181 页。

〔13〕同上,182－184 页。

〔14〕前揭戈岱司编、耿昇译书,52 页。

〔15〕同上,53－55 页。

〔16〕同上,55 页。

〔17〕同上,57 页。

〔18〕同上,59 页。

〔19〕同上,61－62 页。

〔20〕转引自前揭方豪书,155－158 页。

〔21〕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98 年影印版。

〔22〕前揭方豪书,158 页。

〔23〕同上,147－150 页。

〔24〕A. H. 达尼《巴基斯坦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74 年,216 页。

〔25〕同上,218 页。

〔26〕前揭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

〔27〕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240 页。

〔28〕前揭杰佛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

〔29〕《史记·大宛列传》。

〔30〕参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32、55 页

〔31〕《史记·大宛列传》。

〔32〕《史记·司马相如传》。

〔33〕王先谦《汉书补注》(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 年,85 页。

〔34〕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见《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2002 年,未刊。

〔35〕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109 页。

〔3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上海书店据辅仁大学图书馆 1930 年版影印本,38 页。

〔37〕前揭戈岱司编、耿昇译书导论,20－21 页。

〔38〕《后汉书·西域传》。

第八章　两汉时期中国文化西传

汉代中西文化交流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交流的动因源于双方的需要，物质方面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需要、农业生产需要和战争需要；精神方面主要是为了满足娱乐消遣需要和寻求精神安慰的需要。这是经济文化交流动因之所在，彼此间的贸易建立在双方需要的基础之上。两汉时期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其成果流传西域的，我们分为以下五个方面介绍。

一　汉代中国物品的西传

汉代传入西域的产品主要有丝织品、棉织品、麻织品、漆器、竹器、铁器、铜镜、软玉、釉陶、装饰品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丝绸、铁器和漆器。

（一）丝织业的发展和丝绸的西传

汉代丝织业发达，不仅品种繁多，品质精良，而且生产量也足以供应当时的大量外销。当时丝织品的制造和贸易主要是官办的，西汉时都城长安有东织、西织两大织室，承办郊庙之服；齐郡之临淄（今山东淄博）和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各有官营作坊，专供皇帝穿用。《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条提到元帝

罢"齐三服官",颜师古注云:

> 李斐曰:"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幘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齐冠带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绣,以给衮龙之服。'"《地理志》云:"襄邑亦有服官。"师古曰:"齐三服官,李说是也。'縰'与'纕'同音,山尔反,即今之方目纱也;纨素,今之绢也;轻绡,今之轻纱也。襄邑自出文绣,非齐三服也。

服官是负责管理丝织制衣的政府官员,据此条记载,汉在齐与襄邑两处置服官。齐三服官制春、冬、夏三服,襄邑则专制衣绣。元帝罢齐三服官,只是一种临时的举措,那是因为遭受天灾,皇帝为厌天意而节用的表示。直到东汉章帝时,齐仍有三服官。《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建初二年四月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唐章怀太子注云:

> 纨素也,冰言色鲜洁如冰。《释名》曰:"縠,纱也;方空者,纱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方目纱也。纶似絮而细,吹者言吹嘘可成,亦纱也。前书齐有三服官,故诏齐相罢之。

这与西汉元帝时一样是临时性举措,并不是撤销此职。据《汉书·贡禹传》,元帝时长安、齐郡临淄、陈留郡襄邑设立官营手工业作坊有相当大的规模,织工皆达数千人之多,一年所费巨

万。东织废后，仅留西织，称织室。

除了官营之外，各城市通常都有富商大贾经营私营手工业作坊，从事商品生产；还有农民家庭手工业，他们主要纺织麻布、葛布和绢帛以供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也有一小部分纺织品出售。齐地本来就以丝织著称，秦李斯《上书谏逐客》中提到"阿缟之衣，锦绣之饰"[1]，所谓"阿缟"就是齐国东阿出产的白色丝织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冠带衣履天下"，说明齐地丝织品行销范围之广。晁错《论贵粟疏》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当时民间丝织业之发达，实际上是无家不从事丝织。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连富贵之家主妇也从事丝织之事，如霍光妻、陈宝光妻，都是"六日成一匹，匹值万钱"。《史记·货殖列传》说："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其人"比千乘之家"。有人作这种估计，如果全国织丝者以百万计，六日百万匹，两月一千万匹，一年即六千万匹。《汉书·张汤传》记载，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的张安世夫人除亲自纺织外，又率七百家僮共织而成巨富，超过了大将军霍光。由于丝织品的大量生产，丝绸成为百姓的日常用品。同上晁错文写商贾云："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盐铁论》卷六记载贤良的话云："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裹人而居婚姻之饰。"

汉代纺织技术有新的提高，纺车、织布机成为普遍的纺织工具，提花机已经使用分组的提花束综装置和用地经和绒经分开提况的双经轴机构。丝织品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主要生产比较

贵重的锦、绣、绮、縠(有皱纹的纱),这是几种高级的丝织品。日本原田淑人测定汉代丝径为0.008—0.013毫米[3]。而据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标号19的方孔纱测定,丝径细到0.0055—0.006毫米,超过现代各国的家蚕丝[4]。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薄如今日之尼龙纱,透明如蝉翼,轻如烟雾,重量仅有49克。汉代的丝织物总称"缯"和"帛",其中汉锦是五彩缤纷的多彩织物,代表了汉代丝织物的最高水平。经对汉代丝织品进行化学分析,知道汉代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以染成绿、褐、红等色,比战国时期用温水溶帛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东汉纺织业技术又有重大进步,丝产量也有增加。光武帝刘秀赐卢芳缯二万匹,樊宏布万匹,单于缯采四千匹;明帝赐邓皇后布三万匹,东平宪王苍布一次十万匹,又一次二十五万匹,又四万匹、九万匹;章帝赐昆明夷卤家帛万匹。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斑烂、花纹复杂的织锦。蜀锦已驰名全国,朝廷设有专门管理丝织业的官吏,故成都有"锦官城"的美称。西晋左思《蜀都赋》云:"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5]蜀地蚕桑丝织业发达当甚早,"蜀"字即指蚕丛,说明蚕桑之业虽不一定起源于蜀,而汉代以前蜀地早已成为蚕桑丝织业兴盛的地区。《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刘备入益州,诸葛亮、张飞、关羽等人各赐锦千匹。临淄和襄邑的丝织业依然兴盛不衰。王充《论衡·程材篇》云:"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6]。新疆地区的丝织业也有很大发展。民丰县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花毛织品,显示出当时西北地

区高度发展的纺织工艺水平。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说葱岭东西各国"其地皆无丝漆"。汉代由于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丝织品不仅供衣著之用，而且成为重要商品大批西运，成为深受西域各国人民喜爱之物。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是中原丝绸西运的主要通道，沿途考古发现不少汉代丝织品遗物，在武威、敦煌、额济纳和新疆境内北道沿线的吐鲁番、库车、拜城、巴楚，南道的楼兰、尼雅等，都曾发现汉代彩绢、锦绮、纱罗。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和诺因乌拉汉墓中，见到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同样的汉代菱纹起绒锦。在敦煌古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一件丝绢，署有"任城国亢父（今山东济南）缣一匹"的字样，另一件西汉末年绢的末端则有波罗谜文，说明这些丝织物来自今山东地区，而运输的目的地则是中亚。在民丰东汉墓发现整件锦袍。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肯科尔、撒马尔罕也发现汉代的丝织品。

两汉时丝绸的西传有几个主要途径：

一是充作军饷发给驻守西域的将士和充作旅费供使节作为支付手段，通过当地和沿途交换而传播西域。丝绸在新疆、中亚、西亚成为最受信任的通货和馈赠品。《史记·大宛列传》写汉使路经西域，途中被诸国刁难的情形，云："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说明帛是用作旅费的。班固《与弟超书》云："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駏驉"。则以丝织品交换西域特产。

二是作为贵重礼品，通过对匈奴和天山南路诸国赠送而流到国外。为了发展与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友好关系，有时也是为

了缓解匈奴对汉朝西北边境地区的军事进攻，汉统治者不断赠给匈奴贵族以大量贵重物品，其中包括精美的丝绸制品。汉文帝在《遗匈奴书》中讲到："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毗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7]在《遗匈奴和亲书》中又云："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糵、金帛、绵絮、它物，岁有数。"[8]武帝《欲伐匈奴诏》云："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9]《史记·大宛传列》记载，大宛使者到汉，"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降汉，朝天子，天子赐物中有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此后每年一次入朝，汉朝都赠送大量的丝絮缯帛。元寿二年（前1年），汉封匈奴单于，赠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建武二十六年（50年），匈奴南单于遣子入侍，光武帝赐给南匈奴单于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赠给单于家属和臣僚缯彩万匹，此后"岁以为常"[10]。尼雅发现的一些汉地丝织品，有的用作男锦袍下摆底襟，有的是男用锦袜，还有手套，上面绣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等字样，斯坦因在罗布淖尔也得到几件同类的织品，在叶尼塞河畔奥格拉赫提公元二世纪墓中也发现此类织品，其上残存"益"、"寿"、"三"等字，都是作为礼品赠送的。

三是官办贸易。从汉武帝时起，汉朝商使已经进入印度洋开展贸易，丝绸是汉使所携主要货物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后，武

帝元狩二年(121)设置武威、酒泉二郡,汉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大为开展。汉代运丝的商队通常由政府主管,称为使节。汉朝每年都派出大批使团随带大量的牛羊、缯帛和黄金,用骆驼、驴马作运载工具,跋涉于沙漠、草原和峡谷之间,和远方的塞人、大月氏人、希腊人、波斯人、印度人交换商货。从中国出发的队商,在前汉时代已经跨过阿姆河,进入里海北部、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北印度,有的到达了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甚至有的还抵达罗马,充当了赛里斯国的使者。据《史记·大宛传》的记载,他们往返一次近的要三、五年,远的长达八、九年。新疆和内蒙出产的双峰骆驼在翻越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的远途运输中起了沙漠轻舟的作用,这些商队也常常使用马和驴子。汉朝派往西域诸国进行贸易的使者,称为使节,但通常并非一般的政府官吏,而是通过召募和察举的方式组成出外商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四月《求贤诏》有云:"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11]所以出使人员比较复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至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根据此段记载,不论吏民、贫人子、妄言无行之徒,甚或犯法抵罪之人,都是以政府派遣的身份西行的。在西行中汉使随带大量的牛羊和币帛,以便与沿途各国交换他

们旅途中所必需的生活用品。

四是外国商人的贩运，这是数量最大的外销。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说：赛里斯人“不与别人交往，坐等贸易找上门来成交”，罗马人“远赴赛里斯以换取衣料”。成书于公元一世纪末的拉丁文著作《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是一位定居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他曾到过锡兰(斯里兰卡)。据他记载，中国的丝绸在印度的港口装船。托勒密《地理志》第一卷引提尔的马利努斯，说有一位叫马埃斯(Maes)的人，原籍马其顿，和他的父亲以经商为业，曾派遣手下的一批人到赛里斯经商。《史记》记载，西北外国使“日款于塞下”，中亚细亚和安息国人“善市贾，争分铢”。罽宾“实利赏赐贾市”，遣使至汉从事贸易。

汉代中国丝绸最远、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据说丝绸最早是通过叙利亚传入罗马。公元前53年，罗马三位执政官之一克拉苏以叙利亚总督的身份率七个军团，跨过幼发拉底河，发动了对帕提亚的战争，与从安息赶来的波斯军队展开了卡尔莱之战。波斯人发挥弓箭的威力，有效地阻止了罗马人的进攻，克拉苏速战速决的计划被打破。而当凭借盾牌抵抗的罗马士兵疲惫不堪时，波斯人突然发动反击。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他们的军旗分外鲜艳夺目，令罗马士兵眼花缭乱。他们不清楚波斯人手中拿的是什么武器，也不知道波斯人为什么勇气十足，以为波斯人获得了神的庇护，于是兵败如山倒，克拉苏自杀身死。“至于那些在这次毁灭性的战役中使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绣金的、颜色斑烂的军旗，历史学家弗罗鲁斯(Florus)认为就是罗马人前

所未见的第一批丝织物”[12]。自此以后，中国丝绸在欧洲人心目中造成了一种神奇的印象。

李希霍芬在《中国》(China)一书中说：“中国丝虽在公元前一世纪已发现于罗马，但丝之贸易，则须迟至公元后一世纪。且因西域交通中断，故由海道经印度而来。及公元后100年左右，班超征服葱岭东西各国，于是陆上交通再兴。布里尼乌斯(普林尼)谓中国输往之货以丝、铁为大宗，即指此时。由罗马东来者，则为金、银、玻璃、珊瑚、象牙等。”1938年，希克斯(Sir Percy Sykes)著The ouest　Gathay，认为中国丝之出现于罗马，当为公元前一世纪之事，乃由陆路运至底格里斯河之塞琉基亚城(Seleukia)及叙利亚之安底奥基亚城。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人侵占叙利亚后，在这里得到中国丝绸，从而刺激了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欲求，对中国丝织品的需求迅速增加。

罗马是通过海陆两路沿途各国转手贸易得到中国丝绸，安息是中国丝传至罗马的重要中介国。安息为了垄断丝路贸易，甚至阻挠罗马与汉朝的通使。因此丝绸在罗马帝国是非常稀罕之物，起初罗马人只能用丝绸制作花边饰品或襟边装饰。由于原料缺乏，罗马人甚至把零星的丝绸边料拆开，抽取其中的丝来用。据说罗马人喜欢紫红色，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工匠用某种贝类液汁来制造紫红染料，而丝料极容易着以这种颜色。布尔努瓦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A·瓦隆《丝绸古代史》、M·博利厄《上古和中世纪的服装》和E·巴利塞《丝绸历史》等书的记载，说：“他们既不是用丝绸裁制长大而柔软的服装，这是从希腊时装中借鉴的样式，更不做面纱或宽外袍托加(toge，罗马人

穿的宽外袍)。只是在两个世纪之后,一位罗马皇帝才穿上了整套丝绸服装,此人似乎就是赫里奥加巴尔(Héliogabale)。当时罗马人只是把丝绸用来做一些小装饰品,并且染成紫红色或刺绣,然后嵌饰在内长衣上,或绣在白毛线的托加上,有时也缀在从埃及进口的柔软的棉织品衣衫或来自巴勒斯坦的亚麻布衣服(人们怀疑这是一种纤细的亚麻或棉布衣)上。这些装饰品都是平行罗带,垂直缝绣在长衣的前襟。"他还据普林尼《自然史》指出,丝绸在罗马人手里"有时还作为边饰,方形或圆凸形的装饰品。人们也顺便把所有的零碎丝绸小片拆开,以便把丝线从中抽了出来,然后再织成更薄的绸布。这些都是由当时罗马追求时髦的社会风气所致,罗马的风纪监察官们曾批评这种服装过分下流猥亵了。"据说,制作紫红色染料,需要大量的活贝壳动物,又需要长期的操作和必要的护理,所以染成红色的布匹价格昂贵。奥古斯都时紫红色丝绸虽然使用量很小,但却价值千金,与当时同重量的纯金几乎等价。

随着中西间交通的开展,输入罗马的丝绸越来越多,上层贵族开始有条件穿丝绸衣服。据说利凡特的提尔、西顿等城市的丝织业,都是靠中国的缣素运到后,重新拆散,再织成绫绮,染紫缕金,供罗马上层贵族穿着。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史家卢卡努斯(Lucanus)记载,埃及女王克利奥巴特拉(前 48 - 30 年在位)因为拥有较多的丝绸衣服而为人所羡。罗马共和末期,凯撒皇帝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被认为奢侈之极。他们所穿的衣服都是把中国的绫绮用针拆开,重新织就的。凯撒还使用过丝绸伞。此后罗马贵族不论男女都争穿绸衣,普林尼书中提到,穿着中国

丝绸衣服的罗马少女的体态分外显得婀娜多姿。唐代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秦"条云：大秦人"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纹"，大概就是指罗马工匠这种拆解中国丝绸重新编织的做法。缣是一种多股丝织成的绢，十分致密。罗马工匠把这种难得的原料拆解，以单股丝织出更多的轻薄绸缎。

到罗马帝国初期，即中国东汉时，罗马人穿丝绸衣服已经蔚成风气。皇帝梯皮留斯（Tiberius）曾下令禁止男子穿绸衣，以为那是女人气太重，以限止奢靡之风。但丝绸既然大量运人，此风禁而不止。锦衣绣服成为富室风尚，连教堂也习惯于用丝绸作帘幕。图拉真（Trajanus）虽曾禁止一切糜费，而丝之贸易并没受到影响。罗马城内的托斯卡区开设了专售中国丝绢的市场，有叙利亚妇女以此为业而致富。公元二世纪时，丝绸在罗马帝国极西的海岛伦敦，风行的程度竟然"不下于中国洛阳"[13]。尼禄火葬巴贝亚（Pappaea），丝及丝服，用如泥沙。韦尔斯《世界史纲》云："罗马王安敦时代（161－180年），须经遥远而迂回路程才能运抵罗马的丝，价值高于黄金，然而罗马人恣意滥用，财源东流。……至于丝为何人所织，并不过问。"普林尼曾列奢侈品和贵重物品表，其中有丝绸。他进行了一项计算，认为罗马每年向阿拉伯半岛、印度、中国支付的香料、丝绸等货款，达3500万至1亿罗马币赛斯特斯（Sesterces），约合10万盎斯黄金。有学者计算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0万至500万美金。所以普林尼感叹道："此即吾穷奢极欲之妇女所付出之代价！"中国山西发现过公元14年至275年间的罗马钱币。这是罗马黄金大量流入中国的证明。有人估计，从公元前31年到公

元192年的220年间，罗马在东方贸易中损失的价值约合1930年的一亿英磅。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丝的输入，是导致罗马帝国后来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

（二）铁器、漆器、玉器、竹器和铜器的西传

在世界上，中国不是掌握冶铁技术和使用铁器最早的国家。但汉代中国的铁器名扬世界各地，原因是冶铸技术先进，铁器精良。汉代有不少铁器输出，主要是由于战争传入西域的兵器。安息王朝就从中国输入过钢铁。运输路线既有经陕、甘、青、新的丝路西运，也有从四川经过云南，入缅甸和印度北部，再由印度西北入高附（今阿富汗喀布尔），然后抵达安息东部。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outarchos）《列传》中称安息骑兵的武器为“木鹿武器”，木鹿城在安息北部（今吐库曼斯坦），是中国钢铁的集散地。中国钢铁还通过安息流入西方，传到罗马。罗马学者普林尼在其著作中称：“在各种铁中，赛里斯铁名列前茅。”[14]。

漆和漆器的输出也是汉代与西域交流的内容。中国产漆和漆器很早，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瓜棱圆木碗，饰有朱红生漆，是所见最早的漆器。造漆和漆器工艺在战国时代早期还是木器业的附属部门。战国中期以后开始脱离木器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已经发明了髹漆，饮食器具、日用容器、乐器、武器、以至棺材，都用髹漆。髹漆不仅可以增强器物的防腐性能，而且可以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象和图案，使器物成为各种工艺美术品，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

西汉的漆器技术独步世界，制漆和漆器业有很大发展。漆器手工业在汉代达到黄金时代，漆器在当时被视为珍贵的工艺品和日用品。除了官营之外，亦有私营制漆和漆器业。政府在蜀郡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其人"比千乘之家"。当时的官僚、贵族、富豪之家竞相使用漆器。汉代崇尚厚葬，在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四川、陕西、河北、甘肃、河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内蒙古、新疆等地发掘的大中型汉代墓葬中，多有漆器出土，并刻有铭文，记述制作时间、使用对象、生产及管理机构或产地、生产工序、管理及生产者的名字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184件，还有两具精美的彩绘大漆棺。漆器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色彩鲜明，光泽照人，精致美观。

汉代漆器流传西域，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云，葱岭以西诸国"其地皆无丝漆"，这就造成了西域对中国漆和漆器的需要。中国漆器在阿富汗帕格曼遗址中有所发现。帕格曼距离喀布尔七十公里，遗址是迦毕试国都城外一处大伽蓝。1937年和1939年法国考古队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物中有汉代的漆奁、漆盘和漆耳杯。

玉是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可以雕凿成各种器物和装饰品。雕凿玉器在中国也历史悠久。甚至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有一个玉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第二次大分工使手工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导致了玉器工艺的兴起。如前所述，新疆出产的软玉（Nephrite）早在先秦时期就运销葱岭以西

的中亚、北印、西亚，甚至远达埃及。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怛叉始罗）发现公元前一世纪由中国运出的玉[15]。于阗的玉传入中原地区，还被道家视为长生养生之仙药。葛洪《抱朴子·仙药》中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迟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乌米酒及地榆酒化之为水，亦可以葱浆消之为饴，亦可饵以为丸，亦可烧以为粉，服之一年以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刃之不伤，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国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阳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卢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虫血渍玉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与水饵之，俱令人不死。"

竹器西传也很早，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过邛竹杖。纺织品也很早传入西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过由印度转销过去的蜀布。蜀布当时又叫黄润细布、筒布，麻制，或麻葛混合织成。这些蜀地的产品应该是通过中国云南至掸国，通过孟加拉湾再至印度，又由印度转贩至中亚的。

铜镜汉代传至域外，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萨帕利遗址和塔什干附近，分别出土有汉代的日光镜和人形镜。位于阿富汗北部的提利亚遗址曾出土三枚汉代铜镜，上面有汉字铭文，内容有"洁白而事君"等。俄罗斯顿河流域的维诺格拉德奈遗址中出土的汉代中国铜镜，铭文有"见日之光，长勿相忘"；"天下大明"等。波斯人也提到中国人用白铜制镜。

中国白铜传至西域。所谓白铜是一种镍合金，这种合成金

呈白色或银色，俗称白铜，《广雅》称“鋈”，阿拉伯语叫做“中国石”。用这种合成金可以制成铜镜，波斯人知道中国人用白铜制镜和箭头，说用白铜制的箭头一中箭就会丧命。公元前二世纪时，它首先出现大夏。镍币由 Euthydemus 的继承人 Demetrius－Euthydemus Ⅱ、Pantaleon 和 Agathocle 所铸造。根据化学分析，大夏镍币的成分与中国白铜相差无几，因而可以肯定其来源于中国。欧洲直到 1751 年才提炼出镍，同样当时在中国也不知道镍是一种单独的元素。中国古代工匠把含镍的铁矿石与铜矿石融化在一起来铸造镍铜合金，结果部分铁的成分被保留在合金中。因此“古代中国白铜的特点之一是含有少量铁的成分，原因是用含镍的铁矿石作为原材料”[16]。大夏镍币的化学成分是 77% 的铜，20% 的镍和 1% 的铁，证明它们是源于同一材料，同一铸造方式。

由于含镍的铁铜共生矿不是到处都可以找到，可以断定这些矿石只能来自中国。塔恩（Tarn）在提到大夏镍币来源时说：“在古希腊时代，大夏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贸易。中国与伊朗之间的交通是在公元前 106 年张骞通西域之后才开始。中国出口的货物是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最后到达大夏。镍、竹制品以及四川的丝绸都是这样运到的，以至于张骞在大夏见到后甚为惊叹。”[17]大夏缺乏自然资源以及制造的传统，有学者断定其镍合金来自中国云南。约翰·马歇尔认为是希腊人“把白铜（一种铜和镍的合金）从中国引入了印度西北”。他说在塔克西拉（怛叉始罗）考古发现的铜器有一种合金，“铜里面加了镍，这不仅使合金具有银色光泽，还使之特别柔韧，易于锻造。

在欧西德莫斯二世(Euthydemus)、潘塔隆(Pantaleon)、阿加托克勒斯(Agathocles)的一些钱币上,就用了与此类似的合金。这种合金无疑是从中国云南获得的,那里有这两种金属混合一起的天然合金。中国人把它叫'白铜',大概在没加工的时候就从云南卖到了塔克西拉。但更有可能的情况似乎是,在塔克西拉发现的几件白铜制品,是把印度-大夏国王们的钱币熔化之后制成的,正如今天印度人常常把卢比熔化来制作银器"。从上述几位大夏希腊国王的钱币上发现用了镍,他认为这种铜镍合金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出现在塔克西拉。《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古堂螂相当于今云南的会泽、巧家和东川,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邻近的四川会理,历史上以含镍的铁矿而闻名。那么大夏镍合金的来源可能是中国云南,经过印度辗转传入[18]。

二 汉代中国技艺的西传

汉代中国工艺技术西传主要是铸铁技术、穿井技术和农耕技术。

(一)铸铁技术西传

中国对铁的使用和冶铁技术的掌握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考古发现商代使用陨铁制作的铁刃铜钺,说明对铁的性质和锻打嵌铸的技术已经有了掌握。春秋时已经懂得了人工冶炼,铁器已应用于农业生产,偶而也用于兵器。山西侯马北西庄出土春秋晚期的大批铁制农具、日用品,还有钢剑,说明不仅能铸造

熟铁，还能冶铸生铁，这是冶金史上一项重大成就。欧洲在1380年仍用块炼铁熔制新铁，直到十四世纪才有生铁，中国则从铁器时代初期，就是生、熟铁并用。铸铁技术应用得早是中国冶铁技术上独特的长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利用鼓风囊增高炉温的冶炼技术。战国时冶铸技术大大提高，如层叠铸造法一次可浇铸出多个铸件，这时还创造了展性铸铁。不仅农具大量使用铁器，兵器在燕、楚、韩及黄河流域都已普遍使用。锻钢和可锻铸铁已在全国流行。

汉代冶铁业进一步发展，作坊多，规模大，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技术也进一步提高，将战国时层叠浇铸法由两孔浇铸发展为一孔浇铸，还出现了低硅灰口铁和球墨铸铁，这是非常先进的铸造技术，据说在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才使用。战国时出现的展性铸铁在汉代得到广泛使用，西汉时由块炼铁渗碳钢进一步发明了由铸铁脱碳的百炼钢，开始用生铁炒钢的新工艺。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汉代铁镢，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相当。当地还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种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尚属少见，大多数只限于楚地。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的长剑、长矛、环首和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在西汉中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说明汉铁器的使用已十分广泛。

汉代也有经营冶铁和铁器而致富者。《史记·货殖列传》说,在通都大邑,经营"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的商贾,富比"千乘之家"。蜀卓氏乃冶铁世家,其祖先战国时为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国,将卓氏迁至临邛,于是卓氏"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宛孔氏之先,战国时魏国人,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孔氏于此"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鲁国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

汉时中国的铸铁技术名扬世界,公元前二世纪,现在乌兹别克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会了铸铁技术,后来又再传俄国。塔吉克语中的铸铁叫"чуян",相当于鞑靼语的"чуен"。二者都出于汉语中的"铸"字,传入俄国后又成为俄语中"чугун"。在俄语中锻铁作"Железо",相当于英语 Cast iron[19]。在罗马人笔下除了提到赛里斯的丝和丝织物之外,也提到中国的铁和铁器。罗马作家除了老普林尼在他《自然史》一书中提到"赛里斯铁"和赛里斯人"出口铁",大约产生于公元二世纪末和三世纪初的《伪托克利芒蒂纳的看法》一书中,也提到赛里斯人"强迫一个人用一件铁器使自己的同类洒血"[20]。

西汉时铁剑长度在80厘米到118厘米之间,钢剑的刃部经过淬火,坚实锋利。汉代还出现了仅一侧有刃的环柄长刀。这样锋利无比的武器正是西域各国所需要的。《史记·大宛传》记载,当时从大宛以西直到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

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西域各国的弓矢和铁兵器，和汉朝军队所配备的长柄的矛戟和射远的弓弩以及剑盾相比，要落后得多。由汉朝投降的使者和逃亡的士兵直接将铸铁技术教给了大宛、康居和安息的铁工。公元36年，陈汤到西域，讲到“胡兵”的武器不如汉朝军队，“矢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21]。此所谓胡兵，包括葱岭以西的大宛在内的汉西域都护统辖下的西域诸国兵。

安息从中国输入钢铁兵器，木鹿是中国钢铁的集散地，安息骑兵所用武器由木鹿传入。所以罗马史家普鲁塔克称安息骑兵武器为木鹿武器，所用刀剑用中国钢铁锻铸，以犀利著称。这些中国钢铁又通过安息流入罗马。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作家西流士·伊塔利库在《惩罚战争》一书说：“我不是已经谈到过酒神巴卡斯了吗？高加索的猛虎拖着他凯旋的战车奔驰过大小城镇，束缚了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之后，他带着缴获的武器从东方胜利而归。”[22]

（二）穿井引水技术西传

汉时穿井引水技术传入西域和葱岭以西地区。据《史记·河渠志》记载，汉武帝时曾令士卒在今陕西大荔修“龙首渠”，这是一种新式的水渠，打出若干水井，井深达40余丈，“井下相通行水”。目的是控制水源和防止沿岸崩漏，非常适合沙漠地区的用水特点。

武帝太初二年（前103），李广利为取大宛马，率3万汉军远征大宛，把这种穿井引水的技术用到了战争中。《史记·大宛

列传》记载:李广利攻贵山城,"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于是大宛城内的贵族大为恐慌,起来杀死了大宛王毋寡,遣使求和。李广利与部下计议:"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决定接受和议。所谓"新得秦人",是匈奴给大宛送来的汉人凿井工,说明这种井渠技术这时已经传到了费尔干纳盆地。此后这种引水技术就在西域推广开来,这就是在新疆发现的"坎儿井"。

新疆的"坎儿井"举世闻名。"坎儿"是维吾尔语的音译,其切实含义应为"井渠",是一种地下渠道。在新疆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坡降而下的水很容易渗入到戈壁沙砾之中,流程十分有限,难以为人利用。坎儿井就是沿着水脉,每隔二、三十米挖一口竖井,在竖井之间又挖通暗渠,汇聚沙砾石层的点滴渗水,最后流入低处地面的储水涝坝,再通过条条小渠滋养绿州。这种井渠主要分布于新疆吐鲁番、托克逊、鄯善和哈密诸地,现在新疆吐鲁番盆地,至少还有近千条坎儿井的渠道,总长度大约在3000公里以上,再加上万千口竖井,工程之大亦属罕见。有人甚至认为,它与长城、运河可以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坎儿井的起源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美国的亨廷敦等人认为这种技术是从波斯传来的,因为公元前500年伊朗已使用井渠,而后传入西亚和中亚。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这种技术传入新疆的实证材料。中国学者王国维作《西域井渠考》,认为新疆坎儿井技术得自中国内地。他说:

今新疆南北路通凿井取水,吐鲁番有所谓卡儿井者。

……伯希和教授疑此法自波斯传来。余谓此中国旧法也。《史记·河渠书》:武帝初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此事史家不记其年,然记于塞瓠子(元封二年)之前,时西域尚未通也。又《大宛列传》云:"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又云:"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是穿井为秦人所教。西域本无此法,及汉通西域,以塞外乏水,沙土善崩,故以井渠法施之塞下。《汉书·乌孙传》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至敦煌,遣使按行卑鞮侯井。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井名通渠,又有上下流,则确是井渠。是汉时井渠或自敦煌城北直至龙堆矣。刘郁《西使记》言穆锡地无水,土人隔岭凿井相沿,数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言与汉井渠之法无异。盖东来胡贾以此土之法传之彼国者,非由彼土传来也[23]。

这种井渠后来继续西传,至少在公元前146年已经在西亚出现,波斯称为卡纳特,传至阿曼,叫法拉吉。公元二世纪时,也门的艾兹提人移居阿曼时,看到那里的地下水渠有万条之多。目前只剩下4000多条。最大的法拉吉在古都尼兹瓦的郊区,主渠长达几十公里,并有纵横交错的支渠,主渠从绿山区下坡,经暗渠流向尼兹瓦。《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写作者在印度巴里格柴见到过这种水井,有人推测是希腊人开凿的,但也有人估计是由费尔干纳的希腊人传到印度的。

王国维去世后,伯希和《评王国维遗书》中又对王国维此文

发表了基本肯定的意见，他说：

> 《西域井渠考》……所考者应是 *kārīz*，别言之，伊兰、俄属中亚、与吐鲁番等地习用之地下井渠也；王氏以为此乃中国旧法传至西方者。纪元前二世纪末西安府一带所穿筑者固是此类井渠，数年前余亦将此文检出（参看《亚细亚报》一九二〇年刊第一册二六一页，《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同《汉书》卷《沟洫志》相对之文）。《汉书》卷九六下《乌孙传》所识在敦煌穿筑者，亦必属此类井渠无疑。惟王氏引有新文，即《史记》卷一二三《大宛（*Ferghana*）列传》，言"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一条是也。但谓为纯粹汉人发明，似乎言之太早，先应研寻此类井渠发现年代也[24]。

看来伯希和也承认了新疆地区的坎儿井来自汉地，只是他还不能完全肯定此法是否全由汉人发明。

另外，1983 年在新疆尼勒克县奴拉赛发现的古铜矿遗址，时代在春秋中叶和战国早期（前七世纪至前五世纪），当时这里还是塞人聚居的地方，当是塞人开采。在矿坑内外发现了用于开矿抽水使用的提升工具，许多由卵石制器制成的平衡石锤，这种石锤和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古矿遗址所出相仿，应该是由中原西传的。

（三）农耕技术的西传

汉时农耕技术流传西域。汉武帝后期曾十分注意农耕，推广新的耕作方法。从汉武帝时起，以及后来的宣帝、昭帝、元帝，

东汉的明帝、和帝、安帝、顺帝都先后命官吏、军队在西域各地长期驻守屯田，中原地区许多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到了新疆，后又传入葱岭以西的中亚和西亚。特别是水利灌溉技术。《水经注》卷二"河水"条记载，汉元凤四年（77 年），霍光遣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立其质子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又派敦煌人索励为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伊循城屯田，以镇抚楼兰。索励又调集鄯善、焉耆、龟兹各国兵各千人，横断注宾河（今卡堵河，源出昆仑山），掘渠分水，灌溉农田，"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当为'屯'字之误）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这种掘渠分水法，是汉族地区新的水利技术。这些先进的水利灌溉方法通过汉军屯田传到西域，对西域人民提高农业生产是有利的。新疆沙雅发现约 200 里长的汉代古渠，至今还被当地人称为汉人渠。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克塞湖东岸乌孙赤谷城遗址郊外，也发现汉代灌溉渠道。大月氏原来是游牧民族，活动在今新疆东部和甘肃西北部一带，与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接近。后来西迁阿姆河流域，过上了定居生活，生产转化为农耕，他们把汉人的农业文明带入西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　汉代中国药材的西传

主要有姜、肉桂、大黄等。

（一）姜

姜，又写作薑，又叫"生姜"，根茎作蔬菜，香辛料；中药供药用，中国南部和中部早有栽培。《论语》中有云"不撤薑食"，《史

记·货殖列传》中云:“江南出楠、梓、薑、桂。”“巴蜀亦沃野,地饶椒、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千畦薑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可知汉代生姜种植之广,需求量之大。汉代姜通过西北丝路传入中亚与西亚。相传汉武帝时东方朔所著《海内十洲记》记载,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四月,西国王使至,献罗马胶。武帝厚谢使者,“赐以牡桂、干姜等诸物,是西方国所无者”。干姜,是生姜加工后的产品,陶弘景说:“凡作干姜法,水淹三日,去皮置流水中六日,更刮去皮,然后晒干,置瓷缸中酿三日乃成。”李时珍说:“干姜以母姜造之”,“凡入药并宜炮用。”《海内十洲记》是否为东方朔所作,人们很怀疑。西汉时与罗马不曾有过这种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这件事本身不很可靠。但姜通过这种途径传入西域当是可信的。

法国伊朗血统汉学家阿里·玛扎海里在《中国的生姜与丝绸之路》一文中研究了中国生姜的西传[25]。有人说“生姜是自印度传入我们之中的殖民地产品”,他认为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不太坚实可靠的认识。他说:“生姜是一种出产于亚热带或热带地区的外来产品,但它是一种具有非常悠久的栽培史的植物,中国人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懂得栽培它了。”“在丝绸之路畅通的时代,伊朗人从中国获得了大批生姜,然后再转销于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和拉丁人中。中世纪的制药业要消费大量的生姜,烹饪中对它的需求就如同胡椒一样多。”20世纪的世界百科全书中提到了3名同样都叫阿庇攸尤斯的罗马烹饪专家,其中有一位与图拉真是同时代的人,他可能曾赴安息人中旅行过。在他有关烹饪的著作中,作为香料而提到了姜。图拉真

是罗马皇帝，生活在公元53至117年，正值中国东汉时期。在《中国的肉桂与丝绸之路》一文中，他提到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安息皇室的药剂配方中，有中国的肉桂和姜，说明那时中国生姜已被波斯药学家用为药剂配料。

根据他的研究，姜的贸易与传播也"取道于海路"，"马来亚和南印度被长期以来仅由中国人垄断的这种贸易的巨额利润所诱惑，他们于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中也在亚热带之外的地区栽培姜。马来人－印度人的这一传统在被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又被葡萄牙人沿袭；在很久以后又由英格兰－撒克逊人仿效，他们把姜引进到美洲，从本世纪初起又使之适应了非洲的气候。""中国在此期间始终是唯一掌握有关这种奇特产品的栽培术和保存方法之秘诀的国家。甚至在医药方面，远东也一直保持了较其它地区先进一步的特长"。"除了医药学之外，英格兰－撒克逊人还知道生姜葡萄酒、生姜米酒、加姜糕点、生姜酱和姜粉等。这一整套传统在不同程度上都要追溯到远东。"在古代波斯药学家看来，运到他们那里的最佳生姜来自中国。玛扎海里也没有否定姜从西北丝路西传的可能，他说："虽然从某一时代起，也存在有经海路出口的中国生姜这一事实，但像伊朗和高加索那样的内陆地则仍经丝绸之路直接获得他们的姜。"

（二）肉桂

肉桂，亦称"玉桂"、"牡桂"、"菌桂"、"筒桂"。木材纹理直，结构细，供制家具等用，树皮含挥发油，极香。中医学上以桂皮入药，性大热，味辛甘，功能温肾补火，祛寒止痛，主治肾阳虚衰，心腹疼痛，久泻，痛经，阴疽等症。嫩枝称"桂枝"，亦可入

药。桂树产于中国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上引《史记·货殖列传》中云："江南出楠、梓、薑、桂"。亦见于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据《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公元一世纪时，中国商货在印度港口装船西运，其中有丝绸、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和医药产品。在欧洲人亲自到东方以前，他们通常认为桂树生长于阿拉伯半岛，这是误会。阿拉伯的转口商人不肯告诉罗马人桂皮商品的真实来源地，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就误认为桂树生长在阿拉伯半岛。可是人们从来没有在阿拉伯半岛的土地上发现过桂树的踪影，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不适宜桂树的生长。后来西方人又长期以为桂皮来自锡兰（斯里兰卡）。桂皮在罗马帝国的需求量很大，当时的美容品、药品、香膏、香脂等都需要加入桂皮，所以桂皮的价格十分昂贵，一罗马镑的优质桂皮价值1500古罗马银币，即便是劣质品也值50个银币。

阿里·玛扎海里在《中国的肉桂与丝绸之路》中详考中国肉桂的西传[26]，他的结论是肉桂于汉代已经传入波斯，稍后则又传入东罗马：

> 穆斯林们用阿拉伯文 darsini 来称呼肉桂或桂皮，它出自萨珊王朝的波斯文 dar－tchini，意为"中国的药"。该词的第一部分 dar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因为它意指植物和树。但它也指药，指一种草药，在此情况下就相当于新波斯文的 daru，在古伊朗文中作 daruk。至于第二部分 tchini 则是指中国的，它是由一个地理词 Tchin（秦、支那）而组成的形容词。这一伊朗——伊斯兰文术语同样也行用于印

度，在孟加拉叫作 darchini 或 daltchini。在印度斯坦的其余所有地区，大家都使用 galami－chini 一词，该波斯词意为“中国树的条纹”。该词相当广泛的用途证明了印度斯坦和伊斯兰世界诸民族是通过伊朗人而了解肉桂的，而伊朗人自己则是通过经丝绸之路与中国的贸易而了解肉桂的。

波斯史料可以使人肯定，伊斯兰之前诸民族对中国肉桂的了解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历史的初期，有关它的知识是与有关生姜的知识同时发展起来的。这就是我们通过在穆斯林医典中保留下来的萨珊王朝和拜占庭人的某些古老处方而得出的结论。例如，为花剌子模的算端艾济兹用波斯文所写的一部卷帙庞大的医典著作的作者乔尔杰尼（卒于公元 1136 年）就转引了某些这类历史处方。

把 24 梅提卡勒的中国肉桂加入治疗眼镜蛇咬伤的片剂中，这是萨珊人皇家医学院（君迪萨布尔医学院）的处方配制的，该学院在四－九世纪期间非常繁荣昌盛。为了配制糖衣药片而开了 8 梅提卡勒的中国肉桂，该药首先是为祆教徒国王凯拜斯（Kabadh，在希腊文中叫 Koates）而调配的，该国王于公元 487－531 年在位。据同一部史料记载，中国肉桂也出现在加利安的软糖药剂中。最令人惊奇的是在米特里达梯·欧巴托尔（米特里达梯国王）的一种含鸦片的软糖剂方中，也有肉桂。这就可以使我们将此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巴黎国立图书馆波斯文新增著作，第 337 页）。在米特里达梯的这张药方中，同时列有肉桂和生姜。

这一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直接或间接地说明

了拜占庭帝国在古代缔造者与中国科学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像李约瑟那样的某些作者对于早就由于中国的古老技术水磨的原因，而怀疑到这一点了，即怀疑罗马人是否确实在这一米特里达梯的国家中发明了它，并对此作了描述。（请参阅斯特拉波书，第12章，第557页；韦图尔夫书，第10卷，第52页；叶勒米安：《安息朝亚美尼亚的奴隶王朝衰败与封建关系的出现问题》，俄文著作，1954年在东方学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但我们刚才引证的史料便可以证明，中国医学从生姜和肉桂开始同样也于罗马人入侵的前夕传入了东罗马。中国人的药学和医学以一些无可争议为中国的药剂而对前伊斯兰时代的大学者们行施了某种影响，如迪奥斯科德斯和加利安是两位用希腊文写作的东罗马医学家，他们生活在伊本·巴伊塔尔和赖泽斯之前。

玛扎海里根据公元前一世纪安息皇家药方中含有肉桂、生姜的事实，说明汉代中国肉桂、生姜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亚。根据他的研究，大航海以后，西方人在有关"东印度"产品问题上，大致区别出了两种肉桂，一种是锡兰肉桂，一种是中国肉桂。但直到1909年，植物学家们还根据商人的说法，认为中国桂皮以及安南和交州桂皮均是自锡兰桂皮派生出的不同品种。而实际上，锡兰桂皮从未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品，这种产品仅在非常晚的时期才在市场上出现，首先是作为一种"代用品"，慢慢地才成为真正肉桂——中国桂皮的重要竞争品。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和印度游记》中，描述印度诸港口及公元850年左右在那

里成交的贸易，尽管他多次讲到了锡兰岛并记述了其物产，却对桂皮只字未提。直到十世纪初马苏第著《黄金草原》，也丝毫没有讲到锡兰桂皮。中国人曾长期在广东和广西种植处于野生状态的桂树，后来又在安南和交州一带发现了处于野生状态的这种树。直到宋代，他们才发现了西方商人和植物学家称之为“锡兰肉桂”的斯里兰卡品种。

（三）大黄

大黄，亦称“马蹄大黄”、“四川大黄”、“南大黄”、“川军”。分布于我国湖北、四川、陕西、云南等省；另有“掌叶大黄”（又称“北大黄”）和“唐古特大黄”（又称“鸡爪大黄”）等。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中医学上以根状茎入药，性寒味苦，功能攻积导滞，泻火解毒，行瘀通经，主治实热便秘，腹痛胀满，痢疾，黄疸，瘀血闭经，目赤口疮，痈肿等症，外敷可治烫伤。

玛扎海里在《中国的大黄与丝绸之路》中也研究了中国大黄的西传[27]。他说：“大黄出自中国，它又从那里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在许多国家中都引进并栽培大黄，但引进的品种从未达到原产地大黄那样的药效，配制好和晒干的大黄继续运往西方。近代植物学家和药剂学家根据各种大黄的来源和引进的情况而给它们起了不同名称。欧洲许多国家都试图引进大黄，但仅仅获得了一些最多可供烹调和糕点使用的劣质大黄。”大概跟水土气候等因素有关，大黄只有中国的才是优质品。据他的研究，大航海之后，西方人有的称经海路西传的中国大黄为“东印度大黄”、“印度大黄”。但这并不是说大黄来自印度，“印度”一词于此具有指“外洋”和“海外”的引申意义。香料商们赋予

了“印度”一名这种广义。这有点类似古代中国人称来自埃及、罗马的玻璃制品为身毒或天竺产品相似。沿西北陆路西传的中国大黄,有时被称为“莫斯科大黄”、“王廷大黄”或“西伯利亚大黄”。这是沙皇曾经对中国大黄的贸易实行国家垄断造成的。

但是西方人最早什么时候知道大黄呢?曾有人推测,如果普林尼说的 rhacoma 来自黑海岸,那么它就是近代的 rhapontic,从 Rha(伏尔加河)河口而来的亚美尼亚人玛尔塞林所说的 rha 或 rheon,也只能是这种大黄植物。他说这是一种植物根块。普林尼还谈到了 rha Barbarum,应该指从香料之路上进口的大黄(Barbarum 可能是指巴尔巴里斯港的形容词)。玛扎海里说:“如果这一切是正确的话,那末就应该承认中国的产品经过统治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贵霜人或大月氏人的手之后,仅仅渡过了安曼海(位于我们的孟买 - 亚历山大航线附近的波罗羯车),与陆路相竞争:把中国、中亚与黑海联系起来的黑海以北之路。”根据这种猜测,早在汉代,中国大黄便经海、陆两路西运波斯。玛扎海里根据迪奥斯科里德、普林尼和加利安等人所讲的大黄情况,认为“从公元一世纪起,其交易就一直扩大到地中海国家,当然还有巨大的印度市场。”生活在 1329 至 1403 年的波斯设拉子的宰因·丁在其有关医药内容的著作中曾引用过加利安关于大黄药性的论述:“加利安指出大黄可治肝病。他说大黄能清脾和肠胃。其药性可治肝病,即使是已变成慢性病也罢(至少可以作为强肝剂使用)。”而加利安是生活在约公元 50 年前后的波斯人。

玛扎海里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波斯传说,能够说明晚

期的伊斯兰国家对大黄是何等熟悉。据祆教文献记载，第一个男子是玛西亚，第一个女子是玛西亚娃。据《阿吠陀》记载，他们是以由山神伽玉玛特和格王诞生的一株大黄的形式出现的。当两株大黄成熟时，他们彼此之间相爱了。所有谈到琐罗亚斯德教古代传说的伊斯兰文献都知道这个传说。犹太－基督教的传说中同样也把"智慧树"和"蛇"与第一对夫妇的神话结合起来了。第一对夫妇指亚当和夏娃，他们是"西域"中世纪的先祖。智慧树的药用特征仅仅在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中才明确地出现过，它是指生长在一座高山上的大黄。《圣经》的安息人作者可能把"智慧树"理解成一种具有已得以证实其疗效的药用植物，具有很大的圣洁性，它与作为毒药和疾病之象征的"蛇"相对立。这种传说就意味着，人类的第一对夫妇也与晚期人类生活于同样的境地，他们受到了毒素的威胁，在诞生时带有由大黄象征的一剂蛇药。

四　中国乐器、音乐的西传

傅玄《琵琶赋》序云："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载（一作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实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28]汉代创制的这种乐器称为"秦汉子"，是中国式琵琶，西汉时传入乌孙。

《汉书·西域传》"龟兹"条记载，龟兹王绛宾妻乌孙公主

女，并与公主女朝汉，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亦号公主，汉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绮珍凡数千万。汉与龟兹的联姻大大改善了彼此的关系。龟兹王和夫人在汉朝待了一年后回国，汉厚赠送之。此后数来朝贺。龟兹王在本国推行汉朝制度，“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之乐曲传入龟兹。

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的乐器箫在汉代开始西传。箫又叫“排箫”、“籁”，战国时代即已出现。现在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称排箫为“奈伊”，有人认为“奈伊”出于波斯语 nay，原是竹子的意思。古代匈牙利人中很多是从中国迁去的，排箫有可能随匈奴人西迁而西传的。西汉初年，原来居住在今新疆东部和河西地区的月氏族和乌孙族，因受匈奴族逼迫，先后西迁。他们会把自己的音乐文化带到中亚和南亚。[29]。

五　汉代中国礼仪制度的西传

中国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也传入西域。据《汉书·西域传》“龟兹”条记载：龟兹王绛宾娶乌孙公主女为夫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羸也’。”《后汉书·西域传》“莎车”条记载，东汉初，延为莎车王。延在西汉元帝时曾入汉为侍子，在长安长大，“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延死，其子康代立，“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

注　释

〔1〕严可均《全秦文》卷一，前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2〕严可均《全汉文》卷十八，同上。

〔3〕《东亚古文化研究》，1944 年，东京。

〔4〕《文物》1972 年第 12 期。

〔5〕严可均《全晋文》卷七十四，同[1]。

〔6〕王充《论衡》卷十二，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年。

〔7〕严可均《全汉文》卷二，同[1]。

〔8〕同上。

〔9〕严可均《全汉文》卷三，同上。

〔10〕《后汉书·匈奴传》。

〔11〕《汉书·武帝纪》。

〔12〕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年，3 页。

〔13〕赫德生《欧洲与中国》，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58 页。

〔14〕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2001 年，13 页。

〔15〕《印度考古部报告》（第一册），Report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1919－1920，Vol. 1，19 页. pt. 1。

〔16〕梅建军、柯军《中国古代镍白铜冶炼技术的研究》，见《中国冶金史论文集》，北京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年，10－20 页。

〔17〕塔恩（Tarn，W. W.）《古代巴克特立亚和印度的希腊人》（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108，Chicago：Ares Publishers，Inc，1985.）。

〔18〕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49 页、155 页、185 页；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

究》,载《考古》1999 年第 4 期。

〔19〕参前揭沈福伟书,64 - 65 页。

〔20〕前揭戈岱司编、耿昇译书,59 页。

〔21〕《汉书·陈汤传》。

〔22〕前揭戈岱司编、耿昇译书,14 页。

〔2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 年,16 页。

〔24〕伯希和《评王国维遗书》,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商务印书馆,1995 年,66 页。

〔25〕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 - 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6 年,503 - 518 页。

〔26〕同上书,462 - 486 页。

〔27〕同上书,536 - 552 页。

〔28〕严可均《全晋文》卷四十五,同[1]。

〔29〕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210 页。

第九章　两汉来自西域的物质文明

汉代采取对外开放政策，汉代中国不仅向西域各国输出文明，也大量吸收了域外文明成果。中西间丝路通畅之后，汉武帝注意采取各国之长，发展本国经济与文化。汉王朝从经济文化交流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汉代传入的西域物质文化，我们拟从植物、动物和其它物品三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　西域传入的植物

汉统治者喜欢域外的名果异卉，因此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交通开辟以后，西域各国的各种奇花异草名果异木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入，有的移植过来，不能移植者则又源源不断的输入。《三辅黄图》卷四"苑囿"条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西京杂记》卷一曾记录多种，其中有中国本土所产，亦有明显来自周边少数族、西域或域外的，如西王母枣（出昆仑山）、胡桃（出西域）、羌李、蛮查、安石榴等。司马相如名篇《上林赋》中也提到"蒲桃"（葡萄）、"离支"（荔枝）等[1]。汉代输入的域外植物品种很多，并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发生了重要影响，直至当代。

(一)葡萄

葡萄,旧称蒲陶(《史记》),或蒲桃(《汉书》),译自伊朗语,一说译自希腊语。托马希克(Tomschek)、肯斯弥尔(T. WKingsmill)和夏德都以为是希腊文 Botrus 的对音。根据劳费尔的研究,葡萄原产伊朗北部及中亚,西传希腊、罗马、高卢一带,东传大宛。故其语源应当是伊朗语 Budawa。其说为人信从,则葡萄乃一外来词。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三云:"人啗饮之则陶然而醉,故有是名",是望文生义致误。葡萄传入欧洲很早,公元前 2000 年以前,米诺斯文明时期,希腊克里特岛就盛产葡萄,葡萄酒也是当地生产的大宗产品。汉时西域诸国安息、大宛、罽宾、乌弋山离、伊吾、车师、且末、龟兹、于阗、康居、大月氏等地都盛产葡萄,并善酿蒲陶酒。龟兹一家富户能收藏千斛葡萄。大宛以葡萄酿酒,贮藏葡萄酒多的有 1 万多石,长久的数十年不致酒败。中国葡萄来自大宛。中国内地本也有野生葡萄,分类学上称"葛藟"、"蘡薁",有 20 多种,俗称山葡萄、刺葡萄,或野葡萄,分布很广。中国人也早已饮用天然葡萄酒。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发现一批古代的粗陶酒器,考古学家鉴定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遗物,距今约有 5800 至 6000 年。但中国野葡萄品种不佳。

新疆的葡萄是从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传入的,有人根据考古资料说葡萄在秦代已经引进,如咸阳秦宫殿壁画便有葡萄内容。但秦时虽有葡萄传入,却没有种植,未能产生影响。北宋苏颂《图经本草》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都以为张骞带回葡萄,西晋张华《博物志》则以为李广利征大宛回带来。张骞出使西

域回，曾向汉武帝提到大宛“有蒲陶酒”，但并没有张骞带来葡萄的记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张骞从大宛回，中途被匈奴所拘达一年余，他带回葡萄种子的可能性不大。葡萄是张骞以后的汉使出使西域从大宛带来的。据《汉书·西域传》，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蝉封为宛王，汉朝发使十余辈使宛西诸国。“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旁”。据同书《匈奴传》，汉朝上林苑中有“蒲陶宫”，因栽种葡萄而得名。《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条云：“葡萄宫，在上林苑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以太岁厌胜所，舍之此宫也。”汉使取来了种子，在长安栽种，于是引进了优良的品种。

葡萄传入以后，不久也就有了人工酿造的葡萄酒，至迟在东汉末年，中国已能自酿造葡萄酒。《后汉书·张让传》注引《三辅决录注》云：“（扶风人孟）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遗（张）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张让是东汉末年桓帝和灵帝时有名的宦官，十常侍之一。曹魏初年，魏文帝曹丕喜食葡萄，在《诏群臣》中说：“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萄、石蜜乎？”讲到葡萄的价值，又说：“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蒲萄说，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当作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脆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当为麴）蘖，善醉而易醒。导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也。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2]

由于葡萄美观好看，因此，葡萄从西域传入后，很快便被用

为一种新颖的装饰题材，用为器物上的纹饰图案。秦时宫廷壁画已有葡萄。葡萄还用于织锦图案，见于记载的有葡萄锦。《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同书卷一记载，汉武帝时，"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考古发现和阗、尼雅遗址出土东汉绮、罽，都有葡萄图案。在东汉时夫妻合葬棺内出土一件黄色鸟兽葡萄纹绮缝制的女上衣，是中原地区的织品。还有一件绿底人兽葡萄纹罽，在绿底上用黄色显出卷发高鼻的人物采摘葡萄的图案，是新疆当地的织物。有用葡萄纹饰的丝织品，也有葡萄纹饰的毛织品。葡萄纹饰还作为铜铸图像，汉代有铜铸的海马葡萄镜和海兽葡萄镜，都是汉代工艺美术的精品。战国以后的文献，铜镜也称为鉴。《宁寿古鉴》、《宣和博古图录》、《西清古鉴》、《金石索》等书著录的海兽葡萄鉴，制作精细，图像绮丽。后世中国花鸟画中有葡萄画，还有以画葡萄名家的画家。

（二）苜蓿

苜蓿，古代文献亦写作目宿、牧蓿、木粟，古大宛语 buksuk 的音译。俗称风光草、金花菜、盘歧头、草头、连枝草等。原生伊朗波斯、高加索南部、大宛、罽宾等地。劳费尔说米底（今伊朗西部）盛产这种草料[3]。从语源上说，翟理斯字典认为是希腊语 Mēdikē 的译音，拉丁文作 Medica。斯脱拉波《地理书》中也提到这种草。还有人以为是 Buso 的译音，来自里海附近居民语。伊朗语作 Musu，发音最为接近。

这种草于公元前 470 年就传入希腊、罗马。其花有紫、黄或同开白黄青紫三种，可作饲料和菜蔬。武帝时汉使出使西域，从

大宛国带回紫苜蓿种子，古时所称苜蓿专指紫苜蓿而言。《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西京杂记》卷一记载，长安"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炎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汉时文献没有说是张骞带回，后来张华《博物志》和相传梁代任昉著《述异记》，以及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八都认为是张骞带回，洛中并有张骞苜蓿园。西方学者也相信了这些后来的传说，例如布尔努瓦就说："张骞于公元前125年左右归国时，或者是稍后，于第二次出使回国时，携回了某些植物种子和中国人所陌生的两种苗禾，即苜蓿和葡萄。"实际上这也是将其他汉使带回的物产记在了张骞名下。

李广利远征大宛，获得大宛的天马，又叫汗血马。天马越来越多，嗜食苜蓿，而且外国使者来时也带来苜蓿、葡萄种子，于是种植越来越多。"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4]。此后苜蓿在汉地得到推广。唐人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云："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者，皆汉时种也。"据《本草纲目》卷二十八，苜蓿除了作马之饲料之外，"可为饭，亦可酿酒"。

（三）棉花

植物中影响最大，对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最有意义的是棉花的引进。

棉花的种植是汉代时开始引进的。印度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和生产棉织品的地区，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哈拉巴

文化中,这一地区的农作物中就有了棉花,并有棉织品遗迹发现。中国古代没有棉,也没有"棉"字,有一个"绵"字,则指丝绵,后来借用来表示棉花,称"木绵"。中国古代中原和江南地区不出棉花,其纺织品以丝麻为主,达官贵族衣绸缎,平民百姓着麻布(故称百姓为"布衣")。棉花何时传入中国,《尚书·禹贡》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之语,有学者解释,"岛夷"指东南亚的海岛居民;"卉"意为草,可能是指木棉之类的植物;所谓"织贝",就是后来所说的古贝,是梵语栽培棉(karpasi)的音译。这是说东南亚的海岛居民进贡棉花。古代东南亚的棉花来自印度,今天一般仍称"亚洲棉"(Gossypium arboreum)。意谓先秦时印度棉花已通过东南亚居民传入中国。这里可能理解有误,所谓"岛夷"不过是东南沿海各岛的居民,草服是蓑衣、草笠之类,而"织贝"是以极小之贝,以线串连之,织以为巾者。今台湾山胞仍有此俗[5]。

棉花最早是由东南亚传入我国东南和西南地区。汉代珠崖地区和云南西部的人民已经种棉织布。《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条记载,云南西部的哀牢人织造"帛迭",此为梵语野生棉(bhardvji)的音译。章怀太子注引《外国传》云:"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帛迭、白叠即棉布。同传同条又云哀牢地产"有梧桐木花,绩以为布",注引《广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国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也。"即棉花和棉布。说明汉代云南境内的棉花是从印度经缅甸传入。汉代以后棉花种植缓慢地向周围地区扩展。汉代棉花还从西北陆路传入中国。1959 年在新疆民丰县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一批包括棉织

品在内的纺织品，如覆盖于盛着羊骨、铁刀的碗上两块蓝白印花布，男性墓主穿着的布质裤子，女性墓主的手帕等。《梁书·西北诸戎传》记载，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白迭子。国人多织以为布。布甚细白，交市用焉”。白迭子即帛迭。这种野生棉即草棉。草棉的原产地在西亚或非洲，经波斯、印度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这条路线为棉花传入中国的北线。草棉相对于亚洲棉而言，植株矮小，棉铃小，产量低，但成熟早，适于在生长期短的新疆和西北地区种植。

（四）胡麻

胡麻，俗名油麻，即芝麻，又叫鹊纹芝麻。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说原产大宛。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以为张骞带来，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三亦云：“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改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这也未必是张骞带回的，很可能也是其他汉使带回，记在了张骞名下。

汉地人掌握了胡麻的种植时令和收藏方法。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云：二月，“杏花盛，桑椹赤，可种大豆，可种胡麻”。四月，“是月也，杏花盛，……可种胡麻”。“六七月之交，……可种胡麻。”关于胡麻的出售，他说：“距立秋，……可粜大小豆、胡麻。”胡麻被方士们视为长生食物。《三辅黄图》卷三“集灵宫”条引《汉武帝内传》云：“鲁女生，长乐人，初饵胡麻，乃永绝谷，八十余年，少壮色如桃花。一日与亲知故人别，入华山。后五十年，先识者逢女于庙前，乘白鹿，从王母，人因识之，谢其乡里而去。”

胡麻传入中国后，胡麻制饼和胡麻制丸的饮食文化也传入

中国，并被道家当作保健长生食品。《本草纲目》卷二十二引葛洪《肘后百一方》云："用上等胡麻三斗，淘净甑蒸，令气遍。日干，以水淘去沫再蒸，如此九度。以汤脱去皮，簸净，炒香为末，白蜜或枣膏丸弹子大。每温酒化下一丸，日三服。忌毒鱼、狗肉、生菜。服至百日，能除一切痼疾，一年身面光泽不饥，二年白发返黑，三年齿落更生，四年水火不能害，五年行及奔马，久服长生。"在《抱朴子·仙药》篇中，葛洪又说："巨胜一名胡麻，饵服之不老，耐风湿，补衰老也。"

（五）其他作物

胡桃，即核桃，原产波斯北部的俾路支和阿富汗东部。汉时来自羌胡，《异物志》以为张骞带来，《本草纲目》卷三十引苏颂云："此果本出羌胡，汉使张骞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故名之"。其实也未必是张骞所为，但确实是汉武帝时开始在上林苑中栽种。

胡瓜，即黄瓜。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八说张骞使西域得种。并引陈藏器《本草拾遗》云："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其实也未必是张骞所为。杜宝《拾遗录》云："原名胡瓜，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贞观政要》卷六亦记其事，唐太宗批评隋炀帝说："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胡瓜原产埃及和西亚，乌孙、大月氏、匈奴都有种植。

安石榴，即石榴，据说也是张骞出西域，在大夏得涂林安石榴，归国后移栽中原。所谓涂林，是梵语 Darim（石榴），安石分指安（今布哈拉）、石（今塔什干）二国，安石榴由此得名。一说

原产安息。晋张华《博物志》说是张骞带回，因形状似榴，故名安息石榴，简称安石榴。陆机《与弟陆云书》云："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6]唐李冗《独异志》也以为张骞带回。可能跟葡萄、苜蓿一样，将其他汉使的成绩记在了张骞的名下。石榴传入中国后，原在长安周围种植，唐代逐渐扩大。离长安25里的临潼，以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所产石榴品质最优，至今仍为我国名产之一。东汉至唐，常写作"若留"、"楉留"。石榴花可供观赏，果可解渴造酒，充作杀虫剂，榴木有文采，用制几案、枕头。

胡萝卜，原产地中海地区，肉质根可作蔬菜、饲料等。营养价值高，有"小人参"之称。清乾隆年间《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有红、黄二种，甘甜堪食，可生可熟。昔人题云：'不是张骞通西域，安得佳种自西来'，盖出西域故云。"但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六以为"元时始自胡地来"。

红蓝花，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云："（马）志曰：'红蓝花即红花也，生梁汉及西域。'《博物志》云：'张骞得种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苏）颂曰：'今处处有之。人家场圃所种，冬月布子于熟地，至春生苗，夏乃有花。花下作梂猬多刺，花出梂上。圃人乘露采之，采已复出，至尽而罢。梂中结实，白颗如小豆大。其花暴干，以染真红，又作胭脂。'"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说："红蓝花产于埃及、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可以用作燕支粉，又可染丝绸。药中用之以活经血也。"

番红花，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云："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元时以入食馔用。按张华《博物志》

言，张骞得红蓝花种于西域，则此即一种，或方域地气稍有异耳。”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也以为张骞带回，亦非。当时阗宾盛产红花，大概是从古埃及、阿拉伯半岛间接传入。至北宋时，红蓝花、番红花在中国已普遍种植，苏颂《图经本草》云：“今处处有之。”[7]番，旧时对西北边境各族的称呼，亦为外族的通称，广州过去称外国为番。又如西红柿，原产南美洲，故又称番茄，其他如番鸭、番舶、番饼（银元）、番薯、番石榴等。

胡荽，即芫荽，芫，读作 yán，旧读为 yuán，别称“香菜”。《本草纲目》卷二十六云“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荽。”四世纪初石勒改为“香荽”。原产地中海沿岸。希腊文作 Kusbavas，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文俱同。有特殊香味，茎叶可做蔬菜，果实可提制芫荽油，中医学上以全草入药，性温味辛，功能解表，透发麻疹。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明罗欣《物原》都以为张骞带回，学者也表示怀疑。

胡椒，原产南亚，当从海路和西南丝路传入，我国南方有栽培。浆果球形，黄红色。有两种，未成熟果实干后果皮皱缩而黑，称“黑胡椒”，成熟果实脱皮后色白，称“白胡椒”。胡椒是印度大量出产的著名香料，不仅传入我国，也和中国的丝绸一样，远销欧洲，从印度洋经红海至地中海的海上通道因此又称香料之路。

无花果，其实有花，雌雄异花。花隐于囊状总花托内，外观只见果而不见花，故名。肉质松软，味甜，可供鲜食或制果干、果酱、蜜饯等。中医学上亦可以果干入药，功能开胃止泻，主治咽喉痛。树皮又是造纸原料。原产亚洲西部，可能由南海海道传

人，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及山东沿海地区有栽种。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一云："无花果凡数种，此乃映日果也。即广中所谓优昙钵，及波斯所谓阿驵也。"又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阿驵出波斯。拂林人呼为底珍树。长丈余，枝叶繁茂，有丫如蓖麻，无花而实。"无花果树传入似在汉代以后。

胡蒜即大蒜，一名葫，因来自蕃中，又称胡蒜，一名大蒜，一名荤菜。中国原有小蒜，汉时从胡地传入大蒜，汉伏无忌撰《古今注》（一名《伏侯古今注》）已记有胡蒜，他说："蒜，葫蒜也，俗谓之小蒜。胡国有蒜，十子一株，名曰胡蒜，俗谓之大蒜是矣。"《东观汉记》记载："李恂为兖州刺史，所种园小麦、胡蒜，悉付从事，无所留。"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六引孙愐《唐韵》云："张骞使西域，始得大蒜种归。"又云："张骞使西域，始得大蒜、胡荽。则小蒜乃中土旧有，而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

荔枝、桔柑、薏苡等自越南传入，并从交趾、九真等地移植中原。汉武帝曾于长安建扶荔宫，移植荔枝百株，由于自然环境不同，他的移植没有成功。《三辅黄图》卷三"甘泉宫"条记载：

> 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密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少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

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至后汉安帝时，交趾郡守唐羌极陈其弊，遂罢其贡。

东汉唐羌有《上书陈交趾献龙眼荔枝事状》，云："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8]交趾甘桔输入中原，王逸有《荔枝赋》序云："大哉圣皇，得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赋则极写荔枝树之繁茂与荔枝之美观爽口[9]，交趾的桔柑馨香可口。马援北返时从交趾载回当地的薏苡种子，结果造成"薏苡之谤"。《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潜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因而坐罪，葬不归墓，妻子亦株连，史称薏苡之谤。"

胡豆（包括蚕豆、豌豆）从波斯和中亚传入，最早见于《古今注》。胡豆最初指豌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四云："胡豆，豌豆也。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名。种出胡戎，嫩时青色，老则斑麻，故有胡、戎、青斑、麻累诸名。"又引孙思邈《千金方》云："青小豆一名胡豆，一名麻累。"《邺中记》云："石虎讳胡，改胡豆为国豆。"后来称同样来自西胡的蚕豆为胡豆，同书同卷云：蚕豆"豆荚状如老蚕，故名。……此豆种亦自西胡来，虽与豌豆同名，同时种，而形性迥别。《太平御览》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此也。今蜀人呼此为胡豆，而豌豆不复名胡豆矣。"

大葱，《广志》云："休循国居葱岭东，其山多大葱。"《西河旧

事》云:“葱岭在敦煌西八十(当为‘千‘字之误)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

耶悉茗花、茉莉花自海道传入。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记载:“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耶悉茗花,又名素馨。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云:“素馨亦自西域移来,谓之耶悉茗花。即《酉阳杂俎》所载野悉蜜花也。枝干袅娜,叶似茉莉而小。其花细瘦四瓣,有黄、白二色。采花压油泽头,甚香滑也。”茉莉一作奈花。同上书同卷云:“嵇含《草木状》作‘末利’,《洛阳名园记》作‘抹厉’,佛经作‘抹利’,《王龟龄集》作‘没利’,《洪迈集》作‘末丽’。盖末利本胡语,无正字,随人会意而已。韦君呼为狎客,张叔敏呼为远客。杨慎《丹铅录》云:‘晋书都人簪奈花’。即今末利也”。又云:“末利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滇、广人栽莳之”。佛教《神通游戏经》中描写佛祖的母亲王后迦耶夫人之美时有云“须摩那(茉莉)似的皓齿”。茉莉花当来自西亚、南亚,从海道传入中国南方。

指甲花,《南方草木状》卷中云:“指甲花,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叶如嫩榆。与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国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极繁细,才如半米粒许。彼人多折置襟袖间。盖资其芳馥尔,一名散沫花。”

另有酒杯藤,据崔豹《古今注》卷下引《张骞出关志》,以为出自大宛。花果如梧桐,“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但

有学者以为此乃出于“虚构”，并无此种植物。李世珍《本草纲目》草部记有诸种藤类植物，尤此名。还有的记载出于传说，难可凭信。任昉《述异记》卷上云：“汉武帝时，西方日支国，有献活人草三茎。有人死者，将草覆面，即活之矣。”

二 来自西域的动物

主要是马、狮子和其它珍奇动物。

(一)马

古代我国西北游牧民族地区，都出良马，尤其西域的马最为优良，因此中原地区很早就从西北游牧族那里输入包括马在内的牲畜。据说中原地区本有良马，河南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时代的铜马，躯体雄伟壮大，应当有极强的纵跳力。但此后似乎退化，秦汉时中原马体型较小，在汉对匈奴用兵的过程中，需要发展骑兵，需要大量战马和驮马，因此对养马和马种改良十分重视。汉武帝尚武爱马，他要用战马充实他的骑兵，同时他又追求长生，听信方士的话，说西域的马叫天马，是神龙的化身，乘之能升天成仙，所以更孜孜以求。

汉朝首先从匈奴得到北方的良马，有三条途径：一是通过互市所得，汉与匈奴无论战和，一直保持着边境贸易。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马有通过商贾贸易而来者，《史记·货殖列传》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同传还记载了边塞地区因畜牧而致富的名叫桥姚的人，“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

粟以万钟计”。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颜云：“塞斥者，言国斥开边塞，更令宽广，故桥姚得恣其畜牧也。”桥姚所以能以畜牧致富，与国家边境地区开放贸易有关，他从塞外游牧民那里交换到良马、牛、羊，贩卖到内地，从这种转手经营中获取厚利。二是通过礼赠而得，汉统治者赠给匈奴贵族的礼物主要金帛丝絮，匈奴单于赠送汉统治者主要是马和骆驼。如汉文帝《遗匈奴和亲书》就讲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三是通过战争获取。如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益封卫青》诏书中表彰卫青进击匈奴的战功，云：“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武帝时还得渥洼良马，元鼎五年（前112年）十一月《郊祠泰畤诏》云：“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曾向武帝讲到，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据说所谓“汗血”，跟马身上的一种寄生虫有关。《东观汉记》记载：“闻武帝歌天马沾汗赤，今亲见其然，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有人考证，现在的中亚吐库曼马，有一种寄生虫寄生于马的前肩膊与项背皮下组织里，寄生处皮肤隆起，马奔跑时，血管张大，寄生处创口张开，血就流出来。古代的大宛汗血马可能就是因此而得名。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乌孙是多马之国，《汉书·西域传》说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张骞归国，随行而来的乌孙使者以马数十匹献汉报谢。后来匈奴欲击乌孙，乌孙为了与汉结盟，“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汉朝提出“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的条件，于是乌孙又以马千匹为聘礼献汉。可能在元封三年（前108年），汉

朝以江都王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武帝很喜欢乌孙马,称之为"天马"。此后乌孙马仍以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输送汉地。

李广利远征大宛胜利,又得到了大宛的汗血马,武帝认为比乌孙马还好,于是又称大宛汗血马为"天马",把乌孙马改名叫"西极"。武帝听说大宛有好马藏在贰师城,不肯给汉使。武帝派使者以金换马,结果不仅没有换成,连使者也遭杀害。于是命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远征胜利,获得好马数十匹及中等的马三千多匹。武帝高兴之余,赋诗:"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次战争可以说以取马为直接目的。这种大宛马终两汉之世,一直源源不断地输入。直到东汉末年,曹植还从其父曹操那里得此种好马,其《献文帝马表》云:"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骍马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谨以表奉献。"[10]

西域良马的输入,曾使武帝求仙思想达到一个高潮,同时最终又造成了他求仙思想的破灭。汉武帝很迷信方士妄说,成仙长生的欲望非常强烈。"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祠"。后来在方士炫惑下,屡行求仙之举,皆以失败而告终。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汾阴出土宝鼎,方士公孙卿编造黄帝铸鼎铜山,鼎成乘龙升天的神话,武帝心向往之,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神龙不可见,武帝怅然,"嗟黄其何不来?""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效黄帝,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

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武帝派方士栾大入东海，想接迎仙人于海，封禅泰山。“而五利将军（栾大）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此事在元鼎五年。第二年，“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这年春，公孙卿又上言，在东莱山见到神人，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三数日，无所见。”

及闻西域有良马，方士又妄言西域之马是神马，乘之可以代龙而升天成仙。《史记·大宛列传》云“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为天马。”西域马入汉，武帝初时仍信此等妄说。武帝作有《天马》诗二首，一为元狩三年（前120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其中有云：“今安匹兮龙为友。”二是太初四年（前101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其中有云：“天马徠，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徠，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11]都表达了乘之升天为仙的思想。然而天马既到，久之并不能升天，武帝之梦想终归于破灭。

到东汉时，月氏马也传入中国，班固曾请身在西域的弟弟班超为他买月氏马，在他给班超的信中写道：“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骚琵”[12]。据三国吴康泰《外国传》记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13]那时大月氏成为马的主要输出国。

这些良马输入内地以后，是否通过交配，促进了汉地马种的

改良，学术界看法不同。因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内地依然通过交换、进贡或掠夺从游牧近邻那里获得良马，却没有通过良种繁衍而得好马的记载。如前所述，至曹植的时代大宛马仍然来自西域而作为珍贵礼品赐赠。1981 年，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侧 1 号无名冢 1 号从葬坑出土一尊鎏金铜马。据研究，这尊铜马所表现的就是天马的体型，是旱热地区舍饲的乘型品种。在汉以前的造型艺术中，不见这种体型的马，而从汉迄唐约千年间，这类马的造型艺术品屡见不鲜。与现代良马相比，这尊铜马与中亚土库曼的阿哈一捷金马最为近似，它们可能属于同一血缘品种的马。乌孙马、大宛马和月氏马的输入中原，提高了汉朝农业的生产力和骑兵的战斗力。

西域良马输入汉地后，马形装饰图案和艺术品越来越多。《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条记载：“金马门，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马，以铜铸像，立于署门，因以为名。东方朔、主父偃、严安、徐乐，皆待诏金马门，即此。”此铜铸像大概与汉武帝茂陵东侧 1 号无名冢 1 号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制作技术相同。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44 年)，马援铸有马式铜鼓。乐浪发现汉代铜马和绿釉陶马。山东嘉祥武氏祠堂画像石刻有龙马之状，是乌孙、大宛马输入中原后龙的变形图案。

(二)狮子

师子即狮子，古代波斯语音译，产于非洲和西亚，汉时来自乌弋山离、大月氏、安息、疏勒。相传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记载，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氏国曾献猛兽一头，据其描写：“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黄”，当即狮子。《三辅黄

图》卷三记长安奇华宫附近的兽圈内养有“师子”。据记载，东汉时除了上述章帝章和二年(88 年)安息国献师子以外，后来安息、疏勒又献师子。《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十三年(101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郭璞《山海经注》释“灵兽”：“狮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犁牛及狮子。”师子的原词属于伊朗语族，一说原词是波斯语的 ser，一说是东伊朗语的 se/si。狮子的形象尤其为人喜爱，后来成了中国古典造型艺术的代表之一，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汉代狮子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文献中已经提到这一猛兽，但在先秦文献中不称狮子，而称狻猊。《汉书·西域传》“乌弋”条云乌弋有“师子”，颜师古注曰：“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穆天子传》卷一云：“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此书出自战国汲冢墓。说明战国时代中原人民已经知道狮子。颜师古提到的先秦文献《尔雅》对狮子作了这样的介绍：“狻猊如貍猫，食虎豹。”可见当时对狮子的特点已有了解。根据林梅村的研究，“狻猊”一词的词源应来自塞语，或称斯基泰语。这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使用的语言。先秦时期斯基泰人在东方的分布已达哈密盆地。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研究，于阗塞人称狮子为 sarau。该词的形容词形式作 sarvanai；抽象名词作 sarauna。所以林梅村认为汉语“狻猊”可能来自塞语表示狮子的词 sarvanai(形容词)或 sarauna(抽象名词)。

汉代以前，狮子的艺术形象就已经在中国境内发现，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墓地以及天山东部的塞人墓地相

继发现带有狮子图案的先秦文物。1983 年,在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发现的青铜器中,有一个高足承兽方盘,盘上的对兽表现的正是狮子形象。类似的方盘在中亚七河流域的塞人墓地也有发现。1976 年发掘的新疆阿拉沟战国墓地也发现了一件带有对狮的同类器物,与之共出的还有一件狮形金牌饰,长 20 厘米,其年代在距今 2345 至 2040 年之间。金牌狮体作昂首跳跃状,张口卷尾,振鬣奋足,造型极为生动。俄罗斯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发现的塞王墓中有许多狮子纹饰,其年代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其中同出的还有不少中国文物[14]。

西汉时狮子传入中国,汉语中便有了"师子"的新的称谓。狮子形象凶猛,传说可以辟邪,所以用石刻狮子镇门、镇墓。据说汉武帝上林苑中离宫的门前就已经有了石狮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狮子艺术形象,大约在东汉时已经定型;今存山东嘉祥的东汉武氏石阙前的一对石狮子,长约 4 尺 6 寸,两相对立,形态生动,已经中国化了。据石阙铭文可知造于桓帝建和元年(147 年)。四川芦山县出土东汉杨君墓石狮昂首挺胸,体态刚劲。四川省雅安县的东汉高颐墓前的石狮子,立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 年),雄壮威武,胸前刻有飞翼,具有古代波斯艺术风格,为希腊艺术而受波斯影响的结果。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收藏有汉代山东济宁晋阳山慈云寺画像石,有犬,敏捷强悍,有的却作狮子姿态。

据《汉书·艺文志》孟康注,狮子舞历史悠久,汉代即已流行。但汉代有无狮子舞,尚无其他材料说明,曹魏时确已有戏狮舞表演。北魏京都洛阳每逢佛祖生日,信众抬佛像游行,"辟邪

狮子导引于前”。据《宋书·宗慤传》记载，南朝刘宋时曾以士兵装扮成大狮子，吓退了林邑的象兵，取得战争的胜利。此后遇到战争胜利或有喜庆的事件，便舞狮子以庆贺。唐代《太平乐》即五方狮子舞。狮子舞成为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流传至今。狮子塑像和狮子舞又从中国东传。位于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岛，古称琉球，历史上与中国交往密切。无论在琉球王朝古都首里，还是普通百姓家门口，常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生动逼人的狮子塑像，与中国所见镇门的狮子相似。狮子舞是冲绳最有特色的舞蹈，据说是从中国福建传去的。

西域狮形饰品或其创意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一镏金铜饰物。这件被称为“二怪兽镂花铜饰物”，据考古工作者的描述：“二怪兽交股站立，兽形似狮而有如鹿之角及獠牙，耳上及足上皆戴圆环，上、下端有四蛇缠绕，蛇口咬住二兽的面颊”[15]。据童恩正细审原图，此二怪兽确实是从狮变化而来。13号墓的时代是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大致在公元前175年至前118年之间。童恩正认为，这种主题肯定不存在于古代黄河流域或云南的装饰文化中。但在古伊朗（Achaemenid Iran）带角的狮饰却非常普遍，例如在苏萨（Susa）宫殿发现的公元前五世纪铸在戒指上带角的狮形饰以及著名的上釉砖浮雕。这个图案两头狮子相背而立的构图，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早期Kushana石雕中可以见到。这件作品或许为当地滇人所制，但其构思可能来自印度[16]。

（三）犀牛

犀牛，产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汉朝犀牛来自乌弋山离、缅

甸、天竺。中国古代有犀牛,《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国语·楚语》记载白公子张讽谏楚灵王有云:"巴浦之犀、牦、兕、象,其可尽乎。"据有学者统计,《山海经》中有十一处提到"犀",并说其"状如牛而黑"。据沈竹等编《中国文物精华》,河北平山县发现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青铜犀牛[17]。

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把石犀牛用作镇妖辟邪的灵兽,战国后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作石犀牛五尊,以镇压水怪[18]。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文献似乎已经不太清楚犀牛为何物。《尔雅·释兽》说:"犀,似豕。"这个解释风马牛不相及,表明犀牛已经濒临绝迹。如果李冰的时代犀牛已在中国绝迹,他所作五尊石犀牛形象很可能来自西域,并可能通过中印缅道传入蜀地[19]。这个推测虽很有道理,却不能作为战国时中国犀牛已经绝迹的确论。《史记·货殖列传》讲到各地特产时,说"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又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说明司马迁时江南特别是广东沿海地区有犀牛。

但在汉代犀牛已经是珍稀动物,汉文帝时,南越王赵佗归汉,他上书朝廷称托汉使陆贾带回贡品中包括有犀角10枚[20]。1955年发掘南越国时期墓葬广州东山梅花村2号墓,出土了4枚陶制犀牛角模型。1960年在广州三元里马鹏岗1号墓发现15枚陶制犀牛角模型。同墓出土的木胎漆扁盒两面均以朱漆绘犀牛。这些考古资料被有的学者当作西域犀牛和犀牛角在汉初以前已经传至中国的例证,看来还有待探究。史料上不见中

原地区产犀牛，因此南方沿海地区将犀角作为特产进贡朝廷，西域沿海诸国遣使也将犀牛作为特产献给汉朝皇帝，因此西域犀牛通过海道输入汉代中国。1975 年西安市东郊白鹿原发现 20 座西汉帝陵从葬坑，其中第 20 号坑出土有犀牛骨骼。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鉴定，此从葬坑中之犀牛是生活在东南亚爪哇岛的独角犀。《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颜师古注云："犀状如水牛，头似猪而四足类象，黑色，一角当额前，鼻上又有小角。"同书《王莽传》载莽上太后《奏羌豪内附》书云："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汉书·班固传》颜师古注亦曾引此条记载。黄支国献生犀，当时被当作祥瑞，所以《汉书·王莽传》云："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后汉书》之《西南夷传》、《和帝纪》、《哀牢传》记载：和帝永元六年(94 年)，"敦忍乙王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

犀牛传入中国，便产生出犀牛造型的艺术品，1963 年，陕西兴平县曾发现一件错金银铜犀尊。有学者认为，犀牛的形象还演变为辟邪的灵兽形象[21]。

(四)象和象牙

大象原产南亚和非洲，在西域一些国家，象作为坐骑和战骑使用，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身毒国"人民乘象以战"。《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云："乘象而战。"又"东(《魏略》作'车')离国"条云："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

西域诸国以象进贡汉朝时，象牙是贵重物品，大象则供观赏。1983 年发掘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王文帝赵昧墓，其西耳室发现大象牙 5 枚，成堆叠置在一起。每支长度均

超过1.2米，最长的达1.26米，全属粗壮型，从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看，应为非洲象牙[22]。那时中国与非洲之间还没有直接的通航，这应该是通过印度洋航路辗转贩运至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属”。僬侥部族的献物是象牙、水牛和封牛。汉时罽宾、缅甸皆曾贡献大象。上引《后汉书》之《西南夷传》、《和帝纪》、《哀牢传》记载，和帝时，敦忍乙王延慕义遣使译，除献犀牛外，还献大象。

大象通过朝贡进入汉代都城，成为人们观赏的动物，东汉张衡《西京赋》写人们的娱乐活动，有大象游戏，“白象行孕，垂鼻辚菌”[23]。

（五）符拔

符拔，又叫扶拔、桃拔，来自安息、月氏和乌弋山离。《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国“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引曹魏孟康之说：“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东汉章和元年（87年），月氏国献扶拔。第二年，安息国献师子、扶拔。符拔来自中亚希腊化古国，据法国汉学家沙畹研究，符拔一词译自古希腊文boubalis，认为是羚羊之类，即叉角羚。叉角羚和我们熟悉的蒙古草原上的羚羊不同。叉角羚分布于非洲和欧亚大陆，非洲巨大的角斑羚肩高1.75米。雄性叉角羚都长有独特的向后弯曲的角，雌性叉角羚大部分无角。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考证，孟康认为符拔有角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既然符拔是叉角羚，而叉角羚雌性大部分无角和雄性

有角，那么也不能说《后汉书·西域传》中的说法完全是错的，只是当时人们见到的符拔数量不多又不相同罢了。孙机还指出汉代铜镜有的铸有带角的灵兽，并有题铭称其为“天禄”，，据汉镜题铭，双角者为天禄，独角者为辟邪。因此有学者认为汉代灵兽天禄的原型即汉代被称为“符拔”的义角羚。而独角兽辟邪则来自另一种西域动物[24]。

（六）安息雀

安息雀，是产于条支来自安息的大鸟，《汉书·班固传》颜注：“条支国临西海，有大鸟，卵如瓮。条支与安息接，武帝时安息国发使来献之”。郭义恭《广志》记载：“鹰身，蹄骆，色苍，举头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卵大如瓮”。似为驼鸟。班超的妹妹班昭曾作《大雀赋》，其序云：“大家（即班昭，班昭嫁曹氏，称曹大家，家音姑）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班超进献朝廷的大雀来自西域无疑，或许就是这种安息雀。故赋中说：“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凰之匹俦。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当时是把西域大雀之类的珍禽异兽的输入，视为汉朝天子有德有义，“自东西而南北，咸思服而来同”的太平盛世的表现[25]。

（七）其它珍禽奇兽

西域传入的珍禽异兽品类极多。

封牛，一种高背的大牛，是产于缅甸、罽宾的一种野牛，因背部隆起，故称瘤牛、双峰黄牛。《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都记载，罽宾国出“封牛。”颜师古注云：“封牛，项上隆起

者也。”据《后汉书》记载，安帝永初元年（107），僬侥部族“献象牙、水牛、封牛”。

孔爵，即孔雀，产于条支、罽宾。《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出“孔爵”；同书《两粤传》记载，南越王赵佗献文帝孔雀二只。《通典》卷一九二“条支”条云：“出封牛、孔雀。”汉之甘泉宫养有孔雀，刘歆《甘泉宫赋》云：“翡翠孔雀，飞而翱翔。”[26]西汉时孔雀已经作为宠物进入贵族之家，《西京杂记》卷二记载：“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鸧鹒，俸谷一年费二千石。”东汉末曹操养有孔雀，曹植作《孔雀赋》，并请杨修同赋。曹植的作品已佚，杨修《孔雀赋》序云：“魏王园中有孔雀，久在池沼，与众鸟同列。其初至也，甚见奇伟，而今行者莫视。临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兴志而作赋，并见命及，遂作赋。”赋又云：“有南夏之孔雀”[27]，说明来自南方。

大狗，原产罽宾。《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有大狗，颜师古注引郭义恭《广志》云：“罽宾大狗大如驴，赤色，数里摇鞞以呼之。”

沐猴，《汉书·西域传》云罽宾出沐猴，颜师古注云：“即猕猴也，”汉时已有“沐猴而冠”的成语，沿用至今。《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汉书·伍被传》：“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猕猴戴帽子，比喻虚有仪表。

鸧鹒，《拾遗记》卷六“后汉”条记载：“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来贡异瑞，有鸟名鸧鹒，形高七尺，解人语。其国太平，则鸧鹒群翔。昔汉武时，四夷宾服，有献驯鹊，若有喜乐事，则鼓翼翔

鸣。按庄周云：'雕陵之鹊'，盖其类也。"

长颈鹿，徐州贾旺发现的东汉画像石中的麒麟，刻划成长颈鹿的形象，具有写实的倾向，与中国传统的麒麟形象不同。长颈鹿仅产于东非（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一带），因此有学者据此认为长颈鹿在东汉时已传入中国，应当是经西亚和中亚各国传入中国[28]。

白雉，来自南方沿海诸国。《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上太后《奏羌豪内附》书云："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元和二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蛮夷别号也）邑豪献生犀、白雉。"

黑鹰，《艺文类聚》卷九十二引《异类传》云："汉武帝时，西域献黑鹰，得鹏雏。东方朔识之。"

独峰驼，即背上只有一峰的骆驼，汉代文献称为"一封橐驼"。《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出一封橐驼"。颜师古注云："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为封牛。封音峰。"

长鸣鸡、司晨鸡出交趾等地，《西汉杂记》卷四记载："成帝时，交趾、越隽献长鸣鸡、司晨鸡。即下漏验之，昏刻无差。长鸣鸡则一食顷不绝。"

传说中西域进贡之奇禽异兽还有"花蹄牛"、"双头鸡"之类，有的过于荒诞，不足信据。这些珍禽异兽传入以后，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和宗教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们形象的新

奇和怪异，人们常常把它们和神话传说中的某种灵怪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吉祥或者凶险的象征，而且还常常被用作各种装饰题材，如汉代毛毯的图案多有这种动物形象。又常常摹其形状制作出各种工艺品，《三辅黄图》卷四引《汉书》云：在汉太液池，“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

三 其它物产

（一）香料

香料是具有挥发性并能用以配制某种香水香膏的芳香物质，可分为天然香料和人造香料两大类，天然香料通常为含有多种芳香成分的混合物，又可分为动物性香料和植物性香料两类。前者得自某些动物的生殖腺分泌物或病态分泌物，种类很少，常见的如麝香、灵猫香、海狸香、龙涎香等；后者种类繁多，是从芳香植物的花、叶、果实、种子、根、茎、树皮等部分或分泌物加工而得。

中国原本没有燃香的习俗，香料的产地多在海外，这些香料大都制成香脂、香膏远销各地。香料传入中国的早期，属于高级消费品，用途很广，一是充作统治者奢侈生活中的装饰和薰香料；二是供医疗之用。1983 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已有香料，在南越王赵昧墓西耳室的一个漆盒内发现许多乳香，呈树脂状，重 26 克。乳香主要产于红海沿岸，据说真正生产乳香的地区是南阿拉伯的哈德拉茂，可能是经罗马商人传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有人统计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物中，发现熏香

炉多达200余件，南越王墓中有一件四连体铜熏炉，高14.7厘米，器表作几何形镂空。炉盖和炉身分别铸出，再把四个炉身与方座合铸而成。1955年在广州华侨新村出土的釉陶熏炉，通高16.5厘米，腹径11厘米，盖面隆起，作几何图形镂空，顶有鸟形立钮，器身如豆，饰刻划纹，器表饰有黑釉。熏香炉式样有南北之分，北方中原流行博山式熏炉。汉代刘向《熏炉铭》描写过这种器具："嘉此正器，堑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麝，朱火青烟。蔚术四塞，上连青天。"[29]李尤也作有《熏炉铭》云："上似蓬莱，吐气委迤，化白为烟。"[30]然而南越盖豆式熏炉在先，北方中原博山式熏炉在后，说明香料由海外输入路线是先至番禺，后转运至中原。

古代传说中有西域香料传入汉代中国的记载。相传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记载："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据说"灵香虽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灾死者，将能起之，及闻香气即活也"。又云：西海中有聚窟洲，"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类"。洲上有大山名神鸟山，上多大树，与枫木相类。"而花叶香闻数百里，名为返魂树。……伐其木根心，于玉釜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饧状，令可丸之，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震灵丸，或名之为反生香，或名之为震檀香，或名之为人鸟精，或名之为却死香。一种六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者在地，闻香气乃却活，不复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验"。其中所述虽不免有夸张成分，但故事的产生当以西域传入香料的史实为根据。作为香料，从植物中提取也符合自

然事实。

张华《博物志·异产》记载:"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干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当为'瘥')。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犹不歇。帝乃厚发遣饯送。一说汉制献香不满斤。西使临去,乃发香气,如大豆者拭著宫门,香气闻长安数十里,经数日乃歇。"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云:"《博物志》此节记事,与上方所录《十洲记》聚窟洲之却死香,大同小异。聚窟洲与凤麟洲皆在西海之中,凤麟洲四面有弱水绕之。凤麟洲既已承认为指欧洲地域而言,则《博物志》此节之弱水西国,亦必指欧洲而言也。"

梁代任昉《述异记》卷上记载:"辟寒香,丹丹国所出,汉武时入贡。每至大寒,于室焚之,暖气翕然。自外而人,人皆减衣。"据《隋书·南蛮传》云:"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而"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婆利国。学者们都认为赤土在现在的马来半岛,丹丹当远于赤土。

用香是上层贵族生活奢侈的表现。《拾遗记》卷六记载,东汉灵帝在西园建裸游馆,盛夏灵帝与宫人游此,"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而汉末曹操提倡节俭,其《内诫令》云:"昔天下初定,吾便

禁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因此得烧香。吾不烧香，恨不遂初禁。令复禁不得烧香，其所藏衣，香著身亦不得。"[31]他还曾作为礼品赠蜀相诸葛亮，《与诸葛亮书》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32]因为香是名贵之物，得之不易，曹操临死《遗令》特别嘱咐："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33]

但汉代传入中国的香料有哪些种，却缺乏具体材料加以说明。所以有学者认为，三国以后，中国自西南海上诸国运入者，以香料为大宗，而汉代未之见。因为香料与佛教有极深之关系，佛教传入前，中国对香料之需要不太大。历史上传入中国的香料品种很多，但大多见于后世的记载。《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引三国时人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云其物产有"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当为'迭'）、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参据后世史料，西域输入中国的香料主要有阿拉伯沿岸的乳香，东非的紫檀、索马里的没药、芦荟、苏合香，西亚安息香，北非、大秦的迷迭香等。这些香料有的大概在汉代已有传入，说汉代未之见不免过于绝对。有人说《史记》和《汉书》提到一种来自海外叫"果布"的物品，在番禺集散。有学者以为当即"果布婆律"，是马来语龙脑香（kapar barus）的音译。此论未必确当。果与布当指南方沿海地区两种特产。《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史记集解》引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荔枝）之属。布，葛布。"龙脑香是由龙脑树树干析出的白色晶体，具有类似樟脑的香气。龙脑树原产于苏门答腊、加里曼丹、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等地，树干经蒸馏可得结晶，为一种香料，即龙脑，

或称冰片，中医学上用为芳香开窍药。

迷迭香，《广志》云："迷迭出西域。"曹丕《迷迭赋序》曰："余种迷迭于庭之中，嘉其扬条吐香，馥有令芳，乃为之赋"，赋中有云："越万里而来征"[34]。王粲《迷迭赋》云："惟遐方之珍草兮，产昆仑之极幽。受中和之正气兮，承阴阳之灵休。扬丰馨于西裔兮，布和种于中州。去原野之侧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蓼蓼之茂叶兮，挺苒苒之柔茎。色光润而采发兮，以孔翠之扬精。"[35]都强调其来自远方。曹植、陈琳、应瑒等皆有同题之作。

乳香一名薰陆香，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四引宗奭曰："薰陆即乳香，为其垂滴如乳头也"。有两种，一种为橄榄科，小乔木，主产于红海沿岸，即阿拉伯语中的 luban，茎皮渗出的树脂凝固后就是乳香。古代主要出自大秦，印度、波斯也有出产。另一种为漆树科，小乔木，产于欧洲南部，茎皮流出的树脂可入药，亦可作香料。据《本草纲目》所引诸书，《南方异物志》云："薰陆出大秦国，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胶流出沙上，状如桃胶。夷人采取卖与商贾，无贾则自食之"。李珣《海药本草》据《广志》云："薰陆香是树皮鳞甲，采之复生。乳头香生南海，是波斯生树脂也。"宗奭《本草衍义》云："薰陆，木叶类棠梨，南印度界阿吒厘国出之，谓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即乳香也"。乳香是应用极广的香料，可以用来薰香、照明、调料，还可以用作活血定痛药。中国医家使用乳香最早见于南朝梁代陶弘景《名医别录》，以为有"疗主风水毒肿，去恶气，……疗风癞疹痒毒"之功效。

苏合香也是用途很广的香料，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四

引郭义恭《广志》云："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梵书谓之咄鲁瑟剑。"苏合是希腊语 sturaz 的音译，苏合香油即 storax 油，是古代从金缕梅科野茉莉属落叶乔木脂液中提炼的（一说从高阿打枫树枝干上流出的树胶中提取的），前引班固《与弟超书》，说宴侍中要用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交换西域特产，其中便有苏合香。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中有《异产》一节，记叙了西国使节向汉武帝献过三枚如枣的香丸，武帝起初不曾重视。后来西使归国，香丸忽发香气，经久不息。论者认为这条记载颇似史书记载的苏合香。西晋傅玄《郁金赋》有"凌苏合之殊珍"之句。《梁书·中天竺传》以为"大秦珍物"，说中天竺"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所以国中"多大秦珍物"，其中包括苏合。关于苏合香之制作，作者说："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又说大秦人采集苏合时，已经先榨取其汁水制作香膏，而售予诸国商人的都是渣滓，所以不太香。《本草纲目》引陶弘景《名医别录》云："苏合香俗传是狮子屎，外国说不尔。今皆从西域来，亦不复人药，惟供合好香尔。"唐人苏恭《唐本草》注云："此是胡人诳言，陶不悟也"。宋陈藏器《本草拾遗》云："苏合香色黄白，狮子屎色赤黑，二物相似而不同。狮子屎极臭。或云：狮子屎是西国草木皮汁所为，胡人将来，欲贵重之，故饰其名尔。"苏合香对醒脑开窍有奇效，又能清热止痛，作外敷药。宋人赵汝适《诸番志》云"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还可以充当上等的防腐剂。汉代对苏合香已有较多的了解，并应用于宫廷。《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中有"会合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的记载。

没药一名末药，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四云："没、末皆梵言"。近人以为是阿拉伯语 murr 的音译。没药香气浓郁，有活血散瘀消肿止疼之功效。最早提及此药的是徐表于五世纪时所著之《南洲记》，书已佚。唐人李珣《海药本草》引此书云："是波斯松脂也。状如神香，赤黑色"。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云："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萦。长在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没药用于入药，《本草纲目》引《开宝本草》马志注以为"没药生波斯国，其块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又引苏颂《图经本草》言其当从海路输入，说没药"今海南诸国及广州或有之，木之根株皆如橄榄，叶青而密。岁久者则有脂液流滴在地下，凝结成块，或大或小，亦类安息香，采无时"。赵汝适《诸番志》说它产于"大食麻罗拔国"，即今阿曼佐法尔省首府萨拉莱以东数十公里处之 Mirbat。"高大如中国之松，皮厚一二寸"。李时珍引《一统志》言其采集方法云："没药树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采时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指（脂）流于坎，旬余方取之"。又说："李珣言乳香是波斯松脂，此又言没药亦波斯松脂，盖出传闻之误尔。所谓神香者，不知何物也。"

安息香得名有两说，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四云："此香辟恶，安息诸邪，故名。或云：安息，国名也。梵书谓之拙贝罗香。"又引苏恭《唐本草》注云："安息香出西戎，状如松脂，黄黑色，为块。新者亦柔韧。"安息香是从安息香树切口处流出的树脂凝固而成，中国原从波斯商贾手中购买此香，后来改从东南亚购进，所以李珣《海药本草》说它生于"南海波斯国"，赵汝适《诸

番志》则说“出三佛齐国”。安息香是中国传统的海外进口产品。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云：“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岁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芯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

郁金香，许慎《说文》释“郁”曰：“芳草也”，“远方郁人所贡芳草，合酿之以降神。郁，今郁林郡也。”《艺文类聚》卷八十一以为“郁草”即郁金香，并引有汉朱公叔《郁金赋》。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云：“（陈）藏器曰：‘郁金香生大秦国，二月、三月有花，状如红蓝；四月、五月采花，即香也。’时珍曰：按郑玄云：‘郁草似兰。’杨孚《南州异物志》云：‘郁金出罽宾，国人种之，先以供佛，数日萎，然后取之。色正黄，与芙蓉花裹嫩莲者相似，可以香酒。又《唐书》云：太宗时，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似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花而不实，欲种者取根。二说皆同，但花色不同，种或不一也。古乐府云：‘中有郁金苏合香’者，是此郁金也。晋左贵嫔有《郁金颂》云：‘伊有奇草，名曰郁金。越自殊域，厥珍来寻。芳香酷烈，悦目怡心。明德惟馨，淑人是钦。’”

芦荟主产于热带非洲，来自波斯，由叶汁浓缩干燥后所成的块状物，中药学上入药，功能泻下，清热，杀虫。主治小儿疳积，热结便秘等症。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四引李珣《海药本草》云：“卢会生波斯国，状似黑肠，乃树脂也。”又引宋苏颂《图经本草》曰：“今惟广州有来者”。说明自海道传入。

胡椒南自南亚，除了用作食物的调料之外，也取其香气，用

作香料。《三辅黄图·未央宫》引《西京杂记》云:温室殿"温室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用椒涂壁,取其温暖而有香气。因此当时又称后宫为椒房。

(二)毛皮与毛制品

毛皮主要来自途经中亚北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北道,这一带的康国、奄蔡、严国(卡马河)出产兽毛、兽皮。《后汉书·西域传》云:"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称此道为"毛皮路"。当时在新疆地区,北道输入毛皮,南道输出丝绸。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的貂皮都集中在严国,这里成了毛皮的集散地。此外还有里海附近出产的白狐青翰,也大量输入中国,汉代通邑大都商肆出售有"榻布皮革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商人因此致富,《史记·货殖列传》说拥有如此资产者其人可比"千乘之家"。西域有以皮裘进献汉宫者,《西京杂记》卷一记载:"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

毛制品最著名的是罽、氈、毾㲪、氍毹。罽,是有花纹的毛布。许慎《说文解字》云:"西胡毳布"。郭璞注《诗经》则说是羊毛织成的衣料。据《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八年(前199年),刘邦曾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绨纻罽",说明汉初以前,这种毛织品已传入中国。氈是有斜纹组织的毛布,后世有斜褐之称。服虔《通俗文》云:"织文曰罽,斜交曰氈。"毾㲪是 tap-tan 的音译,源出中古波斯语 takht – Dar,意思是榻上的毛垫,就是毛毯、毛毡。刘熙《释名》云:"榻登,施大床之前,小床之上,所以榻登也。"氍毹是毛织的地毯。这些都是草原游牧民族的

特产，主要是羊毛织品。

匈奴、乌孙、罽宾、月氏、印度、安息、罗马都盛产毛织物。《太平御览》卷七〇八引东汉初边笃《边论》云："匈奴请降，毾㲪、罽褥、帐幔、毡裘，积如丘山。"此指西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之降，说明各种毛织品西汉时已传入中国。同书同卷又引马援《奏文》云："马贤于军中，帐内施毾㲪，士卒飘于风雪。"罽宾的氍毹非常著名，《广韵·十虞》"氍"下引应劭《风俗通义》云："织毛褥谓之氍毹"。《三辅黄图·未央宫》引《西京杂记》云，温室殿"规地以罽宾氍毹"。罽宾以产毛织品著名，约在西汉时，首都长安已见使用罽宾氍毹。古乐府《陇西行》："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通邑大都，市场上更有毛织品出售，《史记·货殖列传》说有经商者"旃席千具"，其人富比"千乘之家"。所谓旃席即毛织地毯。东汉时人们更千方百计设法得到西域出产的毛织品，《北堂书钞》卷一三四引班固给班超的信中曾提到"月氏毾㲪，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月氏毾㲪就是罽宾氍毹。大秦所出"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36]。《后汉书·西域传》云，天竺国"又有细布、好毾㲪"。汉代人还掌握了毛制品的保养方法，崔寔《四民月令》云："芒种节后，阳气始亏。……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

汉代这些毛织物从南、北两路传入中国。二十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南部的古尼雅遗址和楼兰遗址发现具有典型的希腊、罗马图案的毛毯，还有混合中国与西方美术风格的毛织物残片。新疆地区的人民还学习西域毛织技术，提高了纺织水平。他们织出了辫扣织金银毯、栽绒毯和用丝、毛、棉三种原料混纺织成

的各种毯子。尼雅遗址出土的木简上记有“和阗毯子”。据说这种毯子就是栽绒毯,当地至今流传着洛甫县人那克西万试织地毯和羊毛染色的传说,被尊为地毯之神。迄今以组织细密、起绒短、经久耐用而又富有装饰色彩而名闻世界的和阗地毯,就是在早先创制的栽绒毯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大月氏、安息和罗马等地毛织技术而不断改进的优质毛织品。

1959 年,在新疆民丰大沙漠东汉墓出土不少毛毯毡片,其织造技法已与现在完全相同。而在同期居址的遗迹中发现的织花毛织物,则使用了在纬线上起花的织造技术,与中原地区在经线上起花的丝织技法不同。这几件毛织物的纹饰,有卷发高鼻的人物和写实的葡萄形象,有的是中原传统的龟甲四瓣花纹图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新疆洛普县东南于阗墓地发现一批西域技法织成的缀织物,其中有一件织有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马神怪。据报道,这种织物在巴比伦附近阿尔塔尔遗址亦有发现。从艺术风格和纺织技法看,于阗和巴比伦出土的这种织物,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罗马产品[37]。这些毛织物可能有的是从中原或西方各国传入,有的可能出于当地工匠之手,但已经采用了中亚和西亚的织染技术和装饰风格。

1997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尉犁县孔雀河北岸营盘古城附近发现古墨山国贵族墓地,随葬品中有中亚艺术风格的皮革面具、黄金冠饰,还有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金缕罽、波斯或罗马玻璃器以及黄铜戒指、黄铜手镯等鎏石工艺器。营盘墓地第 15 号墓墓主身着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罽袍,头戴黄金装饰的面具。墓中随葬大量的织金罽和织金锦。这种织金罽十分

罕见，过去只见于文献，即便在罗马帝国本土，亦未曾发现过实物。织金线是罗马人的独特的创造，《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国“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缕”。墨山国墓葬中之织金罽来自罗马无疑[38]。

（三）胡床

胡床，亦称“交床”、“交椅”、“绳床”，据《贞观政要》卷六，隋炀帝改名为“交床”。其书引唐太宗批评隋炀帝的话，说他“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这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俗称“马扎子”。《太平御览》卷七〇六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云：“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京师则竞为之”。据《晋书·五行志上》，西晋武帝泰始（265－274年）以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富人贵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世说新语·自新》记载：“（戴）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四：“今之交床，制本自虏来，始名胡床，桓伊下马据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讳有胡，改名交床”。

关于胡床的形制，陶穀《清异录·陈设门》记云：“胡床施转关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这是西北游牧民族为了乘马时携带方便，制造出来的，很为内地人所欣赏，推广开来，至今流传不衰。

胡床的传入对中原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有重大影响。在它传入之前，中国人坐具或为坐卧一体的“床”，汉末《孔雀东南飞》中有“槌床便大怒”的诗句；或为专作坐具的“榻”，王勃《滕王阁序》用汉代典故云：“徐孺下陈蕃之榻。”其坐姿虽有垂脚而

坐的，但一般都是席地而坐，称为启、居（踞、踞），即跪坐（危坐）与安坐（凭几而坐），两者都是两膝着地（席），坐时臀部落在反铺的脚跟上，跪时则将腰伸直，体位升高，而膝着席。《诗经·采薇》："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唐代李商隐咏史诗《贾生》写汉文帝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胡床传入并推广之后，中国人的坐姿便逐渐发生了变化。胡床轻便灵活，垂坐舒适。根据上引《风俗通义》的记载，胡床在汉代已经传入中原，它先是在东汉都城洛阳流行开来，东汉灵帝喜欢胡床，京师皆竞为之。随后很快便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至西晋时，已经"中国相尚用胡床"。这种垂脚而坐的方式发展下去，坐具不断改进的结果，便是唐宋以后出现的坐椅。

（四）玻璃器

玻璃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写作琉璃、瑠璃、璧琉璃、璧流离、颇离、陆璃等，隋唐以后称玻璃。玻璃制品是罗马出口最多的商品。罗马帝国控制下的地中海地区是古代玻璃制造业中心，它们生产的玻璃因钠、钙含量高而称钠钙玻璃。据老普林尼《自然史》记载，埃及亚历山大城所制琉璃，品种很多，有半透明之红白色者，有色似萤石青玉或凤信子者，有用黑色玻璃制成之杯盘。罗马玻璃种类更多，透明者有蓝、绿、黄、紫、棕、红赭色，不透明者有白、黑、红、蓝、黄、绿、橙黄诸色。其中似石英之纯白琉璃为最贵重。

中国自战国时代起也生产玻璃，因铅、钡含量高而被称为铅钡玻璃。古代还有一种钾玻璃，可能产生于东南亚地区。中国玻璃不及罗马玻璃性能好，因此罗马玻璃成为受中国人欢迎的

一种外来品，但因为玻璃制品是经过辗转传递到达中国的，汉代中国人常以这些制品系于所传自国家和地区，经海路传入者常系于印度、斯里兰卡、日南等，《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引《广志》云："琉璃出黄支、斯调、大秦、日南诸国。"而经陆路传入者则系于西亚、中亚诸国。《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汉使经海路至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购得"璧琉璃"。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武帝时身毒国进贈白光玻璃鞍，在暗室中能光照十多丈。玉晶盘是埃及制造的白玻璃盘，《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条记载，武帝宠臣董偃"以紫琉璃为帐"，"以玉晶为盘"。盘乃武帝所赐，武帝把千涂国（健陀罗）的礼品玉晶盘赐给董偃，"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相洁"。玉晶盘如此晶莹透明，"侍者谓冰无盘必融湿席，乃拂玉盘坠，冰玉俱碎"。《拾遗记》卷五亦记此事。埃及十色琉璃、印度琉璃马鞍、罽宾璧流离传入中国，在汉代文献中皆见于记载。《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出"璧琉璃"。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流离青色如玉。"又引《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他说唐代琉璃"今俗所用，皆销冶（'冶'字之误）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

汉代输入中国的玻璃器还有碗、耳环。1954 年，广州市横枝岗出土了 3 件形制相同的西汉中期玻璃碗。碗呈紫蓝色，半透明，平底，模制成形，内壁光滑，外壁及口沿打磨成毛玻璃状。据同位素 X 射线萤光分析，属钠钙玻璃系统。从化学成分和制作工艺分析，都与地中海南岸罗马玻璃中心公元前一世纪的产

品相似，当为其地产品，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罗马玻璃器。洛阳西30里汉墓中曾出土玻璃耳环，现存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据分析，与同时期地中海附近发现的玻璃，制法相同。公元前后，罗马发明了吹制玻璃技术。1987年，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一件非常完整的黄绿色长颈玻璃瓶，自口沿至平底通体旋绕白色条纹，色调鲜明，造型优雅，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80年在江苏邗江甘泉2号东汉墓出土的紫、白两色相间的搅胎玻璃器残片，复原后乃带竖棱纹的平底钵，乃采用模压成形技术。据安家瑶研究，这种玻璃器以前在英国一世纪遗址中发现过，与此相似的一件器皿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和贵县东汉墓多次发现的蓝色玻璃碗和托盏，其化学成分与罗马玻璃相同，可能也是罗马产品[39]。东汉末年秦嘉妻《又报秦嘉书》讲到，她托人赠送秦嘉的物品有"玻璃碗一枚，可以服药酒"。山东嘉祥武梁祠的汉画像石刻中有璧琉璃，并有题词："璧琉璃，王者不隐过乃至"。

有学者认为，璧琉璃，《后汉书·南蛮传》"哀牢"条作"瑠璃"，为梵文Vaidurya的音译。阿拉伯语、波斯语作billaur，拉丁语作beryllos，希腊字不便印刷，英语作Beryl（绿玉、绿宝石），从语源上说都出于梵文。此本汉时宝石名，与玻璃不同。清代学者徐松《西域传补注》云："璧流离，梵书作吠瑠璃。《一切经音义》：旧言鞞稠利夜，亦言鞞头梨，或云毗瑠璃，亦作鞞瑠璃，皆梵音讹转。从山为名，鞞头梨山出此宝，青色，一切宝皆不可坏，亦非烟焰所能熔铸。……《说文》云：'瑠璃，瑠石之有光者也。'段（玉裁）氏谓璧瑠离即此传之璧流璃。汉武梁祠堂画及吴国

山碑，皆有璧流离。今本《汉书》注脱'璧'字，读者误以璧与流离为二物矣。璧与吠音相近。"

广西合浦西汉墓及贵县东汉墓出土的玻璃器中，有的属钾硅玻璃，与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和西方的纳钙玻璃都不同。从器形上看，有的像贵县南斗村8号东汉墓出土的带托盘的高足杯是我国当时少见的器形，有的则是腰鼓形耳珰之类中国固有的器形。广州汉墓中出土的4枚玻璃珠，经鉴定亦属钾硅玻璃。这批玻璃器是外来的还是当地自制的，其中的耳珰是不是用外来的玻璃料加工而成，学者们尚难定夺[40]。因为东南亚地区有此种玻璃器制造，学者们认为可能是东南亚地区出产的钾玻璃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发现。

（五）金银器

西方金银器至迟在西汉初就传入我国。古代中国本不以金银为容器，后来达官贵人以金银为器受中亚、西亚或西方文化影响，那里的草原游牧民族早就掌握了金银器制作工艺并进行技术交流。从域外输入者有从陆路来者，也有从海路来者。1983年，发掘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陵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小件饰品，也有容器，被考古学者断定为海路舶来之物[41]。其中有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的金粟粒，与江苏东汉邗江甘泉广陵王墓、广州郊区4013号墓、长沙五里牌9号墓等处出土的多面金珠的制法基本相同，采用的都是一种焊珠工艺。马贡（H. Margon）在《古代世界的金属工艺》（Metal Working in the Ancient World）中指出，此种工艺在两河流域乌尔第一王朝（前4千纪）已经出现，流行于古埃及、克里特、波斯等地，亚历山大

东征后传至印度。中国至迟在公元前一世纪末，也掌握了这一工艺。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约前54年）出土的镶有琉璃面的马蹄金和麟趾金，器壁上部已焊有用金粟粒组成的连珠纹带[42]。南越王墓比八角廊墓早半个世纪，那时还有迹象证明国内已能生产此类器物，所以南越王墓之金花泡饰应是来自西方的工艺。

西域以捶揲工艺制作的金银器很早就受到中国人的喜爱，成为王公贵族和富豪巨室之家收藏的珍品。1978年，在山东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1号陪葬坑中出土了一件银盒。有人认为这种银盒是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和安息王朝金银器中常见器物；也有学者以为这种银盒可能是罗马人使用的容器，类似的器物屡见于巴尔干半岛古代遗址[43]。据发掘者推测，临淄西汉齐王墓墓主当为刘襄，陪葬坑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79年左右。1983年，南越王赵昧墓出土一件与临淄西汉齐王墓出土同类型的带盖的扁球形波斯银盒，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272.6克，盖与器身吻合。盖与器身均施有用锤揲法打压出的突蒜瓣形主纹带，这是典型的波斯纹式。盖沿和器沿饰有一条穗状窄纹带，表面鎏金极薄。上有汉字铭文，是携入中国后镌刻上去的。出土时盒内藏有药丸，说明这是赵昧生前盛药的器皿。伊朗苏撒城（Susa）曾出土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一件银盒，公元前五世纪制作，上刻波斯王薛西斯（Xerxes）名字，与赵昧银盒类似。因此人们推测，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可能是古波斯时代的器物，至迟在汉初，它已经辗转传递到中国南方沿海。但也有学者认为此乃罗马银盒。

广州汉墓还出土有多面金珠。所谓多面金珠是将小金环组焊成多面体，再在各环交接处用金粟粒堆焊成尖角。同类的器物在越南南部的奥高遗址和巴基斯坦的怛叉始罗遗址中都发现过，因此学者认为广州汉墓所出者应来自南亚。来自域外的此类金珠皆为十二面体，外国学者甚至将它定名为“十二面珠”（dodecahedron），而在邗江广陵王墓出土的金珠却以14枚金环焊成，西方未见其例。考虑到我国古代有一种多面体状的博茕，而1976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中发现的博茕正是十四面体。又有学者认为，我国出土的多面金珠有的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

汉末曹操《上杂物疏》中提到不少金银器具，“御物三十种，有纯银参镂带漆画书案一枚、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一枚”。“御物三十种，有纯金香炉一枚，下盘自幅；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御杂物用，有纯金唾壶一枚，……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御物有纯银参镂带漆画案一枚”。“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御物中宫贵人、公主、皇子纯银漆带镜一枚，西园贵人纯银参带五，皇子银匣一，皇子杂用物十六种，纯金参带方严四具”。“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枚，又纯银七，贵人公主银镜台四”。“纯银澡豆奁，纯银括镂奁”。“银镂漆匣四枚”。“纯金参带画方严器一”。“银画象牙盘五具”[44]。这些金银器具有的是曹操得帝、后所赐，有的可能是从别处获赠物品，现在又进奉皇室。根据考古学者研究，汉以前我国上层社会很少使用金银容器，至

南北朝时受了西方的影响，使用这类器物才渐成风尚。曹操所提到的这批金银器，很可能来自域外。

（六）火浣布

火浣布即石棉布，产于西域，汉时传入中国。《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傅子》记载："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为单衣，常大会宾客。冀阳（佯）争酒，失杯而污之。伪怒，解衣曰：'烧之。'布得火，炜晔赫然，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灿然洁白，若用灰水焉。"经火后如用灰水洗后那样洁净。后来由于汉地久不见此种物品，故曹丕在《典论》中曾否认有这种布，他说："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火尚能烁石销金，何为不烧其布？"曹植《辨道论》曾提到术士左慈曾向他说："诸梁时（指东汉梁冀等当政时），西域胡来献香爵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45]

曹丕少见多怪，受到后人的讥笑。葛洪《抱朴子·论仙》云："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其间未期，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遽毁斯论。"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三云："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然遽毁斯论者不是曹丕，而是齐王曹芳。据《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僚"。裴松之注云："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

下笑之。”此言不仅笑曹丕妄作结论，亦笑明帝断《典论》为不刊之论。

但火浣布是怎样制作的，中国人一直不得其解。南朝刘宋时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异物志》云：“斯调国在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污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斯调国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又引《搜神记》云：“昆仑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而引相传为东方朔所作之《神异经》又云：“南荒之外有火山，长三十里，广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烧，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绩其毛，织以为布。”梁时任昉《述异记》卷上还说：“南方有灾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灭。火灭之后，草木皆生枝条。至火生，草木叶落，如中国寒时也。取此木以为薪，燃之不尽，以其皮绩之，为火浣布。”

由于不能科学解释火浣布的来历，便视之为神奇之物。干宝《搜神记》卷十记载：“吴选曹令史刘卓病笃，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言曰：‘汝著衫污，火烧便洁也。’卓觉，果有衫在侧，污辄火浣之。”火浣布成了梦中奇物，神仙相赠，而这一梦境又被当做神奇之事收入于宝搜奇记异的书中。

（七）马具

与马的输入有关，是马具的输入。汉代文献记载外来的马

具，皆为极珍贵物品，非一般乘骑所用。如《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武帝时，身毒国曾献一套马具，有连环羁、玛瑙石勒和白光琉璃鞍。影响所及，造成长安贵族盛饰鞍马之风，“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值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华，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镊，饰以流苏，走则如撞钟磬，若飞幡葆。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鎗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熊罴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东汉末年曹植还有银鞍一具，其《上银鞍表》云：“于先武皇帝世，赦此银鞍一具，初不敢乘，谨奉上。”[46]

波斯锁子甲（又称环锁铠）汉末时传入中国内地。波斯很早就已使用盔甲和马具装，公元前480年，波斯皇帝泽尔士的军队已装备了铁甲片编成的鱼鳞甲。中国汉代以前也有甲衣，但不是金属制品，而是皮革制成的。秦兵马俑身上的甲衣只在前后胸要害处缀有金属片。在幼发拉底河畔杜拉·欧罗波发现的安息艺术中，有头戴兜鍪身披锁子甲的骑士，战马也披有鳞形马铠。这些马具装和锁子甲至东汉末年经过中亚传入中国内地。曹操《军策令》中提到：“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47]曹植《上先帝赐铠表》云：“先帝锡臣铠，黑光、明光各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48]据《唐六典》，明光铠即铁铠，这样的马铠和环锁铠都是从西域传入，因此数量极少，只用作贵族礼赠用品。

（八）玛瑙

汉末曹丕得玛瑙勒，作《玛瑙勒赋》，其序云：“玛瑙，玉属

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49]陈琳作《马脑勒赋》，其序云：“五官将得马脑，以为宝勒，美其英采之光艳也，使琳赋之。”[50]王粲亦有《玛瑙勒赋》，当为同时之作。其词云：“游大国以广观兮，览希世之伟宝，总众材而课美兮，信莫臧于玛瑙。被文采之华饰，杂朱绿与苍皂。于是乃命工人，裁以饰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应规，厥性顺德，御世嗣之骏服兮，表騄骥之仪式。”[51]说明曹丕是将得之西域的玛瑙加工成马鞍饰品。关于玛瑙，《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引《玄中记》云：“马瑙出月氏国。”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引《释名》云：“文石”，又云：“藏器曰：‘马脑生西国玉石间，亦美石之类，重宝也。来中国者，皆以为器。又入日本国。”“宗奭曰：‘马脑非玉非石，自是一类。有红、白、黑三种，亦有文如缠丝者。西人以小者为玩好之物，大者碾为器。’时珍曰：马脑出西南诸国，云得自然灰即软，可刻也。曹昭《格古论》云，多出北地、南番、西番，非石非玉，坚而且脆，刀刮不动，其中有人物鸟兽形者最贵。顾荇《负暄录》云，马脑品类甚多，出产有南北，大者如斗，其质坚硬，碾造费工。南马脑产大食等国，色正红无瑕可作杯斛。”

（九）续弦胶

续弦胶是一种优质骨质胶，能粘接折断的弓弦和刀剑，效果极佳，接续以后，即使其它地方折断，接续的地方也不会再断，所以被称作续弦胶。相传武帝时东方朔所作《海内十洲记》记载，这种胶出于西海之中央“凤麟洲”。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四月，西国王使至，献此胶四两和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库，不

知胶裘之妙用。以为西国虽远,而上贡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后来,武帝幸华林园射虎,而弓弩弦断,使者时从驾,又上胶一分,使口濡以续弩弦。武帝吃惊道:"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共对掣引之,终日不脱,如未续时也。胶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黄色,乃神马之类,裘入水不沉,入火不焦。帝于是乃悟,厚谢使者而遣去,赐以牡桂、干姜等诸物,是西方国所无者。《海内十洲记》是否为东方朔所作,人们很怀疑。西汉时与罗马不曾有过这种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这件事本身不很可靠。但这种胶为西域所产,传入中国当是可信的,张华《博物志》亦记其事。学者以为所谓西海,即海西国,就是罗马。

(十)车渠碗

玉器则有车渠碗。东汉末年曹丕有《车渠碗赋》,序云:"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小以系颈,大以为器。"《广志》云:"车渠出大秦及西域诸国。"《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引《玄中记》云:"车渠出天竺国。"崔豹《古今注》云:"魏帝以车渠石为碗。"《中华古今注》云:"魏武帝以车渠石为酒碗。"同时的曹植、应瑒、王粲、徐干皆有同题之作。赵幼文在曹植此赋按语中考证说:"《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曹操攻屠河池,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凉州平定,西域交通开始恢复,西域诸国馈送,才能达致邺都。应、徐、王俱死于二十二年,则此赋创作时期,不会后于二十二年春天,是时王粲已死,据此或写于二十一年。"[52]据此则知西域车渠石(玉)当于此前传入中原。

（十一）医药与医术

印度医药和医术应该是伴随佛教的东传而传入的。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记载安清（世高）："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释慧皎《高僧传》卷一亦云：安清"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安清于东汉桓帝时至洛阳传教，当是一位通晓印度医术的高僧，也可能是最早将印度医术传入中国的僧人。据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东汉末年来华的印度高僧竺律炎和大月氏高僧支谦曾译有《佛医经》，说明汉时印度古医书已经传入中国并有汉译本问世。

1930 年，陈寅恪著《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一文，考证汉末名医华陀的姓名来自梵语，开启我国与西方古代医学交流史研究之先声。《三国志·华陀传》云："华陀字元化，一名敷。"陈寅恪认为，天竺语有"agada"，乃药之义，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习见之语。华陀即"阿伽陀"省去"阿"字后之读音，"元化固华氏子，其本名为敷而非陀，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陀'，实以'药神'目之。"陈寅恪还指出，东汉时安清曾译《捺女耆域因缘经》，其中记载神医耆域诸奇术，与华陀治病奇效不异，说明华陀故事中有将外来故事附会于本国人物的迹象[53]。受陈寅恪之说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印两国在华陀时代已经开始医学交流，华陀的医术来自印度；也有人认为华陀的医术受波斯影响。

《三国志·华陀传》记载华陀的医术有云："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刮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醉如死无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

人亦不自瘖，一月之间，既平复矣。”其中提到的麻沸散显然是一种用于全身的麻醉剂。林梅村著《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一文，认为麻沸散中有洋金花的配方，因为从中医学界所做实验和临床研究看，洋金花是目前所知唯一和麻沸散性能相符的草药。南宋周密早就怀疑华陀的麻沸散就是押不卢，洋金花一名押不卢。他在《癸辛杂识》中写道：“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参之状。其尤名之曰押不卢，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着其毒气必死。……别用它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虽加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陀能刮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药院中亦储之。”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七引周密之说，也认为华陀的麻醉药必为押不卢。后世医家所用麻醉药多以洋金花为主要配方。中国古代不产洋金花，宋代高僧法云所编《翻译名义集》卷八提到印度有此植物，梵名“曼陀罗”（mandāra）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考证，中世纪阿拉伯波斯作家阿布·曼苏尔（Abu Mansur）最早将押不卢著录于他的药书《药物原理》（约成书于975年）。洋金花所制胡药可能被汉代来华的中亚或印度僧人带入中国。曼陀罗花至迟宋代在我国南方广西已有栽培，周去非《岭南代答》一书中有所记载。“麻沸”二字难以在汉语中得到解释，可能来自梵语。古希腊人对曼陀罗的麻醉性能也非常了解，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常常提到曼陀罗。古希腊的螺陀罗可能也是印度传去的。

古代印度人所谓“药”（bhaisajya），由四部分组成：酥、油、蜜和石蜜。据季羡林先生考证，大约从公元二至三世纪东汉后期

时，“西极石蜜”已经传入中国。石蜜就是蔗糖，以蜜和蔗糖入药是印度医学传统。古代中草药方剂称“汤”或“散”，丸药在我国出现较晚。而蜜和蔗糖是制作丸药必不可少的原料。中国制作丸药的技术无疑学自印度。张衡《七辩》有诗云：“沙饴石蜜，远国贡储。”说明东汉人知道石蜜及其产地[54]。

（十二）胡粉

胡粉是指外来的用于化妆的粉，此种化妆品可能来自中亚地区。汉灵帝喜欢西域胡人的生活方式，京师洛阳贵族之家纷纷效仿，造成一时的胡化气氛，喜欢以胡粉化妆便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表现之一。东汉末年男女都喜欢用胡粉化妆，《后汉书·李固传》记载，顺帝时，诸所奏官多不以次，李固奏免100多名。顺帝死，这些人一面怨恨李固，一方面又想讨梁冀欢心，乃飞章诬奏李固，说他“大行在殡，路人掩涕，（李）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三国志·何晏传》记载，东汉末年，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同书《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记载：曹植“初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东汉末年至魏初，洛阳市场上胡粉买卖极盛。《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魏名臣奏》中有刘放《奏停卖胡粉》，云：“今官贩粉卖胡粉，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宜乞停之。”说明百姓卖胡粉早已成为一种洛阳市场上的生意，由于有利可图，政府也开始从事经营。可见当时从境外运销至中原地区的胡粉数量之多。汉代传入的化妆品还有一种燕支粉，《古今注》云：“燕支叶似艾，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调红、蓝，以染粉为妇人面色，谓之燕支粉也。”

（十三）其他

铸有希腊铭文的铅饼来自西亚地区。6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考古队在汉长安城遗址（今西安市西查寨）发现 13 枚草体希腊文铅饼。这种铅饼直径约 5.5 厘米，最厚处 1.2 厘米，重约 14 克。正面凸出，上有类似龙的浮雕图案；背面凹入，印有一周草体希腊文。除此之外，扶风发现 2 枚，甘肃灵台枣树台遗址发现 274 枚，天水也有发现。这些铅饼都出土于汉文化层中，有些装在汉代陶罐里，有的和汉代五铢钱及汉代陶片同出，大都出于遗址，不见于墓葬。据地层分析，“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有人曾经认为这是一种草体希腊文拼写的帕提亚（安息）钱币铭文，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有人则怀疑铅饼上的铭文可能是大夏文，它们在丝路沿线流行似与贵霜难民流寓中国有关[55]。

汉代也得到域外的铜镜，汉宣帝有身毒国镜，来自印度。《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筒盛之，缄以戚里织成锦，一曰斜文锦。帝崩，不知所在。”印度产铜镜在阿富汗大月氏贵族墓地考古中有发现，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身毒国镜的标本，说明《西京杂记》所记并非凭空之论。据说在巴基斯坦北部塔克西拉（怛叉始罗）遗址也发现过类似的铜镜，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大月氏墓地出土的两枚带柄铜镜，被鉴定为印度文化遗存[56]。

鍮石传入中国。十九世纪的欧洲汉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

古代文献中所谓鍮石，就是现代工业中所说的黄铜。古代鍮石的产地首推波斯，《魏书·西域传》云：波斯国“出金、银、鍮石”。《隋书·西域传》也说波斯盛产“鍮石”，并且“每遣使贡献”。古代黄铜为什么称为鍮石，学者们都从语源上去探索，有阿拉伯波斯语说、印度梵语说和伊朗语借词说等说法[57]。《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武帝“得贰师天马，帝以玫回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据陈直介绍，长安城奇华殿遗址曾出土一件五环铜炉，现藏于小雁塔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可能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鍮石工艺品。炉上有铭文云：“奇华殿铜鍮炉，容一斗二升，重十斤四两，天汉二年工赵博造。护守丞贤省。”[58]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武帝年号。建章宫的奇华殿是西汉王朝收藏域外珍物之处，所以波斯鍮石制作的工艺品存于其中。墨山国地处丝路孔道，其墓葬中墓主佩戴有黄铜戒指、黄铜手镯，即波斯传来的鍮石工艺品，也为鍮石东传竖立了坐标。

汉代传入中国的罗马钱币也有发现。上世纪初，山西灵石县曾出土16枚罗马古币。经英国汉学家卜士礼鉴定，属于罗马皇帝泰比里厄斯（14－37年）至安敦尼（138～161年）在位时期的货币，相当于中国西汉末至东汉[59]。张星烺说：“近代西人在山西掘地，得罗马古钱。西方货币输入中国，可以证明当时商贩往来之繁也。”[60]

据文献记载，当时中亚、西亚、南亚、北非和罗马的名贵物产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还有很多。如于阗的玉石，千涂（犍陀罗）的火齐（即琉璃）屏风，大秦的火浣布、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琅干、朱丹、青碧，象牙、犀角、玳瑁，罽宾的珠玑、珊

瑚、琥珀等。明珠又称真珠，又叫麻尼珠，麻尼为 Mani 的对音，义为“无垢”。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一名身毒，“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骚黇、谐香、石蜜、胡椒、薑、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自武帝时频来献见，至和帝时又多次贡献，其所献物当然即上述物产。其中石蜜即蔗糖，汉时显然也传入中国。《西京杂记》卷四记载：“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同书又记载，汉武帝在未央宫建温室殿，其中设“火齐屏风”。班固《与窦宪笺》提到窦宪曾赐以“骇犀、玳瑁簪”，[61]骇犀当即骇鸡犀。在《与弟超书》中又说“今遣仲升玳瑁黑犀簪”[62]。

长安西郊有上林苑，秦都咸阳时所置，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营建朝宫于苑中，著名的阿房宫即其前殿。汉初荒废，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允许百姓入苑垦种。武帝时又收为宫苑，周围至二百多里，苑内放养禽兽，供皇帝射猎。中建离宫观馆数十处。司马相如《上林赋》极写其侈，在现在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班固的《西都赋》写上林苑集中了四方奇物，云：“西郊则有上囿禁苑（颜师古注曰：‘上囿谓上林苑也’），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63]

据《三辅黄图》卷三记载，上林苑中修建有一座别致的离宫，称为建章宫，宫旁有一个奇华殿，是专门收藏来自域外物产的地方。这座皇苑及其离宫典型的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

盛况。据说，离宫门口的石狮子，是按照安息狮子的样子雕成的，这可能是中国用石狮子镇门的最早来历；离宫殿内的屏风，画着开屏的印度孔雀；椅子和茶几，镶嵌着和田的玉石；宫内点燃着香料，则来自印度；陈列着安息驼鸟蛋和千涂国的水晶盘子。离宫较远的地方，种着从大宛来的紫花苜蓿和葡萄。上林苑中还养着狮子、孔雀、大象、骆驼、汗血马和成群的其它珍禽异兽。至于其它宫殿里，来自西域的奇珍异宝更是不少。《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汉书·西域传赞》描述西汉所获异域物产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四种骏马名）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武帝时东方朔《化民有道对》言当时奢侈之风，云："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64]所谓玳瑁、珠玑皆奇方异物。

注　释

〔1〕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64 页。

〔2〕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六，1082 页。

〔3〕劳费尔著、林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 年，31 页。

〔4〕《史记·大宛列传》。

〔5〕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130 页；江灏等《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年，77 页。

〔6〕《太平御览》卷九九〇，《大观本草》卷二十三。见严可均《全晋文》卷九十七，2018 页。

〔7〕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引。

〔8〕《后汉书·和帝纪》注引谢承书。

〔9〕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五十七,784 页。

〔10〕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310 页。

〔1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98 年,95 页。

〔12〕《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引,又见《全后汉文》卷二十五,609 页。

〔13〕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见《史记·大宛列传》注。

〔14〕林梅村《狮子与狻猊》,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87-95 页;马自树主编《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物集萃》,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280 页。

〔1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16〕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 年第 4 期。

〔17〕沈竹等《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 年,图版 71。

〔18〕《太平御览》卷八九〇引《蜀王本纪》。

〔19〕林梅村《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前揭《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97 页。

〔20〕《汉书·两粤传》。

〔21〕同〔19〕。

〔22〕麦英豪《汉代番禺的水上交通与考古发现》,见《广州外贸易两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年;邓炳汉《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见《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1991 年。

〔23〕前揭《全汉赋》,412 页。

〔24〕同〔19〕。

〔25〕《全后汉文》卷九十六,《艺文类聚》卷九十二;又见《太平御览》

卷九二二引《曹大家集》，作《大雀颂》。

〔26〕前揭《全汉赋》，237 页。

〔27〕《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1574 页。

〔28〕《文物》1980 年第 2 期，55 页，图 14。49 页正文说明是麒麟，沈福伟认为当是长颈鹿，见《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70 页。

〔29〕《文选·景福殿赋》注引。

〔30〕《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见《全后汉文》卷五十，751 页。

〔31〕《太平御览》卷九八一引，见《全三国文》卷三，1067 页。

〔32〕《全三国文》卷三，1070 页。

〔33〕《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见《全三国文》卷三，1068 页。

〔34〕《艺文类聚》卷八十一引，1394 页，又见《全三国文》卷四，1074 页。

〔35〕前揭《全汉赋》，683 页。

〔36〕《三国志·魏书》卷三十注引《魏略》。

〔37〕林梅村《墨山国贵族宝藏的重大发现》，见氏著《古道西风》，三联书店，2000 年，194－209 页。

〔38〕同上。

〔39〕安家瑶《中国早期玻璃器》，载《考古学报》1984 年第 4 期。

〔40〕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载《文物》1999 年第 10 期。

〔4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42〕同〔40〕。

〔43〕林梅村《中国与罗马的海上交通》，前揭《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316－317 页。

〔44〕《全三国文》卷一,1057－1058 页。

〔45〕前揭《曹植集校注》卷一,186 页。

〔46〕同上书卷二,311 页。

〔47〕《全三国文》卷三,1067 页。

〔48〕前揭《曹植集校注》卷二,309 页。

〔49〕《全三国文》卷四,1074 页。

〔50〕前揭《全汉赋》,705 页。

〔51〕同上书,674 页。

〔52〕前揭《曹植集校注》卷一,139 页。

〔53〕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157－161 页。

〔54〕林梅村《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前揭《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322 页－342。

〔55〕参林梅村《西京新记》,前揭《古道西风》,181 页。

〔56〕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831 页。

〔57〕同〔37〕。

〔58〕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65 页。

〔59〕同〔37〕,209 页。

〔6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与欧洲的交通",4 页。

〔61〕《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引,1443 页;又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二十五,608 页。

〔62〕《太平御览》卷六八八引,见前揭《全后汉文》卷二十五,607 页。

〔63〕前揭《全汉赋》,311 页。

〔64〕前揭《全汉文》卷二十五,265 页。

第十章　佛教的传人

一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

印度佛教创立在公元前六世纪，正值中国的春秋时期。释伽牟尼（约前565—486年）与中国孔子（前551—479年）是同时人而略早。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前265—236年，中国战国后期），佛教开始越出本土向外传播。阿育王经过血腥斗争巩固了王位，又用武力削除各地割据势力，整个南亚次大陆基本上都归入了孔雀帝国版图之内。于是阿育王统治的重点由武功转向文治，弘扬佛法是他适应形势发展而调整统治政策的重要内容。在他赞助下，佛教举行了第三次结集，他还派遣名僧奔赴远方绝域传播佛法。据说阿育王所派传法僧徒数目之多、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空前的，除了印度次大陆边远地区如喜玛拉雅山、南印和德干高原之外，他的传教专使东赴缅甸，南下锡兰，西达塞琉古和希腊诸国，北进克什米尔、犍陀罗以及中亚。这样佛教便走出国界，变成了世界性的宗教。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和以什么方式传入中国？有许多传说。佛教徒为了神化佛教信仰，编造了不少神话，都不很可信。有说阿育王时代已经传入中国，《佛祖统记》卷三十五记载迦叶摩腾

向汉明帝讲佛教东传的历史，说："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有人认为秦代佛教已传中国，如前文提到过的朱士行和费长房的记载。其书晚出，不足凭信。1927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发表《中国石刻的由来附不得辞》，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中"不得"是Buddha的音译，即佛陀，此句应在"祠"字下断开[1]。1944年中国有学者撰《秦史纲要》，亦以此句为据，以为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不得"即浮屠。他还认为《史记》中之"羡门"即沙门，"安期"即"阿耆尼"[2]。此说已经有学者予以批驳，有人认为"不得"为"吠陀"（Veda），亦属误解。陈垣发表《禁不得辞举例》，说明"禁不得"乃两汉三国间诏令书史中之习语[3]。

方豪则从语音学方面认真作了辨析，说明"不"字非浊声浊调，与"浮""佛"不相类，亦非"吠"之音类；"得"字为入声，而非浊调，主要元音无对读开口"a"，与"图""屠"不相类。"沙门"之梵文原文为Sramana，巴利文为Samana。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八云："沙门，梵语讹也。正梵音云'室啰末拏'。"但据今人研究，"沙门"一词翻译并不误，它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译自吐火罗语。在吐火罗语焉耆文中，梵语Sramana写作Samam；吐火罗语龟兹文中写作Samane。中文"沙门"便从吐火罗语译来，不可能译成"羡门"。"阿耆尼"的梵文原文是Agni，是古代印度颇受尊崇的火神，与"安期"发音不同[4]。

《魏书·释老志》是中国正史中最早记载佛教东传及其发展的材料，其中有云：

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匈奴之祭天金人是否印度之佛，或其烧香礼拜之仪式是否受到佛教的影响，尚待考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上半叶，佛教传入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前二世纪中叶，大夏被来自东方的大月氏征服，中亚一些希腊式城市国家逐渐并入大月氏领地，大月氏则直接承受了在大夏流布的佛教。张骞出使至大夏时，佛教早已在此地扎根，他在大夏长达一年之久，所以说张骞至大夏，回国后传来关于佛教的消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二　佛教从西北陆路传入

佛教是经海陆两条路线传入中国的。它首先是经过陆路在于阗得到传播，时间在公元前一世纪。据藏文《于阗国授记》记载，于阗建国以后 165 年，尉迟胜登位。在他登位的第五年，克什米尔毗卢折那（Vairotchana，或作毗卢旃、比卢折那、毗卢折那）阿罗汉到于阗传扬小乘佛教[5]。于阗建国在公元前 250 年。所以这一年也就相当于公元前 80 年（西汉昭帝元凤元年）。当时的具体情况，六世纪初北魏时，与宋云一起前往天竺取经到过于阗的惠生记下这样的故事：

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非皮非缯，莫能审之。

这段记载为北魏杨玄之《洛阳伽蓝记》卷五所引。于阗原来不信佛教，有印度商人带来比丘毗卢旃，毗卢旃请佛显灵，于是于阗人始信。于阗王便在城南杏树下立寺画像供奉。"比丘"是佛教名词，梵文 Bhiksu 的音译，意译"乞士"，因初期佛教徒以乞食为生而得名，佛教出家"五众"之一（其余四众为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指已受具足戒的男性，俗称"和尚"，女性为比丘尼。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条也记载了这一传说：

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唐言遍照）阿罗汉建也。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至此林中，宴坐习定。时有见者，骇其容服，具以其状上白于王。王遂躬往，观其容止，曰："尔何人乎？独在幽林？"罗汉曰："我，如来弟子，闲居习定。王宜树福，弘赞佛教，建伽蓝，召僧众。"王曰："如来者，有何德，有何神，而

汝乌栖，勤苦奉教？”曰：“如来慈愍四生，诱导三界，或显或隐，示生示灭。遵其法者，出离生死；迷其教者，羁缠爱网。”王曰：“诚如所说，事高言议，既云大圣，为我现形，若得瞻仰，当为建立，罄心归信，弘扬教法。”罗汉曰：“王建伽蓝，功成感应。”王苟从其请。建僧伽蓝，远近咸集，法会称庆，而未有犍椎扣击召集。王谓罗汉曰：“伽蓝已成，佛在何所？”罗汉曰：“王当至诚，圣鉴不远。”王遂礼请，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信，弘扬佛教。

瞿萨旦那国即于阗。罗汉是梵文 arhat（阿罗汉）的略称，是上座部佛教（小乘）所理解的最高果位，有三义：一是杀贼，断除贪嗔痴等烦恼；二是应供，应受人天供奉；三是无生，不受生死轮回。说明毗卢折那至于阗所传播的乃小乘佛法。《魏书·西域传》认为于阗城南五十里的赞摩寺就是比卢折那最初传布佛教的地方。斯坦因在尼雅废址中，发现有一些木牍，上面用梵文雅语书写成段成段的佛经，这些木牍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与上述传说时间一致。说明佛教传入于阗不久，梵本经典就已利用中国特有的书写材料加以传抄，但尚未经翻译。当时蔡侯纸还没发明，主要的书写材料还是木牍和竹简。因此，从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都可以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境内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即西汉中叶。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在西汉末年。《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当时大月氏佛

教极其昌盛，伊存当即大月氏王派来的佛教国使。其时大月氏已经建立贵霜王朝，在丘就却统治之下，因此人们认为伊存就是丘就却派来的佛教信使。《魏书·释老志》亦记载此事，景卢作秦景宪，但当时对伊存讲授的佛法，汉朝人却不信服，"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

到了东汉，上层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佛教，东汉初曾盛极一时。据《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楚王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明帝报其诏书云："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颁示诸国中傅。"他崇奉浮屠，洁斋赎罪，并盛宴供养沙门(Cramana)和伊蒲塞(Upasaka，居士)。"沙门"是梵文 Sramana 的音译之略，一译桑门，意思为"息心"，"勤息"，即勤修善法、息灭恶法之意。原意为古印度各教派出家修道者的通称，后佛教专指依照戒律出家修道的人。

永平十一年(68年)，明帝夜梦顶有白光的金人，飞行殿庭。乃问群臣，太史傅毅附会为西方的"佛"，明帝便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18人"使于天竺"，蔡愔等至大月氏，其时大月氏已经占领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犍陀罗(濮达)、克什米尔(罽宾)，并进一步侵入印度河流域上游的旁遮普地区。他们在此得到佛画像和佛典，和中天竺沙门摄摩腾(Kasyapa)、竺法兰(Dnarmaratna)一同返归洛阳。明帝让摄摩腾和竺法兰住在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并择地建庙，即后世所谓白马寺。据说摄摩腾和竺法兰来时，是用白马把佛经驮来的，故称白马

寺。摄摩腾翻译了《四十二章经》，藏十四石匣中，成为最早的汉译佛经。竺法兰又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和《四十二章经》等五部。应该说到这时，佛教已经完整地传入中国，佛教有三宝之说：佛（泛指一切佛）、法（教义）、僧（信徒）。现在佛经、寺院、佛教徒等在中国都已经有了。“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对于明帝求经之说，前人亦有致疑者。此说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其他佛教史籍附会处很多，有很多种不同说法，如年代有永平三年、七年、十年、十三年等说，派往人数有18人、14人、12人等说，到达地有说大月氏，有说天竺。他们的事迹也有不同说法，有问道术、图佛之形像、奉迎沙门和传写佛经等。更有记事舛误者，《四十二章经序》云：“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将张骞西使系之东汉明帝，甚为荒唐。特别是此后百余年间，竟无佛教传播之迹象。对于摄摩腾和竺法兰译经，也有人怀疑其事。因为虽然明帝遣人赴天竺见于《后汉纪》卷十和《后汉书·西域传》，但并未记载摄摩腾和竺法兰事，也没有言及《四十二章经》。后世佛教典籍有的说摄摩腾译于大月氏，有的说摄摩腾译于白马寺，有的说是竺法兰所译，有的说是摄摩腾和竺法兰合译。而且译文系魏晋以后文体，有模拟《道德经》、《孝经》等书之痕迹。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是最早的佛教经录，却不载此经。所以有人认为《四十二章经》一定是后世中国人伪造，当在东晋道安以后。僧祐《出三藏记集》首记摄摩腾译此经事，而僧祐为齐梁间人，则此经当造于此前。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认为，龟

兹在公元前二世纪已与中国接触,汉成、哀帝时(前32年至1年)来往尤其频繁,不仅可以介绍梵僧来中国,而且也有可能迎送汉使去印度,所以《魏略》记载博士弟子从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不应视为伪造,那么当时应当有汉使西去。而69年后,摄摩腾、竺法兰来华,似乎不应该否定。学者也认为西域僧人来华虽有可能,但未必就是摄摩腾和竺法兰。此事仍难证实。

明帝以后近百年的时间,史籍上不见佛教在中土的流传,只有袁宏《汉纪》说汉明帝以后"西域沙门赍经像来中国益众"。有人认为可能与统治者对佛教的警惕有关,有人指出明帝治楚王英一案可能与佛教有关。直到东汉末年,桓、灵之际,佛教又受到提倡,《后汉书·西域传》"天竺"条云:"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以后,西域僧人入华和译经渐多。《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襄楷自平原郡隰阴县家乡至京上书,有云:

>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伐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当为"聘"字之误)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据此可知,佛教已进入东汉宫中,而社会上对佛教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信奉者越来越多。《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刘繇传》记

载汉末笮融之事，反映了当时佛教之盛行：

>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此乃汉灵帝时事。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神甫步履仁在洛阳发现一方残碑，以为是希伯来文碑志。残石由马衡携至北京大学，至1961年，英国学者亨宁发现步氏之误，又经希腊夫研究，断定为佉卢文碑刻。林梅村研究认为此石刻是大月氏人在洛阳建造寺院的纪念物。铭刻译文是："唯……年……十五日，此地寺院……祈愿人们向四方僧团敬奉一切。"公元二、三世纪时，大月氏贵霜王朝人流寓中原者甚多，他们于此建寺拜佛，并立碑纪念。此石刻正是佛教东传现存实物方面的最早文物[6]。

西域各国包括印度、月氏、安息、康居的高僧陆续来华，传译佛经，洛阳成为当时佛教传播的中心，白马寺被后世称为佛教的"祖庭"。东汉建都洛阳，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新的起点和终点，也成为佛经翻译的一个中心。据梁释慧皎《高僧传》记载，汉时来华传教的高僧纷纷到洛阳从事译经，印度有竺法兰、摄摩腾、竺佛朔、维祇难、竺律炎、竺大力、昙果、昙柯迦罗。大月氏有

支娄迦谶、支曜、支亮、支谦。“支”即月氏，表示来自大月氏。安息有安清、安玄。康居有康巨、康孟祥、昙谛，他们大多以国为姓，与汉地沙门和信徒合作翻译。

除了摄摩腾和竺法兰所译佛经之外，灵帝光和二年（170年），竺佛朔携来《道行经》，在洛阳翻译，他译经二部。光和、中平年间支娄迦谶至洛阳游说，译经14部（一说23部，一说39部）。支谦的祖父法度于东汉时与本国人数百名移居中国，支谦从小生活在中国，后来也有大量译著。康孟祥曾和昙果合作，译经6部。有人以为中国造像立寺当始于灵帝中平五年（188年）至献帝初平四年（195年）。如前所述，其时笮融造大佛及佛寺，礼佛者常五千余人，其地当在江苏北部。洛阳、许昌等地亦有佛寺建立。安玄是安息国优婆塞（梵语Upasaka，居士），灵帝末年经商至洛阳，官至骑都尉，学汉文后，与临淮人严佛调合作译经两部。据《内典录》，康巨、康孟祥来自中天竺，当是移居中天竺的康居人。康巨于灵帝中平四年（187年）译经1部，康孟祥于献帝兴平元年（194年）至献帝建安四年（199年）译经6部。汉末移居吴兴的昙谛姓康，祖先是康居人，精通佛经和儒学经典，晚年在苏州虎丘寺讲《法华》、《大品》、《维摩》等佛经十五遍，讲《礼记》、《周易》、《春秋》各七遍。

安世高是中外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名叫安清，字世高，本是安息国王子，而且已经继承了王位。但他的兴趣在于研究佛学，因此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叔，开始遍游诸国，大约在桓帝初年（147或148年），沿“丝路”来到洛阳。他的后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前后大约三十年。据说，在中国他到过荆州、豫章、庐

山下的寻阳(今九江)、扬州、丹阳、会稽、广州。这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从洛阳向南方传播的路线,这些地方都是佛教的重镇。他聪明好学,很快学会了汉语,"宣译众经,改梵为汉"。他把当时一些僧人翻译的佛经加以整理,编为七章,取名《道地经》,他还写出佛学论文集 39 篇,据释道安《经录》记载,他自"汉桓帝建和二年(148 年)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现存 22 部。有人说他译经共 95 部,现存 54 部。他宣讲佛经,令人信服,翻译佛典,不需转解,而"义理明析,文字允正"。他的翻译涉及大小乘佛教经典,南朝高僧道安为之作注,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人认为他是东汉最成功的佛典翻译家。

三　佛教传入中国的其他路线

佛教通过南海海道传入中国比较晚,大约在东汉末年。南方交州(今越南河内,汉魏时又称交趾)是中国早期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交州佛教最初来自内地北方,例如苍梧人牟子是佛教的代表人物,他带母亲避乱到交州,著《理惑论》一书,宣扬佛教,成为中国学者第一部佛学论著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高潮的先声。牟子名牟融,原为儒者,到交州传习佛典,被人非难,著此书 37 篇以作答辩。但也有材料说明,交州佛教也有自海路南来,并由此北上中原,成为佛教传入内地的另一渠道。东汉末年僧人康僧会就是在交州长大的,而他们家是从天竺经海道来交州的。据《高僧传》卷一,他原籍康居,世居天竺,父亲

因经商到了交州。10 余岁父母皆亡,遂出家。他通天文、谶纬之学,尤娴经律。康僧会所传播的佛教就是从天竺带来的,《大南禅苑传灯录》记载:"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赢楼又重创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于时有比丘尼摩罗、耆域、康僧会、支疆梁、牟博(即牟子)之属在焉"。《高僧传》卷一记载康僧会于三国吴孙权赤乌十年(247 年)抵达建业(今南京),"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为舍利建塔,成为江左建寺之始,故称建初寺。这是典型的天竺风气。因此可以说康僧会所传佛教是经海路迁入交趾,然后又北上南京。康僧会译有《六度集》、《旧杂譬喻》等经,共 7 部,20 卷,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经。于是江南佛法始兴。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佛教的考古发现集中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如乐山麻浩崖墓中的佛像石雕、乐山柿子湾墓中类似的佛雕,绵阳何家山 1 号墓中青铜摇钱树上的五个佛像,什邡白果村东汉墓画像砖上的佛塔,彭山崖墓中刻在摇钱树陶座上的佛像。所有这些发现的年代都被确认为东汉末年。因此目前有的学者提出,佛教传入中国,除了传统的北路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另一条南路。佛教很可能由往返于中国西南部与印度之间古商道上的旅行者或香客们传入,而且时间可能早于北路[7]。

四 佛教初传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随着佛教传入,佛经的汉译从东汉开始。佛教教义在五天

竺和西域流传的早期，都没有定本，《分别功德论》卷上云："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东晋的法显《佛国记》亦云："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在佛经翻译初期，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佛经原文，再由懂西域语言的中国居士、僧人或文士译成汉语，笔录下来。据佛教史学者研究，至东汉末时汉地所译佛经已达 192 多部，共 395 卷。佛经翻译有的是由官方组织的，有的则是民间自发的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的开端。

佛经翻译不仅是一种宗教经典的传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的翻译。因为佛经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学故事和形象的比喻，佛经翻译中语言转换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意义的表达。例如东汉时《法句经》已有维祇难的译本，安世高翻译过《鳖喻经》、《五阴譬喻经》、《七处三观经》和《道地经》，支娄迦谶翻译了《杂譬喻经》，其中都有丰富多彩的比喻。佛经中精彩的比喻对丰富中国文学语言起了积极作用。曹操《短歌行》诗中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比喻。而把人的生命比作早晨的露水，却是佛经中已有的，三国时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有云："犹如朝露，滴在草上，日出则消，暂有不久，如是人命如朝露。"作为文学，佛经经过翻译自然逐渐为中国文学所吸收，并融入中国文学中去，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随着佛经翻译又发展和建立起翻译理论。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媒介，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转换。佛经翻译初期，由于语文不通，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难度很大。为了寻找两种文化

的沟通点，译者不得不采用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无本”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出息、入息）去译佛经的禅观（安般）等等，这必然造成译者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与印度佛教宗教概念的比较和辨析，造成中国传统概念被赋予新的含义，从而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印文化的异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都发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佛教传入本身便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传播现象，同时宗教又常常是文化交流的媒介，佛教也不例外。汉代佛教艺术的传入表现为佛教画像的传入。汉代传入佛教绘画。明帝时派人到天竺取佛像归国，明帝命画工临摹画出几幅，分别藏在南宫清凉台和显节寿陵。白马寺建成后，有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山东滕县出土的一块东汉画像石残块，有前后相随两匹六牙象的图像，图上只显出右半侧三牙，象身有人骑坐，但已残缺。六牙象的内容出于佛教传说，此画像石被认为是东汉章帝前后的佛教史迹。桓帝和灵帝时期，佛教图像在中国已经相当普遍地流传，西起新疆，东至山东滕县、沂南等地，北至内蒙和林格尔，南至四川彭山、乐山，都有佛教图像的发现。1959 年，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东汉末期墓葬出土两块白地蓝色腊缬棉布，有一块画有半身裸体菩萨像，手持花束，头后有项光。内蒙和林格尔东汉桓、灵之际墓葬中，有一幅“仙人骑白象”壁画，骑者身穿红衣，头部已残泐，另有题有“狯俳”的图像。

佛教画像的传入还见于陶制或范制佛像、石刻和陶刻佛教图像。1979 年，在新疆和阗买力克阿瓦提遗址出土不晚于西汉

末年的窖藏西汉五铢钱，并发现一处佛寺遗址，出土范制白石膏质小立佛像一躯，残高 10.7 厘米，嵌在墙壁上。另有红陶范制残坐佛像一躯，石膏质小佛头一个，红陶质残佛手指一排三指，原系大佛像的手指，还有各种花纹的佛身残块。这些小型原始佛像被认为是我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遗物。四川乐山麻浩东汉崖墓后室门额以浅浮雕刻坐佛像一尊，头带项光，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印。乐山柿子湾东汉墓两个后室门额有类似雕像。四川彭山崖墓抗战时出土陶座，刻有一佛二菩萨像，中为释迦，两侧是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1953 年发掘的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南北两面顶端各刻东王公和西王母像，头带项光，而作手印。发掘者认为这是佛教初入中国内地，画家只凭自己的见闻加以揣摹，而画出的佛像，是佛教艺术处于萌芽状态的作品，但这种画像是否与佛教有关，似乎还需要探讨。

早期佛教艺术是从中亚传至新疆地区，经新疆地区东传内地，所以内地的佛教图像受新疆地区影响的痕迹很明显，从成都扬子山汉墓发现的模压彩绘画像砖的图像，可以看到新疆境内发现的范制模压佛像的影响。由于各地画工佛教知识的局限，早期佛教图像常常有凭空想象的成分，而且还常常和本土的各种信仰如方仙道、道教思想等杂揉在一起。这种本地化的倾向越是到中原地区越是强烈。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各种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也传入中国各地。东来的高僧不少人都会一些方术，有的僧人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安般守意经序》云，安世高“博学

多识,综贯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观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七正即七政,即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这段记载说明他懂天文学、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

注 释

〔1〕《东洋学报》第十六卷第2号,1927年。

〔2〕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篇第九章第二节。岳麓书社,1987年,127页。

〔3〕《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3月10日。

〔4〕前揭方豪书,126－128页。

〔5〕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8页。

〔6〕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刘铭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见《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204－205页。

〔7〕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

第十一章　西域艺术的传入

汉代传入中国的西域艺术主要有音乐、杂技和各种造形艺术。西域传入的音乐包括西域传来的乐器、乐曲和演奏者。汉武帝以后，域外音乐更多地传入中国内地。来自域外的乐曲，经过汉朝音乐家的加工和修改，创制出新的曲调。杂技魔术的表演也常常配合着音乐，还有各种造形艺术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艺术的内容。

一　乐器、乐曲

中国古代的传统音乐，到汉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雅乐衰落，俗乐兴起。雅乐只在郊庙祭礼和朝廷宴享时使用，而大家喜欢欣赏的则是俗乐。俗乐是在吸收民间音乐和外来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推溯其原因，主要在于西域音乐的传入，包括乐器和乐曲。音乐是统治者贵族奢侈生活的一部分，汉代西域音乐传入很早，《三辅黄图》卷四记载，汉高祖与戚夫人“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汉代传入中国的西域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胡笛、胡笳、胡角等。这些乐器的传入，各有其不同的路线和历史。中国音乐艺人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又不断加以改造，产生出新的形式，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的有机组成

部分。

(一)箜篌

箜篌是一种拨弦乐器,汉代时写作坎侯、空侯,汉代以后中国人仿照笙、竽、筑等表示乐器的字,创制出"箜篌"两个新字,唐代以后成为这种乐器的定名。《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云:"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箜篌起源于何地,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印度古老的 Vina,梨俱吠陀时代弦乐器的代表。有人考证箜篌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可能是波斯语的音译,古波斯语称为 cank。还有人以为源于埃及。如前所论,考古发现后来流行于中国内地的箜篌战国时期已经传入新疆地区。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曾发现两件实物,年代约为公元前三至四世纪。

汉代箜篌经南、北两条路线传入。首先是从南方传入的,汉代文献有记载,见于《史记》的《封禅书》、《孝武帝本纪》和《汉书·郊祀志》。据记载,汉武帝征服南越后,传入了西南方的音乐,武帝祷祠太一(传说中的天神,汉代最高神,天帝之别名)、后土(土地神),命宫廷乐师李延年创制祀神的乐舞,命乐工侯调作乐器,侯调作二十五弦瑟,又模仿印度乐器作"空侯"。应劭《风俗通义》卷六云:"谨按《汉书》,孝武皇帝赛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人侯调依琴作坎坎之乐,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说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独坎侯耶?斯论是也。"瑟是中国的传统乐器,春秋时已流行,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实物。瑟有五弦、十五弦、二十五弦、三十五弦等,而以二十五弦最为普遍。据说原来是五十弦,《西汉会要》卷二十五云:"太

(一作'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中国音乐美学追求"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所以不能接受令人悲禁不止之曲调。李商隐诗:"锦瑟无端五十弦"(《锦瑟》),强调音乐过于令人悲伤。侯调所制的"空侯"是在弓形木框上系弦七根,形似瑟而小,横置,用拨弹之,犹如琵琶。这种形制的乐器应是来自印度,经海道传入南越国,而在汉武帝时传入内地。

东汉时又从西北丝路传入竖箜篌,又叫胡箜篌。据说灵帝曾作"胡空侯",《通典》卷一四四《乐曲》四记载,其形制"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空侯"。这种"擘空侯"源出埃及,由亚述、波斯东传新疆。今传嘉峪关东汉晚期墓葬的画像砖有竖箜篌。新疆克尔尕哈第23窟和库木吐拉第63窟的壁画中,绘有乐工演奏竖箜篌的图画,乐工用左臂夹着竖箜篌,用双手拨动琴弦弹奏。

箜篌传入中国后,在汉代颇为流行,东汉作曲家创作了《箜篌引》的乐曲。著名长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十五弹箜篌"。箜篌很快又传入朝鲜。《古今注》记载:"《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舟,见一白首狂夫,披发携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鼓之。歌曰:'公无渡河,公终渡河,公堕而死,当奈公何!'声音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其声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写其声,为琴操五十七曲第九曲"。至隋唐时,箜篌又传入日本。箜篌起初传入时是竖式抱弹的,后来中国人又根据琴、瑟、筝、筑等传统乐器演奏的方法,创制了卧箜篌,更能适合中国艺

人的演奏，发挥更高的技巧。

（二）琵琶

琵琶也是一种拨弦乐器，古时有手弹和拨弹两种弹法。汉代传入，初时手弹，或曰擫弹，当时写作“批把”，或“枇杷”，还有写作“鞞婆”的。东汉刘熙《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白居易《琵琶行》云：“沉吟放拨插弦中”，则是拨弹。琵琶是游牧民族马上演奏的乐器，唐诗人王翰《凉州词》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约在晋代，人们取琴、瑟等字形和批、把等字音，而创制出“琵琶”新字，此后成为这种乐器的定名。据说琵琶最早是由苏美尔人所发明，公元前二千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塑像上已有描绘，是一种长颈琵琶，称为 Pantur，后来传入埃及和希腊，希腊人称为 Pandoura。塞琉古时这种乐器又传入波斯，波斯人称为 tanbura。另有一种短颈琵琶，古波斯语有 Barbat 一词，即指此种弦乐器，可能就是琵琶的原词。传入新疆地区，龟兹语称为 Vipanki，汉语中琵琶可能就是龟兹语的对音。琵琶因出胡中，又名胡琴。

据杜佑《通典》卷一四四《乐四·八音》“琵琶”条记载，自汉至唐，中国的琵琶有三种：一是秦琵琶，俗谓秦汉子，一般认为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亦作“鞉”）之遗制。鼗，乐器名，即长柄的摇鼓，俗称拨浪鼓。《周礼》郑玄注：“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有两种说法，一曰秦制，晋杜挚说：“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为拨浪鼓扯上弦）而鼓之”。弦鼗是中国发明最早的一种琵琶类型的乐器。《初学

记》卷十六引释智匠《古今乐录》也说“琵琶出于弦鞑”。晋代阮咸善弹秦琵琶，唐以后因称秦琵琶为阮咸。一曰汉制，傅玄《琵琶赋》序云：“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裁（一作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实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杜摯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鞑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1]他的意思是说，汉制琵琶乃遣乌孙公主时结合诸种乐器之形制创制的，便于作马上之乐。

二是曲项琵琶，当是汉代由西域传入，《通典》卷一四四《乐》四云：“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琵琶在唐代传入日本，现在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有唐代的曲项琵琶，四弦四柱，体作梨形。根据日本学者林谦三氏和岸边成雄氏的研究，这种乐器发祥于西亚细亚，是波斯、印度、中亚细亚诸地重要乐器之一。古梵语中“Bharbhu”（拔弦）发音与琵琶相近。公元前后，古希腊语中有一种琵琶类弦乐器称为“Barbyton”，同类乐器在古波斯语中叫“Barbot”。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制乐器取名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说明其时已知外国此种乐器。武氏祠和两城山等石阙中都雕有弹琵琶的乐舞，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说明，它当是沿天山南路经龟兹传入中原的。四弦的曲项琵琶，米兰木板画中已有，是公元三至四世纪的作品。常任侠更认为古代文献中所谓“胡琵琶”，就是龟兹琵琶。龟兹琵琶的名称，最早见于《通典》卷一四六，书中说：“后魏平中原，复获之

(龟兹乐)。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龟兹琵琶也叫胡琵琶,《北史》卷九十二《恩幸传》记载:"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曹氏三代世传龟兹琵琶,所以说胡琵琶就是龟兹琵琶。又《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云:"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祇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旧五代史》卷一四五《乐志下》记载:"沛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胡琵琶和龟兹琵琶,两名可以互用。因为龟兹是胡乐的中心,所以胡琵琶也就是指龟兹琵琶。那么《通典》所谓"本出胡中",胡便指龟兹。敦煌壁画和云岗石刻都见到曲项、五弦琵琶,在北魏至唐的造像和绘画中,琵琶是横抱于怀用拨板弹奏,与后来竖抱指弹的搊弹不同。汉代琵琶初传时可能也是如此。

三是五弦琵琶,也是出于西域的乐器,大概也是出于美索不达米亚,是北朝时传入中原的。唐代时也传入日本。《通典》云:"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唐时"北国"指突厥,大概是唐时经由突厥传人。有人说五弦琵琶由印度传来,不知所据。

(三)其他乐器

筚篥、胡笳、胡角、胡笛都是吹奏乐器。筚篥是以芦茎为簧,短竹为管的竖笛。筚篥是一种簧管乐器,初用骨器,后改用竹子,以芦为簧,以竹为管,管有九孔,竖吹发音。汉代传人内地,山东孝堂山石刻第十石第二层有屈足跪吹筚篥的图像。初传人时,有时写作"必栗"、"悲篥"、"贝篥"。南朝宋何承天《纂文》云:"必栗者,羌胡乐器也"。《通典》卷一四四《乐》四云:"本名

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筚篥来自龟兹，有人以为出于天竺，来自中亚，经龟兹传入内地。唐代诗人李颀《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云：“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2]。唐时传入日本，日本正仓院现在还保存有唐代的筚篥，其形制和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筚篥歌》诗中描绘的一样，“剪削乾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3]。

胡笳，笳或作葭，因为卷葭叶而吹，后来游牧民族用芦苇制成哨子，装在羊角管内吹奏，以便放牧，称为胡笳。傅玄《笳赋序》云：“吹叶为声。”[4]《通典》卷一四四引杜挚《笳赋》云：“李伯阳入西戎所造”，出于传说。笳是匈奴人常用乐器，李陵《答苏武书》描写匈奴：“胡笳互动，暮马悲鸣。”[5]东汉末蔡文姬被匈奴所掳，留左贤王部伍中，闻笳而作十八拍，即所谓《胡笳十八拍》。东汉有《胡笳调》和《胡笳录》各一卷，后来《笳吹乐章》录有六十七章乐曲，其中有《婆罗门引》、《明光曲》和《法座引》等梵曲。所以有人说这是佛教盛行下，中亚和北印度各族的乐曲。传说张骞归传其法。有大胡笳、小胡笳，传入内地后，一直用为军乐器。

胡角是羌族牧马人用牛角制成的乐器，据《古今注》，张骞将胡角带入长安，同时带来了《摩诃兜勒曲》。《晋书》卷二十三《乐志》下云：“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乃用之。”《通典》卷一四四云：“或出羌胡，以惊中国马。”角在后来高昌乐中演变成牛角形的铜

角，声音雄壮，作为军中乐器，能产生振兴士气惊吓敌兵的作用。所以有人说："角，原名拔逻回，发惊军之音"[6]。这种铜角后来还是民间鼓吹乐中的一种主要乐器，称为号筒，俗称大喇叭。

胡笛是汉代中国音乐家根据羌笛加以改进而成的吹奏乐器。据说梨俱吠陀时代印度人已用使用的乐器 vana，就是笛。羌人的笛可能与印度此种乐器有联系。中国传统乐器中有笛，后又传入羌笛，汉时写作"邃"，即竹制直吹单管的洞箫。最初只有四孔，约公元前一世纪传至中原地区，并增加一孔。后经改进发展为六孔。应劭《风俗通义》卷六云：笛"汉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其后又有羌笛。"徐坚等《初学记》卷十六不同意汉时才有笛的说法，云："宋玉有《笛赋》，（宋）玉在汉前，恐此说非也。"又《西京杂记》卷一记载："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笛长二尺三寸，六孔，铭曰昭华之琯。"汉武帝时丘仲对羌笛进行改造，制成胡笛，乐声动听，受到汉地人民的喜爱。《初学记》同卷引东汉李尤《笛铭》云："剡削长干，二孔修长。□□□□，出自西凉。流离浩荡，壮士抑扬。"马融好笛，自称"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律，鼓琴吹笛"。因闻雒客于旅舍以笛吹奏《气出》、《精列》、《相和》诸曲，"悲而乐之"，又以前人曾作箫、琴、笙等颂，而无人赋笛，遂作《长笛赋》。赋中说："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辞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7]据说笛和羌族牧马人自古联系在一起，最初也像笳和筚篥一样，用羊骨或鸟类骨头制作，后来才改用竹木。《通典》卷一四四《乐》四云："汉灵帝好胡笛。

《宋书》云"有胡笛出于胡吹"，即谓此。

另外还有金钲，属打击乐器，《文献通考》引韦昭说："丁宁，钲也。……胡乐铜钲，如大铜鉴，似铜盘，悬于簴（悬挂钟、磬的木架两侧的柱）而击之，南蛮之器"。

（四）乐曲

乐曲是伴随乐器的传入而来。如上所云，张骞从西域归来带回了胡角，同时带来了《摩诃兜勒曲》，当时仅两支曲子。"摩诃"，梵文是大的意思，"兜勒"则不详其义。日本学者桑原陟藏解为"大伎乐"，并以为可能是六朝时传入，但自己亦不能肯定。武帝宫廷乐师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即二十八支曲子，从而使汉代音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上引《晋书·乐志》，这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乃用之"。班超初拜长史，曾"假鼓吹幢麾"。魏晋以后，李延年二十八解不复具存，只存十曲，即《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一作"枝"）杨》、《望行人》。

李延年曾对汉乐进行过很大的改革，据蔡邕《礼乐志》记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颂，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其乐凡有四品（即四部，四套乐曲），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黄门鼓吹，天子享乐群臣用之。四曰短箫铙歌，军中用之。"其中鼓吹和铙歌两类就是新造的乐曲，以胡乐为主，所用乐器为鼓、钲、箫、笳，源于

北狄。《汉书》卷一一百《叙传》云："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鼓吹曲，汉初边军用之，以壮声威，后渐用于朝廷。东汉明帝时，乐分四品，其中有"横吹"，军中马上所奏者，与鼓吹同为军乐。《后汉书·班超传》注引《古今乐》云："横吹，胡乐也。"

二 杂技

汉代音乐演奏时又有杂技表演。中国有传统的杂技，称角抵，秦汉时的角抵是一种技艺表演，大约同现代的摔跤相似。汉武帝时角抵泛称各种乐舞杂技，发展成为名目繁多的"百戏"。于是角抵与百戏通用，成为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东汉张衡《西京赋》有"程角抵之妙戏，"其内容不仅仅是角抵，实际上包括了各种杂技幻术，如戴杆、走索、倒立、扛鼎、寻橦、跳丸、弄剑、吞刀、吐火以及鱼龙变化、戏狮搏兽等等。汉代杂技的发展跟西域杂技魔术的传入有关，明王圻《三才图会》云："百戏起于秦汉，有弄瓯、吞剑、走火、缘竿、秋千等类，不可枚举。今宫中之戏亦如之，大率其术皆西域来耳。"

汉代传入了西域的魔术和杂技。武帝时，安息使者来汉，带来了犁轩（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善眩人，会变种种奇幻的魔术，"眩人变化奇幻，口中吐火，自缚自解"。《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云："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鬓，长四尺五寸。"张星烺据其形状，以为"其为

欧人，已无可疑”[8]。成帝时西域人成批到内地，在长安长杨宫表演“大校猎”，即人兽相搏，表演者受到朝廷的封赏。《汉书》颜师古注云：“眩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掸国（在今缅甸北部）国王雍由调又一次遣使至洛阳朝贺，使团向汉献乐及大秦幻人（杂技艺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千”可能是“十”字之误，跳丸也叫弄丸、飞丸，古代百戏节目，表演者两手快速地连续地抛接若干弹丸，同时连续抛接上千弹丸，不可想像。也有抛接短剑的，则称跳剑，或弄剑。跳丸以同时掷丸数多少区别难度大小和技艺高低，通常四、六丸已经不易，同时能掷十丸，更为罕见。而《魏略》记载大秦幻人则能吐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第二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掸国乐和大秦幻人的表演当然是重要内容。安帝欣赏了这些节目后，高兴之余，“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缯彩各有差”。

这些西域传入的杂技、魔术进入汉朝宫廷，并流向社会，使汉代的杂技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刘昭《礼仪志》注引蔡质《汉仪》云：“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舍利从西方来，戏于庭，……化为比目鱼，又化为黄龙。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中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对面相逢，切肩不倾。又蹋局出身，藏衫于斗中，钟磬并作，乐毕，作鱼龙曼延。”《艺文类聚》卷六十一引张衡《西京赋》、傅玄《正都赋》，同书卷六十三引李尤

《平乐观赋》等作品中都有对杂技魔术活动的精彩描写。如张衡《西京赋》所写:"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李尤《平乐观赋》描写汉庭新年来临时的游戏活动非常生动:"尔乃太和隆平,万国肃清,殊方重译,绝域造庭。四表交会,抱珍远并,杂踏归谊,集于春正。玩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鞉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刀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限一,逾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窃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偶;禽鹿六驳,白象朱首,鱼龙曼延,隈延山阜;龟螭蟾蜍,掣琴鼓缶。"在考古发现的汉代石刻画像上,我们可以看到跳丸、吐火、弄蛇、走绳、戴竿等种种表演情景,跳丸的内容,有一人同时飞四短剑和两丸的,旁有鼓乐为之伴奏。《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提到夫甘都卢国,颜师古注云:"都卢国人劲捷,善缘高。故张衡《西京赋》云:'乌获扛鼎,都卢寻橦(橦字之误)。'又曰:'非都卢之轻矫,孰能超而究升也。'"

有人据十二块汉代画像石的内容考证出十种娱乐情形。这十二块画像石有武梁祠画像石,孝堂山画像石,临淄文庙画像石,济宁两城山画像石,登封县开母庙阙画像石,嘉祥隋家庄阙庙画像石,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藏汉画像石,前东京帝室博物馆藏画像石,永初戴氏画像石(出两城山,端方旧藏,后为法国人所得,有正书局出版汉画第一集有拓片),中央研究院所藏画像石。十种杂技百戏为(1)侧立舞戏;(2)寻橦;(3)弄丸;(4)殽

抵戏;(5)马戏;(6)翻筋斗戏;(7)弄剑戏;(8)倒行;(9)蹋鞠;(10)对舞[9]。据张衡《西京赋》、傅玄《正都赋》、李尤《平乐观赋》的描写,寻橦即爬高竿,又叫险竿,缘竿作惊险动作。橦即高竿,《后汉书·马融传》有"揭鸣鸢之修橦",章怀太子注云:"橦,旗之竿也。"寻橦之戏,据诸赋描写,有的建橦于车,有的立于平地,有的立于人之额上,或牙齿上,两伎缘橦而上;有一种难度更大,立木橦于车上,长二丈,以马数匹驾车疾驰。两伎缘橦而上,橦顶又置横木,两伎至顶,则各坐一端,或作鸟飞,或侧挂横木。

西域诸国向中国进贡杂技魔术艺术和艺人,远在先秦时就有记载。汉代仍有同样的记录,汉朝统治者喜欢用杂技魔术娱乐和招待胡客。这跟杂技魔术这类艺术的特点有关。杂技魔术是诉诸于视觉的艺术,不需要语言作为媒介便可理解,这很适合在语言不通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因此成为当时重要的外交活动。汉文帝时贾谊就说:"上即獠胡也,大角抵也。"[10]汉代的杂技项目因吸收了西域的因素而更加丰富多彩,影响深远。据北宋陈旸《乐书》记载,汉代的许多杂技至唐代仍有表演,"汉世之撞末伎、舞盘伎、长矫伎、跳铃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峡伎、高绠伎、猕猴幢伎、缘竿伎、椀株伎、丹朱伎,唐世并存"。其中有的表演流传到今天。

三　其他造形艺术

汉代造型艺术如石雕图像、织物图案、画像石、铜镜上的图

像、绘画、墓室壁画等，在主题、题材、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常常看到希腊、罗马艺术、犍陀罗艺术、佛教艺术以及西域各种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又作乾陀罗，或健陀逻，古印度地名或国名，梵文作Gāndhāra。相当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公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亚历山大入侵其地，希腊文化艺术曾影响这一地区。公元前三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遣僧人来此传布佛教，后逐渐形成犍陀罗式的佛教艺术。公元一世纪时大月氏人入据此地，后建立贵霜王国，至二世纪初贵霜王朝强盛时期成为迦腻色伽王统治中心。首都布路沙布罗（即富楼沙，今白沙瓦）当建于此时。后贵霜势衰，又为厌哒人所占。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特色是以希腊式的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的题材，特别是佛教内容，有时是直接模仿罗马题材。其艺术形式主要有绘画、雕刻、雕塑、工艺美术和建筑式样等，出现了大量精美的艺术品。东汉时期，由于贵霜王朝的势力达到葱岭以东和印度商人的贸易活动，犍陀罗艺术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同时把希腊、罗马的艺术主题、题材和风格也带到新疆地区。新疆地区汉代遗址出土的毛织物，有犍陀罗艺术题材和风格。二十世纪初，斯坦因在楼兰遗址汉墓中发现的一块毛织物残片，上有希腊、罗马题材中的赫尔美士头像。还有一块地毯残片，图案主题是中国传统的云雷纹，却连有一匹具有波斯风格的有翼的马，而镶边图案却又是希腊罗马式的。科兹洛夫在蒙古诺音乌拉发现的汉代纺织品织物上，也见到这种有翼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卷二十一据此以为埃及织成技术传入了新疆地区，是出于误会。

根据这些纺织品的织法，可以判断它们都是新疆本地织成的，因为采用的是中国早就有的通经断纬的织法。实际上，新疆地区的织工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和犍陀罗艺术的题材和风格。

汉代石雕图像主要有圆雕动物、透雕动物纹饰、石刻和画像石，以及大型镇墓兽石狮、石马和天禄、辟邪，其中都有西域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影响。战国以来出现的透雕动物纹饰牌和动物格斗题材在汉代有新的发展。据萨尔蒙尼（A. Salmony）《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中图版 XXVIII[11]，安特生（J. G. Andersson）《鄂尔多斯青铜器选集》中图版 IX2[12]，汉代透雕动物纹饰牌中有许多表现双驼、虎食鹿、虎驼相斗的饰牌。骆驼出产于新疆、内蒙和中亚细亚，在汉代西北丝路交通中发挥了沙漠之舟的作用，在当时成为新的艺术题材。虎食鹿和其他动物博斗形象是欧亚草原文化的一个具有特色的内容，由此可见草原文化对汉代艺术风格的影响。

有人指出，汉代动物纹饰题材和造型风格发生了一个明显变化，其重要表现是大型镇墓兽石狮、石马和天禄、辟邪、有翼兽代替了过去的圆雕动物形象[13]。狮子和有翼兽是流行于古代波斯的艺术形象，著名的古波斯阿塔萨斯（Artaxerxds）宫前石狮，有展翅式三叠飞翼。在汉代中国与波斯的交往和交流中，中国的造型艺术受到波斯艺术的影响，狮子和有翼兽成为圆雕动物艺术的新题材。这种造型艺术传入中国也表现出变形、简化或中国化的倾向。山东嘉祥武氏祠石阙前石狮子已经没有了翅膀，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石狮子虽有飞翼，但比之波斯三叠飞翼简化为肥短的二重翅翼。有翼兽传入中国当在汉代以前，1974

年,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就出土一对错银铜双翼兽,兽首高昂,作展翅振飞状,形态和南朝齐武帝、梁武帝陵前石兽很相似。1976 年苏州虎丘农机厂出土汉代辟邪形铜座,属同类有翼狮形兽,据铭文为汉成帝河平元年(前 28 年)的器物。说明在我国后来称为天禄、辟邪的有翼狮形神兽艺术品早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已经产生。汉代的天禄、辟邪形象类似草原游牧民族斯基泰民族流行的鹰头兽的形象,还带有波斯艺术中有翼兽的色彩,起初用于宫殿门前装饰。《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灵帝命宋典缮修南宫玉堂,使掖庭令毕岚于云台殿前铸天禄、虾蟆。同书《灵帝纪》记载,灵帝中平三年(186 年)春,"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章怀太子注云:"天禄,兽也。……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据此,即天禄、辟邪并兽名也。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天禄阁建于汉高祖刘邦时的皇家图书馆,取名未必是来自兽名。而宗资为东汉桓帝时人,其墓前石兽膊上各刻"天禄"、"辟邪"字,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后汉天禄、辟邪字"条亦记其事。两宋之交的赵明诚在《金石录》卷十五记载:"汉州辅墓石膊字,其一辟邪,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州辅亦桓帝时人。说明东汉桓帝时天禄、辟邪作为灵兽的形象在中国中原地区已经产生。云南晋宁石寨山 7 号墓出土一件盾牌形有翼虎错金嵌银带扣,当是经过中印西南缅道传入的。有人认为传播这种艺术的是散居中亚、天山南北和印度河流域的塞人,最早是通过蒙古草原由西伯利亚南部传入中国北方。

画像石出现于西汉末和东汉初，类似埃及的浅浮雕，图案则有西域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影响，如马、狮、象、骆驼、有翼兽、有翼天禄、鹰头兽、裸体人像等。还有的画像石上刻划有杂技百戏的内容。如上所述，有人据汉代12块画像石的内容考证出的10种杂技百戏，明显地表现出西域娱乐的内容。四川新都王稚子两阙的画像石有狮子和象。山东肥城西南孝堂山石室造于公元一世纪初，其东壁第三层画像石上有骆驼和象并立。山东两城山画像石作于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第十六石上层前有飞翼天禄，后有双峰骆驼和象。鹰头兽是草原文化富有特色的内容，1981年，陕西神木出土匈奴圆雕金鹿形鹰头兽，那种半鹰半兽的形象完全出于想象和幻想。这种图像在汉代已经通过天山北路和西伯利亚南部传入天山南路和黄河流域。十九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于阗附近约特竿发现过这种雕塑，1953年发掘的山东沂南汉墓，中室有八角擎天石柱，北面图像有鹰头有翼兽和有翼牛，西面画像有有翼白虎和带翼麒麟，墓葬年代为二世纪中叶。汉代孝堂山石刻和嘉祥武氏祠石刻都有翼形兽，四川彭山崖墓和河南南阳石刻也有这种图像。说明当时这已经是一种和中国传统艺术融和在一起的艺术表现手法。

汉代画像石中有不少有翼人物像，在内容题材、表现手法和艺术构思等方面，显然是接受了古代波斯艺术和希腊罗马雕刻艺术的影响的产物。十九世纪末，在大夏故地发现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二世纪阿姆河宝藏中常常见到装饰有翼兽的文物。据考证，有翼兽表现的是火祆教神，其产生和火祆教流行大夏有关。希腊、罗马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中盛行裸体有翼的神像和人物像，

如常见的有翼天使、爱神埃洛斯。此种艺术题材和风格伴随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结合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和艺术传统而发生某种变形。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西王母,居昆仑山,又有周穆王西征见西王母的故事。汉代石刻和铜镜上常有西王母的图像,同时又以穆天子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东王公与西王母相配。汉代画像石上东王公和西王母都肩生双翼。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八角擎天石柱正面刻着东王公和西王母,嘉祥武梁祠石刻也有东王公参谒西王母的图像。河南唐河针织厂汉墓出土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用剔地浅浮雕,内容有羽人、有翼白虎、苍龙,四神图中之龙、虎都带翼。此墓葬时间属东汉早期。兴建于桓帝建和元年(147 年)的山东嘉祥武氏祠被视为东汉晚期画像石的宝库,前后左右画像石中有许多带翼的羽人,姿态各异。石室第一石画像的顶部三角形中央,有翼神仙的左右各刻有翼人像,作供养状。前石室第五石顶部三角形内,左右相对也刻划着有翼人物。后石室第二石上层有两个有翼神仙,下层上部出现有翼的男女神像,云层中也列有许多有翼人物。第五石第一层刻着三匹有翼的马,骑者都有飞翼,云中也有许多有翼人物。第三层左方雕刻的是两排有四翼的人,各自乘龙飞腾,另有一神仙执幡接引。左右石室第二石上部三角形中央,也有带翼神仙端坐,周围供养人亦有翼。

汉代画像石有一些人首兽身而有翼的雕刻画像,则是受到古代亚述和波斯艺术的影响。佛朗克(J. R. Franke)《艺术史手册》提到公元九世纪亚述王阿苏纳西帕尔(Ashurnasirpal)二世宫殿中有人首有翼牛身雕像[14]。波斯古都波斯帕里斯也有这

种雕刻。虽然此类雕刻在中国比较少见，此类艺术题材的影响却是有明显例证的，它大都和中国传统艺术融合而别具一格。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是江苏沛县栖山东汉初期墓画像石中刻有西王母的形象，还有人首蛇身、马首人身、鸟首人身、人首鸟身的图像。洛阳卜千秋墓建于西汉昭帝和宣帝之间（前 86—49 年），墓门内上额壁画画的是人首鸟身像，象征升仙。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室第二石画像顶部三角形中有翼神仙左右，有一些人首兽身的有翼人物。此类画像既脱胎于亚述、波斯艺术，也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有翼天使和蛇形怪人而有飞翼的神像石雕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到春秋战国时期，长生不死的观念发展为修炼成仙的思想。因此在中国很早便有“人得道，身生毛羽也”之说[15]。东汉末年的王充在《论衡·无形篇》中说：“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汉代那些人首兽身或鸟首人身而又有翼的神仙图像，便是在中国古代神仙观念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以及波期艺术观念成分的艺术作品。

汉代画像石中有一些裸体人像，这是一种与中国艺术传统题材不同的内容，溯其源头，则当来自希腊罗马的裸体石雕和绘画艺术。希腊、罗马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中盛行裸体神像和人物像，常见的有翼天使是裸体的，爱神埃洛斯也是有翼裸体。在中国见到的裸体人像最早的出现于西汉末年。1969 年，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一件绿釉陶树，座部贴有泥塑的裸体人、猿猴、飞蝉、奔马等。新疆和阗买力克阿瓦提遗址采集到人头、兽头和肩负小罐的裸体人陶片，都是细泥红陶，高二至五

厘米,时代属于西汉末年,可以作为裸体人像的艺术题材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路标。这种裸体人像题材也反映到汉代画像石的石刻图像中。滕固《南阳汉画石刻之历史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讲到南阳汉代画像石中有裸体舞的图象[16]。画像石中裸体舞题材是生活中的裸体舞的反映,这种舞蹈和此类画像都是外来的艺术,出于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歌舞。山东嘉祥吴家庄画像石上有裸体力士支承屋盖,有人认为与希腊神话中大力神海克利士支撑大地的形象相似。山东曲阜颜氏乐园画像石有裸体力士相搏雕像。嘉祥武氏祠祥瑞图"浪井",有二裸体男子,石室后壁第四层有二裸体男子相随攀树。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石刻也有裸体力士。

汉代与画像石相类的艺术,还有画像砖。其内容也有西域题材,1978 年在四川新都发现的画像砖,上有双峰骆驼,中置建鼓,两侧有击鼓人,列入官吏仪仗队。

汉代铜镜制作工巧,常常采用西域传入的动植物如葡萄、有翼兽、石榴、海兽、飞马、狮、犀、大象、孔雀、宝相花等作装饰图案。据《宁寿古鉴》诸书著录,大部分汉镜直径仅三寸三、四分,也有大到直径九寸六分的。通常称为海兽葡萄镜或海马葡萄镜的汉代铜镜,内层刻有翼飞马和海兽,外层列各种珍禽,以结枝葡萄和石榴作装饰图案。有一枚海兽葡萄镜图像十分繁富,内轮铸有六头海兽,有的作立状,有的作伏状,有的昂首高耸,有的纵身跳跃,中间隔有三匹有翼飞马,空间绕以结枝葡萄。外轮铸有四头海兽和两匹飞马,各以鸾凤、孔雀等六只禽鸟相间,又以结枝葡萄作点缀。海兽的图像出现在汉代工艺品上,是印度洋

海上交通发展的反映。在“海兽葡萄镜”或“舞凤狻猊镜”钮上，有怪兽，有人称为麒麟，似鹿，狮子头，角在鼻上。汉代孝堂山祠堂及六朝汉式镜上的孔雀，线条优美，姿态生动，为西徐亚式，而夹有汉代朴素雄伟与印度怪异之兴味。汉代的铜镜有的纯为中国式，有的则在花纹图案中杂有西域意味，如刻有葡萄等外来植物。汉代铜镜装饰图案明显受到印度和西方风格的影响。拜占庭时期，罗马赖文那出土古棺，在葡萄唐草纹饰中刻有孔雀，象征不死的灵鸟。萨珊波斯和拜占庭装饰图像中流行飞马和狮子题材。则自通西域后，西域各国商人一定有将此类工艺品输入者，而中国铜镜工匠则吸收或参用了此类纹饰图案。

汉代保存下来的绘画作品主要是墓室壁画，这些壁画也表现出外来因素的影响。希腊罗马流行的忍冬纹图案在西汉时已开始在中国流行，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中便有忍冬纹，可能是汉地所见最早的此种图案。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屏风用忍冬纹装饰，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丝织物上绣有忍冬图形。此后忍冬纹成为一种变化繁富的装饰纹样，成为佛教石窟壁画主要的装饰图案。汉明帝时派人到天竺求佛，回来时得到了画在棉布（白叠）上的佛像，这是佛教美术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1971年，内蒙和林格尔发现的东汉墓壁画上有“仙人骑白象”的内容，乃西域佛画题材。

汉代瓦当纹有兔，却带翼。牛羊为汉地装饰图案，亦作西域艺术形态。汉墓中出土有胡俑，面目服装，皆为胡人。据其形象判断，当时已有胡人在中国为奴者。在汉代的一些文物中，还出现女子裸体舞蹈的形象，一般认为是受了西域舞蹈艺术的影响。

西域艺术的传入，推动了汉地艺术水平的提高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张星烺说："据近代美学家之研究，汉以前，中国之绘画雕刻，简单幼稚。其构思及体裁，虽庄重古雅，而粗朴怪奇，变化太少，陈陈相因。及武帝以后，美术界忽然大进步，古代朴陋生硬之风尽脱，渐臻自然精致之域。往往现汉代以前未曾有之新画象。其至今尚遗存者为汉代之古青铜镜，及山东济宁道嘉祥县南紫云山（一名武宅山，又名武翟山）之汉武氏祠石之石刻画象。颇有昔日之欧风焉，是皆希腊文化之影响也。"[17]

汉代统治者喜爱西域生活方式，造成东汉末年的胡化风尚。《后汉书》卷二十三《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据《拾遗记》卷六记载，灵帝于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澈，乘船以游漾，使宫人乘之，又选玉色轻体者执篙划船。盛暑之时，故意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令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宫人"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使以余汁人渠，名曰流香渠。"显然此种生活方式受外来风气影响。上行下效，贵族们竞以效仿西域生活方式为尚，于是西域各国之服饰与乐器大量传人。

有人据此认为，由于汉灵帝的提倡，所以东汉末年西域文化的传播达到了高潮，从汉宫到京师洛阳，从京师到广大社会，盛行西域风尚。实际上这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见解。从汉武帝时起，由于汉通西域，西域大量物品传人，丰富多彩而又新奇有趣的异域风物以及生活方式，越来越引起上层贵族社会的爱好，于

是追求异域特色的珍奇物品和生活方式成为其奢侈生活的一部分。《三辅黄图》卷三记载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马，充塞其中。"同书同卷记载曜华宫云："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珍禽怪兽毕有，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梁冀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汉书·梁冀传》记载，桓帝时，梁冀当权，"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梁冀与其妻孙寿皆大起第舍，"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藏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苑囿，……奇禽驯兽，飞走其间。"不要说皇帝权臣，连当时豪富之家也喜好异域之物，据《三辅黄图》卷四记载，茂陵富民袁广汉筑园，"奇禽珍兽，委积其间"。说明此风已弥漫朝野和社会上下。灵帝喜好西域生活方式，是长期以来汉代此种社会风气流行的结果。

注　释

〔1〕《北堂书钞》卷一一〇引，见严可均《全晋文》卷45，1716页。

〔2〕《全唐诗》卷一三三，中华书局，1979年，1354页。

〔3〕《白居易集》卷二十一，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460页。

〔4〕《文选》卷四十一，李陵《与苏武书》李善注引，上海书店，1988年，571页。

〔5〕同上李陵《与苏武书》。

〔6〕《胡俨集》，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6页。

〔7〕前揭《文选》卷十八，234页。

〔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11 页。

〔9〕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 年,169 页。

〔10〕贾谊《新书》卷四,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年,478 页。

〔11〕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1933 年,巴黎。

〔12〕Selected Ordos Bronzes,《远东博物馆馆刊》(BMFEA),1933 年 5 期。

〔13〕塔恩(Tarn)《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剑桥,1938 年。

〔14〕佛朗克(J. R Franke)《艺术史手册》(An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Art history),1956 年,纽约,修订本,11 页,图 B。

〔15〕王逸《楚辞·远游》注。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57 年,267 页。

〔16〕《张菊生先生七十寿辰纪念论文集》,见前揭沈福伟书,72 页。

〔17〕前揭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古代中国与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20 页。

第十二章　余　论

秦汉时期是丝绸之路或曰中西交通和交流的开拓时期，这种开拓以先秦时期东西方交通和交流为前提和基础，但在规模和成就上却是空前的。按照我们的认识，在全部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史上，这一时期特别是张骞出使西域以后的两汉时期都堪称一个高潮，而且是第一次高潮，不仅在当时成果丰硕，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外交往从此发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文化交流一经产生，就像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江河，其本身潜在的动因推动这种交流必然发展下去，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

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某某时期中西间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由于某种原因中断了。正史中没有记载，或者没有官方的交往，并不说明交流不存在。事实上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交往和交流活动大量的不见于记载，国内外考古学方面的成果不断地揭示这一事实，而通过考古能够说明的问题又是多么有限！没有什么因素能阻止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高山大海能阻断人们的交流吗？即便在人类征服能力非常有限的远古时代，自然环境也没有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战争能导致中断吗？正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的，战争不仅不造成交流的中断，战争本身还是文化交流的途径之一。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文

化交流是一波又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地持续发展的，而且随着交通条件的日益进步，交流的方式、途径也越来越多种多样。汉代以后，中西间交通和文化交流之河越来越宽广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再过 10 年、20 年，或者半个世纪和更远的将来，人类间文化交流的条件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无法想像。

尽管我们认为中国的先秦时期，中西间文化交流就已经发生，但得到国家有效的组织、有意识的提倡和大力推行，并形成较大规模，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汉武帝在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从他开始，不仅两汉历朝统治者，而且中国历代历朝统治者都大力开展以朝贡贸易为主的交往活动。然而，对于统治阶级所开展的对外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价值和作用，历来存在不同认识和评价，褒贬不一。汉武帝是大力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的第一位皇帝，因此历来成为议论的中心人物，对其开拓西域的动机和功过有很多议论和评价。实际上这些议论集中代表和反映了历代中国人在制订对外政策、处理对外关系以及开展外交活动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汉武帝开拓西域是从派遣张骞出使开始的，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什么？张骞之后汉朝不断遣使外出，使者相望于道，其动机是什么？汉武帝苦心经营西域，甚至不惜代价，远征大宛，其动机又是什么？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武帝遣使西域乃受求仙思想之支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见于大秦传中之中国思想》一文中，曾推断张骞西使之随员中，必有深

信可见西王母者。因为张骞向武帝的报告中说道:“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有人认为张骞出使西域,纯为经济目的,有的说是为了推广当时生产过剩之丝,张骞一再出使,等于率领经济考察团西行,考察丝绸市场。西方多有赞成其说者,如洛威尔·多玛斯(Lowell. Thomas)等。他们认为汉之经营西域,非为对付匈奴,其目的实在通商。汉之征服匈奴,乃欲开西域,并不是开西域以征服匈奴。有人认为汉武帝通西域,伐大宛,是为了改良马种。他们认为李广利征大宛,出马三万余匹,获大宛马三千匹,如果不是为了改良马种的话,武帝不会这样做。也有人认为汉武帝交通西域,其目的在于追求珍禽异兽,满足统治的奢侈生活和精神享受。

上述看法存在倒果为因或以偏概全的倾向。汉朝经营西域,从汉武帝个人的动机心理来看,其实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的有关记载就反映了这种变化的轨迹。关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本传云:“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使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说明汉武帝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非常单纯的,便是拉拢和联合与匈奴有仇的月氏人共击匈奴。自汉建立直到武帝时,匈奴的侵扰成为汉朝心腹之患,汉朝统治者为此坐不安席。汉武帝方欲反击匈奴,双方力量强弱优劣之势对比还不明朗,其战争走向尚难逆料,能够得到地处西域的盟军,造成对匈奴的夹击之势,则会增加一分胜利的希望。此时汉武帝不可能顾及其他,更何况由于长期的隔

绝状态，其时汉朝对西域了解甚少，也不可能产生对西域物产包括大宛良马的企求。

十余年后，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汇报了西域见闻，这是汉武帝心理变化的契机。《史记·大宛传》记载，武帝闻张骞报告后，欲开辟西南经身毒至大夏的通道，其用意是："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其交通西域的目的，袒露得淋漓尽致。一是西域"多奇物"，可以满足奢侈生活需要；二是兵弱之国，容易征服，他们又贵汉财物，可以利诱；兵强之国，也可以用贿赂的方式拉拢之，如果征服和利诱两招成功的话，"以义属之"，可以广地万里；三是显示皇帝威德广被，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司马迁叙事之间，分明暗示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虚荣心理的滋长。汉武帝此种心理的产生有特定的背景。当张骞从西域返回的这一年，汉朝刚刚取得对匈奴战争的第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西汉完全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又设立了朔方、五原二郡，募民屯边，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基地。

张骞经身毒通大夏的道路没有走通，武帝交通大夏诸国的愿望却日益强烈。当对匈奴的战争再次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汉与"大夏之属"诸如大宛、康居等不存在夹击匈奴的问题，那么汉武帝欲通大夏等，分明是希望得到西域诸国之"奇物"。张骞建议联络乌孙，他能够打动武帝的理

由有两个，一是招乌孙居“浑邪之地”，“断匈奴右臂”；二是“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结果“天子以为然”。当张骞出使乌孙时，便“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则是其好大喜功心理付诸实践。副使至诸国，为广地和宣威。汉武帝了解到西域诸国对中国丝绸的喜爱，所以当作礼品相赠送，目的则是借此换取“大夏之属”为“外臣”。其目的在于政治意义，并不是经济意义。认为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出于经济目的并不确当。

张骞随行副使分别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于弥及诸旁国，各国皆遣使入汉。武帝在获取各国贡物的同时，对西域有了更多的了解，刺激了他对西域诸国珍奇物产的欲求。企图以黄金换取大宛名马，求取不得时发兵远征便是在这一心理背景下发生的。李广利率军远征，过去仅从求取名马探求其原因。有人不赞成其说，认为汉武帝虽多欲，不失为英明之主，不致发兵 18 万，以求数十匹善马，贵畜贱人，一至于此。武帝非为求天马而伐大宛，亦非为改良马种而出兵西域。其主要动机是与中亚诸国建立联盟，以对付匈奴。据《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前 110 年），帝巡边至朔方，勒兵 18 万，威震匈奴。”说明当时汉朝骑兵的战斗力已经超过匈奴，不必靠引进几十匹大宛良马来改良马种。武帝欲得大宛马，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为了改良马种，他是把大宛汗血马看作西域珍奇而求之的，更何况有方士的炫惑，以为得天马可以乘之升天。及至出师不利，而决意征服大宛，又不完全是为了得大宛马。汉武帝此

时考虑更多的是这次军事行动不能取胜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不仅宛马不能得,更重要的是汉在国际上的威望便丧失殆尽。所以不惜代价,必须维护汉朝在西域诸国间的地位,这对汉朝发展对外关系至关重要。远征大宛取胜,西域诸国望风款服,于是汉与西域的交通和交往进一步扩大。汉武帝好大喜功与奢侈享受的欲望进一步膨胀。此后包括汉武帝在内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和爱好,便大力开展与西域诸国之间的朝贡贸易。除了通过西北陆上交通与西域各国发展交往外,还遣使出南海,交通黄支、已程不国,其目的是相同的,“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海外珍异很快便充塞汉宫,汉朝则建专门的宫殿以贮积这些外来的物品,奇华殿便是这样的所在。

汉武帝开拓西域,从出于军事目的之政治外交活动演变为追求奢侈生活追求的行为,成为后世统治者此类作为的开端和先声。武帝在世时,虽然有司马迁委婉的谴责之笔,但更多的是受到臣下和文士的颂美和赞扬,表彰多于批评。在司马相如的笔下,汉使西出是大汉声威远被的见证,他的《大人赋》写道:“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航)绝浮渚而涉流沙。奄息总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这段材料大多出于古代神话传说,《史记正义》引姚丞云:“《大荒西经》云: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总极,葱岭山也,在西域中也。”而汉朝人有远涉流沙而适昆仑、三危的想象却有现实的根据,它

是汉使西行交通西域的活动在作家思想和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他的名作《上林赋》也把荔枝、葡萄等域外珍异传入中国当作盛世的物证来描写的。

但是汉武帝一死，立刻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开拓西域的行为受到社会上的批评。在范宽著名的《盐铁论》里，我们便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那些受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操纵的贤良和文学们以“贵道德而贱用兵”为理由，攻击武帝的长期用兵是“废道德而任兵革”。对汉武帝经营西域，御史大夫桑弘羊和文学之间发生了一场尖锐的争执，争论是围绕征大宛而展开的。桑弘羊说：

> 初贰师不克宛而还也，议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则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先帝（按：即武帝）绝奇听，行武威，还袭宛，宛举国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宝马。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虽未尽服，远处寒苦堉埆之地。壮者死于祁连、天山，其孤未复。故群臣议以为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可遂击服。

他极力强调远征大宛的重大意义。文学们不以为然，他们反驳说：

> 有司言外国之事，议者皆侥一时之权，不虑其后。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鸟，县官既闻如甘心焉，乃大兴师伐宛，历数期而后克之。夫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

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当此之时，将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后遣上大夫衣绣衣以兴击之。当此时，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东豪杰，颇有异心。

关于伐大宛的原因和后果，双方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在文学看来，武帝之意在于听信张骞之言，不过欲得汗血宝马、真玉大鸟而已。实际上伐大宛获宝物，连汉武帝也视为重要战果，其《封李广利为海西侯诏》云："贰师将军李广利，伐胜大宛，赖天之灵，从溯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积，士大夫径度，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于阙。其封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对此次伐宛大捷，武帝欣赏的重要内容就是获"珍怪之物"。至东汉时，武帝开拓西域之举受到更多的批判，人们大都持有与文学们相同的意见，《后汉书·杜笃传》记载，光武帝时杜笃作《论都赋》云："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拓地万里，威震八荒。……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即天竺国也），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隽。"班固虽然肯定了汉武帝击败匈奴解除了北边威胁的功劳，却也强调了武帝为求异物而扩大对外交通的动机，还批判了其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汉书·西域传赞》云：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

河曲列西郡(宋祁曰:"新本西作四"),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饷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曼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厄,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书》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

班固之后,对汉武帝开拓西域历来持否定态度。

在对外交往上，中国历代统治者只满足于扬威异域怀徕柔远之虚名，不重视在对外交往中获取实际的经济利益；只重视获取奇珍异物，不重视发展经济和生产，汉武帝开了先河。因此我们看到汉武帝开拓了西域，但他的举措却为后人所诟病。说他好大喜功，图慕虚名，奢侈浪费，穷兵黩武，将他与隋炀帝并称。唐太宗李世民说："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所批判的就是他们。据《贞观政要》卷九记载，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欲伐高丽，房玄龄表示反对，他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寡。……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曰："善！"唐代凉州都督李大亮在给唐太宗所上表章也说："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

《隋书·西域传》后史臣将秦皇、汉武和隋炀帝并列评论云：

> 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

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馑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东之祸乎！

根据这一段论述，汉武帝时“户口减半”，隋朝的灭亡，都是统治者对外政策造成的。

《隋书》由唐初宰相魏征等奉敕编撰，其著史之目的是“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王朝是在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初统治者目睹隋王朝大厦土崩瓦解的过程，深以为诫。为了谋求长治久安之术，他们时时处处以前代兴亡为鉴。在贞观君臣的论议中，经常展开对秦、汉、隋等朝灭亡的原因的探讨，他们常常把秦皇、汉武、隋炀帝的各种举措施为与其身死国灭联系起来。于是他们的对外政策和开疆拓土自然也成为其衰亡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唐初经济尚未恢复之时，贞观君臣更反对“以四夷劳中国”、“以无用害有用。”上引史臣评论，就代表了贞观之初太宗君臣的这种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武帝和隋炀帝在开拓疆域和对外交往方面的过失就被过分强调了。

我们看到，随着唐朝经济的逐步恢复，当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时，太宗也一样开始了对四夷的用兵，开展贡赐形式的对外贸易。其举措施为其实是踵武帝、炀帝余绪的。这时尽管太

宗的行为受到过臣下的批评，却动摇不了太宗扩张的决心。《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太宗灭高昌后，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褚遂良上疏反对，以为"糜费中华，以事无用"，太宗却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但是认真分析起来，汉武帝和隋炀帝开展对外交往和经济贸易，唐初君臣对武帝、炀帝行为的批评以及贞观后期唐朝的对外政策的变化，却是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同样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自命天朝上国观念，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贸易关系必然是朝贡赉赐形式。在统治者看来，与异域各国的交往不是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而是体现"上国天子"、"天可汗"对附属国的安抚之责任，是皇恩远被天下归附的表现。王莽厚赂黄支国，请黄支进贡生犀，也是为了显示天下的太平和皇恩的广被。于是当国力强盛时，则以贡赐贸易显示其皇威远被恩加四夷，而国力衰敝时，就视这种贸易活动为负担，是劳敝中国，以无益害有用。后世对汉武帝的批评也存在这一倾向。

主要参考书目

《尚书正义》〔唐〕孔颖达等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 年。

《毛诗正义》〔汉〕毛亨撰，郑玄笺，同上。

《大戴礼记》〔汉〕戴德撰，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年。

《韩诗外传》〔汉〕韩婴撰，同上。

《吕氏春秋》〔战国〕吕不韦撰，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山海经》〔晋〕郭璞注，同上。

《竹书纪年统笺》〔清〕徐文靖撰，同上。

《荀子》〔战国〕荀况撰，〔唐〕杨倞注，同上。

《庄子》〔晋〕郭象注，同上。

《史记》〔西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1982 年。

《汉书》〔东汉〕班固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年。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年。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中华书局，1959 年。

《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

《魏书》〔北齐〕魏收撰,同上。

《梁书》〔唐〕姚思廉撰,同上。

《三辅黄图校注》,何清谷校注,三秦出版社,1998 年。

《淮南子》〔汉〕刘安撰,二十二子本。

《新书》〔汉〕贾谊撰,汉魏丛书本。

《说苑》〔汉〕刘向撰,同上。

《新序》〔汉〕刘向撰,同上。

《易林》[汉]焦延寿撰,上海大通书局石印增订汉魏丛书本,宣统三年(1911 年)。

《盐铁论》〔汉〕桓宽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风俗通义》〔汉〕应劭撰,汉魏丛书本;又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5 年。

《别国洞冥记》〔汉〕郭宪撰,汉魏丛书本。

《论衡》〔汉〕王充撰,汉魏丛书本。

《全汉赋》 费振刚等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曹植集校注》〔三国·魏〕曹植撰,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

《搜神记》〔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 年。

《博物志校正》〔晋〕张华撰,范宁校正,中华书局,1980 年。

《古今注》〔晋〕崔豹撰,四库全书本。

《逸周书》〔晋〕孔晁注,汉魏丛书本。

《穆天子传》〔晋〕郭璞注,同上。

《王子年拾遗记》〔晋〕王嘉撰,同上。

《华阳国志校注》〔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

《西京杂记》〔晋〕葛洪撰,汉魏丛书本。

《抱朴子》〔晋〕葛洪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洛阳伽蓝记校注》〔北魏〕杨玄之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述异记》〔梁〕任昉撰,汉魏丛书本。

《高僧传》〔梁〕释慧皎著,中华书局,1992年。

《出三藏记集》〔梁〕释僧佑撰,中华书局,1995年。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95年。

《艺文类聚》〔唐〕欧阳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大唐西域记》〔唐〕玄奘撰,章巽校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慧立、彦悰撰,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

《通典》〔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撰,中华书局,1981年。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撰,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

《安南志略》〔越南〕黎崱撰,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

《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德〕赫尔曼(A. Germann)著,柏林,1910年。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烺著,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影印辅仁大学丛书1930年版。

《中西交通史》 向达著,中华书局,1934年。

《印度与中国:千年的文化关系》(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印度〕巴格齐(P. C. Bagchi)著,印度孟买,1950年。

《中西文化交通小史》 刘伯骥著,台湾正中书局,1953年。

《殷墟卜辞综述》 陈梦家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

《西突厥史料》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

《中亚古国史》 〔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华书局,1958年。

《观堂集林》 王国维著,中华书局,1959年。

《大秦国全录》 〔德〕夏德著,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

《中国伊朗编》 〔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商务印务馆,1964年。

《草原艺术》(The Art in Prairie) 〔美〕杰特曼(K. Jettman)著,纽约,1967年。

《汉与罗马》(汉とロ－マ) 〔日本〕护雅夫著,日本平凡社,1970年。

《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1972 年。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英〕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钟槐译,商务印书馆,1974 年。

《巴基斯坦简史》〔巴基斯坦〕A. H. 达尼著,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4 年。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吕澂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吕澂著,中华书局,1979 年。

《中西交通史》 方豪著,岳麓书社,1987 年。

《寒柳堂集》 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西域地名》 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中华书局,1980 年。

《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编年史》〔罗马〕塔西佗(C. Tacitus)撰,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

《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 常任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

《古代中越关系史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殷墟玉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2 年。

《丝路史话》 陈良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年。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 年。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季羡林著,三联书店,1983 年。

《新疆考古三十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朱杰勤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 北京大学历史系、东语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中国甲骨学史》 吴浩坤、潘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 〔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

《中西文化交流史》 沈福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傅天仇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毛昭晰等译,三联书店,1985 年。

《中国美术全编·绘画编》(1) 张安治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年。

《匈奴通史》 林幹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夏鼐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中国染织史》 吴淑生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中国民族史》 吕思勉著,东方出版中心,1987 年。

《中外文化交流史》 周一良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古西行记选注》 杨建新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中印文学关系源流》 郁龙余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 周菁葆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中国美术全编·工艺美术编》(10) 杨伯达主编，文物出版社，1987 年。

《中国佛教研究史》 梁启超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 年。

《中国上古神话》 刘城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金维诺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5)，段文杰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

《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 张广达、王小甫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 年。

《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 汶江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

《中国杂技史》 傅起凤、傅腾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中国舞蹈发展史》 王克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广州外贸两千年》 陈伯坚主编，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年。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苏联〕列·谢·瓦西里耶夫著，

文物出版社,1989 年。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英〕李约瑟著,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 马雍著,文物出版社,1990 年。

《七海扬帆》 姚楠等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 年。

《丝绸之路史研究》 〔日〕长泽和俊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 季羡林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今古文尚书全译》 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年。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 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年。

《世界历史》(上古部分) 朱龙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佛教史》 杜继文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 吴焯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

《海上丝绸之路》 陈高华等著,海洋出版社,1991 年。

《中亚佛教艺术》 许建英、何汉民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 年。

《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

《越南通史》〔越南〕陈重金著,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 年。

《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 陈玉龙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哈密文物志》 本书编纂组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王炳华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张维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

《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 张志尧主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年。

《丝绸古道上的文化》〔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年。

《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 王树英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年。

《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 黄时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 王孝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美〕弗雷德里·J·梯加特著,丘进译,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

《秦汉交通史稿》 王子今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西周史》〔美〕许倬云著,三联书店,1995年。

《西域史地丛稿初编》 张广达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 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 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孙毓棠著,中华书局,1995年。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 江玉祥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丝路文化》(海上卷) 刘迎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丝路文化》(草原卷) 刘迎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丝路文化》(吐蕃卷) 张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丝路文化》(沙漠卷) 黄新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丝路文化》(西南卷) 邓廷良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